

俄國革命全史

俄國博克老夫斯基著
日本石川一郎

1930

14P-21

心弦書社版

潘既閑譯

博克老夫斯基
石川一郎著
潘旣閑譯

俄國革命全史

上海心弦書社

譯者序

這本書是集兩個人的著作而成的。雖然是兩個人的，但他確前後一貫，緊接而成。不但如一個人所作的一樣，並且我們還可以看出各個研究歷史所注意的特點。

這書前一部分自第一章至第十一章是俄國博克老夫斯基著的。他是由俄國十二月黨的運動說起，直至二月革命的前夜，前後凡一百餘年的歷史。在這幾章中，我們不僅看出了博克老夫斯基所敘述的俄國革命之經過的歷史，並且，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學習怎樣以唯物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歷史的發展。我們中國的歷史，現在不過在一踏糊塗的狀態麼？他還在英雄名人及皇帝督軍的家譜的鎖鍊中。我們怎樣能將中國歷史的事實，從數千年唯心主義的腐儒學者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怎樣將中國之歷史社會的發展給他一個經濟的科學的分析，這確是每個中國從事研究歷史——不——從事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人，所必須努力的一件事。從

事於這樣偉大工作的，首先必需在自己頭腦中對於研究歷史的方法，有一個非常科學的瞭解。爲達到這一點起見，博克老夫斯基這一十餘萬字的演講，確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法的講義。博克老夫斯基的演講，對於整個俄國社會的歷史，對於俄國革命以前的階級關係，固然都給了許多重要材料，但我們必需特別注意的還是在於研究歷史之科學的方法。這是譯者所非常願意重複向讀者表示的。

第二部分自二月革命以後寫起這是日本學者石川一郎最近的著作，與博克老夫斯基的演講正緊相接連。這一部分歷史敘自一九一七年，所以全部都是關於現在蘇聯狀況的材料。現在在中國出版界中關於蘇聯的著作雖然已有不少，但我們很難找着合理的據事實的記載。田中一郎也是以演講形式寫成的，但我們已深感覺着這是一親歷蘇聯的人所據實的說法。現在是全世界反蘇聯戰爭準備最緊張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一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怪物國家是不能不注意的。雖然我們現在以至已往的過去，都聽說了關於蘇聯之『洪水猛獸』，『共產共妻』，『暴虐』，『殘殺』之種種駭人聽聞的消息，看見了許多關於蘇聯之『危機四伏』，『內部破裂』，『麵包恐慌』的新聞，但這個國家爲什麼依然能存在，壯大，發展，而最近還有聞

所未聞的『五年經濟計劃』，『七小時工作制』，這些確不能不使我們注意研究的。糊塗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盲從是文化上最可恥的事，只有研究與考察，這是我們應有的判斷事物的方法。這本書上就供給了許多關於研究蘇聯的材料，不用說，這些材料，確是中國一般出版界中很少有的。

這就是我譯完這兩本書中的感想。

還有一點要聲明的，就是本書第七章關於一九零五年革命的全篇，完全是譯者自己寫的。因為在整個博克老夫斯基的演講中，他是俄國學者中間的演講，所以只注重分析而不注重事實。一九零五年俄國革命的經過，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對於俄國的學者們，自然都完全知道，所以著者在原文上完全沒有說到。可是對於我們中國人，這些事必要加以說明，然後才能了解博克老夫斯基的分析。所以譯者便根據一九零五至一九零七年俄國革命史（潘文鴻譯，上海中外研究學會出版），寫了補充的一章。

同樣，在這兩個人的演講中，有許多為外國人所都知道的專門人名地名，他們順口說了許多，但這既與問題的本身沒有重大關係，而在中國人看來，外國譯音太多，實在難讀。所

以，許多不必要的人名，地名，譯者都將他刪去了。這樣比較醒目些。

總括起來說，譯者總覺得這本書的價值是非常可貴的。因為從十九世紀開始，叙到一九三零年，這樣的俄國革命全史，這是中國出版界上的第一本著作。僅只就這一點說，譯者已經很滿意的願意將這本書供獻於一般青年讀者。

潘旣閑 一九三〇，五月於上海。

俄國革命全史

俄國博克老夫斯基
日本石川一郎 著
潘旣閣譯述

目 錄

譯者序

上 篇

第一章	俄國經濟的發展	一
第二章	俄國十九世紀的十二月黨	二
第三章	農奴『解放』與革命運動	三
第四章	民粹派的革命運動	七
第五章	俄國馬克斯主義的發展	一〇

第六章	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俄國.....	一〇〇
第七章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〇六
第八章	俄國沙皇的改良政策.....	一一〇
第九章	世界大戰前的俄羅斯.....	一一三
第十章	帝國主義戰爭與俄國經濟.....	一二〇
第十一章	宮庭政變與二月革命.....	一二六

下 篇

第十二章	二月到十月.....	一三〇
第十三章	波勒斯特和約與軍事共產主義.....	一三四
第十四章	新經濟政策.....	一三六
第十五章	五年經濟計劃.....	一三八
第十六章	現在蘇聯政治組織.....	一四〇

俄國革命全史

俄國博克老夫斯基著

上篇

第一章 俄國經濟的發展

研究歷史這一門科學，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現代史。所有一切從事新發明的人，總要希望他沒有謬誤發生。馬克斯主義者，不管其說的什麼或寫的什麼，縱使論及最古的石器時代，也不能不從他與現代的聯繫着想。因此，我們常受許多資產階級的教授所攻擊。我們必要注意與現代的聯繫。這並不是我們自己懸奇驚人，實在非如此不可。我們敢大胆說一句，只有從現代着想，才能估量已往。這一點當然要令資產階級的教授，全然神經錯亂，他們更武斷

地說我們都不是學者，而是政論家，且是無聊的政論家。所以我們的著作，完全沒有什麼學術的意思。這完全是笑話。對某個時代的社會學之科學的分析，那末，只有歷史唯物論的方才是正確的。

關於這個問題，此地值得引證幾個例子，證明資產階級最聰明和最靈敏的歷史學家，當其誠懇的想了解各種事變的時候，每次都要無意的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見地之上。請看三年前——一九二三年春天在不魯舍爾所舉行的最後一次的歷史學家國際大會，便可一目瞭然。不消說，那裏都是些資產階級的教授。現在的不魯舍爾是協約國的第二首都（在大陸上協約國的第一首都是巴黎，第二首都是不魯舍爾），簡直不容任何共產主義者參與其間；那裏的確也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然那些大學教授，所做的報告却完全是歷史唯物論的精神。有一位教授報告科學和藝術的復興，中世紀末古典學派的復興，說這是商業資本的影響。我是研究商業資本在俄國歷史中的作用底人，他這個說明，對於我當然是特別愉快的。但他所論及的不是俄國，而是西歐。

另一個例子，復證明他們闖入了我們所打開的大門。在這個大會上，有一種這樣的思

想，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基郎特派，是階級的政黨。這一點在我們看來，當然不是新的索諾夫和考茨基當其榮盛之年，早已把這個意見確定了。而資產階級的教授却把這個東西供獻於國際大會，實屬新奇之至。在我們看來，這都是些老生常談。然在他們看來，却是時髦的真理，他們說基郎特派是代表某一階級的政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

像這樣的例子，一天一天的增加，這是證明要了解歷史，除了我們老生常談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并且證明現在資產階級的學界中，也無意的應用了這個方法。根據這個觀點，我便要重複一句，要研究現代，必須觀察已往。

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俄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究竟是什麼呢？俄國的工人羣衆起來革命，這是世界的現象。這不是一個在狹小範圍內所能說明的民族革命，這不是完全由俄國的條件，由俄國空間與時間諸條件所產生出的一個革命。帝國主義的戰爭，決定了革命爆發的時機。因此之故，在俄國革命的爆發和社會主義的轉變，便較其他各國爲先。但俄國工人革命的本身，却仍是世界工人革命的開端，國際工人運動史中的一段。倘若我們探索俄國革命之國內的與民族的根源，那末，我們無須求之于工人革命，而是要在農民革命之中，要在

土地轉移於農民手裏的時候去追求，才有頭緒。土地轉交農民，是革命唯一的結果，開始且爲資產階級所同情。伊蘇果也夫說，不管俄國如何反動，而地土轉到農民手裏，是必須同意的。這在俄國的社會中，已經鑄成鐵案了。此爲伊蘇果也夫所宣告同意的。此外他以爲隨革命而來的公民平等和廢除各種等級——不管你用什麼法西斯蒂的鐵，也是不能剷除，不能撲滅的。這都是我們資產階級所已承認的事實。土地轉交農民，這乃是社會主義以前的俄國民族革命的中心，這不是世界革命運動史中所普通有的，而是俄國特有的現象。列寧說：「土地問題，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民族的特性」。

關於土地轉交農民的意思，列寧說得非常之確切。他說：「地主經濟消滅之後，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民羣衆，即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因爲地主的經濟，在經濟上完全是反動的，而資本主義的農莊成分，是開俄國農民經濟史的先河。在此種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之上。因國內的市場日益擴大，與全體人民的生活程度，氣力，動機，文化都蒸蒸日上之故，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要自由得多，迅速得多，以至於無可限量」。

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時列寧的主張便是如此，現在，經過十年了。我們看待資本

主義已經不同。我們當引着農民經濟走完全不同的河道。在這個河道中，我們所達到的階級，是『農夫的資本主義』。

這是事實。俄國農民欲為獨立的小生產者，這是什麼呢？這是俄國全部土地歷史（至少始于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初葉）中心問題。三百年來小農經濟與大地主的經濟爭鬥，都是為生存的權利而爭鬥。

本來農奴制度，絕不是像俗譚所說的一樣，是由于流蕩的農民受土地束縛而產生的，我們讀一讀克流切夫斯基的著作便可知道。這個相傳已久的俗譚，不特為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傾覆，且久為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破壞。羅石可夫曾經揭破過此種俗譚。步其後塵者，有純粹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巴夫羅夫在其『俄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書中，也曾經把俄國十六世紀的農民是租借貴族土地的流氓底俗譚完全駁得體無完膚，這個俗譚是在十九世紀時偽造出來的，該俗譚欲證明歷史上的農奴制度，及地主掠奪農民的事實，是合理的。

為要說明地主何以有權剝奪農民，則非造出一個理論不可。說古來的土地是貴族的，農民不逾是租借這個土地罷了。倘若如此，當然可以減少佃戶的土地。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

二十年前羅石可夫便已證明過十六世紀時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領有制，都是發生于小的自由農民土地私有制的廢址之上。此等遺迹，我們在當時的律書上可以找出很多，農奴制度的法律與地主的行為，在使農民的私產日削月割，他們奪取農民的土地，使農民無法經營其經濟。在此種基礎上，于是便爆發了許多曠日持久的農民革命。舉世紛亂，幾無寧日，始則烏克蘭的哈米林尼茨基的革命，繼則有亨克拉斯的暴動，最後，在十八世紀末葉復有普加齊夫的騷動。

所有這些都是農民為求獨立的小主人的權利而舉行的死戰，而地主則盡力驅除農民，使農民由獨立的小主人變而為僅有一片「份地」的佃農，使農民經濟僅足糊口。不料，社會革命黨人及慈善的馬恩羅夫居然認為這是自然的現象。但實際上，這却是長久的偉大的鬥爭底結果。經過農奴改革以後，地主們才打破農民本來僅足糊口的地位。迫得農民由出賣食物的小生產者，一變而為只在地主田莊上為市場而生產食物之人了。此時農民只為地主而生產剩餘生產品，而自己不能佔有這些生產品。這個完全不是自然的現象，農民始終不能甘心的（小生產者天性在農民的腦海中非常深固）。記得一九〇五年的時候，「農民復渴求土地」，

爆發起來與地主相搏戰。幸得國內此次有工人運動可以利用，所以農民的鬥爭，比前較為順利。至一九一七年時才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主和寄生蟲大遭失敗，地主的土地于是亦轉交于農民手裏，數世紀以來農民渴求而不得的土地，卒歸農民所有，而不依賴貴族。

上面這個例子，顯然可以知道，如欲了解現代，則非深究已往不可。這裡所謂已往，便是以十二月黨的革命做出發點。換言之，便是從那個一目瞭然的中心問題講起。十二月黨人不能離開所處的現代，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對於十二月黨人是全部景緻的中心。不寧惟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愈益緊急，則土地問題在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中的作用也愈大。他們所處的時代越安寧，則土地問題越可置諸高閣。十二月黨最主要的觀念，最注意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和農奴制度的問題。十二月黨運動中最重要和最深謀遠慮的人物，他們心目中所最注意的，差不多全是這些問題。這個軸心既已反映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中，那麼，這個軸心，便自然會昭然在人耳目。十九世紀三十年間革命運動的意義即在于此。

要了解此時的革命運動，是十九世紀所發生一切革命鬥爭的前驅，我們必須多致力于研究過去歷史上的土地關係。我認為十六世紀的農奴與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時代農民的區別，實

不難由推想而知。這個推想的作用，在現在非常重要。因為關於十九世紀革命運動的歷史，大部分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的遺著中傳給我們的。此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或智識份子的歷史學家（智識份子的歷史學家，不消說，是資產階級的，因為智識份子，不成爲一個特殊的階級，可是，智識份子自成一派的特點却在這個過程中完全表顯出來了）。其觀察歷史的過程，顯然是根據個人主義的表現。

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在他們看來，是爲自由而奮鬥的。可是自由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爲實現最高目的爲轉移。到另一社會之一種手段。這個事實我們是非常明瞭，非常清晰的。十九世紀後五十年的資產階級，雖然也知道社會主義，而且大談特談社會主義，這是事實。然而資產階級不知自由是個手段，這也是事實。爲自由而與專制政體實行鬥爭，資產階級以爲這是目的底本身。這個目的本身，如何判定呢？自然的求自由的志向，是人類天賦的情感。這是說什麼呢？這是資產階級的歷史觀之生物學的根源，誰都知道的。人生欲自由。這個自由的趨向，乃小生產者求獨立的趨向。在俄國說來便是農業，生產者，農民，在工業方面的小生產者，便是小手工業者。小生產者求獨立的趨向，在鄉村中每爲大地主私有者所抑制，

在都市中則爲大資本家所屈伏，小生產者求自由的傾向亦即伏根於此。關於這一點，資產階級及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智識份子當然是不同意的。他們說，事情不是這樣簡單。他們的解說，在他們看來覺得更要複雜得多，科學得多。在此種見地之上于是便創造了俄國革命史中現有的俗譚。人與人發生鬥爭，因爲有些人們知道什麼是自由，有求自由的趨向，所以才起而與壓迫他們的和剝奪他們自由的人們相戰，首先即與君主專制相戰。因爲在君主專制之下，不特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在政治上沒有自由，即農民在公民上，也是沒有自由的（農民就是農奴）。這自然是因爲君主專制，政治元首，與農奴制度有密切關係有以致之。由此便可以在一般的著作中常常遇着一個這樣的名詞——即所謂農奴制的國家。當此之時，凡有求自由趨向的人，必須與這個猛獸決鬥。這個猛獸，就是君主專制所封的農奴制度。十九世紀中葉擁護自由的戰士，已經粉碎了這個怪物之一部（獲得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號的農民解放）。嗣後，此等戰士竭力要把這怪物當頭一棒，作一最後的打擊，事在十九世紀後五十年和二十世紀的初葉。最後，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了君主專制。此時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智識份子，便欲托庇于自由神的王國之內，而顛伏無產階級

專政。因為到了這種程度，他們絕對夢想不到。到了這種程度，在他們看來，是奇怪的，盲目的野蠻的，所以他們痛哭，流淚了，宣誓了，不要這種革命。說這種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直到現在，他們才承認革命之某幾種結果：土地轉交農民與公民平等。此外他們就不肯再越雷池一步了。至于談到自由一層，他們便垂頭喪氣，失望已極，他們甚至情愿受亞力山大第三底統治，他們期望，亞力山大第三底復辟。

我們且不理他們，不管他們的妙想天開吧。這個是一九一七年的小史，渴求自由的智識份子居然走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這個小史，是一個極嚴重的小史。不特對於知識份子是这样，即對於上面說過的歷史概念也是如此。他們為自由爭鬥了十年之久，結果他們所獲得自由，完全不是他們心目中所夢想的，而是別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事變的光天之下，所有這些自欺欺人的概念，在不偏不倚的歷史學家看來，是瞭如指掌的。實際上，沙皇是地主的沙皇，農奴國家之元首，只有在農奴制之下，才能存在。可是沙皇并不常常代表地主的利益，這種事實，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究竟作何解釋呢？沙皇曾經解放過農民：沙皇解放農民這個事件在他們看來，便是由于擁護自由的戰士攻擊沙皇主義，所得來的讓步。但那些戰士

恰恰在這個時候，很少顯露頭角，因而便造作種種政治的和經濟的理論，來解釋沙皇主義所以在一八六一年迫不得已實行讓步的原故，藉以自圓其說。他們說，沙皇所以讓步是因為國家要建設鐵路。但是國家何以不能在農奴制度時建築鐵路呢？於是又有另一種說法：沙皇所以要解放農民，是因克留姆的戰爭，意法英人大敗俄羅斯之故。克留姆戰爭的失敗是農奴制的俄羅斯，孱弱無力的表現。因此，便需要強大俄羅斯，使俄羅斯能角逐于國際鬥爭之場。這種說法，多少是矯柔造作的，費盡心力求解釋，而不指出其最主要點——例如整個十九世紀君主專制所實行的保護關稅政策，重征國外商品的賦稅那回事。這件事情對於地主是否有利呢？這是極端不利的。地主必須購買一切用品——他和他的家眷穿慣了國外的呢絨和絲綢，着慣了國外的衣服，用慣了國外的家具等等，購買此等物品付錢要多三倍，因為商品入口時付了很重的關稅，地主時常痛哭流涕，反抗這個政策。在十九世紀初十年間，地主無時不反抗這個保護關稅政策。整個的十九世紀，關稅非常之重，只在短促的時期內由五十年末至七十年末，才算例外（正地主在表面上大受致命的打擊，因剝奪地主的農奴取消農奴制度之時）。

矯柔造作的解說，應該細加思索，決不應毫無考慮。個人主義解釋十九世紀的俄國自由，是爲自由而反抗君主專制的鬥爭史，而對於君主專制本身的解釋，却說他不過是農奴國家的元首。此種解說，不甚深刻，有許多要待解決的問題，使我們依然迷惑莫辯。因此，我要重複一句，我們應當多致力於想像與推測去找問題的答案，爲求自由而反抗君主專制的爭鬥，實際上說來，便是兩種資本主義形式的劇烈鬥爭，卽到處蔓延的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的鬥爭。這個現象，是世界的，絕不是俄國特有的。法蘭西底大革命，便是這個鬥爭中的一段小史之一，一八四八年德意志的革命，也是這個鬥爭中的一段小史之一。這個鬥爭，只有在英國才沒有這樣利害，因爲英國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非常僥倖，兩者界限分明。——商業跑到殖民地去了，在殖民地內商業資本制度一直保持到現在，工業資本則居於英國，且在那裏統治着。由于這種分工，所以劇烈的衝突，才不至於時常爆發。十八世紀的美國的革命，也是此種衝突之一。另一個衝突則正在發展。我們若把這些衝突除外，則英國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實可說是時常安居無爭，然而這只是英國的特點。在大陸上，此種衝突幾乎各國都有，而衝突較爲利害的，則在俄國。因爲這兩種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

主義，在俄國是非常後進的，且忙于追隨西歐的祖先和模樣。在此種急忙之中，該兩種資本主義，比之西歐，便更要毫不客氣的互相蹂躪，互相傾軋，互相抵觸。

商業資本，剝削獨立與小生產者，不參加生產，不創造生產，不組織生產，只依靠非經濟的壓制的助力。他的特點，他最出色的成就——在俄國境內不發展，亦不榮盛——就是種植，如北美南部諸州的種植就是利用黑奴而種植棉花或烟草，黑奴是這些企業中活動工具之一。此種種植，是商業資本出色的生產。種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而非封建的現象。這是工人所造成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及無產階級作工的工廠，正立于相反的地位。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俄國有些種種經濟的萌芽。有些地主使其農民變為月工。換句話說，每月把他一定的食品（非常之少），而奪取他所有的土地，取消其所有的財產。當時的地主，有些變為與種植業主相似，而農奴的農民，則有些變為與黑奴相似。這種情形常反映于俄國的文學中，第一，有描寫農民吃了些地主的虧而失望至極的小史。第一次的小史，就是拉齊車夫作的『由聖彼得堡旅行莫斯科』，第二，有吉爾齊諾夫所作的『是誰之過歟』的小說。該小說中有一特殊的名詞即將軍『黑奴』之名。這是此種過程中所表顯的

纏綿烟艸。然此種過程的本身在俄國却沒有充分的表現出來。俄國的地主經濟對於種植事業從未達到過最高限度的發展，實際上，地主能使農民從僅足糊口的經濟變而為具有一片分地的佃農，就算是心滿意足了。農民起初并不是佃農，而是農奴，嗣後方變而為佃農。然要實行此種手術，便必須對於農民大用特用非經濟的壓制。故商業資本為要剝奪小生產者底分地，為要掠奪小生產者所產生的剩餘生產品，便必須創造一個偉大的警察的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而以沙皇為首領。戴着沙皇冠冕走遍俄國領土的，就是商業資本。在他看來，地主和貴族只是他的代辦人，只是他的機關而已。所以「俄國境內的主人翁」對於俄國貴族的態度，有時毫不客氣——雖然這個主人翁有時回憶自己，也是貴族，也是地主，實際上商業資本勢力，有左右一切之概。比之地主的私有財產之勢力，更為雄厚，更為擴大，所以他自視太高，而視後者為卑不足道。且對待他的機關，亦毫不客氣。裁減和更動一切定員并支配一切事宜。君主專制對待地主和貴族，也是如此，因為這是他的機關。商業資本是必要的，且在彼得帝時驅逐地主到戰爭中去，而且在行伍中披堅執銳，歷二十年之久，不許他歸家。商業資本是必要的，且他供給了大批的入口稅，破壞了地主的荷包。資本主義是必要的，不僅商

業資本，即一般的資本，也是必要的。必需解放農民——地主雖然呻吟嘆息，雖然不是所有的地主完全有利，但農民終於解放了。

倘若我們以這個觀點，觀察君主專制乃政治上有組織的商業資本主義，那末，我們就懂得革命運動中一切的悲劇了。工業資本是由商業資本自然而發展起來的。自然，工業資本發展，要有完全不同的條件，這是必要的。工業資本要組織生產，因此，他便無須乎非經濟的強制。工業資本是生產過程中的主人翁。但他無須乎一切人工的援助去束縛羣衆，工業資本壓制人們的手段，不像商業資本一樣。商業資本是推擊人們的背部，工業資本乃是餓其肚腹。他的手段，更要巧妙。但無論如何，絕不出乎人的體力之外。

工業資本不要非經濟的壓制，這是君主專制絕大的和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特在俄國是如此，在世界各國亦莫不皆然。歷史是非常刻薄的東西，所有現在歷史過程中所不需要的，便立刻變而為有害的和令人難堪的東西，因此使非拋棄他不可。這是俄國君主專制自己親身所閱歷過的。實際上講起來，尼古拉第二客觀上比其先，並不惡劣些。何以見得呢？他之為人，其狂亂不如巴夫拉其殘酷不如尼古拉第一。無論何種場合，他總是不劣於他們，這是毫

無疑義的。但是巴夫拉第一雖遭厄運，然君主專制沒有因此顛覆，而尼古拉第一在位三十年中並沒有遭到什麼厄運，後來他雖死于不幸，這也是對外政策使然，而不是對內政策之故；不是敵人致他死命，而是他自己因對外戰爭失敗，便自戕其身。這樣看來，尼古拉第二是不劣于其先王，然而歷史恰恰對他刻薄，而不對他的先王。其故何在，很明顯的，因為尼古拉第一和巴夫拉第一是當時的歷史所須要的，因為當時是商業資本統治之秋，是商業資本如花盛開之際，資本主義必須認此種元首，而在二十世紀初葉那就完全不需要了。歷史既不需要他，對之自然也就完全不姑息。好像飛輪把無用之物，從機器中滾拋出去一樣神速，工業資本主義的統系，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系統，不要非經濟的壓制，而須要別種東西，農奴制度對之却有莫大妨礙。所謂別種東西，便是自由的無土地的來往自如的工人，能夠時常調動的勞動後備軍。橫塞于工業資本主義道路之上者，是農奴制度，此十九世紀前五十年間工業資本主義之所以必須沿此路線進攻之故。——反抗農奴制度。一八六一年，工業資本主義已經鑿開了一條門徑。被取消的那一些農奴制度只不過是工業資本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工業資本獲得了產業後備軍，因此便獲得了向前發展的可能。

在二十世紀初葉，工業資本已經不要商業資本的政治組織了。這個組織，在工業資本主義看來，是有莫大的束縛；他就依靠已經開始的工人革命起而反抗這個組織，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他居然借工人革命的助力把君主專制，完全消滅，但同時他又消滅了他自己，——這一點在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腦海中，是從來沒有想到的。古代聖賢說得好，倘若人們確知其將來，那末，他們會失掉他們一切艱難從事的動機。只是因為這個將來，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才會努力的去幹。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在實質上，便不期然而然的替社會主義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這不特在俄國是如此，即在世界各國，亦莫不皆然。工業資本主義，當其創業和作戰之時，竟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了。

倘若我們以這個觀點去論十九世紀的革命鬥爭，那末，所有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同時又是擺在資產階級先父先祖前面的問題，指顧間便可了事，且自然而然的可以解決了。然則，實際上，一八六一年何以解放農民呢？因為工業資本主義和建築鐵路及其他種種關係，必須解放農民；因為俄國鐵路的建築，恰好是俄國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莫大的動力。

俄國五金工業，即因俄國鐵路的建設而發展起來了。五金工業是重工業，是一切工業的

基礎。這個基礎的奠定，與當時鐵路的建築有莫大的關係，然而這個關係，當然不是像斯特羅威所說的一樣。在他看來，鐵路的建築，是國家的必要——是國家要建築鐵路；事實上，這是為資本主義往前發展所必要的。鐵路的建築，是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妥協，商業資本取消了農奴制度，對工業資本讓步。兩種資本，彼此各表示其意見。商業資本說，好了，我給你自由工人，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我來取消農奴制度，然後我便要將那些在我支配之下的小生產者的穀物，盡量的使之流通起來。工業資本說，妙哉，我替你建築鐵路網吧。這是你從來沒有的唧筒，從來沒有的水管阿。試問你向來有什麼東西呢？只有河道和運河，只有小百姓用貨車運送穀物，現在將有火車運行于全俄羅斯，你的穀物且能大批大批的運輸出去，千百萬普特的穀物，可從農民的穀庫裏一下載出來，多麼好呢？下面的數目字，就是事實的證明。在一八五〇年，即距改革前十年，俄國輸出了三七五，〇〇〇噸小麥，而在一八七〇年，即改革後十年就輸出了一，五七三，〇〇〇噸了。黑麥的輸出，在一八五〇年為九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八七〇年為四，四二〇，〇〇〇噸。

可知穀物的出口，因鐵路的建設而大大的增加了。地主由此得利多少，我們以後再說。

地主不是到處得利的，地主得利是有條件的。然而商業資本得些什麼利益，這是不難明白的。商業資本的流通如果增加五，六，十倍，則其利潤當然也要增加五，六，十倍。商業資本在俄國這樣繁榮，實為空前所未有。工業資本替商業資本造成種種可能使剩餘生產品底流通獲得空前的發展。工業資本自己亦因此而得了自由的工人。這個歷史，是非常明瞭非常簡單的。地主還衣其貴族的錦衣繡服，峨其冠而紅其帶，趾高氣揚，以為他自己是一個很高貴的階級從事實業的。商人，勢力日益澎湃，有時雖在地主的前面鞠躬致敬，但其心坎裏却已經暗想道：『貴族老頭兒，你為何一瘦至此』。

由這個觀點，我們就懂得第一次革命，即十二月黨的革命。我描寫的這個革命，是涉及最普遍的特點，至于此次結黨行凶的歷史我不能詳細解釋，我只是很簡單的說幾句。

在十九世紀二十五年間，即俄國自拿破崙的戰爭告終以後，馬上在俄國境內接二連三的開始組織秘密社團；始則在一八一四年有『俄國騎士團』，繼之在一八一七年有『救亡同盟會』，在一八一八年有『幸福同盟會』，最後約在一八二一年有所謂『十二月黨的秘密社團』，這是個真正的陰謀團體。當此等秘密社團到了發難之際，純然是對付王室要人之襲

擊，正是亞歷山大第一皇帝突然逝世之時。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亞歷山大第一突然死于距首都遙遠之地。當時正是俄國無王之日，因為其弟君士坦丁（亞力山大第一無子），早已誓不就王位了。但朝野上下均無人知道此事，其次弟尼古拉亦未知悉，因此亦不肯就王位。當此王室凌夷，朝廷多故，實為早已成熟的秘密社團舉行陰謀的導火線。一八二五年舊歷十二月十四日暴動起于比得格列（註），嗣後同年十二月終又在南俄發生暴動。暴動均被鎮壓，秘密社團的社員亦完全被捕，并提交法庭審判。結黨行囚的首領，盡被吊死。其餘的人，則處以流刑。十二月黨的一曲長恨歌，于是便從此遺怨千古了。為自由而反抗君主專制的戰士，在俄國是第一次出現，風行十九世紀的俗諺，亦從此而感動了後來無數的戰士。

（註）現時名為列寧格勒

但是甚麼是這部歷史客觀上的根源呢？我們須從高處——這個高處是相對的——深入低處去找極庸常的事實。這些極庸常的事實是俄國第一次自覺的反抗君主專制企圖推翻君主專制之革命基礎——這個庸常的事實，便是俄國穀物的出口。在十八世紀英國因為工業革命的關係，英國能消售大量的入口的穀物。而在英國市場上主要的穀物供給人，就是俄羅斯。所

以英國的工業革命，竟成俄國特殊的地主田莊革命的出發點。地主的田莊，因此就變而為出產穀物的工廠。這個變化，起于十八世紀的末季，然特別感覺激烈的，只在拿破崙戰爭以後、即十九世紀二十年的中葉。

小麥的出口，其增長之迅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黑麥及其他穀物之出口，亦同樣的增加）。在四年之間，穀物的出口，驟增五倍。俄國穀物出口之驟增勢必要引起真正的革命運動。當時地主的田莊比以前倏然要多生產五倍的穀物，輸往世界商場，這正是真正的革命了，秘密社團的發展，也恰恰在這幾年中登峯造極。這兩個事實，彼此不能不有連帶的關係。

此等秘密社團的目的，是甚麼呢？倘我們試一探求十二月黨人的社團（我稱他們為十二月黨人，是回憶往事之義，因為暴動的運動終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緣故）之焦點，那麼，便毫無疑義的這些秘密社團的焦點，就是取消農奴制度。北社中（比得格列社）有一個腦經最敏銳的土耳其金也瓦在她看來，取消農奴制度，乃是她一切文學上和政治上活動的中心。而南社中，有比斯特爾大佐，他的思想，也不離乎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二者不愧為當

時的中心思想。試問；當時地主們何以提出取消農奴制度的問題呢？因為，農奴勞動，是一般勞動使用中最草率形式之一。農奴經濟，是非常草率的經濟。農奴勞動，是非常不生產的勞動。農奴勞動底生產非常之低。這一點還是在十八世紀時，就早為世人所熟知，而其所以能保留以至於今日，一則是因為生產的勞動形式非常之少，再則是因為這個勞動是非常便宜的勞動形式。農奴的農夫為貴族作工，既無絲毫的報酬，則這個農夫，當然是最便宜的工人，因為其他的一切工人，總是要報酬的。故當俄國穀物出口的增加，與穀物價格之高漲尚在比較遲緩之時，地主的經濟當然那種生產力極低的農奴勞動還可以應付市場的需要。

可是恰恰在這幾年當中穀物價格的高漲，好像狂濤怒波一般。在十八世紀後五十年倫敦市場中穀物的價格，平均每四分之一噸（約為十二普特）約值五先令，在十九世紀初十年中，穀物每四分之一噸則值七十四先令，再過十年，每四分之一噸價格，幾乎漲到九十先令了。在這幾十年中穀物價格的高漲，是非常利害的。同時，革命的高漲亦與俄國穀物出口的高漲無異。穀物價格之高漲既出人意料之外，市場對於生產產品的需要，自然也就一天一天的擴大，這是擺在地主目前之任務，這種任務甚至在一八〇九年時，地主們還認識得不很清楚。

一八〇九年，在『自由經濟社』的著作中，還可以看到贊稱農奴經濟的頌辭，即贊頌他的舊式農奴勞動的剝削。一到十九世紀第二十年之末，即過了七、八年之後，解放農民的問題，變為很嚴厲的問題了，且在藝術文學中也發生這個問題了。著名的普希金反抗農奴制度的『鄉村』詩，居然博得國王亞力山大第一懇切的唱和。這大概是在一八一九年的事情。在十年當中，已經有了急劇的變化。亞力山大第一也派人來編纂解放農民的草案。大局至此，勢非得已。在我們看來，是非常清晰的。在田莊裏的農民勞動必須設法使之加強。但是用甚麼方法呢？這就是當時的根本問題。

地主們開始看到，農民的怠惰，令人可怕，農民的工作，非常之少，同時這也就是十二月黨人耶枯希金所看到的。他找出農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必須想出怎樣補救的辦法，使農民勉于勞動。耶枯希金曾經到過鄉村山莊上，看見地主經濟弄得一塌糊塗，因此他便將他所觀察的結果發表出來：「他們——農民——對於此種方法，即舊的經濟方式，當然不能和平了事，此亦不能希望用此等方法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說，我們忍受了千辛萬苦，主人們還依然是一毛不拔，不管什麼工作，都無再幹之必要。因此為貴族工作也好，為自己工作

也好，始終沒有盡自己的氣力努力勞動。這樣看來，自然必須想出補救的方法，去促進他們的勞動，使他們勉于勞動才好。這是秘密社團中最有名的社員之一，且應該說，是十二月黨人中最尊貴的黨人之一耶枯希金的言論。耶枯希金是在尼古拉第一盤詰之前不屈不撓的有數人物之一。雖然尼古拉第一曾處他以嚴刑苛罰，置于獄中鎖着他的手足，如是者足足一月之久，但他終不變其本色，且在檢察官審判之時，他的答覆是非常可貴的。其操持之堅實，非他人所可企及，即比之里也夫更爲可貴。里也夫是十二月黨的詩人，是十二月黨的謳歌者，是詩人風骨之一。但里也夫在法庭審判時的操持，比之耶枯希金則相形見拙了。耶枯希金自己表現他是個真正的革命者。這個真正的革命者曾公開的說，關於農民的改革，是他平生最苦心焦慮的一回事。他公開的說，『必須使他們（農民）勤勉從事勞動』。他在供狀中，仍然是個誠懇的真正的人，與在審判時無異。他不願隱隱自己的論調。

耶枯希金所想出的策劃非常簡單。而這個策劃，不只他一人所能想到，且當時許許多多的地主也想到了。怎樣使農民勉于勞動呢？非常簡單，給他們自由，奪回他們所有的土地。那時他們便要用自己雙手的勞動，去獲得食物。或則租賃土地，如此，便要努力生產，多做

工作以償地租。或則變而爲農業工人，替他人耕種土地。這種思想，是很普遍的。不特耶枯希金的腦海中所具有，即在史謨林許多地主的腦海中也曾經時常這般想過。該地有個地主寫過：『怎樣能使地主的利益與農人的自由符合一致呢？我以為這是非常容易的。看看我的建議吧。我讓農民居住於田廬，給他們土地和牧場，其餘的土地——即一切可耕之地，留爲己用。又將農民固有的土地，轉給他處的農民』。這是他的提議。在一八一九年俄國一部分先進的地主——已經實施了這種農民的改革，阿斯特細的男爵，并曾經指示俄國其他各處的同僚以許多必由之路。他們又指示了釀酒的道路，——第一次釀酒的工場，建立于阿斯特細省。他們復指示解放農民的道路，把自己的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當耶枯希金提出解放農民的方法之時，農民用很漂亮的話答復他們——農民作爲不懂的問他道：『阿父啦，土地是誰的呢？』他說，『土地當然是我的，不過你們可以自願的租去耕種』。接着又有很漂亮的答覆：『唔，阿父拉，百事沿舊罷；我們算是你的，土地算是我們的』。等到農民都知道了土地是不能取得的時候，他們便揚言道，『不行，這樣我們是不同意的。』耶枯希金曾將其策劃具呈于當時的內務總長可主比。可主比是個非常聰明和非常仔細的老頭兒。他便答復他

道，改革當然是可以的，但這種改革會引起莫大的暴亂，此種暴亂將使我們不勝其擾。因此，最好還是把這個增進農民勞動的強度底計劃，置之不理，另想別外的辦法罷。我們要詳細的研究十二月黨人對於這一點曾經爭辯過的，他們始終要使農民永為純粹的自給的小經濟。

第二章 俄國十九世紀的十二月黨

有人以爲十二月黨人是完全爲地主利益的，同時他們也是欺騙兵士到先奈斯基這一廣場上舉行暴動的地主。到沙皇軍隊射擊兵士時，他們便拋棄這些兵士了。其實。我們看，十二月黨人絕對不是盡爲地主，盡在先奈斯基廣場上欺騙兵士的人，只有一部分才是的。至于其他沒有到先奈斯基廣場上的人，却都是很好的真正的革命者，最少也是國內自成一派的民主革命者。他們所缺乏的只有一點：他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亦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這完全是對的。可是當時俄國一般講起來，沒有什麼無產階級，且不能有什麼無產階級，因爲農奴制度是廣泛存在的。這是最明顯不過的。此時想十二月黨成爲無產階級的政黨，這無異想雞

果樹上的蘋果要在五月成熟一樣，因蘋果只有到了八月或九月才能成熟的。這一點十二月黨人是無罪惡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十二月黨人，達到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極限，達到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極限了。前面提及過十二月黨的土地政綱，是我們的全部革命運動史，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公布土地法令為止的中心，我們是從比斯特爾的土地政綱着手去做的。不錯，這是萌芽，然而天地萬物，即從此萌芽而生長的我們研究革命，找到革命的萌芽，這不是奇異的，而是應該的。

十二月黨的運動不僅不止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格勒之先奈斯基廣場上，且具最嚴重的運動亦不在此地。且至今歷史家的眼界，仍注視于彼得格勒，這因為彼得格勒決定一切運動的命運，運動命運之決定于此，是毫無疑義的。但有人只看到主觀方面，以為十二月黨人是欺騙兵士的地主。他既從由主觀方面去看，自然必須從主觀的路綫去估量十二月黨人，對於他們政綱及其運動，也從主觀的路綫去觀察了。十二月黨最顯明的政綱和最堅決的運動，不在彼得格勒，而在離彼得格勒甚遠的各省。是當時俄國軍隊主要力量集中之地，是奇也夫省等地，是極左的十二月黨的組織，所謂「斯拉夫大統一社」的發祥之地。這個「斯

拉夫大統一社』，是由窮苦人們和下級軍官（特別是砲兵軍官中的智識分子）組織而成的。他們的政綱，當然與地主的利益漠不相關。從『斯拉夫大統一社』命名的本身已經表示出，他們從事革命，不在俄羅斯民族的範圍，而在全斯拉夫民族的範圍。我們聽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五十年間所謂大斯拉夫主義，所謂合法的地主的著作，我們不妨記憶他們的淵源，猶如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是為九十年代合法的民粹派之革命的先覺者，『斯拉夫大統一社』，是合法的大斯拉夫主義的先覺者。『斯拉夫大統一社』以統一所有斯拉夫種族而為一個聯邦共和國并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斯拉夫國家為職志，這個國家一抵亞得利亞海二至波羅的海三至白海，四至黑海。他們建設聯邦的疆域，有這樣偉大的策劃。這是他們政綱中理論的部分。這個理論的政綱，他們未能絲毫實現。因為要建設斯拉夫聯邦，第一要領有俄羅斯的國家政權，而十二月黨人未能做到這一步。所以他們一切計劃，遂無形中破壞了。更具體來說，『斯拉夫大統一』有很奇妙的一點，即我們常見的『德謨克拉西』這個固有名詞，而在『斯拉夫大統一』社中則用這個名詞了。他們說：他們是德謨克拉西者，另一個奇妙之點，就在他們的人生觀方面？他們是非常自由的思想家，有些是澈底的和堅決的無神論的代表。關於

這一點，資產階級的著作當然是以個人主義的眼光去解釋，他們以為「斯拉夫大統一社」的創造者，波里索夫曾與其師隊久居于波蘭一位地主家內，此地有豐富的法國圖書館，所以他讀盡了十八世紀法國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的作品。我們對於這種分析當然是不同意的。

「斯拉夫大統一」，恰恰是惟一的堅決的運動之首創者和發起人，他們與十二月黨人的陰謀暴動，頗有關係。一般的輿論，都說十二月黨人軍事行動的中心是彼得格勒，然而實際上唯一的真正的武裝暴動却是齊爾尼可夫團之暴動。普列漢諾夫批評此次的事變，非常中肯。十二月黨人，毅然決然，奮不顧身，指示後人以必由之路。第一，這是武裝的暴動。人們荷槍帶彈以赴之，以備射擊，以便作戰。第二，這是沒有絲毫勝利機會的暴動，因為以一個團之兵而抗全軍之師，寡不敵衆，庸夫俗子亦皆知暴動者之期望軍隊響應、毫無根據。軍隊果然不響應他們，於是騎兵將軍一舉手便削平了這個暴動。主要的因為騎兵有大砲，而齊爾尼果夫沒有大砲。無怪許多參與暴動的軍官——在戰場上自殺而死。此次十二月黨的暴動是最悲慘的事變。這個悲慘事變是由于「斯拉夫大統一」之準備，亦只有「斯拉夫大統一」才能準備。與兵士有聯絡的只有他們，在兵士中做過宣傳的，亦只有他們。他們有交通機關，

聯絡南社首領和兵士羣衆間的聲息。倘無此等首領，則南社的參與人，恐怕不能接近「斯拉夫」了，也恐沒有此次的暴動了。

這樣看來，若要企圖在十二月黨的極左派，民主派和無神論派中間，找出什麼代表地主利益的派別，是萬分困難的。這個極左派又組織了唯一的真正的武裝暴動。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極左派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斯拉夫大統一」並不著名于世。研究十二月黨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對於他們的事業，幾乎完全緘默無言。這就我們之所以值得特別指出的。

倘若我們考察「斯拉夫大統一」，那末在十二月黨的社團同一空間內，我們便可遙着在比斯特爾領導之下的南社。這是什麼。阿爾明斯基引出比斯特爾的「俄國真理」一段話，爲保持地主的利益，應當取消農奴制度，使不至喪失地主的收入。阿爾明斯基故張其辭，認爲激動十二月黨人的利益，是狹隘的階級利益，地主的利益。上面已經解釋過，在十九世紀初亞力山大第一時代，地主經濟及其地位在社會運動中有何種的作用，在這裏我不否認地主的利益占主要的地位。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阿爾明斯基所引的章句（我先聲明，這是真正

的)，與這個文件——『俄國真理』之整個的意思和神氣，極端相反。比斯特爾在『俄國真理』上所陳述的綱領，其社會的和經濟的基本意思是什麼？其意思與土地國有最相近似，比斯特爾是十二月黨的有數人物之一，他懂得只有對於廣大的國民羣衆有利益的時候。革命才有可能，只有對於農民有利益的時候，革命才有可能。所以他很關心農民的利益。在革命之際，或在革命之後，立刻把所有國家的土地合併爲一個公共的基金；嗣後將這個基金，等分爲二，一半分死居民，但不能作爲私產，而只可供使用。在這一半的基金內，每個居民，可得一份。

如果一八二五年農民的分地只等於全部耕地三分之一（在十八世紀時，農民分地尚有二分之一，可知地主掠奪農民的土地不少），那末，我們便可想到，比斯特爾的策劃，可給農民極大的土地了。這一半的土地歸區邑處理，區邑又將這些土地分配于各居民，比斯特爾說，於是，俄國每個公民，將爲土地的領有者？俄國或無一人不領有土地了。按比斯特爾的意見，這些土地應從事必要的生產，換句話說，即從這些土地上可得必要的生產品。另外一半歸國家處理的土地，則應從事『豐富』的生產？換句話說，即從一半土地上，應得到剩餘

的生產品，爲增大這個剩餘生產品的獲得起見，國庫可將這些土地大批的出租，甚至可以出賣于私人之手。比斯特爾的綱領并不反對資產階級的土地領有，不過有一個問題，所有的農民，既然得了分地，且其分地的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則我們的資產階級領有者，從什麼地方去取得勞動者呢？那時有什麼方法可以激勵這班農民到土地私有者的土地上，到資產階級的田莊上去工作呢？這個問題，對於比斯特爾是很奇特的，他仍然沒有解釋這個問題。所以奇特的緣故，比斯特爾及其黨人終於趨向土地社會化之一途，不特這一半的土地應爲社會化，且所有的土地亦變爲社會化。實際上，比斯特爾分國有土地爲區邑土地和國家土地二部分，顯然是逢迎十九世紀初葉俄國土地領有制之資本主義的趨勢。這是一個妥協。比斯特爾并不是個抽象理論家，比斯特爾是個實行家。

比斯特爾，順當時的環境，提出這個分土地爲二部份的綱領，而沒有把土地國有澈底實行。但是這個一半的土地國有，也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這是不言而喻的。別的是說不通的，倘若看了比斯特爾論貴族一章，那末，我們便可知道，比斯特爾的思想，在邏輯上極端主張必須消滅一切的等級，尤其是貴族。阿爾明斯基所引的章句，是有貴族的見識，與上面

的意思，柄鑿不八，可惜至今沒得說明。但是所有讀過『俄國真理』原稿的人就容易曉得。比斯特爾的『俄國真理』，是不完成的原稿，有半句中斷的，有一行塗抹寫上另一行的，又復塗抹再寫上三行，又塗抹了，旁邊又添上第四行，這樣一來，原稿至少有三四文字在一起。他引證的章句，究屬那行文字呢？這是討論比斯特爾的先決問題：我們決定那行文字為證據（因為文字有好幾行）以後，那麼可以斷定作者的意思了。不過現在必要根據已有的兩個事實來下判斷；一為土地國有（這個土地國有是一半的在這土地國有制之下尚允許有資產階級的土地領有制之存在）。二為保護地主的利益。這兩個東西，聯結一起，邏輯上是不通的，我們在『俄國真理』以外，可以找到一種著述，他主張（俄國第一人）沒收大地產，不錯，他只主張沒收最大的地產。若土地在某種分量以下，地主可以得到一定的貨幣代價。這又與阿爾明斯基引用的所謂保存地主利益的章句，互相抵觸。

這樣看來，阿爾明斯基所引用的章句，還不能證明比斯特爾是地主利益的代表者。況且他亦是地主利益的代表者，他本身還是無地的貴族（正確些說，他是『無農民的貴族』，因為他有了土地，而沒有人民）。這種情形，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當然不能作為證據。

然而羅尼可夫却居然以這種情形作為論據，他曾經按十二月黨人所領有土地的多寡而分他們為各個等第。這種分法實在令人不可同意。因為人在運動中所處的地位，不是由其個人的財產多寡而決定的。否則，我們就不懂得恩格斯既是個發財的人，是個工廠主，而同時他又是歐洲革命的工人運動的開創者之一。很明顯的，這個論法是不適當的。

我作過文章指出一個似是而非的事實，誰讀過我在『少年俄羅斯』中所發表的文章，他就記得，比斯特爾是舊日近衛騎兵的軍官，嚴莊璀璨的大佐，總司令維廉士清的副官，無疑的，他是俄國第一政治上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有勢力者。這是似是而非的事實。比斯特爾的政綱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當然，不是資產階級的——若說無產階級的，實在滑稽，但這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模範的小資產階級者聖西門是此時比斯特爾的政治經濟學底老師；比斯特爾是第一個『俄國的聖西門主義者』。這個小資產階級性反映于比斯特爾的政治綱領和社會綱領之上。

第一，比斯特爾狹窄的仇視資本——『豪富貴族』。對於比斯特爾，豪富貴族是主要的毒藥，以他的眼光看來，豪富貴族比封建制度更為惡劣，所以在其『俄國真理』開卷便與這

個貴族相戰。在他看來，主要的是不許有這個「豪富貴族」，要使俄國人民一律平等。根據這點平等趨向，比斯特爾，是個模範的甲可邦派。他的土地分配，一半歸區邑所有——這恰恰是模範的甲可邦的特性。這個平分土地的甲可邦的政綱，載入現代法蘭西立法的民法之中。法蘭西的繼承權，法蘭西的民法不利于大財富的積蓄，比其他各國為甚。這是比斯特爾的純粹小資產階級底政綱的一方面，還有很奇異的比斯特爾非常關心市僧，他說「無論如何不能將市僧的土地收為國有，其他的土地，皆可收為國有」。則「其他的」言外之意表現出了。最後，比斯特爾小資產階級的特性，不僅在前綫上顯出，且在後方顯出了。他擬定把俄國所有的猶太人集合起來，給他們一些武裝力量，并派他們去奪取巴勒斯坦，使他們離開俄羅斯。

無論從那方面去看，比斯特爾是模範的小資產者，是出現于政治上第一回小資產者。實際上他的革命性不下亞于他人（歷史不能證明此點，因為比斯特爾在其活動以前已經被捕過了，所以不能顯出他的本領，倘若他得以自由，或者他可以做到的），他亦遠不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之人，比斯特爾是有他的階級本色，但顯然是別階級，而不是地主階級。比斯特爾

在其政治綱領上，在其策略上，均與他的本色相符合，所以比斯特爾是更重大的急進派。在政治綱領上，比斯特爾是法國共和政論者德九提特拉西的信徒，德九提特拉西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運動家之一，在拿破崙第一當國之時，他僑居於美洲，并著有『孟德斯鳩的「法學精神」釋義』一書，他在這個書上特別憤激的反抗任何的個人專政。按德九提特拉西的意見，國家的元首，行政內閣應有數人，而不是一人獨斷獨行。比斯特爾完全與這個見解相同。比斯特爾假定許多普通名詞如『王權會議』、『王權國會』、『元老國會』等。指不勝屈名詞爲國家最高機關，簡單說，是『行政內閣』，他的通信及其著述也沿用這個字眼。一國的元首，應屬於行政內閣，此外要有國民會議，當然，這是由德謨克拉西的原則選舉而成的。比斯特爾對於選舉不主張任何財產上的限制，所有這些機關，純粹根據共和的德謨克拉西的步驟而產生的。

所以，在政治方面，比斯特爾是非常的附和共和政論者和民主主義者，他主張所有的國民，均有政治上的權利，沒有例外。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因爲其他的十二月黨人絕不是民主主義者。最後一點是比斯特爾的策略，我們只能根據他的草案去估量他的策略，因爲他

自己沒有實用過他的策略。比斯特爾的策略，純粹是革命的策略，是武裝暴動的策略，比斯特爾希望他所屬的軍團，歸附自己，并和這部軍團去逮捕亞力山大第一，攻下莫斯科，在聖彼得堡的近衛隊和海軍中起暴動，於是武裝革命，完成革命，此外比斯特爾還有十分奇妙的特性，這個特性，也是整個的革命運動的中心：比斯特爾認為剿滅一切羅曼諾夫的聖朝，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這是澈底的推倒沙皇革命者。他已經看出，只消滅一個亞力山大第一還是不夠，而必須剿滅一切。南社沒有做過暴動。不錯，『斯拉夫大統一』所組織的唯一的暴動，是以比斯特爾最親切的同志之一謨拉威夫為其領導，謨拉威夫是十二月黨人中宣傳家右數人物之一，他曾經在兵士中間作過宣傳。但是他的一生事實只限于此。比斯特爾本人因被告密而被捕，事在暴動以前，甚至在聖彼得堡十二月十四日的暴動以前，所以關於南社之事，只能根據他的草案去判斷。現在必須對於十二月黨的極右派——北社，加以研究。

我們已經研究過二個派別了——所謂『斯拉夫大統一』和比斯特爾所領導的南社。在南社的成份中，雖有貴族在內。可是這個南社是由貧乏的軍官組合而成的與『斯拉夫大統一』

無異。同樣的，南社亦有兩個小資產階級派別。一派是左的，急進的和觀念朦朧的；另一派是觀念更清晰的和更確切，然而更右的，顯然與『豪富貴族』妥協的，這派的首領對於他們并不憎惡。這兩派的性質，可以比擬社會革命黨的左派和右派。資產階級的史家，已經把十二月黨的第三派，即我現在所說的北社，放在第一個位置這并不是沒有意義的。北社是純粹資產階級的和地主的一派，此實毫無足疑。

這個第三派，已經在其憲法中表顯出她的思想了。這個憲法，是謨拉威夫編纂的，又載在特魯白茨基王侯的報紙上。這個憲法上，最先可以看出選舉的財產格。現在我所引證的是將要發表的真正的原文，該原文說：

『公民必須具有下列資格：年齡至少在二十一歲，居住……是有經常的一定的寓所，精神健全的，財產上能個人獨立的（整個的無產階級不能在公民之列！），嚴格的交納公共稅務的；沒有違犯法律的，個人的私有財產。有：1. 不動產值五百盧布的銀幣。2. 動產值一千盧布的銀幣』。

確實的說：所有俄羅斯國家的主人，不是公民（即可為居民而不是公民！），但是以自己

的勞動得到一定資財後，若符合上述的條件之時，便馬上得為公民。一七九一年法蘭西的憲法？『合法國家』規定公民的財產格，土地不下五百盧布，或動產值一千盧布，簡單說，即不遜于優裕的富農。公民為俄羅斯共和國或帝國的幹部，因為這是兩個變體：一方面——是共和國，另一方面，——是君主國。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居民，而不是公民。

這還不够。倘若我們再看憲法中關於國家管理機關本身的條文，那我們還可找到更為顯明的東西。

『每縣具有法律規定的動產和不動產的公民，每年得選舉一個縣長。這個縣長便是這一縣的首領，縣長須具有：至少『年齡在二十一歲，品行端正，不動產的價值不下三萬盧布的銀幣，或動產不下六萬盧布的銀幣』。

有一個十二月黨人曾經讀過這個憲法的原文，看見選舉的財產格這樣高，他加上一個註解：『差不多一切公共的領地，都沒有縣長』。在公共領地中，每縣要找一個有土地值三萬盧布或動產值六萬盧布的人，簡直沒有希望。這個財產格之高，顯然是滑稽之至。這樣一來，二十個縣長中當然有十九個是地主了。縣長既是地主，那末，他以前的農奴，無論如

何，都不能參加選舉了。

憲法規定：

『凡使用公共領地內的土地的人們，不是財產的有者』，因此，他們不在選舉之列，但農民的土地是公共的領地，所以農民不是公民，不是土地的領有者，于是乎他們便不能參與選舉。這是原文中最精粹的地方。

關於解放農民的草案，憲法規定：『地主的土地，仍然屬於地主』，『住宅，菜園，耕具和牲畜，屬於農民』。由是農民只得一些田宅和菜園，並沒有甚麼田地。謨拉威夫們指出這種辦法不妥，嗣後允許每家再加多二畝土地。不是每人加多二畝而是一家加多二畝。農民所得的分地完全不足用。這個政綱，顯然是地主的政綱，其用意是置俄羅斯于地主支配之下。

北方十二月黨的策略，也在這種政綱上顯現出來了。『斯拉夫大統一』和南社的南方十二月黨人，均為民主論者和革命論者，他們有武裝暴動的理論。特魯白茨基在其被捕後一天說，十二月十四日沒有預定任何的暴動。

在十二月十四日特魯白茨基及其同志本來預定要幹什麼事呢？這一天他們預定指示兵士不要尊奉尼古拉巴夫羅維治爲國王，而始終擁護辭不就位而無人知道的君士坦丁巴夫羅維治爲國王，召集那些未曾宣誓奉誰爲王的團部，于廣場之上或在其他地方，備着武裝。一方面以便對付政府，另一方面以便對付社會。特魯白茨基的勘算，他詳細的說過：政府看了武裝兵士萬衆一心，也許，可以讓步和同意北方十二月黨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召集全國各省的等級會議于聖彼得堡，等級的分配是貴族二人，商賈二人和官有的農民（非農奴的農民）二人。這個等級會議應作爲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應該規定憲法，以後須根據這個憲法而管理俄羅斯。農奴的農民，當然，不許參與會議，關於這一點。毋庸說了；農民的土地是公共的土地，農民不是私有財產者，等等。

特魯白茨基說，他們準備作種種讓步，但等級的選舉會議則無論如何，都須堅持。這是他們最低限度的政綱。另一方面，特魯白茨基說集合的兵士不許有任何的騷擾（在特魯白茨基及其社團看來，不許騷擾是主要的條件之一），凡同情于憲法的人們可以幾個幾個的跑到他們那裏去。

這樣一來，一方面，政府看見了這許多的武裝羣衆便不至于放槍射擊而向羣衆讓步。另一方面，社會看見這些兵士的行動合乎規矩，聽從長官的指揮，不搶掠，不紊亂，而且靜待等級會議，該等級會議地主和資本家，復可大佔優勢，社會人士必定會同情于這種運動，對于這個運動誠誠附和。特魯白茨基所想像的情景大致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從特魯白茨基的眼光看來，萬一開起火來，恐怕是最危險的了。開火，是特魯白茨基的邪鬼。所以在這個開火的前天特魯白茨基曾誠惶誠恐周詳慎重的探問過，究竟開火不開火，十二月十四日的前夜他與其最親切的助手及其他的軍官商議，他最後一句說：『列位先生，步隊不放槍，而砲兵隊還是要開火的』。特魯白茨基再補充一句，『從此以後決定不參與任何的運動了』。特魯白茨基也就實踐其言了。當先奈斯基廣場上有示威運動的那天早上，他就不到先奈斯基廣場上去了。雖然他是北方暴動的首領，且事前曾選舉他爲指揮者，然居然與其舊友出往他處去了。

當先奈斯基廣場上表演悲劇的時候，而其指揮者還在別處，這種情景，當然是奇異的。很明顯的，此次運動的領導者，不是革命者。他們也不願意革命。他們懼怕開火一至于此，

雖則他們有奪取大砲而歸其支配的可能，然他們不敢接受。有些砲兵軍官謁見里尼也夫，說：我們可以給你們大砲，你們要不要。里尼也夫便問他道：你們的兵士是否和你們一塊呢？他們說：不那時里尼也夫們就不要大砲了。本來示威運動之際，應該使砲兵隊的人數全體出發，荷槍實彈準備作戰才成。這樣也許發生效果。但是大砲的本身又是射擊技術的武器，大砲的開火又為世人最害怕的，因此他們不要大砲而堅持不用。他們不能奪取此等大砲，因為大砲不在十二月黨的計劃之中。十二月黨的計劃，是示威運動，和迫脅政府，使政府召集有名的等級會議，就算了事。此外，沒有其他的要來了。

這樣看來，陰謀暴動的領袖，當然不是革命者，況且他們也不當作自己是革命者。特魯白茨基剛纔被捕，便供出了一大卷冊的口供。尼古拉第一根據這個卷冊編成了陰謀參與者的主要名單。特魯白茨基說得詳細之至，無絲毫遺漏，甚至連忘其正確姓名的人也供出來了。

里尼也夫的供詞，更令人發生怨感，在第一次盤詰時即告訴了比斯特爾。他不知道比斯特爾已經被捕了。比斯特爾十二月十三號被捕，十六號盤詰里尼也夫，在這三天內電報不通，甚至政府也不知比斯特爾已捕了。里尼也夫說：南方有大佐比斯特爾一人，從事陰謀暴

動的組織等等。

雖則如此，但是十二月十四號還是值得回憶的，因為雖然此次運動領袖極觀瀆無恥之至（無須隱蔽），他們不是革命者，如果沒有他們，毫無疑的在這一天聖彼得堡就開如革命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尼古拉的日記作爲可靠的證據。尼古拉說明他何以開槍的原因，他公然說：『因爲白日已趨于落幕，羣集的庶民（尼古拉看作人民爲庶民）有震動之虞，暴動將至，非有決絕的手段不可』。

尼古拉本人曾經期待許多時候，而十二月黨的示威運動仍然行動鎮靜。尼古拉許久不願開火，因爲他恐怕一開火將爲軍事行動的信號，這個軍事行動，將鬧到怎樣的地步又是鬼神莫測。故一直到工人在寺院中投擲薪片向尼古拉攻擊以後，他才開火。那時尼古拉看見薪片橫飛，他才知道人民羣衆已經開始進攻了。

有人描寫當時參加運動的羣衆，惟妙惟肖，羣衆在馬路上鬨聲不絕于口。以後，到先奈斯基廣場上的羣衆，刻刻增加。這一部分羣衆實行參加軍事行動了。此時轟擊尼古拉的，不僅木薪，且木石交加，被派出去攻擊十二月黨的騎兵隊，因爲士農們感受他們長官的訓誡，

大部只向空中放槍。

人民開始參加暴動了。關於這一方面的情形，清尾良細夫說得異常詳盡。其父的僕人，在以後二十年的時候告訴了清尾良細夫說此等農民對此次事變有怎樣的偉大的感想，說來好似這是貴族的暴動一樣。很明顯的羣衆對此次的運動是有很深刻的興趣。羣衆不曉得特魯白茨基是怎樣的人，羣衆亦不懂得陰謀暴動的領袖和他們的政策，羣衆只看見反抗萬惡的君主專制，反抗萬惡的農奴制度，已經開始了并有武人參加暴動，羣衆不知道這些武人的大砲，曾經事前決定不放發。這一點羣衆是不了解的，羣衆只看見開始反抗沙皇主義了。如果聖比得堡的十二月黨立定意思號召人民的暴動于聖比得堡，毫無疑義的，那時他們顯然極容易號召的。聖比得堡在這個十二月十四日可變為真正人民暴動的武台，與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精神先後輝映。然而十二月黨不願這樣做去。這不在他們計劃之內，當時的武裝隊伍，有如箭在弦端，一觸即發之勢，而徘徊歧路的領袖，還正在思索，究竟開火不開火。

因此，若把這些右派、完全營做欺騙兵士到先奈斯基廣場上的人們，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他們沒有組織什麼暴動，他們只組織示威運動，此外沒有別的。但此次運動，雖不完

備，却是革命運動的肇端。所以不認發展和不能擴大的緣故，我們只能歸咎于這個運動的指導者，絕對不是因為客觀上沒有發展和擴大的可能。十二月十四日是值得我們紀念的，因為這一天流過工人們的血，流過兵士們的血。當然，用木石攻擊尼古拉的工人們，曾經持有散彈。『庶民』中也有果敢的人們集合于元老院屋頂上攻擊尼古拉和騎兵隊。所以第一次的槍林彈雨，一齊傾注于元老院屋頂之上，第二次才衆槍齊向於十二月黨人放射。當時既然爲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而流了許多人民的鮮血，那末我們現在自有充分理由去紀念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了。

第三章 農奴『解放』與革命運動

我們上面所分析的第一次反抗舊農奴制度的，君主專制的俄羅斯的革命運動。結果雖然失敗了。但此後俄國社會中不但還在進行着革命運動的準備，而且同時革命運動本身亦在進行發展，只不過在別一種形式之下就是了。這種形式，在十二月黨運動時已經有了萌芽，但無具體的表顯，在十二月黨運動時并已有恐怖手段的胚胎。十二月十四日的事變中，已經有十二月黨人想暗殺尼古拉。在另一方面，我曾經簡略的提過，就是十二月黨人曾經有影響羣衆宣傳羣衆鼓動羣衆的企圖。十二月黨人爲了這個目的曾在一八二〇年謝米諾夫斯基團暴動後，散發過傳單當時並有個牧師曾引用舊約全書上的話來證明上帝不喜歡沙皇，因此誰聽從

沙皇誰便是上帝的敵人。這看出十二月黨人一方面是用恐怖手段，另一面是宣傳鼓動羣衆，在羣衆需要的基礎上去激動他們。此種手段充滿了當時所有的一切的革命運動。一直至十九世紀的末期。

現在我們要說到那些造成與培養革命運動的條件。最近一位讀者對於我著的「俄史」寫給了我一封信，他說：你的書很難讀，這并不是因爲你寫的文字困難艱澀，而是因爲你把歷史內外顛倒，把我們經常所習慣的史實，完全內外倒置過來。他繼續說：因此你的書在第一次讀的時候是很難了解，我要讀三次，最後才能了解牠。或許在初讀我的歷史著作時要廢相當的腦力。我們普通都以爲：十九世紀的上半期，尼古拉當位，這是最黑暗反動的時代，全俄都變成了營房，到處蹂躪不堪。在十九世紀之中葉，主要的在克留姆之役及其失敗的刺激以後，這青天霹靂的打擊，方破壞了這死池裏面的沉寂和恬靜；而開始活躍起來。六十年代是『偉大改革的時代』，人們都活動起來了。一切運動都向前進行。最後，在七十年代，立憲改良的與革命爆發的全圖失敗以後，于是又重新回復到靜寂的狀況中去。但是這個時期却比較短得多，總共只有十三年，而以前的靜寂時代却經過二三十年之久。普通都是這樣的描

敘史事。但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的基礎方面觀察這個問題，那就可看到直截相反的圖畫。十九世紀前三十年是運動異常迅速向前發展之時；其停滯加厲之日，却正是自由資產階級所認為安樂，愉快，自負自豪的時代。在尼古拉朝，大工業發展最速的時期，只有一八九〇年威特時代能夠與之抗衡。威特時代工業發展之速度強快得多，其原因是很明顯的，就是因為動力大大的增加了。

試把一切工業的基礎（五金工業）來看吧。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之年）俄國共有一百七十個五金工廠與製造所，有二萬二千五百工人，每年產量四萬九千噸（三百萬蒲特）。經過二十五年之後在一八五〇年時代，則有二百九十九個五金工場與製造所。有八萬八千五百工人。年產二十四萬五千噸（一千五百萬蒲特）。因此可見工人增加了四倍，而生產品則增加了五倍。但工廠與製造所的數量之增加都還不到一倍，這些事實對於一個馬克司主義者，當然是一目瞭然的。這些事實是說明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進步，新的工廠與製造所較之舊的要大得多。在這些工業部門中經過新的資本的集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于是更向前進展了一步。在紡織工業中亦是一樣，在這時期的末葉我們看得特別明顯。在一八四三年全俄共計有四十個

紗廠，共二十五萬錠子；而在一八五三年已有一百萬錠子，全時在一八四三年每一錠子每年產紗十六啟羅格蘭（一蒲特）而在一八五三年每一錠子每年產紗十九啟羅格蘭（四十八磅）。在這十年中增加了三倍的錠子數，而在生產品則是一個錠子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尼古拉第一時代工業發達得非常之快，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從所未有的發展。

假如再去看我們大改革時代的末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工業發展的速度，那更得到完全不同的數目字。在一八六七年全俄工場中所用的棉花共計三百二十九萬八千蒲特（五萬四千噸），在一八六八年共二百五十五萬六千蒲特（四萬一千八百噸）在一八六九年共三百二十八萬八千蒲特（五萬二千五百噸）在一八七〇年，二百八十八萬一千蒲特（四萬五千八百噸）。在一八七一年共四百十六萬五千蒲特（六萬八千二百噸）在一八七二年又是三百六十六萬六千蒲特（五萬九千噸）；在一八七三年三百五十三萬蒲特（五萬七千八百噸）。于此可見棉花的數量常在三百萬左右；雖然有一次達到了四百萬，但馬上又由四百萬降至三百萬。這是一幅很清楚工業停滯的圖畫。在五金工業情形比較好一點。這就因為，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鐵路建築迅速進行之故，建築鐵路需要鐵軌，因此便推動了俄國的五金工業的發展。但無論如何，

五金工業的發展還是很『平靜的』。在一八六七年產一千七百五十萬蒲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噸）生鐵，在一八六八年產一千九百八十萬蒲特（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噸），在一八六九年產二百萬蒲特（二十二萬七千六百噸），在一八七〇年二千二百萬蒲特（三十六萬〇三百噸），在一八七一年也是二千二百萬蒲特（三十六萬〇三百噸），在一八七二年二千四百萬蒲特（三十九萬三千一百噸），在一八七三年二千三百萬蒲特（二十七萬六千七百噸）。總之，這裏雖不像紡織業一樣停滯不進，但其進行仍然是表現得很遲緩很『平靜的』。普通對這問題的回答，主要的都說是因為農奴解放的緣故。我們都知道，農奴解放是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妥協的結果；然其利益大部分却在商業資本身上。農奴解放使得商業資本能夠把國內的剩餘生產品比以前更多的輸運到外國去。為使商業資本能順利的進行起見；在解放的過程中，于是便採用了兩種手段。第一，儘量的多留下地主對農奴的特權，特別把農奴放在一個半解放的小生產者的情況中。那時半封建式的商業資本就容易對待他們。因之農民就被禁在農村中，不能脫離『農村公社』的及連環保證制的束縛。在另一方面，則採用租稅的壓迫，增加稅項，即不增加租稅，農民因贖金的負担亦極繁重，因為農民要償還贖金之故，有許多地方，這些贖金

竟超過了農民土地收入的百分之百。這種租稅的壓迫，使農民迫不得已只有把自己的剩餘的生產品多多的出賣；有時，甚至還須使農民出賣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食糧不足、營養不足，但總還是要賣之又賣，賣掉一切。商業資本在農民解放中所取的特別利益，即表顯于此。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是正確的。在此種條件之下，國內市場決無飛快的強度發展的可能，他的發展必然變非常之遲緩。因此之故，俄國的工業也就發展得很遲緩。就農奴解放後二十年中底工業投資表來看，當時所有的股分公司的資本共計十二萬萬羅布，而投在工業中的却止有一萬三千萬羅布，同時投在紡織廠中的，則僅六百萬羅布，（紡織工業對於國內市場特別需要）。

所以我們的紡織工業幾乎完全沒有發展。其最堪令人注目的，便是：我們本國的工業甚至還不能供給那在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後所造成的狹小的市場。這個不可非難的事實，可以把當時英國輸入俄國的貨品的數目來證明。在一八六七年英國輸入俄國的貨物不到四百萬金磅。在一八六八年——四百五十萬金磅，在一八六九年六百五十萬金磅。在一八七〇年近七百萬金磅。在一八七三年，竟達九百萬金磅。換言之，即一八七三年進口的數量兩倍于一八

六七年的進口，這裏是沒有什麼停滯的；這裏的速度非常之快。英國輸入俄國的貨物年年加多，這就是很有力的證明。俄國的工業的發展比較『解放後』的農民的運命還更痛苦；更確些說，便是農民的解放並沒有充分的擴大國內的市場。甚至這樣狹隘的市場，俄國的工業也不能供給。

因此我們便見到在經濟部門中所有的圖畫，全與普通所描寫的相反。停滯時代是俄國資本主義與俄國工業異常迅速發展的時代。反之，大改革時代却是俄國工業與資本主義遲緩進行之時。自然，這些情形都要反映到社會運動中去。正在尼古拉第一時代，便產生了著名的四十年代之俄國思想文學的全盛時代。在七十年代呢，則產生了一小部分的革命者的激烈的爭鬥，而在廣大資產階級的羣衆中，其上層份子則停頓在黑暗愁苦的狀態之中。但是爲要研究我們的題目，研究革命運動，那我們就沒有必要來詳細研究這些文化的圖畫，而只要研究上述經濟情形的直接結果就夠了。

尼古拉第一時代工業發展極盛的結果是甚麼呢？我想，就是在舞台上出現了勞工問題。這裏舊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家一定要瞪着眼睛問：什麼？在尼古拉時代還有勞工問題麼？是

的，勞動問題在俄國是在尼古拉時代萌芽的，尼古拉第一就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工廠法的著作者（一八三五年的法令）。在一八三五年的法令上，便已規定過開除工人必須在兩禮拜前預先通知。這法律在前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在設立工廠檢查員以前，并不十分恪守遵行，因為沒有人在那裏監督他。但是每月必須付兩次工資。這是一八三五年尼古拉統治最盛的時候；而那時的財政部總長就是江克林，他正是俄國工業主要的保護者。因為那時候沒有特別的工業部，只有財政部工商科。江克林看見俄國工業如此偉大的發展，覺得有安慰尼古拉之必要，說俄國不會造成像西歐當時那樣激烈的工人問題。江克林指出：西歐的工人是無產階級，故當經濟恐慌之時，工人們便無路可走。失業，飢餓，自然要跑到街上去暴動。我們的工人是什麼人呢？我們的工人是農民，他們在鄉下有土地，如果在工場中沒有工作，他就可以回到鄉下去，那裏他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恐慌發生的時候，像西歐那種恐慌的結果，在我們俄國是決不會有的。殊不知尼古拉的懋績，却正是因為我們俄國勞動問題的發展會成爲西歐的形式。這才是最可令人注意地方。尼古拉熟知『共產主義』這個字，尼古拉在加文約克將軍于一八四八年七月槍殺了巴黎的暴動工人之後，很熱烈的誠懇的讚揚法國的將軍。這

并不是沒有意義的。尼古拉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是實際工作人員，他很能清晰的瞭解工人運動發展的方向及其結果。

假如我們用這個多少有些出于意料之外的觀念，來觀察著名的二月十九的大改革，那末我們便可看到有許多完全出于意外的論調。爲什麼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呢？客觀上是商業資本需要把農民變爲小生產者，以便商業資本之剝削。但在主觀上却還有他種更有趣味的企圖。有個農奴解放的首領，加微林曾經寫過很有意味的文字，但要先說明加微林的社會觀念。加微林怎樣解釋私有財產之生產呢？他說：『人在外界所創造的東西，就成爲他的私有財產，這私有財產在他身後，則留給他的子孫，或遺給他的親近。從這裏就產生了新的不平等的根源。某人製造得多些，某人就多有些財產，他人製造得少些，他的財產就少些，或竟沒有私產。但不知爲什麼緣故在各種民族中早晚都造成了一種平等的理論，把人類的歷史充滿了血與淚，並絕對的否認一切的不平等；殊不知此種不平等，却正是人類社會的主要規律！』照加微林的意見來說，貴族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這并不是不幸，而且是非常之好的事情！『因此之故（就是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我們便可從飢餓的無產階級的地位中

永遠的解放出來，並且用不着與此有密切關連的財產平等的幻想的理論。對上層階級之必不可免的依賴，使着社會發展之最後的結果——社會革命，亦可完全免去」。一八六一年二月的農奴解放，同時便是預防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這在實際上是沒有成功的；但是這種主觀的意志是有的。而且不僅是加微林的主觀的意志，並且亦是農奴解放令修輯委員會的意志。修輯委員會對農奴解放用這樣的理由說：「農民所得的『分地』無論如何少，但是他的生活狀況總比現在那種困難的情狀要好些」。主要的並不在給全體農民以充分的土地（這點從商業資本的觀點上看來，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不能強迫農民工作）。而是要在使農民大家多少都有一點土地，使他們的手足都為『分地』所束縛。委員會會詳細說明為什麼要保存農村公社（土地公社與連環保證制），理由就在這裏：「工人聯合，集體的反對資本家，集體反對政府以及其他一切的不良的觀念，只有在他們與一般的田地利益毫無關係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成為游民中才會產生，到那時候，他們覺到個人力量之薄弱，於是使大家團結起來，仇視政府，仇視私有財產與社會秩序」。

由這裏可以看到為什麼在俄國要保存土地公社，愚蠢的社會主義者以為公社是將來社會

主義之萌芽。而更聰明的專制政府的官僚與坐在修輯委員會中的地主，却極清楚的知道，事實正與這個相反。假如你奪了農民的土地。那末，他們便會建立工會，然後還要建立政黨。假若你把他束縛在土地公社中，束縛在一塊的土地上，那他就會被這連環保證制的天然繩索所縛住，什麼政黨的念頭他們都不會想到；甚至連職工會的組織也不會去設立。這樣看來，十九世紀的上半期，不但勞動問題在俄國已經存在，而且政府爲防止工人階級不軌的行動底發展，還採取了許多行政的實際的方法。修輯委員會在五十年代末進行自己的工作，而加微林寫這段話的時候還要早些，那時，並且還有社會主義，與社會革命之宣傳，政府并且還採用了許多的方法來防止這種災害。

觀察了這些現象的全體的時候，對於在這個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俄國社會主義，將不會覺得奇特。這是我們觀察了的這種現象一種必然的反映。工業迅速的發展，就與勞動問題的產生相系連，因此政府就作反無產階級化的爭鬥，因此一部反對派的智識分子的心理，就必然要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許多的現象，彼此都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絲毫奇怪與神秘在內。奇怪與神秘却在別的地方。誰也知道，社會主義的曲子在俄國以及在全世界都是從

工廠中及工廠的無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最初的社會主義者，却是從農村公社中產生出來的，于此就需要稍加解釋了。

這個解釋實在是非常簡單。因為每個從經濟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客觀現象，他要反映到某一社會階級或派別的頭腦中，必須要先經過他們的階級的或派別的利益的反映。那末俄國十九世紀時代的智識份子，究竟代表些什麼東西呢？在這些份子中產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小組，即在一八四九年消滅了的『彼得洛休夫斯的陰謀』，這個陰謀牽涉到當時智識份子所有的名人與領袖。非常奇異的，這些智識份子都不注意共產主義；其中只有一個人是共產主義者。斯彼書腦夫；他堅持武裝暴動的理論，在他所遺下來的著名的誓約上，曾經規定每個會員必須參加搏鬥。在這誓約上很具體的寫着：『接到通知時，我馬上就應該參加搏鬥』——即武裝暴動。這是彼得洛休夫派中惟一的共產主義者，其他多是傅立葉主義者即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爲什麼當時俄國的智識份子都傾向在這一方面呢？爲什麼他始終相信鄉村公社乃社會主義的萌芽呢？爲解釋這個問題起見，須看一看俄國的智識份子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假如以為當時的智識份子是那時發展着的大工業的機關中的辦事人員時，那就差誤了。在大工業中做事的人，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大多數是外國的大專門家。甚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俄國的廠長，著名的工程師等直至匠師，大都是外國人；本國人是非常之少的。十九世紀上半期甚至在下半期，我們的智識份子，大多數都是自由職業者的代表。對的，在尼古拉時代在政治上並沒有此種自由職業者的特別等級；那時還沒有律師，只有醫生，教員，文學家，自由職業的代表，照他的勞動的種類來看，是純粹的手工業者，是純粹的獨自工作者。這正是我們智識份子中最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另一部份的智識份子，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教育界。社會民主黨于一九〇五年間在教員聯合會中的力量非常薄弱。那裏完全被社會革命黨所把持。社會革命黨就指揮這部份羣衆，而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却止有很小的很狹窄的小組，沒有多大的影響。當時在這羣衆中的馬克斯主義者，時常產生悲觀的心理，以為與教員們去擾擾不休是值得的。這部份智識分子正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他們就是俄國之所產生之崇拜公社的奇怪的社會主義底理論的寄託者。因為工人運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他甚至還推動了江克林總長及沙皇尼古拉，去思索社會主義；當然更應該推動當時的智識份子到這

個思想上去。但因當時的智識份子，是純粹單薄的手工業者；因此他不能接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蓋爾僧在一八四八年巴黎的空氣中，會燻染了一分鐘（而且僅僅一分鐘）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後來又回復到鄉村公社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中去了。那些沒有受過一八四八年的空氣底陶養（西歐）的人們，當然不能侵入到這種社會主義中去。只有在俄國他們所能了解的社會主義，他們就在傅立葉普魯東的書籍中找到了。普魯東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完全統治了俄國社會主義底思想。直到米哈衣洛夫斯基在實際上只不過各種形式的普魯東主義者，這些人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是俄國農民公社及土地公社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這就是四十年——到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者的宇宙觀的來源。

現在我再分析這個運動的本身，在分析這個運動的時候最主要的，我應該購一講他們對於俄國的預言，因為他們這種觀點對於我們是最有趣味的。

很明顯的，對於我剛才分析過的那些智識份子，農民是他們的革命民衆，他們完全期望着農民。在這裏我們又有了很有興味的事實。無疑義的，革命運動前進的推動者是工業的急烈發展，與勞動問題之勃興。這只用大事目誌來看不難說明了。六十年代的開始與工業資本

初次的勝利，及農民的解放頗有密切的關係。農民的解放，雖然是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妥協的結果，然而農民從地主下解放出來的這個事實，無疑的是正在需要自由勞動的工業資本的勝利。七十年代的運動，緊接着六十年代下半期的罷工而來。第一次大罷工在一八六五年羅卓夫工廠中，而在一八七〇年彼得格勒則發生了大罷工的潮浪，這潮浪引起了著名的內務部底通告。最終，隨着一八七八年彼得格勒第二次罷工浪潮之後，則有人民自由黨革命運動日趨緊張，這次的罷工，從普列哈諾夫書上可以知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革命運動與工人革命潮浪中間的互相關係是十分明顯的。但是當時的智識份子沒有見到，亦沒有感覺到這一點，而他們主要的希望却放在農民身上。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對於社會的崇拜，都與這個有關係的。我們由當時此一可靠的雜誌及書籍上都可以找出許多有趣味的材料。這些書籍中反映着當時的運動，正如一件東西反映在幾十面鏡子中間一樣。假如我們仔細的觀察這些運動的本身，那我們便可以得着更明確的圖畫。譬如當時趙爾尼色夫斯基所做的告農民的傳單，這傳單的本身有極大的趣味。因趙爾尼色夫斯基在割地剛出現的時候，他就預言了他的經濟意義。所以對於這個傳單我們值得來說一說。他向農民這樣寫道：

「你們的土地將要發生些甚麼變動呢？將要發生下列之變動。當測量之後，強迫的割去你們以前的土地，有的鄉村中割去四分之一，有的三分之一，有的二分之一甚至有些土地還在一半以上。這僅僅照了政府命令行事，還沒有把地主的貪心，與那些測量人對地主的偏袒計算在一起。但是測量人對地主不加偏袒是不會有的。因他們偏袒地主，地主才能給他們金錢。所以結果留給你們的土地比較從前一半還少，那從前家產有兩俄畝地的人，現在還不到一俄畝了。在一畝田農民或者要替地主做與以前兩畝一樣多的工役，或則每年要交與以前一樣多的貢稅。但是農民少了一半的土地怎樣能過活呢？就是說，農民要走到老爺那邊去乞求說：請你再給我一些土地吧，照政府所規定的，我的糧食太不够吃了。而地主則回答道：那麼，要給我多做些工役，或者要多繳貢稅給我！他對農民可以誅求無止！而農民對於地主的要求則須完全同意。因之農民給地主的工役也就更大，或則貢稅愈重。

「是不是僅僅爲了土地一件東西要你們增加稅役麼！你的草場亦要給地主呢（按照政府的命令），牧場差不多都要從農民手中拿去了。對樹林，地主亦要向農民要稅役，你看樹林差不多在每一鄉村中都從農民手中取去了。命令上說樹林是地主的財產，農民若不付錢給老

爺們，連枯枝都不能動一動。有些在湖塘邊小河內釣魚的時候，老爺們亦要向你租役。一切所碰到的東西，地主都要向你增加工役和貢稅。地主連農民身上的最後的一絲一縷都要奪去的。簡言之，一切都照沙皇的命令而轉入地主手中，你們則變為一無所有的貧民」。

你看，要費多少的時候來清潔俄國智識份子的腦袋，趙爾尼色夫斯基在一八六一年所寫的那些東西，直到九十年代末在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那本著名的書籍中，還要加以解釋。同時，俄國的偉大的經濟學者，在農民解放之初就很清楚地了解割地的意義，地租的必然的加重（新式的工役式與耕工制之必然的產生）。新式的工役制這些東西在一八六一年時就是十分明顯的東西。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傳單是沒有散發的，因為他的草稿被人家沒收，這傳單並沒有印刷，因之他也不會有鼓勵的力量。他只不過是在農奴解放時，在農民中間一種極有才幹的智慧的有極大鼓勵力量的紀念品罷了。

我們再不引用別的傳單了（這類宣傳品很多）。只指出：趙爾尼色夫斯基在經濟方面有此種驚人的澈底的見解；但他在政治方面却保持了一種極笨拙的主張。他認為『教育階級』（就是智識份子）有獨立的力量與意義，他們的運動可以得到某種政治的成效。不管『大俄羅斯』

這一部書，即使不是趙爾尼色夫所寫的，亦是在趙爾尼色夫所影響之下的小組中的人所寫的。『大俄羅斯』派人的行動的方法是這樣的：送德政碑，獻詞願書，乞求，依賴自己在道德上的威權。『大俄羅斯』派公開的說：『我們不是草野農夫，槍斃我們是槍斃不了的』。爲什麼不能槍斃呢？一九〇五年三月以及以後的事變顯然證明沙皇政府要槍殺誰都可以的。沙皇政府并不因爲智識份子穿了燕尾服就不敢槍殺他們。智識份子應該要求政府召集立憲會議這一類的東西。讀趙爾尼色夫的告農民書，那就可以見到他對於行動的方法定很謹慎的。他這樣說：

『要使得全體農民都一致，以便時機一到可以一致起來。但是在時期沒有到的時候妄注意自己的力量。……不必空呼悲痛；這就是保持安靜，在表面上絲毫不露聲色。總之，孤獨的一個人不要發動。假如在一個鄉村中騷動起來，而在別的鄉村中還沒有什麼準備，那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事情破壞了，把自己斷送了。等到大家都準備了（這就是到預備助力時）那時就可開始，而在時機未到之時切不可輕舉妄動。要有謙遜的容貌，要在自己的農民弟兄中，加以解釋使他了解真實的狀況』。

很奇特的，這些都留在他的告農民書上，無以前還有下面的一段，後來就塗抹掉了。

『兄弟們！還有一點，你們要請兵士們教你們如何遵守軍事的秩序。大的操練，你們是用不到的，只要你們能夠走軍步，步伐整齊——沒有這點是不成功的。教你們緊密的聯合起來，聽從指揮不要恐怕驚慌，遇到任何情事都要大胆，同時要有冷靜的理智，就是要有冷靜的腦子』。

這是不小的軍事準備的藥方。載在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傳單中，但是後來因為這是危險的東西，所以便把他塗掉了，而『要保持平靜；在表面上要絲毫不露聲色』，這幾句話却留下來了。這是趙爾尼色夫斯基一方的特殊的預示之點。我上面所讀的幾句話不但證明趙爾尼色夫斯基是俄國農村政策的祖先；而且是孟什維克的策略的祖先。這個策略便是：『爲什麼要騷動呢，這是毫無結果的，要保持安靜』。輕輕的，緩緩的依靠資產階級（即趙爾尼色夫斯基的『教育階級』）。教育階級（這是沙皇政府不能槍斃的），用和平的壓力的方法逐漸的去取得沙皇政府的一切讓步。

這是關於趙爾尼色夫斯基的。但孟什維克在一八六一年時，在俄國都是孟什維克的觀

念。讓我來舉一個波爾塞維克的觀念的例子。這就是著名的『少年俄羅斯』的宣言。這宣言引起了當時的孟什維克異常的騷擾與咒罵，得到蓋爾僧與巴枯寧方面很利害的批評。而在這裏復有許多有趣味的預言。很奇怪的，我們現在證明了這個宣言是一個因革命運動而被禁在牢獄中的人寫的，因當時憲兵獄吏的疏忽，這宣言居然得以寫成而且散發。『少年俄羅斯』的宣言，曾已印刷并已散發，這一點恰與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宣言相反（這宣言只有草稿）。這個宣言有許多誤字，這就是因為當時的秘密印刷技術不很高明的緣故。

『少年俄羅斯』的社會學，是非常之有趣的。他把俄國的社會分成兩派——帝制派，人民派。帝制派的基礎是什麼呢？

『在這種混亂上，在這兩派的衝突上（這種衝突現在經濟制度存在的時候，在少數人占有資本成爲別一部份人的支配者的制度存在的時候，是不能夠消滅的）。再加上了一種難堪忍受的社會的壓迫，這種壓迫消滅了現代人類最優良的材能』。

因此帝制派的基礎是資本主義。這是很顯然的了。以後就分析現代制度之荒謬。我現在還是要講他的預言。第一，當『少年俄羅斯』派若得着勝利之後，他們將怎樣對付帝制派的

人呢？

「關於沙皇的人，將有另一種決算。以他們的血來償付人民的災患，長永的專制統治，與不了解現社會要求。全沙皇族的頭顱，應該成爲滌罪的禮品」。

究竟採用什麼方法來完成革命呢？

「我們研究過西方史，這種研究對於我們並不是徒勞無益的。我們不僅要比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者要徹底，而且要比一七九二年的大恐怖主義者還要利害；我們爲要徹底消滅現存制度起見，我們將來所要流的血，雖比一七九二年甲可資黨人所流的血多二倍，我們亦不懼怕」。

「少年俄羅斯」派的思想，是各在大區域內組織聯邦共和國，同時政權則須在國民會議及各區會議的手內。但這並不與十年後那些頑固剛愎的聯邦主義者相同」。

「少年俄羅斯」派寫道：

「我們堅決的斷言：假如運動成功的時候，在政府機關中居領袖地位的革命黨，無疑義地，應該保全現在那種集中制（是政治上的而不是行政上的）。以便在政治集中的助力之下，

在可能的最短的時間內，建設另一種經濟的及社會生活的基礎。革命黨應該把專政放在自己的手中，無論怎樣決不放棄。國民會議之選舉應在政府影響之下進行，政府應該即刻注意，不要使得這會議的成份中參入了現在專制制度的擁護者。『如果還有這類人活着的時候』。這是非常奇趣的預言：革命黨專政，一切的權力實際上都握在他手中，然而並不像政綱所說一樣；要立刻實行其聯邦制。

我再說幾個預言，自然，在現在看來也許非常之幼稚。但是在歷史上却仍有其意義。『我們要求社會工廠中的管理人，應由社會選舉。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一定要他做工作報告。我們要求社會的商店，店中的貨物要照實價去售，而不應由商人任意決定，使自己迅速致富』。

下面這二點其意義直到現在還完全保存着：

『我們要求完全解放女子，給他們與男子同樣的政權與民權』。

『一切教堂的財產應歸國有，用以償還內外債項』。

在這裏無疑地他們違背了社會主義，因為他們說到償還債款，但是他們想用教會的財產

來付這一類債款，這反宗教的意志又是十分顯明的了。

你們看，這是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紀念品（趙爾尼色夫斯基在策略方面不是一個革命家，僅僅在理論方面是個革命家）。在這個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紀念品中，存有許多預示之點；但是這件東西無疑的是來自與無產階級毫無關係的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羣衆間的。許多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特點都已經有了。主要的，從這個觀點上去觀察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革命運動對於我們是極有興味的。從革命運動教育學上我們也值得研究他。我們對於口號，儘力的追求其最後的根源，是有很大的意義的。這最後的根源種得非常之深，證明歷史運動的客觀力量，完全不顧人們對於這個運動的觀念如何，而自有其一定的結果。六十——七十年代時，那些創作俄國革命底書籍的小資產階級，不自覺的暴露了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幾個特點。因為他們在那種自發的客觀的直接壓迫之下，所以他們便握着了那幾點。十分明顯的，這對於共產主義方面亦有某種的有力的影響。在六十年時代的革命者中，有一個脫加風夫，他無疑的，他是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斯主義者，這個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後來是所謂甲可賓派的首領（甲可賓派就是要設立舊的秘密的組織，目的在奪取政權的

一派），這種要求只是在舊的小資產階級的「布朗基」的形式中才能實現。這是特別的一點。另外一點，馬克斯的名字在六十年時代開始響亮起來了。在脫加屈夫處可以遇着許多馬克斯主義者觀點的章句，這些章句，以後不必多說了，但是有一段是我們應當指出，即是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評判。試看脫加屈夫對於資產階級經濟是怎樣說的。

『在他們的學說與理論中，如明鏡一樣，反映出那養育他們的。購買他們的著作的給他們恩金及勳章及好位置的。階級的精神及意志的變動，事實上完全是一樣的問題。他們照著店東地主的的要求，可以完全直接相反的去解決。譬如當說到工人罷工的時候，經濟學者的口唇上即發出咒罵的聲音來，但是在說到廠主罷工的時候，那他們的嘴唇上就滿堆着得意的甜蜜的微笑。他們肩上的力量是活的，動的，每日每時發展的力量。當他很自負的踏進人類進化的舞台以後，到現在還不够一世紀，便已經成爲整個智識世界的主宰者了。現在他甚麼事情都做，吞食一切，他到處都支配着和指揮着，對甚麼東西都發佈他的命令。這個力量，即是資產階級，這種工具就是資本。自然，在資產階級補助之下而存在的科學，亦將與其飼養者同其運命。當其飼養的人還沒有掃清中世紀之跡痕，還沒有從封建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

時候，當他對於過去還有幾分戀戀不捨的時候，經濟學者在這一步上都是很怯懦，遊移，謹慎的。但白亞當，斯密特甚至自李佳圖以來，資產階級已經變動了，他站在前哨的地位。他已經在國民經濟的有機體中種下了很深的根源。同時經濟學也就更變成了資產階級了，更無恥的宣佈了市儈的教義了。

我把這個簡單的來做個小小的證據，說明俄國出版界中脫加屈夫之解釋歷史，無疑義的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在這個空氣中，在俄國的革命的小組中，產生了一個預備革命的計畫，這些預定革命的計畫當然是十分幼稚的。第一次是在一八六八年在尼且也夫的小組中發現了。在尼且也夫是俄國的巴枯寧派人（這可以認為已經證明了的），而尼且也夫小組是巴枯寧式的革命在俄國第一次的企圖，現在我來指出這個第一個巴枯寧革命的缺點，至于那些預言諸點，其音調雖極暗啞，但是也很值得嚮他幾下。

這就是當時巴枯寧派對於革命的策劃：

「最好的行動者在一八六九年五月以前，應該集中在彼得保與莫斯科，而一部分則應集中在那些有大學的城市中。在這時候應該準備及進行各學校學生的運動，要求集會結社之自

由。而且應該用貧穡人（就是貧穡者受過教育的組織），開始在貧穡的羣衆中宣傳。行動的本身應該移到省城及縣城中去。主要的集中在小販，學生及省會中的貧穡者身上。從十月起，首都的及省城的宣傳員轉移到民衆中間去；因之，至少須有四分之三的行動者，由首都派到各省去。其方向則由俄國的西境直至定那保。因為這是對國外僑民最重要的一條道路。所以沿路各省的準備工作頗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在一八七〇年春天就開始羣衆運動，羣衆革命」。

你們將要說，這是笑話。當然，這是笑話。這正如第一個小孩子畫定的預定革命計畫。但這種暴動的計畫，有計畫的準備，却在六十年中從巴枯寧的筆頭裡暴露出來了。因為普通對於巴枯寧派的批評，總以為只會搗亂，止會拋炸彈，所以這一點，很可以改正普通一般人的錯誤。從巴枯寧派的組織中產生了第一個革命的計畫，這個計畫，是純粹小資產階級的，在這裡，甚至連脫加屈夫也沒有受共產黨的燻染，把革命只是看做貧穡者的革命。對於這一點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不必加以嘲笑，難言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八年沒有喊「貧民」革命的口號麼？我們叫這口號時甚至不願老馬克思主義者之反對。如斯切班諾夫在真理報上之批

評。對於這種批評當時不會有甚麼人加以注意。斯切班諾夫寫道：「貧民」與無產階級不是同樣的；布爾塞維克應該依靠在無產階級及鄉村半無產階級的身上，而不要依靠的所謂的「貧民」身上，在這貧民之中，有「流氓」，蕩子及赤貧者，這許多人都是反動派的支柱之一，是一九〇五年以及後幾年中的蹂躪軍。但是不管這許多，布爾塞維克總是還要叫貧民革命的口號。因此便不必向六十年代喊貧民者革命的巴枯寧加以過分過重的攻擊。更奇異的一點，就是他們之注意強盜，巴枯寧對於強盜含有極重大的希望。他說：革命者在人民中第一個應該注意的份子，就是強盜。這種見解，到六十年代的時候，當然是陳舊不堪了。因為六十年代是鐵路時代。而強盜則為鐵路時代以前交通不便時的一種職業。在鐵路上是搶掠東西很困難的，因之對強盜的注意就被技術的發展停止了。

無疑的，這在本質上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運動，但是這運動在客觀上却造就了一個後來多少實現了的計劃。結晶在布爾塞維克黨內那些將來的革命組織的特點，實際上說來，在六十年代已經存在了。秘密組織之要求，一定的計劃，武裝力量暴動，所有一切行動的實際方法，在當時都已經有了。普通以為當時的運動是到民間去的和平的宣傳運動，于此復可把我

們的腦子大大的刺激一下。而這個到民間去的運動是與拉夫洛夫的書『歷史的信』有關連的。

但是，應該說明的就是這『到民間去』的運動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革命運動間最不成重的一部分，菲克納爾在他的『迴憶錄』——這是那時最好的文件之一——中說道：

『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我住在外省，並且極清楚的知道蘇馬爾斯基及其他各省的狀況；我可以絲毫無訛的證明，到民間去的運動是在一八七〇年之初的運動。其時間很短，各人的實際工作不一，有的僅有幾星期，有的二三月。到一八七五年之末則已經停止了。所存在者只有那些在第一次辛而脫逃的人捲上重來的企圖而已。曾從在彼得洛夫斯基縣住了十個月，我們當時在地方上聲氣的流通雖極容易，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人來和我們聯絡』。

這是七十年中大革命家之一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裏我們還要把結衣其的回憶『半世紀』拿來補充一下。結衣其敘述自己到民間去的有趣的歷史，同時又因他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歷史那一點最有趣味，所以使我們覺得更加有味。他說：他準備到民間去，正像去看自己最愛看的戲一樣。他們盡力模仿農民的外貌，穿農民的衣服，說農民所說的話等等。而且當他們在某一個鐵路上被他人當做真正的農民看待的時候，他們便非常快樂。但是他在這愉快之

中就忘了一件小事，忘了學習鄉村的工作，當這個扮裝得極像的農民到了農村中，人家就給他鐮刀要他使用。那他怎樣辦呢？他就開始工作了。起初把他當做真正農民看待的主人，於是便對他說道：『哈？朋友，你要斬斷我的或那女人的腿脛了，看前面那女子怎樣刈，你就照她做吧！』明天復問他道：『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外表看來像農民，而刈草都不會』。當然，不會刈草的人當然是不配做農夫。其他鄉村工作人員亦受同等的遭遇。

這種智識份子的出發點是很明顯的。領會了農民的外表而忘記了實際勞動中農民的實質。因之到民間去的運動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間的革命運動中最不嚴重的一部分。我所講過的那些計畫，章句。無論如何幼稚，但總比他嚴重若干倍。

第四章 民粹派的革命運動

我們如果拿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上半期的革命運動整個的觀察一下，簡言之，實可說是建築在彼騙的農民暴動期待之上，二月十九日農民之受騙，這一次不但趙爾尼色夫斯基很明白，即亞歷山大第二自己也很瞭解，並且曾經很清楚的討論過。當沙皇討論派往各處的將軍省長的名單時，內務總長頗欲專權，不願讓權于沙皇的特派員。內務總長證明在鄉村中一切都平靜，亞歷山大在決議案上寫道：「現在固然是這樣，但到農民知道了他的期望（他們所想的自由），沒有達到時候，那就……」等等，亞歷山大第二很清楚的了解到他所給農民的東西，並不是農民所期望的那種自由。整個的革命運動，及其意義。可以把加拉古作去在刺

亞歷山大後對亞歷山大所說的一句話來簡括的描述他。當加拉古作夫被捕之後，沙皇近前向他道：『你爲什麼要刺我呢？』加拉古作夫答道，『因爲你允許了農民土地與自由，而又欺騙了他們』。被騙農民之期望騷動，便是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期一切革命運動的基礎。在二月十九日後第一年中曾有五十次的騷動，有時亦有很大的槍殺的騷動。然一般的說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却不曾發現，革命也沒有產生。爲什麼會這樣呢？這個問題應稍加以解釋。

在七十年代中在革命黨人中無疑義的已經把農民運動的迷夢打破了，這迷夢的打破就成爲兩大傾向的分歧起點。就在這一點上，這個問題，值得加以說明。這兩大傾向，一則傾向于資產階級，一則傾向于無產階級。爲什麼以前專門傾向于農民的人，現在傾向于別種人身上呢？這正因爲農民不能實現他們的希望，農民不但不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而且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們的革命性異常之少。這個結果是很複雜的，這不但受了農奴解放的傾向，而且還受了六十年代以後，沙皇政府一切經濟政策的影響。農民改革，一方面，對於農民的上層，份子（富農大農），無疑地給了他們一些利益。這些利益不但在改革的本身而且還在於鉄

路之建設。很奇怪的，地主簡直不能蘇御這鐵道，地主的意識簡直不能征服這鐵道建設的結果。鐵路廢除了地主的特權，這特權在農奴制存在的最後的十年中也許比農奴制的本身還重要。農奴制本身在這時候在某種程度上還阻礙着地主。但是地主有個非常貴重的特權，就是地主在市場上佔第一個位置，農民只有把地主的糧食運到港埠上及市場上（地方或中央的）去之後，才能夠出賣自己的糧食。地主佔市場上第一個位置，因此他能得到最高的價格與最大的利益，而農夫則應該的永遠的落後。自農奴制消滅之後，「輸運役」亦消失了。農民亦不要輸運地主的糧食到市場上去了。他亦不必等待地主先出賣糧食了。在鐵路建設之後，凡有車站之處，就成爲市場，誰先到車站（地主或農民）這全要看誰比較的敏捷與機警。而富農大農，在這裏比較地主更快的進糧食到這個新的市場上去，到鐵路上去。因此他便得到了最好的價格。

其結果，則富農大農（特別是沿窩瓦河各省的），無疑的在改革中佔了便宜。故凡沿窩瓦河及頓河各省去的革命者，是最愚蠢不過的人。頓河亦是個大農莊，因爲哥薩克亦歸于大農之中，到窩瓦河或頓河去的革命者，無非是想找些革命的同情。但在那裏想找到革命的

同情是很困難的。而想在當時在政治上最先進的農民羣衆中尋找革命的同情，尤其困難萬分。這個事實，我們必須把他指明出來。當七十年代，鄉村中敏銳與聰穎的觀察者，昂格爾加爾達教授，他曾發表了一封鄉村通信，他寫道：「在我的信上曾屢次的說過，農民雖沒有土地私有承繼權的觀念，他們都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然對於動產的私有觀念却已經是很深了。在前曾屢次說過：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農民中非常發達。企圖剝削，嫉妬，互相猜忌，互相陷害，弱者屈服于強者之前，強者驕傲，崇拜財富——這種思想，在農民中非常盛行。富農的思想統治了一切，每人都想變成富翁，剝削貧者。如有可能的時候，每個農民都想剝削別人。不論地主也囉！農民也囉！都是一樣，要榨壓別人的血汗，剝削別人的生產品」。

無疑地，這裏自然有些形容過甚。當時在農民中間，當然也沒有無產階級的影響，因為這是在七十年代說的。這時候，無產階級的影響尚未侵入農村之中，農村還落後得很。以後在鄉村的貧農中間發生了別種的心理，但是這還在以後，而不是在七十年代。也許可以這樣說：富農于七十年代思想上統治了鄉村的一切。那麼富農的心理到底怎麼樣呢？昂格爾加

爾答道：『富農是鄉村中極端自由主義者，是地主的激烈的敵手，他們不但仇視地主。他們而且認地主爲毫無能力毫無作用之人。雖然在鄉村中有人仇視富農，但富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卻到處受人聽從了。在這一點上富農在鄉村中的意義就非常之大。在說到土地問題，重分土地的時候，看某處地主的土地荒蕪了，農民反破入驅逐，土地若在農民手中決不會荒蕪，糧食也決不會像目下那樣的昂貴』。

因此無疑的，在七十年代富農已是鄉村中最德謨克拉斯的一部分，而且是爲政治革命的主力軍。但當時的革命者却帶着社會主義的綱領，迷信鄉村公社是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萌芽，這樣一來在農村中當然得不着當時的先進份子的理會。在鄉村中宣傳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但若向富農宣傳政治革命這也許不至于完全沒有效果。無論如何，富農對於這個政治革命是會參加的，是站在革命方面的。直到社會主義在鄉村中實行的時候（在鄉村中設立貧農委員會），他才變爲反革命者。這一部分農民是極有勢力的，當然他對於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社會革命黨人，及民粹派的宣傳員，在當時已經是反革命了的，而且這亦是必然的。民粹派的革命者在農村中不全是贊成富農的，在農村中亦有貧農呵。請看非克納爾的回憶錄，看

他對於鄉村中那些非富農的農民羣衆，是怎樣描寫的。她以醫生的女助手的資格到了鄉間，首先她就正式執行她正式任務。三十日中間有八日她不在家，在巡行各鄉村的時候，整天裏就浸淫於飢寒悲慘的深淵之中，平常她總是留宿于農舍中，（所謂客舍）。『在什長或村長按戶通報之後，那裏立即聚滿了病人。三四十個農人，就塞滿農舍。有老有少，大部分是女子；小孩子更多。這些人的叫喊與呻吟之聲。充塞于空氣之中。污穢與衰疲，使對病人不能安靜的診察。其疾病都是經年舊病，成年人瘋癲，腦病拖延至十年十五年之久。幾乎每人都患皮膚病。止有極少的鄉村有澡堂。在多數的鄉村都在俄國式的火爐燥堂洗濯。不能醫治的腸胃病，胸部的暗瘡，在幾步以外都能聽到。在不論大小年齡的人都染着花柳病；瘤癩，與各種的傷潰。而這些又加了那不可想像的污穢的房舍及衣服，不衛生及貧乏的食品。每每就使人呆呆想到，這是人的生活呢？還是動物的生活呢？……我的眼淚常常如雨珠般，落在我給這些不幸人的準備的藥劑和藥水之中。我以為他們的生活與沙可利亞所描寫的四十萬印度貧人的生活無甚差別』。菲克納爾簡括的說：「這三個月對於她是個困苦艱辛的經歷，『從物質生活的民衆方面得了許多悲慘愁苦的印象，民衆的精神，我不曾看到，至于宣傳，

我簡直沒有開口』。

要在這種鄉村貧者之前作什麼宣傳，實在是很可笑的。因為很明白的，這些因為最初步的物質生活存的條件都要求而得，貧者是完全不能接受社會主義的宣傳的。因為他在政治完全落後的。一切進步的富農也不會同意于社會主義的政策，因為他是民主派，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萌芽。因此社會主義的革命，在鄉村中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會得到任何的援助。

我們若說在農奴改革之後，農民的生活狀況一般的改善了，這只是對於富農而言。富農實際上是勝利了，但不是因為農民解放，而是鐵路之建設。富農可以很順利的與地主競爭。至于說到農民羣衆則這些羣衆都遊民化了，這部分羣衆並沒有成爲無產階級而正成爲遊民。不管巴枯賓如何的錯誤，遊民與無產階級之間總還是有極大的區別。在我們之間相同的只有肉體上的一點，就是他們的肚子有時都要挨餓。但不能在這個肉體的相同之點上就做出社會學的結論來。不能因為他們都時常要挨餓，而說他們的心理與意志都是一樣的。無產階級的心理永遠是進攻的心理，革命戰士的心理，甚至于在這最初的時候也是一樣。而遊民的心理

在是求生的心理，在求得自己的肚子一飽之外，什麼都不顧了。農民革命的消沉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當時鄉村中沒有革命的份子。縱有一些革命的份子，然也不是當時的革命者所期望的。因此革命黨人無論與那一部分農民周旋，他們總要碰釘子。

在鄉村中死氣沉沉的時候，在城市中則發生了革命的運動。有一個文件是非常有趣的，這是在一八七〇年聖彼得堡的熱夫斯基紡織工廠罷工後的內務部的通告。通告上這樣說：

「熱夫斯基紡織工廠的罷工，是工人中空前的新現象，極可令人注意。因此皇上便叮囑各省省長對工廠製造所的工人應嚴加注意，勿稍懈怠」熱夫斯基工廠的罷工，當時民粹派的書籍，並未提起。但亞歷山大第二却完全的注意了。自然，內務部所謂這種現象是完全新的現象，這也是不對的。在一年以前，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省長的通告上，就曾經說到在西平布的康騰工廠中的罷工。並且我們知道在一八六五年在馬路若夫工廠中也曾經有過一次大罷工。因此沙皇才注意到這種逐漸成為經常的，而且次數逐漸的增加的現象。工廠罷工次數的增加，驚動了舊沙皇的上層份子。

假如我從這一方面來觀察俄國的革命運動，在七十年中，唯一的最利害的堅固的革命組

織，却正是在工人羣衆周圍所團集起來的。極著名的加衣可夫派他是七十年代宣傳小組之祖先。他主要的是在彼得堡的紡織工人及五金工人中活動。這就是說，他們盤旋于工人之四周而不是坐在鄉村中。在鄉村中他們簡直不開口，但在彼得堡的工人中間他們却宣傳了，而成績亦頗不壞。莫斯科的鮑爾廷拿的小組，也是七十年代最明顯而有力的現象之一，這小組也是莫斯科的紡織工人所組織而成的。鮑爾廷拿及其友人都進了莫斯科的手工廠作女工，他們全樣在工人中在無產階級中活動。在鄉村中正是風平浪靜的時候，在誠市中却正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而在七十年代之下半期，在一八七八年在聖彼得堡那種疾風厲雨，甚至於驚動了對此種現象毫不關心的智識份子的注意。

七十年代聖彼得堡的工人運動頗有很大的發展，當然不用過分的誇張這種革命運動。領導工人的彼得堡的職工會政治上是很幼稚的。他們向皇太子（即以後的亞歷山大第三）去請願。並且這件事還是他們運動最明顯的含有政治性的一點。普列哈諾夫在「俄國工人運動」中，曾經站在第一者的地位來敘述這件事情。

七十年代罷工時，聖彼得堡工人政治智識的水平線並不很高的。假如我們能想到一九

○五年正月九日彼得堡的五金工人向沙皇請願的事實，那我們便不致于嚴重的譴責一八七八年向皇太子請願的紡織工人了。但無論如何這個運動總算是俄國工人第一個政治組織底基礎，哈爾杜林所領導的「俄國北方工人協會」的基礎。

在一八七八年罷工的基礎上所產生起來的「俄國北方工人協會」共有二百多人，但不久即瓦解了（二百人中有些叛賊把他出賣了）。這個協會的創設者的歷史，比這個協會本身的歷史還要有趣。斯蒂班，無條件的是十九世紀的俄國工人中的第一個偉人。斯蒂班是從工場裏出來的真正工人，他之所以能炸掘冬宮，就因為他在冬宮，當過木匠之故。實際上他還是第一個使無產階級運動與鄉村的民主派相結合的人物。他是維脫省某富農的兒子，他父親是很富的，父親死後，他的幾個兒子，每人都得一千五百盧布的遺產，這在當時農民看來，是個極大的數目了。他畢業于（或將畢業而未畢業）維脫鄉紳議會所創立的中等技術學校，與現在的工人補習科相等，有機械學，及物理學等等。他幾乎畢業了，因之他的智識程度，不僅超出于他所組織起來的紡織工人的中等的程度以上，而且還勝過彼得堡的五金工人。他是一個很有智識的人，他是農村中政治智識極高的人，他是一個很複雜很有趣味的「混合」人物。

他集有各種下層民主的以及某種程度上無產階級的觀念。

至于協會本身及其綱領，我們只需要注意其一點，就是這個綱領是很少革命性的。斯蒂班所創設的俄國工人協會，最好稱他為政治會社，因為他無論如何不是一個職工會。這會社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宣傳與組織。很明顯的，他在政治方面對於自由宣傳的必要條件。並無具體的要求。協會的綱領只要求集會結社出版等等的自由，而沒有要求招集國民會議。

這裏就可以看到對當時智識份子的讓步，因為當時的智識份子極力的否認議會主義，斯蒂班因之亦受其影響。普列哈諾夫說：他自己曾經極注意的研究西歐的憲法，然而很奇特的，他所採用過來只是保證自由宣傳的那幾條，俄國工人北方協會還未提到奪取政權為當時任務的問題。在這裏斯蒂班無疑的是要適應他所組織起來的紡織工人的政治水平線。他自己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對於「人民自由黨」的行動受印象很深，而後並以此喪其身。但是當他要去組織昨天還向皇太子請願的工人的時候，他就不能不顧慮到他們的水平線了。斯蒂班在他的政綱中，甚至于還設到基督教與傳道者。可見他是在尋找羣衆所能了解的東西。

在很久的時間中，俄國工人北方協會會被人認為是七十年代俄國工人唯一的政治組織。

現在我們知道，他非但不是唯一的，而且還不是最有趣味的組織。在北方協會成立前三年，在南俄阿結思，便有另一團體之存在，這是南俄工人協會。南方協會的綱領較之北方協會要革命得多。在南俄協會會章第一條上便這樣的寫着：

『我們認爲現在社會的秩序，不能適合工人的光明公正的要求。認爲工人要得到自己應有的權力，只有用暴力的革命來消滅一切的特權與特典，而把勞動作爲個人與社會的幸福的基礎。我們認定只有在全體工人都完全覺悟了自己的狀況是無路可走而整個的聯合起來的時候，這個革命才能產生。我們是南俄的工人，我們要聯合于協會之中，本會定名爲南俄工人協會。本身的目的，便是如此。……』

下面就是協會本身的章程了。我們若注意這段序言，在此地並沒有談到基督教及傳道者，也沒有迎合彼得堡紡織工人的簡單頭腦的他種的曲調，而直接敘出自己的目的，便是暴力的革命，即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在這一點上南俄工人協會，當然是站在革命運動發展更高的階段之上。在詳細的研究之後，才知道南方工人協會舊的會員比北方協會更多（他約有七百人），其存在的時間亦更長。

這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不是在領袖的個人的特性。南俄協會的首領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智識份子兼貴族的若斯辣夫斯基，自然他在行動方法上是一個有大方針的人。他立志不允許七十年代那些革命的宣傳員到工人中間去。他很小心地把工人階級引到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影響之外。所以他與當時一般宣傳者中間的聯繫異常之惡劣，並這也就是他之所以無聞于世的原因。無疑的，他是一個全身致力於革命的人，而且爲了革命的行動耗費不少（他爲了創設這個協會而充軍）。他雖然創造了一個大的協會，然而他在當時却是點點無聞。連普列哈諾夫對這件事情也絲毫不知道。普列哈諾夫不知南俄協會之存在（雖然也要知道的可能），在協會的四周圍靜沉異常，所以連一些聲息都沒有傳到列寧格勒去。但我以爲南俄協會之特點，若全歸功于若斯辣夫斯基，那是毫無根據的。當然，在他的不准小資產階級到自己的工人羣衆中去這點上，是可以稱揚的。而且就這點亦可以表示他是一個很能深刻了解事物根源的人。但是更重要的，却在別一方面，在協會的社會基礎上。北方協會的特點就在他是紡織工人的聯合會，是昨天才從鄉村出來，與鄉村還保持一些聯系的人。南方協會則不然，南方協會主要是五金工人，在阿結思有大的鐵路工廠，有俄國輪船商業會社的大造船廠，在羅斯托

夫亦有大的五金工廠。這個工人運動主要的就建設在他們身上，這個南俄協會的基礎是應該鄭重指出來的。因為在以後九十年代來及廿世紀初的工人運動時，我們將知道俄國的工人運動之成為革命的運動，正在五金工人開始參加運動之時。五金工業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主要的，亦即最革命的工業，而五金工人則永遠的站在俄國革命之前面，永遠的是站在先鋒的地位之上。第一次我們就在一八七五年的阿結思及羅斯托夫的工人中間看到了。協會最後終於瓦解了，南方的工人協會亦全樣的被警察所消滅。其結果則如我所說過的一樣。若斯辣夫斯基被審問並判決充軍。但是這個很明顯的工人自由思想底精神，在南方還依然存在。這可以把普列哈諾夫所寫的狀況來證明。普列哈諾夫在工人搗毀羅斯托夫警署之後一日到了羅斯托夫，他描寫這個運動為一個簡單的原始的爆發。

在這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在七十年代已經稍稍的開始鍛鍊成馬克斯主義的思想來了。我之所以用「馬克斯主義思想」這幾個字，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用慣了這個不甚完善的名辭，事實上，馬克斯和昂格思對於思想這個字是怎樣了解的。就是說：「思想」是某一社會階級在其階級利益影響之下所造成的那種偽的與虛假的畫圖，——純粹主觀的畫圖。因此便有資

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封建的思想。但是馬克斯主義却不是工人階級的行會利益之簡單的反映。而是一種科學的理論，客觀的科學論。因此說馬克斯主義的思想這個名詞，當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應該說馬克斯主義的宇宙觀，否則，我們把那科學的理論，（而實際上是客觀的科學的理論）與一切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空想家，盧梭，及空想的社會主義等等相提並論了，同時我們永遠要嚴厲的指出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區別。我們之所以常用「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這些名詞，也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用慣了這個不完善的辭句之故。

俄國的馬克斯主義的宇宙觀便是在這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開始形成的，俄國的第一個完全的馬克斯主義者是普列哈諾夫，他的第一篇馬克斯主義的文章是在一八七八年在列寧格勒做的，當時他還沒有到外國，還不知道德文。他直接的觀察彼得堡的工人運動，而做了許多相當的結論，這篇文章叫「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與社會主義在俄國的任務」載于一八七九年出版的第四期「人民與自由」上面，然而寫這篇文章是在一八七八年之末寫的。他這樣寫道：

「無論革命者怎樣無根據的否認，然城市工人的問題總算是生活問題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問題之一。在過去我們常把自己一切的希望，一切精力都放在農村羣衆之上。這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城市的工人問題在革命者的預算上，常佔次要的地位。只有在剩餘力量的時候，才會顧慮到城市的工人問題。只在鄉村中爲了某種原因不能宣傳的時候，才會到城市中來做一回宣傳。而這宣傳的目的僅僅是想從城市工人中訓練出幾個到鄉村中去的宣傳員。這種態度，當然沒有可能做有系統的經常的宣傳者，特別是沒有可能去組織城市的工人。因此使我們現在得到一種非常不幸的結果。」

「在城市工人中所費的力量雖少，但社會主義的思想却很深刻的侵入了工人隊伍之中，現在很難找到沒有社會主義者工人的工廠，製造所及大的作坊了。然無論這種現象是何等的可喜，如果我們仔細的觀察一下，近幾年來在大工廠及製造所中發生了幾次大罷工，那時我們的社會主義者在甚麼地方呢？他們在這個運動中有些甚麼作用呢？幾乎絲毫都沒有，有時簡直一無所聞，有時他們雖企圖行動，但他們的影響却非常之微」。

普列哈諾夫繼續說：

「同時我們對於城市工人應該像對於一個整個有獨立意義的羣衆一樣，應該尋找工具來影響這些羣衆。但在城市工人中只有訓練個人的材料時，這種可能是永遠不會有的。以城市工人爲次要意義的觀點，妨害了我們以鄭重的態度去對待城市工人。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城市工人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中真的沒有重大意義麼？我以爲這種意見是十分錯誤的」。

「我們的城市工人雖然不像西歐工人一樣與鄉村斷絕關係，但我們的工人是民衆中最活動最容易接受革命宣傳的人，在這點上我們的工人與西歐工人是一樣的」。

下面一句就是民粹派的調子了。「因之工人是農民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最可貴的聯盟者」。

這裏普列哈諾夫還有民粹派之遺留，但是他所提出之實際方法却在我們面前預示了以後整個革命運動的歷史。最先，便是組織底方法。

爲了鬥爭，用鬥爭的方法，在鬥爭時，把羣衆組織起來！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能造成空前未有的，獨立的，自信的及強固的羣衆。從前因爲沒有這種方法，所以常被幾十個警士把大批的羣衆驅散，嚇跑」。

他說：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羣衆的煽動，在什麼基礎上呢？

「羣衆有切身的利益，羣衆只注意工資的增減，廠主壓迫之大小，警察之兇惡。然社會主義者却在他們面前講述各種不同的理論。號召他們去研究學識，去受教育等等，有時還要講些石器時代或天空中的行星等等的演講，羣衆將如何對待這些人們呢？他們將以爲這是與自己不同的人，他們將以爲這是與他們不同曲調的，有時甚至還要說些怪話去譏笑宣傳者對於未來的信仰與期望；羣衆並不知道宣傳者的言論與願望，到底對於他們有什麼利益，因爲他們不懂得石器時代的演講怎樣可以用來停止監工者的兇暴行爲」。

因此，煽動是應該建築在工人階級的日常需要之上。我們若知道黨史及俄國職工運動史概略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九十年代的『論煽動』的小冊子有怎樣偉大的意義。這小冊子上講的就是在工人階級日常利益的基礎上，把工人羣衆組織起來爭鬥的問題。這種關於煽動的思想當普列哈諾夫在土地自由黨時代（人民自由黨出現之前）所寫的小冊子中就已經有了。

普列哈諾夫說：煽動是影響羣衆的方法，『用煽動來影響羣衆，其所得的效果與其所達到的目的，較之我們過去所用的那種影響個人的方法，來得更大而且更快。』

他不僅預言了『煽動』的思想，他並且還預言了在沙皇底政治環境之下，俄國工人運動應取底形式。

『從此產生了擴大組織底困難，參加秘密組織的人應以絕對的忠實與能力來對付這個困難』。『異常的秘密與極利害的恐怖手段』，是一八二四年前英國工人運動之特點，當他們知道用暴力來對付暴力的時候，決不會有一個稍有思想的人罵他們妄用手段……』

以下土地自由黨之思想又落在普列哈諾夫的身上，他把工人階級的暴力描寫成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恐怖形式。然無論如何，爭鬥的，秘密的工人政黨的思想，將來的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已經很明白的在這幾句話裡面表明出來了。

因此，革命的工人運動底基本思想，普列哈諾夫。在土地與自由黨時代，在一九七八年未所寫的文章中已經完全具備了，這一鐘對於我們很有價值。因為從此可以證明，普列哈諾夫之所以傾向于無產階級革命底態度，並不如大衣却所說的由書裏面來的，而是由于實際生活，由于他所看見的實際的爭鬥而來的。普列哈諾夫的所以成爲馬克斯主義者，不是像大衣却所說的是因爲他研究了馬克斯的原稿，而是因看到了工人運動之真面目，而且只有這個工

人運動才能推動他去研究馬克斯的著作。于此可以了解思想之產生，思想永遠是在某種實際情形基礎上產生的。

什麼東西推動當時的革命者到暗殺的路上去呢？爲什麼他們進行那愚笨的暗殺官僚，行刺沙皇而不去進行羣衆的鼓動呢？我想我上次所引替漢米洛夫的文字已經給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了。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如此。在七十年代的中葉，運動已達到很高的熱度，使得革命者不能僅僅空口說白話了。他們無論如何應該開始行動。那麼幾百個人的團體怎樣能夠開始行動呢。你們也許要說：他們可以同工人羣衆進行工作，推動他們去革命。但是在彼得堡（這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工人羣衆的水平線還是這樣底，他們還要向皇太子請願。很明顯的，依靠這些覺悟程度很淺的工人羣衆而進行革命的鬥爭，那當然是不可能的。農民呢？農民當然比工人更難成爲革命的基礎。那麼，怎樣辦呢？只有自己來幹。所謂「自己」，只不過是幾百人而已。依替漢米洛夫的計劃，在執行委員會的四周圍聚集了五百人左右，這數目是很可靠的。因爲替漢米洛夫對於「人民自由」黨的執行委員會內一切情形是很清楚的。這五百人，因爲客觀的條件及其他原因，除了與政府用遊擊戰爭之外別無方法。他們認爲或則空談

了事，毫無動作（這是他們自己所不滿意的），或則應在遊擊的行動之下，作些事件，這種遊擊行動最後便成了恐怖手段。當時的技術也幫助了他們。因七十年代正是爆烈物發展甚盛第一個期間。正是硝酸鹵、炸藥，棉花藥出現的時期。從許多的回憶錄中，有人對於當時「人民自由黨」的首領發生一種極神怪的想法，說他用一小塊的火藥，在家中用木手工業的方法準備之後，可以產生極大的震動與可驚的破壞力。炸藥成爲爭鬥的技術的工具，這工具使得遊擊性的鬥爭的確實變成了令人驚恐的東西。幾乎炸了沙皇的專車，炸皇宮，最後，炸了沙皇本身。

當時的反動份子之一，警務總監圖而腦夫很正確的說：恐怖手段對羣衆的影響，比較這恐怖手段的直接結果更大。當替漢米落夫在叛變之後與他談話時，替漢米落夫說：實際上說來，當時政府方面何必這樣恐慌呢？他們只不過極少數的人而已。圖爾諾夫回答道：是的，人是很少，但是這少數人有這樣的行動工具，使得他們所有的結果要比他們的數量超過幾倍。這當然很可令人注目的。我以為人民自由黨的策略，在客觀上說來，一概無條件的加以否認，爲什麼社會革命黨在二十世紀初的恐慌政策是完全不適用呢。這就是爲了下面這個

簡單的原因。因為在一九〇五年時，我們已經有了革命的羣衆，組織這些羣衆、引導他們到武裝動暴的路上去，而不是在恐怖手段之上枉費氣力。但是這些條件在七十年代是不會有的。當時沒有能夠武裝暴動的羣衆。因之，當時的革命者只有走上恐怖手段的路上去，採用遊擊性的行動，否則，他們便要陷于空談，無補實際。

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說：我們在實際上並未拋棄遊擊性的行動，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實際上是什麼東西呢？十二月的暴動也是純粹的遊擊的行動，只不過是武裝的人數多些，與人民自由黨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試把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與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暴動比批一下，我們正確的圍攻軍官學校，我們正確的進攻皇宮等等，難道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們與此有些相類的地方麼。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們的策略是純粹遊擊性的策略，只不過他們的風格與人民自由黨的遊擊策略，稍有不同罷了。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們不會有赤衛軍，不會有整個的士兵站在我們方面，不會有炮隊，所以除了遊擊戰爭之外，我們別無出路。因此，人民自由黨的策略，是從他們所處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但是這個策略又必然的要使這派的綱領與其思想發生變化。以普列哈諾夫爲例罷，普氏

一切宇宙觀的基礎都是事實而不是書籍。人民自由黨人便可以做反面的例子。當所有兩個革命的組織，在一八七八年——一八七九年間有「土地與自由黨」的成立，以後在伏以城大會上發生分裂，在一八七九年七月組織了「人民與自由黨」。在菲克納耳的筆記及替漢米諾夫的自傳未出版以前，大家都以為「土地與自由」是個宣傳的組織，只有「人民自由黨」才是純粹的恐怖的組織。在菲克納耳的回憶錄中已發現了這樣的事實，即「土地與自由黨」還像一個恐怖的組織，而不像宣傳的組織。而替漢米諾夫則在自敘傳中直接的說：在一八七八及一八七九年時，在「土地與自由黨」中宣傳僅僅是一個表面。鄉村中的黨員，在農村中團結起來，就在那裡進行宣傳，並夢想着中央對於他們的領導替漢米諾夫說在實際上只有傳統的習慣，才會幫助這類宣傳的組織。因為在歷史上絕不會和舊的行動方法，舊的習慣，舊的口號，立刻斷絕關係。因此對於鄉村的工作人員也只能陸續的給他們些書籍，其全副精力還是集中在恐怖爭鬥之上。當鄉村工作人員到聖彼得堡開大會的時候，彼此常常吵鬧起來，罵將起來，以後他們又回去了。聖彼得堡之中心，依然如故，繼續其工作。與鄉村工作人員吵鬧以後，用甘言蜜語安慰他們一番，使他們不要氣憤，使他們從彼得堡送走，叫他們幹以

前的舊工作。實行恐怖的手段或如時常所說的，破壞國家的政權。

因此在菲克納耳。及替漢米落夫的敘述中，「土地與自由黨」實際上正是一個恐怖的組織，正在「土地與自由」黨時代產生了沙芬微夫行刺亞歷山大第二的事情。行刺沒有成功，因為這是用手槍行刺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則堅決的決定只用炸彈，最後便達到了目的。

在伏羅城大會之後「人民自由黨」則成爲公開的恐怖的組織。而鄉村派則組織了「平民改造黨」，什麼事情都沒有幹，他們既沒有努力的去幹，在實際上也完全沒有幹。

從一八七九年夏天起，「人民自由黨」的執行委員會，有一個著名的決議，把爭鬥的全力集中在亞歷山大第二個人身上。從此以後使獵逐這頭戴皇冠的野畜。一直到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爲止，這獵逐的歷史我不必加以敘述，這是革命黨人可驚的，英雄氣概的表現。在這一點上我們知道這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唯一的時代。「行恐怖手段」，無疑的，必須要一些物質的供給，必須要炸藥，必須要試驗室，而這些東西，都必須要錢，錢從那裏來的呢？後來「人民自由黨」的歷史家如巴却而斯基之流，便否認「人民自由黨」曾受他人的津貼。他們敘述「人民自由黨」的經費，是異樣的拮据等等。這當然是完全不對的，這是資產階級歷

史學家對俄國革命運動底解釋，他們總想說明這個運動是個幼稚的可笑的運動，藉以證明俄國革命運動之失敗而只有資產階級的方法（主要的是入宮請願等方法）是唯一的實際的方法。實際上，「人民自由黨」以及以前的「土地自由黨」都曾從資產階級方面得到大批的款項，一部分是從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黨員那裏來的。一部分是從資產階級的捐助而來的。資產階級對革命運動的態度與農民完全不同。關於這一點菲克納耳在自己的回憶錄上舉了許多例子，這許多例子，也沒有綜合起來，沒有加以解釋。只是單個的把他列舉出來。我們見到有時公證人給他們以援助，有特別地方會議的主席，及市政局的主席都給以助力等等。他們都同情于他們，幫助他們。給他們一點錢。這小小的數目，集合起來，便大有可觀了。經費他們是有的。物質上他們是依賴資產階級。這物質的依賴逐漸使「人民自由黨」在實際上喪失其社會主義性。「人民自由黨」說：他只領導人民到立憲會議為止，以後怎樣管理國家由人民自己去決定。菲克納耳在審判的時候說：共和政體與君主政體的問題，他們沒有提出過，將來究竟是何種形式對於他們仍屬茫然。這就是菲克納耳在一生最痛苦的時間，在死的危險以前，把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解放派一樣。解放派為保全統一與不分裂起見，亦沒有提出共和

政體或君主政體問題來。「人民自由黨」當着物質依賴於別人的條件之下，竟逐漸減低了這個運動的口號。普臘波夫說：「我們目前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求得到民主的憲法。這樣我們便能得到社會底同情。必須避免一切會使我們脫離自由主義的社會團體底方法」。

三月一日不僅是亞歷山大第二壽終正寢的日子，而且是人民自由黨執行委員會實際上死亡之時候，後來人民自由黨只不過空有其名而已。正在這個時候，正在三月一日的前夜，「人民自由黨」才開始感覺到那種真能挽救俄國革命運動的力量，真能使革命脫離可恥的，大腹賈的附屬地位的革命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俄國工人階級。

第五章 俄國馬克斯主義的發展

上面曾經講到七十年代俄國革命運動的兩個方向。這兩個個方向，都是由於從前趨向農民而迷途忽悟的分子中所產生的。在七十年代中葉，有一派革命者，深信農民在政治上無所動作和沒有號召羣衆的農民運動之可能，於是從事於工人運動。很奇特的，自來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史底扁幅，沒有說到這一派，屬於這一派的，有智識份子中聲名未著的沙斯拉夫斯基和鼎鼎大名的普列哈諾夫。另外一派，則從事運動資產階級，此派的領袖爲希臘波夫。人民自由黨是代表着趨向於資產階級的，這對於人民自由黨的策略和綱領，實有莫大的影響。資產階級給了一些物質的資助，然而，因此幾乎取去了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社會主義的精神。

資產階級所供給的資財，除只敷一些恐怖的謀殺組織以外，凡為鬥爭必要的資料，資產階級都有或大或小的幫助。人民自由黨的軍事組織，是最類似資產階級的組織，類似小資產階級的組織，（小資產階級的組織當然要反映資產階級社會的心理），這個軍事組織，經過了好些時候，而無所表白于世。很奇特的，凡研究人民自由黨的歷史的俄國智識份子，無不醉心于研究投擲炸彈和射出手鎗之事。總而言之，即注意那些刺客一流人物的英雄偉業。只有最近，我們才略知這個組織是完全手工業式而能以百發百中的破壞者，才略知這是個比較羣衆的組織，這個組織是「人民自由黨」的軍事組織，正確的說：是「人民自由黨」的軍官組織。參加這個組織者，不下二百餘個軍官，若將表同情者算在一起，則其總數有五百餘個軍官。這樣看來，這個組織的人數，比十二月黨人差不多，十二月黨的人數也至二百人左右。

然而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十二月黨人當時的力量與「人民自由黨」人相若，可是十二月黨人曾有二次的軍事運動。一次，是先奈斯基廣場上的和平運動，因為這裏他們不敢射出，再次，是赤爾尼果夫斯基團的真正的武裝暴動。「人民自由黨」人的軍官人數與十二月黨無異，而人民自由黨人沒有一次堅決的行動，這個軍官組織，熱心研究的秘密著作品，頗誠敬

的援助人民自由黨的宣傳家。最後，較奮力的個人，如海軍大尉蘇漢諾夫等等，曾給他們許多實行恐怖手段的戰士。但是，無論甚麼軍事陰謀，無論甚麼武裝暴動，「人民自由」黨人始終沒有做過，此其所以奇特哩。十二月黨人在其運動中希望什麼呢？十二月黨人固然在兵士中間做過宣傳，不過如滄海之一滴，為量甚少。且這個運動，在十二月黨人看來，並不是主要的柱石。對於十二月黨人，尤其是北社主要的柱石，便是那種傳統的軍營的盲從的紀律。他們利用這個紀律，期望各團部轉而反抗君主專制。當比斯特爾說及運動各軍團時，他心目中是認定準備宣傳各軍團的兵士，但是要宣傳整個軍團至最終一人為止，（軍團有四萬人）。想每人受其宣傳，無論如何，顯然做不到的。然而他們的勘算，只要各軍團的指揮官或將軍們能夠參加陰謀的組織，他們便能任意調動其軍隊了。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便沒有這個死的盲從的軍營紀律了。只有普通的當兵的義務。當時的兵士，是從工廠或田間跑出來的，必須開始有好的宣傳，才能依賴他們。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軍事運動，於是更須依賴着國內的羣衆運動。羣衆運動之高下可以決定軍事運動溫度之高下。例如一九一七年雖然完全沒有軍官的陰謀——正確些說，甚至還反對有利用軍官的陰

謀，但在當時受過宣傳的兵士羣衆的高壓之下，聖彼彼得堡的衛戍部居然爆發起來而推倒了君主專制。在八十年代，這個羣衆宣傳的工作，還是沒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人民自由」黨的軍官組織，完全無所作爲，甚且不願再有所作爲了。此後秘密著作品的閱讀，對革命者的幫助及個人參與恐怖行動的消息，在這個軍官組織中竟杳無聲氣了。

于是「人民自由」黨的首領希臘波夫的著作，復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論據，認爲資產階級的運動，必須以羣衆爲依賴。他的著作，即是工人的綱領，是「人民自由」黨的綱領。希臘波夫是「人民自由黨」人之深知工人運動的意義底有數人物之一。俄國的罷工，是政治的事變，這個名言，是出自希臘波夫之口。希臘波夫即按此方向，而注意于都市的工人階級，比之過去的民粹派更爲深切著名。他的綱領當然，還是純粹民粹派的綱領。在他的綱領中，我們決然可以找到一切民粹派的色彩，相信公社和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等等。但在其中，亦有最奇特之點，認定工人階級有獨立的（馬克斯主義的術語，雖然不適于非馬克斯主義者希臘波夫，然在此地他還可以一用）階級作用。在他的綱領中，我們最可以達到一種思想，這種思想，以後曾經實現出來，這種思想，就是獨立的革命工人政黨底思想。希臘波夫的綱領

說：「工人堅決的認為，現在的秩序和一切人們的生活，必須加以改造，必須造成一些不大的，但是友誼的工人社會（團體）。說明自己必須達到的東西，並準備自己在一定的時候，必須共同努力，出而完全革命。工人團體，應當秘密，以免政府襲擊」。工人組織對於民粹派更爲奇特，他們準備秘密的工人組織，不僅是爲着革命「倘若政府恐懼全體的騷動，而決定向社會主義作什麼讓步，換言之，即施行憲法，此時工人的活動，不應因此而又所變更。他們應當表現自己的力量，應當要求大大的讓步，應當提出自己的代表到國會中去。遇必要時，並可以用羣衆請願和羣衆騷動的方法，以擁護此種要求」。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這完全是明確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了。在這個民粹派和人民自由黨人所手創的綱領，在革命本身的批評，簡直是些預言：「爲革命事業的勝利計，必要擁有各最大都市和保持不失，這種極端重要的。本着這個宗旨，凡暴動起來的國民，要馬上掃蕩都會的敵人。應當從工人中，或從有聲望的忠實于國民事業的，造出自己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須擁有武備，以防禦都會，勿爲敵人所犯。並盡量幫助其他地方陷于暴動，聯合或指導此等暴動，工人須目光如炬的注視臨時政府和追着臨時政府爲國民利益而施政」。這樣看來，這個綱領，是十分有趣的。因

爲他對於組織的秘密的革命工作及羣衆鬥爭的策略有先知之明。換句話說，這個綱領不但是見于一九〇五和一九一〇年的布爾什維克及他們在大會中，甚至于還豫見了一九一七年被工人階級所監視的臨時政府。希臘波夫已經認識了，趨于資產階級的方向沒有效果，他遂趨于另一方面，即羣衆的方向。但是這個羣衆，不是他的先覺者所號召不來的農民羣衆，而是工人羣衆了，所以八十年代俄國破天荒的馬克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勞働解放社的出世，完全不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實，亦不是普列哈諾夫及其朋友們的著述事業所可解釋的。這種事實，已由一切俄國過去的革命運動史所養成；這種事實已由普列哈諾夫受聖彼得堡的罷工的影響，而起思想上的變化所造成；這種事實，也是由希臘波夫綱領中所說的，人民自由黨的變更有以養成之。

自然而然的，八十年代第一個社會民主黨——勞働解放社的綱領，要比前更爲堅決，其離舊觀念亦愈遠。勞働解放社的綱領，前後有兩個。一個是一八一四年的綱領，另一個是一八八七年的綱領（一八八八年公布的）。倘若把這兩個綱領加以比較，可知這些綱領是非常奇異的。在第一個綱領中說及農民，只是一個客體而不是主體，只是被動的，而不是自動的。

以後一八八四年的綱領，便使他們自己對於在過去所寫的綱領，而也吃驚不小。綱領結句說：『組成俄國勞働人民最大部份的農民，一勞働解放』社決不願有所忽視』。這個特點鄭重聲明了。所以必須特別鄭重聲明之故，即因為以前，勞働解放社的綱領，與農民隔絕了不將農民當作自動的能力。『該綱領規定說，在現在這種社會的和政治的鬥爭情形之下，智識份子的工作，首先便應該注意于人民中最進步的份子，即產業工人是。得到這部份人民援助以後，若一有宣傳和鼓動之時，則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便能擴大其影響于農民之中，而有更大的成功之希望』。影響農民，當以革命為依歸。因為要達到宣傳和鼓動的自由，只有在革命運動勝利之際（雖然不是完全勝利），才有可能。

勞働解放社的第一個綱領，全是華而不實的空套文章。在第二個綱領之中，便沒有這樣華而不實的文章了。此地居然視農民勢力為反動勢力，不能有所期望。第二個綱領，非常嚴厲的說：俄國革命運動及其勝利，對於農民首先有利，但農民差不多完全袖手旁觀，漠不關心，農民在政治上的不自覺和智識的落後，即是專制主義最安穩的磐石。雖然他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與現在的政治制度，大相逕庭』。並且又說：資產階級的長首畏尾，農夫俗

子，應尸其咎，因為他不學無知，和政治上無關痛癢。『他們（尊貴的資產階級以國民的名義，奔走呼號。而農夫俗子對於他們的呼聲，則常懷冷靜的態度。由是我們的智識份子，政治的見地，更失掉了固定性。垂首喪氣，心灰意冷，覺得事勢至此，完全沒有希望了……』這樣一來，似乎在俄國只靠一種農民，時事是毫無希望的。不如收拾行李走到另一個國內去罷，俄國是無革命幹了。……』『所幸俄國經濟關係已發生變化，而造成勝利的新機會，有擁護勞働階級的新人物了。農村公社的解體，造成俄國新的無產階級。這個新階級，比之落後的鄉人，其影響革命之呼聲，更易感受，更益流動和更益進步。宗法社會的經濟條件，鑄成農村公社的理想，而沙皇的君主專制在政治上又從而增益之。工人階級的命運只有發展新的更自由的政治條件，他的生活形式才能得着改善。惟其有這個階級，我們的國民，才能在經濟的條件上，與一般的文明國民，並駕齊驅。亦只有借助這個階級，才能參與文明人類先進之域。根據上述的理由，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建立工人的民主政黨，乃自己的第一的和最主要的任務』。

一直到一八八七年，普列哈諾夫乃確實聲明：依靠農夫俗子，政治上是有害的。這個聲

明：是非常主要的，自來孟什維克的著作，尤其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孟什維克的著作，始終是堅持着普列哈諾夫的傳統。期待農夫俗子，沒有絲毫利益；農夫俗子，天性上是反動的。無論什麼運動，一與農夫俗子相接觸，要拉向後走。這樣，誰可爲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自然，這只有資產階級了。資產階級的軟弱和變節，據普列哈諾夫的意見來說，便是因爲農夫俗子的蠢笨和怯懦有以致之。若無農夫俗子，則俄國資產階級，庶幾完全不同了。看呵！這個立論是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孟什維克的基礎，實際上是根源於反對民粹派的革命記，矯枉過正而來的。這個立論，在勞働解放社兩個綱領中，說得異常顯明，於是孟什維克所有的期望，都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身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意見的分歧，恰恰是這一點，因爲布爾什維克希望工人階級和農民。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的。因爲這個問題，至今仍保留其所有的實際意義。無產階級是否有機會利用農民在政治上作爲革命的進取的力量，還是農民永遠是羈絆無產階級雙足的重錘，使我們步武遲緩，轉而向後退却的呢？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倘若考察一下，在目前許多爭論中間，即能分出兩種聲調。一種聲調說：應當與農夫有強固的聯合，應當與他攜手偕行。另一

種孟什維克的聲調說：「與農夫周旋，便忘記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應當小注意農夫而多注意無產階級。我們若考究這個爭論，則知這是繼續八十年代和廿世紀初十年的爭論問題。我所以說這些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所有普多羅夫的統計表，對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問題，可爲便利的出發點。他的觀點，是認爲俄國革命是絕對的工人革命，他竭力找出一些的證據，說俄國的工人，不但在歐洲是最革命的工人，即在世界上也最革命的工人，因爲這種關係，他引出許多統計表和圖表來，說明工業的集中和工人階級聚集于更大的企業中的事實，俄國比之其他各國是有更便利的條件，甚至比較美國亦更爲便利，例如一九一四年俄國有工人一千以上的大企業，共有一百卅萬人，而在美國全樣的大企業共有一百廿五萬五千人。同一時間內，美國每個大企業的工人平均數，爲一千九百四十八，而在俄國甚至一九〇二年已有二千四百九十人了。同一時間內俄國每個有五百工人以上的大企業中，其工人數量等于俄國無產階級總數百分之五十六點五，在美國的全樣企業中所佔的工人數量只爲百分之卅一。美國其餘百分之六十九的工人則分散于更小的企業中。當然這是不錯的事實。不過關於這些統計表，還須有些更正。在施

臘普尼科夫論一九一七年的著作，該書中有個極有趣味的指摘。施臘普尼科夫的書籍，是研究美國、法國，和俄國的工廠底一本著作，他指出一個奇妙的事實。他說：俄國因為勞動力便宜的原故，在最大企業中常使用「人力」，去執行在西歐用機器來執行的工作。所以，當他們看到美國各個大企業工人不到一千人，而俄國每個大企業，有二千五百人的時候，當然，這個數目，按其本身來講，並不足以證明俄國的企業在經濟上大於美國的企業，他只是指出俄國勞働力的便宜。因此，便有大批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美國用機器去做的工作。這種註解，是必要的。我們一切的評判，都應有此種註解。所謂五百人和五百人以上的企業，亦應加上這個註解。惟其有這個原因，所以在美國有四百人的企業，事實上可以大過于俄國有六百工人的企業。計算企業大小的時候，不僅要看其工人的數量，還要看其使用馬力的數量，看其工作結果，生產品的數量。據這一點來說：美國的企業，當然高些，所以這一點要鄭重聲明。因為不如此我們不能得着真實的現象，昔多羅夫所描寫的狀況，當然是不對的。他以爲俄國的資本主義是最進步的，因此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也就更有準備了。

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雖有絕大的天性的吸力，但在一九一七年前，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却並沒有充分的準備。所有曉得歷史辯證法的人，絕不會吃驚，工人可爲天性深厚的社會主義者，但日時却又不曾自覺的實現這個社會主義。恰恰相反，這個矛盾是非常奇特的，而且這個矛盾，我們在歷史中到處都可以逢着。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工人階級，實在沒有充分的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反之，在現在較之一九一七年又要有準備得多，這也是毫無疑義的。這個更正，應該加於昔多羅夫的解釋中去，這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我們便要得個不真確的狀況了。但是在其他各方面，昔多羅夫的圖表，可給一些有興趣的事實，舉例說：這個圖表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的性質，說得非常之好。譬如那些表明俄國罷工次數的圖表，圖表中直綫最長的是——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這個直綫，如像噴泉從地中噴湧而出，直上雲霄一般。描寫俄國工人運動的革命性質的圖表，決沒有比這個圖表上昇得更利害的。經濟的鬥爭，常有此種一步一步上昇的運動。昔多羅夫關於工資一欄的圖表，此地就是逐漸上昇，上昇和上昇的直綫。一看政治一欄的圖表，那末便可以看出，這個直綫，突然上昇，如噴泉沖天之勢，當然，無組織的革命運動，是非常之多，圖表

中完全形容出了。此處尚有十分真切的經濟和政治運動的反映。政治的罷工較之經濟的罷工，是何等的烈強，政治罷工的向上昇騰較之經濟的罷工是何等的急劇。這些圖表，指出得非常顯明，從這些圖上看來，無疑義的，工人階級在俄國幹過革命，並掌握過革命的領導權。

所有這些，就表示出了我們對於運動的了解，和八十年代的人們對於運動的了解是不同的。那時的人，認為工人階級，好似只是孑身孤行，或則引着資產階級，鼓其勇氣，使其信仰將來，使其期望自己的力量，由此鼓勵資產階級以與君主專制相戰。一八八八年「勞働解放」社的第二綱領，就是用這些話來作收束。

但是，無產階級還要引導誰人，從這些綱領中是頗難會悟的。布爾什維克就不同了，布爾什維克認為俄國的革命，開始為大規模的俄國民族的革命，以後則成為國際性的革命。所以如此者，只因追隨工人階級之後和在工人領導之下而趕着前進的，還有偉大的農民勢力。

一九〇五年我們的革命，是否如昔多羅夫同志所想像的一樣，是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呢？抑或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即工農革命呢：我以為這個革命是工農革命，現在我想

盡力把我們所關於革命的農民和農民與工人運動相聯的那些事實，概括的指出來。

沒有論及本題以先，我們應當回憶俄國革命的第三個原素。究竟智識份子逃往何處呢？俄國的革命運動，本來是智識份子開始的。十二月黨人起義以先，步其後塵者，爲比特拉夫派，六十年代有宣傳的民粹派和「人民自由」黨人，實際上到處都有智識份子的組織。這些革命的智識份子，此時究竟逃往何處呢？智識份子究竟逃避了沒有呢？這裏有一種組織，必須鄭重聲明的，本來我們的革命的工人的組織，出世非常之晚，且當工人政黨的思想已經存在和工人政黨的本身已經組織之時，而指導的作用還仍是屬於革命的智識分子。

俄國的革命運動，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至八十年止——可謂智識份子尋找羣衆的時期。智識分子始初在農民中尋找，以後在工人中，甚至在資產階級中，軍官中去尋找。智識份子尋找羣衆，而沒有遇着羣衆。第二個時期，是由八十年代起約至一九一〇年之間爲止，此時智識份子已經找着了羣衆。智識份子雖找着了羣衆，但是還沒有與這個羣衆混合和團結。因爲這些羣衆是逐漸無組織的激勵起來的，這些羣衆在思想上與革命的智識份子相距還有十萬八千里之遠。

現在我必須稍退一步來說：思想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思想認做鏡子，認做只是被動的反映一些已經發生的運動。這種觀點，完全非馬克斯主義的，不正確的。客觀並不在我們訴諸非心理的事實，而在于我們訴諸客觀上必要的和客觀上適合某一社會階級底利益的事實，這就是決定思想的客觀主觀之爲物。故這是在客觀上適合于階級利益的，皆爲客觀的事實，姑無論他主觀的和心理的因子。

思想——這是已知的觀念、概念、綱領等等的總和，這是思想的因子。「精神的」因子，——這完全是客觀的事物，對於社會運動客觀上必要的。反使人們一致的和有組織的向一定的方向去做，必須要有了一定的俗尚，習慣，趨向，藉以推動人們到這個方向去。這是純粹的客觀的工作。我們所做的宣傳和鼓動，實際上就在這裏。所不同者，只是鼓動，多半是喚起人們的情緒，而宣傳主要的是培養人們的智能。但或此或彼，鼓動宣傳，均是一種手段，用以組織我們的心理，使其適合于我們所要做的行爲。

故在全國造成正確的思想，造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在西歐方面馬克斯和恩格思做過這個工作了。在俄國方面，主要是列甯和布爾什維克執行了這個任

務。孟什維克造成的思想，是不革命的，因此不適合于俄國革命的工人階級前面的任務之客觀的要求——這個任務，是進行革命，奪取政權，顛覆君主專制，由顛覆君主專制轉為無產階級專政。

二十世紀初葉，一方面是列甯派，另一方面，是馬爾托夫派，兩方面中間所發生的思想上的鬥爭，其意義的偉大就在這裏。列甯派企圖在思想上組織這些羣衆，使羣衆能執行自己的使命，馬爾托夫派則竭力渙散羣衆，這是後者之所以大受資產階級之歡迎的原因。

因此智識份子的勢力，便好像機器一樣，完成了革命的思想，建立了實現革命應有的組織，智識份子的勢力在這個時期是雄厚的。智識份子的勢力甚且直到現在還是很大的，雖然現在趨于低落，現在智識份子的勢力底意義比以前少些，比第一次革命少些。智識份子底意義，我們可用一個口號表現出來：即「智識份子找着羣衆」，——當時智識份子的作用非常偉大。因當時的羣衆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雖是有革命的天性，但帶有自覺的革命性者却非常之少。這是我們用不著加以絲毫紛飾的。

據我看來，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準備好。主

觀上沒有本領，沒有受過爲達到此種目的所應有的馴養，而在一九〇五年，工人階級對於革命更且沒有準備好。

我以前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不敢大胆的說出這種話來，因恐引起他人誹謗之故。但是看了沒有甚麼誹謗以後，我始敢放高言論說了。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人，不是覺悟的革命羣衆，他們是無組織的革命羣衆。然而這種無組織的革命性，可以跑到四面八方去。甚至如一九〇五年二月廿九日，工人羣衆們會在亞歷山大第二的紀功碑前，表彰他的盛德，這種無組織的革命性，會追隨牧師加邦之後，而且實際上已經跟他跑了。所以無組織的革命性，顯然是翻雲覆雨和極不可靠的。一九〇五年夏天，一萬諾夫——窩司尼夫的工人們忽聞：「打倒君主專制」的呼聲，他們大驚失色，飛奔而走。並大叫道：要不得，要不得，這是過于新奇，過于怪異，過于刺激他們的聽覺了。我再引一個一九〇五年十月我個人所經過的例子罷。我記得當時有個最好的工人露天大會的演說家窩爾斯基，他很憂愁的向我說：

「向工人說及他們受資本家的剝削，說及工人命運的困苦等等，他們肯聽一聽，他們的感動和情緒也能增進。但是一說到君主專制，說到政治，露天大會便開始融解，而工人

們也離散了。他們說：『這我們是要不得的，這我們的沒有用處，等等』。

看呵：一九〇五年十月莫斯科工人的覺悟情形，還是這個樣子。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的工人居然附和牧師甲邦的嚮導，列隊往冬宮請願，據此一端便可想見他們的覺悟程度了。可是智識份子曾經爲此而工作，所以革命的智識份子的作用，在這個時期，是非常偉大的。雖然當時工人政黨的問題已經產生，工人政黨已經組成，但在第一次革命過程中，思想上指導的作用，無疑義是屬於智識份子，否則是不行的。

據我看來，一九一二年四月林廬事變，是一個轉變的時期。自此以後，可謂開我們工人運動上革命的覺悟的新紀元，此時已經不是外來的智識份子了。這一點在資產階級看來是不可解的矛盾，在我們看來這却是辯證法。在第一次革命中工人階級應當敗北，始成爲自覺的革命者，這也不可解的矛盾。正因爲如此，正因爲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工人運動的敗北，所以在工人隊伍中，（始在少數工人中）才能產生覺悟份子，在這些便是布什維克的政黨。自一九一二年始，此等覺悟的份子，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在一九一四年幾乎要實行革命，（當時的環境與一九〇五年相似）卒之，完成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羣衆的作

用，覺悟的革命羣衆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然智識份子，却已經落伍不少了。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並不在各地活動，他們或被放逐充軍，或僑居外國，而所有的智識份子，——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毫無疑義的，已經落在工人運動的水平線下了。工人要求共和國，而智識份子却只要求君主立憲而已。

這個比較，是非常奇異的，智識份子，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佔中央委員會的多數，不能得着政權，而在中央委員會佔少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反而得着政權了。但是社會革命黨人得了政權而不能施行自己主要的關於土地的口號。智識份子宛如喔喔的小雞一般，只是追隨工人運動之後，而始終趕不上這個運動。這例子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奇聞。

工人階級，不僅像一九〇五年一樣，客觀上成爲革命的領導者，且主觀上亦已成爲更覺悟的革命力量，較之當時露頭角的半革命的智識份子要強得多。

第三個時期，是羣衆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運動的時期，這個時期，繼續到現在爲止，可以說，此時無產階級由普通的革命的思想，過渡到明確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了。這個第三期我在此可以不必敘述，因爲這不是我的任務。

現在我說：第二個時期，我們都知道這種思想的混和決不能使我們把第一次的俄國革命看做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其理由以後再說。這種思想上的混和有一個條件在此，即當時革命的智識份子，利用西歐工人運動的經驗，造成了當時運動的思想。故無論如何，這種思想總算是智識份子造成的，而不是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列寧主張在委員會內工人應有八個，智識份子兩個，而事實恰與此相反。在委員會中智識份子八個，而工人兩個，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實際上男學生和女學生，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在社會民主黨各級委員會中，常佔大多數，從上而下去觀察當時的運動。是如此。從下而上的去觀察當時的行動，也可以找出許多非無產階級分子來，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便是農民。

講到這裏，首先必須提到一個事實來，就是俄國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的產生，無產階級增長的迅速，都是與俄國農村經濟有密切聯繫的。

雖然，可以任意把工人與農民對立起來，可是，工人終是從當時的農夫中間生長起來的。我引證一些數目字以爲解釋，可以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七年這十年間的數字爲例。一八八七年五金工人約有十萬零三千人，一八九七年——約爲——十五萬三千人，而紡織工人的

數目，更爲奇特；一八八七年——有三十萬九千人，一八九七年——有——六十四萬二千人。要注意一點，我們的紡織界——這恰恰是我們無產階級的農民成份較多的。

試問：推動無產階級向前發展的是什麼？倘若我們只注意俄國當時大量生產的發展，只注意外國資本之流入等等，那我們只得到一半的答覆。當然，沒有大量的資本，是不能有資本主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俄國的企業家和資本主義在十年之過程，能夠在工廠和作坊中增加二倍的工人數量，使我們的無產階級繁殖起來。可是繁殖無產階級的並不止于這一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蔓延于俄國的鄉村。爲什麼這與農村經濟有密切聯繫呢？這就必須注意到下面這一種事實。自一八八〇年起，在世界市場上穀物的價格大大的低落了。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這五年間的價格，小麥值一四四哥比，黑麥——七八哥比。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小麥——八一哥比，黑麥——六五哥比。于是穀物的價格便向下低落，價格向下低落的影響，發生了農民經濟的破產。關於農民破產的問題，也不必多費時間去研究，爲明瞭起見，我只援引一些數目字就夠了。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三年這六年間，中部九省耕種的家畜，——馬——差不多減少了百

分之廿五、四百萬中減少了九十萬，這是當時軍事調查所得來的明證。

阿羅夫斯省有下列的數目字：一八八一年有馬——二十二萬一千頭，一八九三年——十八萬八千頭，一八九九年——十七萬七千頭等等。

這樣一來，農民經濟之衰落有江河日下之勢了，由此我們不僅知道在工廠中無產階級之所以繁殖，且知道一八九一年何以有飢饉和飢民等等之發生。農民經濟，耕種的家畜愈少，則其收穫亦愈少。一畝地有馬由一·二至一·四頭的，則其收穫的二·七；一畝種地有馬由一·五至二·五頭的，則其收穫為二·九等等，若一畝種地有馬三頭以上的，則其收穫為三·四，可知收穫的增加與耕畜數量的增加，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完全自然的。所以家畜愈少，則土地上所施的肥料愈少，而收穫亦愈少了。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穀物價格低落，在這個原素的影響之下，俄國農民經濟開始破產了。穀物價格已經低落了，而應納之租稅還是和以前一樣，於是農民所有的剩餘生產品應當拿來付給租稅，農民甚且將他的必需生產品去支付租稅了。農民變為無土地的或半無土地的人，他們必須到貴族的經濟中或到工廠中去找工作做。

這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俄國鄉村中所發生過的過程。不知道這個過程，則不能明瞭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國無產階級化何以這樣迅速，俄國若無此種急劇的無產階級化，則決沒有那種構成俄國革命的先鋒隊的無產階級的運動。因為智識份子所有的主要的力量，都注意到工人階級之上了。不錯，只有在那裡，革命的智識份子，才能聽到回聲。這樣看來，這個革命運動的根源，經濟上客觀上是依靠于農民羣衆之上。我們若忘記了這個局面，我們若忘記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這個農民的無產階級化，農民的傾家蕩產，那末，我們就不會懂得，無產階級是從那裏來的，九十年代的罷工是從那裏來的等等。倘無上述的事實，則罷工運動恐不會出現，因為我們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比之工廠和作坊中無產階級的發展，來得快些，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在十九世紀末葉，我們約有二百五十萬失業的無產階級者，換句話說：這是找不到工作的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我們知道，這必然使在工廠中的在業工人，在工資和勞働條件上面受莫大的影響，那種可怕的勞働條件，非常困苦和長度的工作時間及低廉的工資，必然要推動饑寒的工人去做罷工的運動，因此九十年代的罷工運動，與在鄉村中所發生的事件實有不

可分離的聯繫。

這個聯繫可分為二方面，倘若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推動了舊時獨立的主人一天一天的增多跑到城市中去。那末失業的恐慌，便驅逐工人回復到故鄉去，——這些舊時的農民，已經帶了很豐富的罷工鬥爭的經驗，受了城市同志的宣傳，而歸回鄉村了。我們講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我們將讀一讀某個省長關於鄉村「騷擾」的呈文，「那末，便可看見，所有的騷擾的運動，都是由都市中跑回去的農民，即「季候回人」來做領導。他們留于鄉村，集合所有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成爲新的農民運動主要的羣衆。

列甯說：「農民要替地主工作受奴隸契約的束縛，農民喪失了社會的公民的權利，農民要受特權地主底武裝的鞭笞，生活卑下不堪，使農民成爲真正的野蠻人。所有這些，歸根結底仍不外是農奴制度的殘餘。凡在這農奴統治的場合和關係之下，農奴制度是所有農民共同的仇敵。故反抗農奴制度，反抗農奴地主及代表他們利益的農奴國家，農民是一個階級，是農奴社會的階級，是等級社會的階級，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

然而在工人以外，不但有最貧的農民，還有其他的農民，即殷富的農民，——「農村中

破天荒的自由主義者』。這個農民暫時沒有充分的希望。

俄國鄉村小資產階級的產生，是跟着鄉村中無產階級的發展而發展的。這個鄉村小資產階級甚至在農業恐慌的時期尚能利用機謀去發展，不過農業恐慌減弱一些發展的速度。講到這裡，必須指出這個事實來，當時小麥價格的低落，若瀑布之下流一般，而黑麥價格的低落，則好像紙片在空中下降呈「之」字形的狀態。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這五年間一普特黑麥（二六·三歐羅克蘭姆）等于九一哥比，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這五年間——九八哥比，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這五年間——六七哥比，等等。同一時期內，小麥的價值，在無時不向下低落，而黑麥的價格只動搖不定而已，穀物價格的低落至九十年代而終止了，固定了。自八十年代開始，穀物價格低落，第一是有利于殷實的農民。

在這個時候產生了農民的銀行，這個銀行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從這個時候起，鄉村小資產階級佔有各部份的土地，一部份是由地主那裏租來的，另一部分是租借農民的公地，于是村人的土地，都集中于鄉村小資產階級手裏的了。甚至在農村恐慌過程中，農民資產階級的儲金還增長着。按儲金處統計，農民資產階級的儲蓄，發展到一八九一年已經登峯造極

了，這是很奇特事實。在列寧的文章中曾以這個事實說明農民資產階級的儲金增加，在每個儲金分部的儲金票中，增加了農民的儲蓄票和儲蓄基金的數量，這個事實也是非常奇特的。

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事實，這是個人的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和私有財產增加的事實，尤其是其在南方荒原，這個事實，更為明顯。試舉數目字如下：

一八七七年，在南方荒原區域，農民的公地有五百九十萬俄畝，個人的農民私有土地——六十萬俄畝，公共的農民私有土地——三萬俄畝，而合營的私有土地則等于零。在一九〇五年約過了二十八年就不同了，農民的公地由五百九十萬俄畝增加到七百萬畝，個人的農民私有土地由六十萬畝增加到一百九十萬畝，即增加一倍。公共的私有土地，也增加了，但是為數無幾，總共不到五十萬畝。合營的土地，在一八七七年是等于零，現在已經有八十萬畝了。（公共的土地，即為公社所買的土地，合營的土地，即為富農投資法買的土地）。可知個人的農民的土地領有，增加起來了。

現在我把我所引用過的思格卡爾特對於富農的批評仔細回憶一下。富農是農村中被天荒的自由主義者，他在政治上更覺悟的，（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意思，而是農民的階級覺悟

的意思)。這個正在發展的農民資產階級，在反抗君主專制之際，無疑的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這兩者間關係的緊張，足使農民資產階級完全跑到革命方面來，使之成爲反地主的分子，在與君主專制爭鬥之際，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九十年代下半期市場上穀物價格的變動，便達到了這個地步。自九十年代中葉起，穀物的價格開始提高，農民經濟的利益和地主經濟的利益兩方面相對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六十年代曾經發現過)至九十年代末也就非常之利害。這兩個力量底關係——農民和地主，在穀物市場上之日趨劇烈，必然要使他們的頭角互相衝撞，萬不可免了。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工人革命就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根據地上，擴大起來的。

第六章 一九零五年革命前的俄國

工農運動的發展，多少已經預定了最後的革命爆裂。但統治階級可用種種政策遷延這個爆裂，至無限定的年歲。

今日之英國即其一例，英國階級關係之劇烈，——這不是工人和農民間之關係，亦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中間的關係，而是工人和資產階級中間的關係，——英國工人和資產階級間的關係之劇烈，約在一九一二年已抵極點，其劇烈的程度，猶如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俄國的局面一樣。可是，直到現在英國的工人革命，還未爆發，且熟悉英國的人們，不能預先斷定，英國的工人革命，在最近幾年內就會發生。英國的工人革命，或者能夠延擱許多的歲

月。只有新的戰爭，能夠加速英國的工人革命，新的戰爭越覺切近，我們越可看見英國快要走到無產階級底革命，可是無論何人，決不能斬釘截鐵的斷定這一點。英國的資產階級用了種種政策以防止革命，如無微不至的狡兔營窟的政策，無微不至的推行遷延的政策，無微不至的多少精細的欺騙工人政策就是。而最後的最精細的和最巧妙的騙欺工人的政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工人內閣。因此，所謂革命必然爆發的時期，在英國一般的前途中，也許要遷延到很久。

爲明瞭俄國革命何以在一九〇五年發生，那末必須研究旁方面的問題，必須考察與革命對立的那個階級的抵抗力。換句話說，必須考察在革命道路上的障礙與社會階級的抵抗力及抵抗手腕。現在我就來講這一點。

但是要明瞭此數年間俄國資產階級和俄國大地主的心緒和境遇，我們不僅要知道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分析，我們還要稍爲觀察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俄國所經過的歷史事件，這個事件是直接爆發的搖動力。所謂搖動力，即我們認爲最近的原因而已。我們若把舊俄羅斯當做一包陳舊的火藥看待，則日俄戰爭便是俄國革命的火花與搖動者。說到日俄

戰爭的原因，毫無疑義的，尼古拉不是偶然而戰的。尼古拉欲奪取高麗的財富而起了戰爭，他是願意戰爭，他想在戰爭中獲得利益，——這是他底目的。先看克魯泡特金的日記。我們且把他的日記看看，這個日記是克氏與人談話後憑腦海裏所記憶的而寫出來的。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六日，他和維德在跑馬場上馳馬當時他們倆談了一段話。克魯泡特金對維德說：

「我們陛下的頭腦中，有雄圖大略：併吞滿洲，擴充俄國版圖直抵高麗，又有威逼西藏之想，復有取波斯，奪達撻和巴斯福爾之志」。

一九〇三年尼古拉的雄圖大略，就是如此，克魯泡特金的話，還有別種材料可為鐵證。該種材料，便是維德的傳略。關於這些雄圖大略，維德說得十分詳細。——以後我們又在文書保藏處，找到了許多補充維德之言的文書。該文書中說，尼古拉在一八九六年，即登大寶後一年，便有奪取巴斯福爾底企圖。當時尼古拉，秣馬厲兵，準備出征；至於什麼原因破壞了這個出征，和障礙了這個出征，我們至今還不知道。然當時戰爭之爆發，可說迫在眉睫，軍隊集中了，軍艦集中了，決定了一定的電報的暗碼，以便派送軍隊下船，和派送軍隊到君士坦丁海峽去，——總而言之，當時出征的海軍與陸戰隊，都已完全佈置好了。這是一八九

六年的事。顯然有什麼障礙存乎其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點，不過出征的本身——是毫無疑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事實。關於日俄戰爭，也是一樣的。現在從威廉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知道，還在一九〇一年九月尼古拉與威廉相會于但澤，尼古拉已經對威廉說了，俄羅斯預備和日本開仗。這是在一九〇一年，即在戰爭開始前三年。這不是偶然無意所說的話。恰恰過了一年，在一九〇二年九月威廉的日記中又載有尼古拉的話。尼古拉又對威廉說，俄羅斯預備和日本開仗，預定開仗的年月是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三年，二人又復相會，尼古拉對威廉說：一九〇四年還沒有戰爭，因為俄羅斯還沒有準備好。尼古拉深信戰爭時期底宣布，可由彼一手包辦，當他不利宣戰以前，日本人將垂手靜待。然而日本人却不是這樣愚蠢的。日本人宣戰，在尼古拉期望之先，在尼古拉沒有好好的準備之先。倘若我們把一九〇四年宣戰時期的俄國海軍戰鬥力，和一九〇五年五月沉淪于對馬島的小艦隊集合起來，那末，俄國海軍的力量，較之日本底海軍力量大概要多兩倍。

這樣一來，倘若尼古拉能及時準備，或者他有許多可以制服日本人的可能。因為要想反抗加倍的力量，恐怕無論什麼將軍將官多果（曰將官名）即無能為力能。至于俄國的陸軍更不

用說了。在戰爭之初，俄國已有訓練的兵士，約為四百五十萬人，而日本有訓練的兵士，只為六十四萬人，俄國的兵力當然更強于日本的兵力。故所有底機會都操在尼古拉底手裏，尼古拉不但想奪取高麗的礦產，等等——他并且還想破滅日本，若日本與高麗都被破滅之後，俄羅斯便可稱霸遠東了。

尼古拉對遠東的政策，是整個沙皇政府最主要的政策。這種政策，除了帝國主義的野心之外，便沒有其他原因可說。自從最近許多著作——著作出版以後，我們可以知道，在這個時期中還談不到什麼『俄國的帝國主義』，還不能在理論上曲解『帝國主義』這個名詞。甚至在一九一四年說到『俄國的帝國主義』也只能十分有條件的，因為即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夜，俄羅斯還是外國財政資本活動的舞台，而本國的財政資本還比較少。

甚至在一九一四年，在一九〇五年更不待言，其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工具，較之俄羅斯的帝國主義政策之獨立的原素，要深得多。同樣的，從威廉與尼古拉的通信，從克魯泡特金的日記中，使我們的眼界煥然一新。

第一，所有尼古拉『帝國主義』的趨向，不論其趨于何處，趨于巴斯福爾也好，趨于西

藏也好，抑或趨于滿洲也好，總與一共同點有關：即趨于反抗英國。由是便明白了，第一，所有他的趨向的中心問題便是「海峽」。換言之，即爭取他大尼里海峽，為爭奪這些地方，俄國與英國差不多作了一世紀的鬥爭。若以「帝國主義」去了解這個鬥爭，無異把這個名詞應用到一百年以前的俄國沙皇的政策上去了，這完全是荒謬之論。第二，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與英國的鬥爭中，尼古拉不是單槍匹馬，不僅客觀上不是單槍匹馬，且主觀上亦不是單槍匹馬。在尼古拉與威廉第二的通信中，便可證實。與俄羅斯帝國歷代相戰的英國，此時已為德國帝國主義的眼中釘。所以反抗英國，也成為德國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部份，德國在近幾年內比以前十年更要拚命的和加速的包圍自己的敵手。

沙皇主義的對外政策，決定沙皇俄羅斯統治階級中間內部關係，特別是資產階級對沙皇主義的關係。在對外政策中，商業資產階級與沙皇主義頗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經濟發展的辯證法，工業資產階級中應當變為自由主義的，反對農奴制度的，因此，便要反對沙皇主義，為什麼她也鎮靜而謙恭了呢？此地要注意一點，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商業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的結果。商業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實行鬥爭的時候，應

常發展工業，否則，他便宣告死刑了。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若不能發展自己本國底工業，他必然要變為工業國家的殖民地。例如，印度就是，日本就是相反的例子，日本不願把自己變為殖民地，從半殖民地的環境中超拔出來，這就是因為日本底工業的發展，較之俄國還要迅速的緣故。

直接推動商業資本主義國家去發展自己「祖國」的工業，有二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就是必須保商業上的平衡；所有的商人應使出賣多于購買，否則，勢必破產。所有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企圖怎樣減少外國輸入本國的商品，怎樣能增大本國輸出外國的商品：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理論——重商主義的大聖，即具此趨向。故俄國紡織工業的發展，——主要的就是這個原因。十九世紀初葉以前俄國所用的紡織品——尤其是上等的紡織品，是從外國輸入的，主要的是從英國輸入的，而從普魯士輸入的則較少。

一九〇七年後，在拿破崙的壓迫之下，俄羅斯亦參與了大陸封鎖政策。俄國遂與英國斷絕了交通，使俄國本國的紡紗和織布的工廠，有發展之可能。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紙幣一個盧布的價格低落到二十五個哥比，逼到沙皇政府竭力「保護」這些紡紗和織布工廠之發

展。亞力山大第一逝世前不久，已經試行過這個路線，尼古拉第一仍然非常積極，不獨用高度的關稅去「保護」俄國的工業，且爲俄國工業去搜索和征服市場。尼古拉第一的例子，顯然證明，商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絕對不會輕視工業上的利益，而且剛剛相反。

第二種原因，是與各個技術極發展的國家爭市場和爭通商道路。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要和這些技術極發展的國家相戰，亦必須擁有這些國家一樣的技术，而技術的發展又必須發展偉大的營造工業。比得第一建造海軍艦隊是俄國歷史中的古例。當尼古拉第一即位時，俄國的帆船，已經寥寥無幾，而且需要建造汽船了，主要的還需要建築鐵路。前代的「棉花」保護貿易主義，至此已加上五金的保護貿易主義了。十九世紀末俄國的關稅統計，有二種保護貿易主義試舉其數目字如下：

以一普特鐵的關稅爲例（以一八九八年爲例），美國一普特的鐵，付關稅四十二哥比至四十九哥比；德國——由十九哥比至二十三哥比；俄國——落後的俄國——由七十五哥比至九十八哥比。換句話說，俄國的關稅，比美國多二倍，比德國幾乎多五倍。鋼的關稅，也是這樣。

美國一普特的棉紗，付入口稅由二盧布十哥比至六盧布三十一哥比；德國——由九十一哥比至三盧布六十四哥比；俄國——由七盧布二十哥比至十六盧布五十哥比。這種關稅，俄國多于美國四倍了。

美國每普特的棉布，付入口稅由四盧布六十三哥比至十八盧布六十哥比；德國——由四盧布五十五哥比至十七盧布四十四哥比；俄國——由二十一盧布至八十七盧布。

每普特機器的入口稅，（我沒有美國的數目字），德國由二十三哥比至三十八哥比，俄國——二盧布十哥比。

俄國的保護貿易主義，與德國相比好似虎與貓相比。

總而言之，俄國關稅之高，——尤其一八八九年，比之任何強盛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都要高些，這樣高的關稅，真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

然俄國關稅之高，就其本身而言，絕不能證明這是一八八九年俄國的帝國主義的朕兆，此時帝國主義的基礎在俄國一點也找不到的。

現在還有二個補充的說明。第一，這個商業資本『保護』工業資本的過程，絕對不能用

玄學來觀察，把他看做是某種積極的東西，對於某種不動的和遲滯的物體之單方面的影響。在歷史中，是活力相戰的，且他們是互相影響的。工業資本主義利用商業資本開闢的一切口徑，以便貫穿商業資本主義的系統，商業資本主義則維護之欲保留他的神聖，最低限度，也要保留商業資本主義制度之基礎。這種過程，是全世界的過程，是波浪形的過程，是有進有退的，而不是直綫形的向前運動。在十九世紀末葉，約從八十年代始，顯然是『工業的高潮』，工業資本主義的利益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的壓制大為增加。

可以說，在九十年代，俄國暫時發展了以威特為領袖的工業資本的統治權。維德時代，最顯明的事實，就是俄國金本位制的採用。這完全是工業資本戰勝了商業資本。商業資本深謀遠慮的保持不兌換的紙幣，因為這些紙幣是他們寶貴的獨有物。這些紙幣在國內的購買力，較之他在國際市場的價格要高。因此，所有各種商業資本的代表，——不論他是輸出者，抑或是地主——其出賣穀物所得來的一個盧布，實際上，每多於一個盧布，因為俄國內部，尤其是在鄉村中，我們的不兌換的紙幣價格，即所謂信用票的價格。是高于國際的價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財政歷史，有最奇異的現象，這個最奇異的現象，即俄國的財政

總長維石尼克拉斯基(維德的前輩)實行減低俄國盧布在國際匯兌中底價格的運動，而當時的財政委員會的代表阿伯士亦極力參與這個運動。沙皇政府減低本國盧布底價格，——那是非常奇異的現象。然而沙皇政府何以去減低盧布的價格呢？因為有一個呈報維石尼克拉斯基的公文說，俄國盧布的價格在國際匯兌中之過度的提高，俄國的地主要受莫大的損失。在公文上，不是說「地主，」而是說「穀物的生產者」，但是在本文的意思是沒有區別的。試想，實際上盧布已經漲價了，——漲到八十哥比，以前只為六十哥比，——這恐怕所有俄國的內部的關係都要大起變化。俄國地主，所得的盧布數量就會減少，而俄國的地主和輸出者就會大叫道：「這種不法行為是不會允許的，這是等于劫掠。無論如何要把盧布的價格減低，不然我們要受損失，且能發生恐慌」。他們拿恐慌去威嚇，所以沙皇政府，就減低盧布的價格，使恐慌不至發生。有一部份財政委員會的代表已經參加了，但其他部份的代表諒必也在內。自此以後不到十年，維德採用固定的金本位，由這個時候起，盧布的價格，已經不能動搖了，亦不能戲弄了。這顯然證明，此時已經與八十年代相反，已經是便利了，俄國的盧布價格可以高些。俄國的工業家有什麼要求呢？俄國的工業家不能不買國外的機器，不

能不買國外的棉花。不錯在這個時候，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如怒潮一般的發展了，但是在十九世紀末葉，這個棉花業祇能供給俄國紡紗工廠三分之一的需要，——其餘三分之二的棉花，還要到外國去買。因此俄國盧布價格在國外滙兌之高下，對於紡紗的工業家絕不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倘若這個價格太低，那末工業家必須付更多的盧布數量，所以俄國的工業家哀求制定俄國的金本位之必要，鑄造不會動搖的金幣之必要，實行變為金幣的流通。九十年代的中葉維德所採用的金幣流通，——這是工業資本戰勝商業資本的明顯底兆徵。

可是工業資本的勝利并不是長久的。因為商業資本，是俄國羅曼諾夫國家主要的供養人。然而羅曼諾夫的國家制度究竟以何種資財為生存呢？為什麼首先要保持這些不兌換的信用票的價格呢？這些不兌換的信用票，是用于國外的貨幣本位，因為俄國輸出穀物到國外的緣故，所以俄國的荷包一天一天的漲大。我們輸出國外市場的穀物生產數量的大小，我們可以調查的。自八十年代穀物價格低落以後，俄國輸出國外市場的穀物，須一天一天的增加，八十年代中葉俄國輸出國外的穀物佔全生產百分之十七，而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俄國全部生產的穀物，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五，要輸出國外市場去了。為什麼要如此呢？為的

是要保證商業上的出超的緣故。爲使俄國入口少些，出口多些，而出入口底相差，便是俄國人荷包裏的利潤。這個出超是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基金。俄國由於這個商業上的出超才能積聚金幣。俄國金幣的儲蓄至一九一四年已到了最高限度了。試以俄國和法國的金幣儲蓄作一比較：

(以百萬盧布爲單位)

	1900年	1910年	1912年	1913年
俄國金幣的儲蓄	755	1,305	1,430	1,631
法國金幣的儲蓄	936	1,282	1,383	1,406

這樣看來，在全地球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金幣儲蓄有俄國這樣多的，俄國只有依靠這個金幣儲蓄，才能運用帝國主義的積極政策。世界上只有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手裏擁有世界的運輸，世界的交通道路。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夜，全世界的商船四千二百萬噸中，有一千九百萬噸在英國手裏，英國差不多佔了一半。毫無疑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雖然沒有集中大量的金幣儲蓄在自己手裏，亦能供給戰爭的浪費。所有其他的國家——俄羅斯，法蘭西，

就在此等國家之列，——盡力積聚金幣的現銀，在其金庫中，越多越好，以供給戰爭的費用。

現在引證一些數目字來看看吧。俄國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商業上平均的出超約爲一萬萬至一萬五千萬，而在九十九年，即維德全盛時代——我們的出超只爲七百二十萬。十九世紀的末葉，我們的出超幾乎等于零了。對於工業方面，這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她可以跳過這個關頭。她需要什麼呢？她要工業的原料，她要機器。這些完全是充分的，此外她還要廉價的食物，因爲食物的價格便宜，工資也就低下，所以實際上，她（工業）甚且十分不願穀物的出口。穀物出口越少，則在國內的穀物越便宜，由是工資越低下，所以工業方面甚至不願穀物出口增加。然而商業資本是要穀物出口增加的，因爲穀物之輸出外國，不啻將外國的黃金河水流注于俄國境內。在一八八九年這個黃金河水差不多已經乾涸了。在河道上忽然發現了暗礁，維德的政策便落在這個暗礁上與之抵觸。世界市場上的行市，已經變化了，其重心亦自然的，轉移到商業資本方面去。因爲工業資本之壓迫商業資本，只在穀物價格低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穀物價格之低下，迫得商業資本變爲工業資本的奴隸。商業資本猶如雛

鷄一樣一步一步的追隨工業資本之後，而工業資本，則有如鵬鳥一般振翼而飛，傲然自得，大有旁若無人之概。因為食物便宜，勞動力也就便宜，工資亦隨之而低下，換句話說，就是工業的旺盛。可是，上面我已經說過了，在九十年代的下半期，穀物價格開始上升了。試以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這四年內的價格為一〇〇，則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四年這六年內的價格便是二二二，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則為一六五。隨着穀物價格的增加，因而增進了俄國的貿易額。一九〇〇年為一六・三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九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二年——二二六・三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三年——三四七・一〇〇・〇〇〇，一九〇四年——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五年——四五八・六〇〇・〇〇〇，俄國貿易額增進一步，則俄國將來的帝國主義的物質基礎也就增進一步。商業資本在經濟上底意義亦大為增進，他是穀物市場上的英雄，他吸收了許多的金幣到俄國來。經濟局面的變化，使商業資本易于戰勝工業資本，此種步驟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一九〇三年維德退位，結果改組內閣，這完全是經濟局面的變化，——由於俄國資本家內部相對比重底變化，而必然發生的現象，重心復由工業資本轉移到商業資本。在遠東

政策的利益，對外政策的利益，都表現得極明顯，此等政策，無非趨于有利俄國商業資本之一途。此地必須記著西比利亞和西比利亞鐵路的意義（西比利亞與殖民地無異）很奇特的，恰在穀物價格更低的時期，俄國政府和俄國資本主義，開始垂涎西比利亞殖民地了。因為當時俄國無論如何是需要多運原料到市場上去出賣，因此便要多找些新的出產便宜原料的區域以得到這些原料。惟其如此，維石尼克拉斯基就有一句名言：『自己少吃些，多留些出口』，——他是建設西比利亞鐵路的發起人。西比利亞鐵路，給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一個偉大的推動，因為建設鐵道必須有五金工業的生產，所以西比利亞鐵路之建設。造成了俄國五金工業偉大發展的條件。可是西比利亞鐵路本身就是商業資本主義的事業了。在第一個時期，商業資本主義得到最少限度的利益。商業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沒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因為農業的原料價格增大，促成新的穀物價格的行市，——由是俄國的商業資本，也生色了，遂一天一天的在這方面積極的活動起來了。試以年代上作一比較，可以看出非常奇異的事實。自一八九四年起至一八九七年止是為穀物價格的轉變時期。試舉黑麥的價格：一八九四年，每普特值四十一哥比，一八九五年——四十四哥比，一八九六年——四十五哥比，一八九七

年——六十一哥比（突然向上飛躍）。小麥的價格：一八九四年每普特值五十一哥比，一八九五年——五十哥比，一八九六年——七十二哥比（飛躍稍早一些），一八九七年——九十三哥比。恰恰這個時期（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七年）與中國訂立一八九六年的莫斯科條約，發展俄國鐵路直達南滿洲不凍的海灣。恰恰在一八九六年五月，尼古拉第二即王位之時，即與李鴻章訂約，大施賄賂，約費了五十萬盧布，遂訂立了這個著名的條約，開闢了建設新鐵路的前途。一時俄國的工業家非常滿意，同時俄國的商業資本，亦抱同樣的感想。因為這個條約，開闢了西比利斯的原料，出口到不凍的海面。這似乎顯然矛盾的。既然有西比利鐵路，則運輸原料沿鐵路直線逕往西歐，比之在輪船上繞行全亞洲和全歐洲而至西歐似乎更為簡便了。但要注意一點，當時輪船的運費，要便宜得多，——較之鐵路的運費，要少二十五倍，所以鐵路運輸一普特貨物至一千俄里的價格，若用輪船可能運輸二十五普特了，我們可以推想縱使輪輸的原料其經過的長途，較之鐵路線多五倍，也還有莫大的利益可圖。世界市場行市轉變的時期，正與俄國趨向遠東不凍海灣的時期恰相符合，那是極可注意的一點。

日俄戰爭之發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俄政府的對外政策，為的，是要侵佔滿洲，

高麗和其他許多遠東不凍的海灣，開闢此等版圖，以爲俄國出口之需。質言之，爲俄國出口資本和俄國商業資本找尋非常便利的道路，在商業的意義上來講，唯一的道路，即爲由西比利東部出葉尼塞河以東的通商要道。因爲由鐵路出口，價值太貴了，此外還要在遠東找得好好的能把所有貨物都由此運輸出去的海灣來。

故日俄戰爭在行動形式上雖是冒險的，驕傲的，估量不正確供給很缺乏的軍事行動。但他却是個有規律的現象，蛛絲馬跡，歷歷可考。俄國經濟發展的辯證法，促成了遠東的戰爭，促成了與日本的戰爭，這是萬不可幸免的。因爲日本是俄國的敵手，日本橫立于俄國刺西比利亞的道路之上。

這是對外政策方面的方針。對外政策中的指導者，又爲商業資本。一九〇三年八月因爲遠東問題的關係，維德不能不辭職而去。由是政柄遂操于普列維之手。普列維恰恰是純粹商業資本的代表，而不是舊王室貴族的代表，但是商業資本乃粗鄙的，搶劫的，貪婪的勢力的資本，君主專制以這個資本構成主要的特質，因爲商業資本是須要農奴制度俾能達到自己經濟底目的，因此，普列維和地方議會的貴族，甚至與石波夫的莫斯科的穩健的管理地方議會

的貴族，其關係之惡劣，有不可言喻的。

地方議會中仇視普列維。普列維則極力對抗地方議會派。所以認普列維為封建貴族利益的代表者，是不應該的。很奇特的，按其本人的出身，他是沒有族系和血統的人，是西俄羅斯某小地主的繼承子。在這一點來說，維德所推薦的內務部長——昔壁金較之他當然要偉大得多了。昔壁金實際上是俄國貴族的親生子，但他是維德的走狗，是服從維德的人，是維德所提拔出來的人物。普列維顯然不是貴族出身的人。有些人甚至稱他是猶太人種，但他對待猶太人却非常殘酷。普列維是明顯的反猶太人者。他的姿勢是非常奇特的。

柔巴托夫運動只是俄國工人運動的小史。當然，這是悲傷至極的俄國工人運動的小史。因為一九〇二年柔巴托夫組織中的工人，多于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中的工人，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甚至一九〇五年初甲邦所吸引的工人，其數量雖較少，然比之我們黨中所有的工人，却還要多五倍。至于甲邦所處之地，莫斯科更不用說了。當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號樹立亞力山大第二的紀功碑時，在我們黨的組織中的工人，為數無幾，甲邦能驅使五萬工人去紀念亞力山大第二。這樣的『人山人海』，甲邦自己吃了一驚，并趾高氣揚的說道，要指導

這樣的「人山人海」非有特別的天才不可，然而這種天才，又不是人人都有的。這個「人山人海」最先使俄國的企業家注意。俄國的企業家，並不完全是一竅不通和糜爛的東西，並不是不知工人問題爲何物。一九〇三年，當反抗柔巴托夫運動的時候，還有幾個大企業家發起，與財政總長共同商議關於自由結社的問題。在俄國特有條件之下，自然絕不是以西歐爲標準的罷工自由；當時邀請了這些企業家，只是用亞細亞的方法去解決罷工問題。若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在警察保護之下的活動，可是直接起來反對資本家的經濟利益，這當然是企業家所悲痛的。從此企業家確然變爲自由主義者了，他們確然把自己的金錢贈與站在極左一邊的人們了。同時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莫斯科的工人在亞歷山大第二的紀功碑前發表宣言，尊崇盛德。一九〇二年夏天，在國外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解放』第一期出版了。實際上講起來，『解放』報是急進主義的機關報，由資產階級的金錢而成立的。很奇特的，資產階級聘定非常之左的人，去充任這個機關報的編輯者。現在我們知道斯杜盧威，已經是一個保皇黨。當火星報成立的第一年，這個人曾贊助火星報，且有人與之商議欲使彼擔任『曙光』報的經常辦事員。與斯氏商議此事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普列哈諾夫。普列哈諾夫這種舉動是我

們很難索解的。當我們估計解放報爲俄國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的時候，這個事實，是應當認著的。資產階級竭力拿到最左不過的人，做他的招牌。當然，要羈絆普列哈諾夫本人，俄國資產階級，沒有這樣大胆的企圖，可是事實上，普列哈諾夫與之商議，并欲使之參加合作，這已證明普列哈諾夫的機關報，幾乎是被資產階級所羈絆了。

所有這些是證明：我們的資產階級受當時革命運動的影響，已經充其量的左傾了，已經充其量的欲謀害政府了。這些地方議會的左派，在十年當中沒有越過會議代表一步，而解放協會也是地方議會的左派，於一九〇三年正式成立。但是他一開始便以國會政府爲政綱，即主張實行正常的兩院制和普選制。解放協會的指導者，最終定要想出種種的方法去迷惑俄國的公民，并限制這個普選制，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當時的解放協會在原則上却沒有一個

人反對普選制，且沒有一人曾經要求有選舉權的財產限制。此外，這個組織，按其內部的發動力，無疑意的是資產階級的組織，雖然他們曾經極謹慎的向那些左傾的人們掩飾隱避，吸收這些左派的人們到他的團體中去。爲什麼要吸收這些左傾的人們呢？這不過是拿來做招牌。使這個團體底表面比其實質更要左傾。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促進革命的發展，這個熱誠只從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以後，始告結束。我們時常認為立憲民主黨，是向右運動的政黨，這一點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以後看來，完全是對的。因為立憲民主黨自此以後已經完全成為保皇黨了。但在前一時期的立憲民主黨，却是革命的右派，并未提到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問題。他們對左派說：你們是共和黨，請你們去建設共和政府吧；我們毫不反對共和政體。但在一九〇六年一月立憲民主黨却在其綱領上固定的寫道，俄羅斯應為君主立憲政體。這是什麼原因使他們如此呢？這便是莫斯科十二月的暴動及其失敗。十二月暴動以前，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羣衆運動的上升和發展，曾經做過許多的投機事業，這個事實在維德的傳略中，歷歷可致。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即十月罷工以後，黑仙去謁見維德（黑仙此刻在國外辦理立憲民主黨的雜誌——「船舵」）。維德與黑仙說，欲吸引立憲民主黨到自己一方面來，并誓為立憲民主黨人謀一切前途，——「但只要擁護我。」當時維德是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也要顧面子，也要掛招牌。維德說：「只有一個條件，你們要與革命者斷絕關係，不要放炸彈，不要放手槍，不要號召武裝暴動，等等。并請你們嚴厲的說：我們與彼等毫無共同之點，無論如

何決不追隨彼等之後。斬釘截鐵的與他們分家等等。」黑仙很狡猾的看看維德并質問他道：「那時你們能否解散你們的軍隊，警察，等等呢？」維德答道：無論如何，這是做不到的。黑仙又對維德說：「那你們要我們解散自己的軍隊，究竟是如何用處呢？」這樣一來，立憲民主黨人竟把革命者看成了自己的軍隊：所以立憲民主黨剛剛成立，便同情于十月的罷工，并盡力對一切的罷工運動表示好感。當時米留可夫對于「左派的朋友」雖曾屢次秋波頻送，大施其吊膀子的手腕，可是一點效果也沒有。（他說我和右派，絕對的限界分明，與他們毫無關係），曾有人以幾幅著名的滑稽畫來描寫米留可夫，第一圖，描寫米留可夫遇見「左派的朋友」——則甘言蜜語，滿面春風。第二圖，描寫他遇見「左派的同盟者」——已不復有如是的音容笑貌了。第三圖，描寫他遇見「左派的隣人」——則完全沒有聲色了。最後一圖描寫他遇見「左派的蠱子」則咬牙切齒怒氣逼人。這幾幅天才的滑稽畫，便描寫俄國資產階級對於俄國革命一切態度。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無疑義的，資產階級促進了革命的發展，在相當的程度上幫助了革命，甚至在十月罷工的時候，聖彼得堡的企業家還是很經常的支付工人在罷工期內的工資。工廠的管理處還給代表以路費，讓他們去參加蘇維埃的會議。

在這個時期中工業資產階級的態度就是這樣。我們可以推想，工業資產階級，在客觀上是有利于革命運動之發展的。

在結論中，我必須稍為說一說，俄國資產階級的政策，究竟是不是蠢笨的政策？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否知道將來結果究竟如何呢？關於這個問題一九一七年三月已經答復過了。革命勝利了，無疑義的這是真正的工人革命底勝利。一九一七年三月聖彼得堡的主人翁是工人。尼古拉第二也很懂得。他在其日記中寫着，國會委員會欲將革命的運動加以限制，可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委員會（尼古拉稱工人代表蘇維埃，為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委員會）和國會委員起了戰爭，而工人委員會的力量較強，所以國會份子，束手無策。顯然，工人是為主人翁了。但是誰人掌握政權呢。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的米留可夫總長，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及其他同樣的份子底臂助之下取得政權。如此看來，工業資本的政策，絕不是如此蠢笨，如此癡呆，有如初看時一樣。棋局布置好了。不錯，第一局遭受失敗了。怎麼辦呢？資產階級另找出路，——她很快的向右跑，而左派的朋友則變成左派的蠢子。以後逐漸證明，俄國資產階級的計劃無疑義的，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

現在再來補充第二個說明，俄國資產階級在商業資本主義國家內，自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以後本來就應該從他的環境中做出利用革命的結論來，爲什麼做得這樣的晚呢？爲什麼俄國的資產階級只在普列維當政的時候，才想到依靠羣衆的可能，才想到有國會的君主政體呢？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維德時期」底工業資本凌駕商業資本之上，便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和沙皇的關係，是非常親切的。

第一我們應記着，剛才我所說過的這個海關政策，絕不由什麼俄國政府立法機關神速的創造力所創立的。煤炭的稅率，是對於南俄礦工業家之一個直接的答覆。鐵的稅率定每普特爲十五哥比，這也是對於五金工業家大會的聲請之一個正確的答覆。一八八三年他們提出請願，至一八八四年已經完全滿足他們的請求了。下一次的大會，想增稅則爲每普特爲二十五哥比，而在一八八七年已經得到二十五哥比了。一八九六年在諾夫果羅的大會討論附加稅的時候，『寓尼加爾』報寫道，俄羅斯的『商賈無所不可』又那裏的報紙，載有財政部長的非常奇異的聲明書，說道：

「財政部長認爲必須知道各地工商業的代表，對於那些最有意義的問題，究竟有些什麼

意見。財政部向來是抱這種態度。我在財政部服務四十餘年，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和證據，能夠肯定的說，財政部始終是爲工業和資本謀利益的。」

這位貴人所說的話，從四十年代整個的時期中看來，也許是不正確的。因爲在一八七八年施行保護貿易主義以前，俄國的商賈並未感受財政部特別的恩惠，可是在一八九六年看來，他的聲明完全是對的。我舉出另一個事實來看，財政部召集會議決定了經常的勞働時間——十一小時半的勞働時間，財政部的代表痛恨企業家過分要求了。他說，「去年會議請三十人參加，說道——不夠；本年會議請二百人參加，又說——還是不夠。究竟要請你們多少人到會，你們才算滿意呢？」這個財政部代表歎息的意義，已經非常顯明的表示出，財政總長的確是聽從工業階級了。九十年代俄國的企業家沒有絲毫地方表顯着是些急進主義者，因爲當時攬政權者，實際上已是俄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表——維德。關於這一點，待批評維德的時候，我再來發揮。

至於俄國的地主派，那末他們比之俄國工業上的企業家，更爲自由的，因爲他們所能享受政府的恩惠有時還要少些。不錯政府時時施惠於貴族，但是他比重却相差很遠。我們可以

找到許多當時貴族怨恨政府輕視他們的事實。在鄉村中更左的左派，鄉村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在會議上也只能有發言權的代表。貴族只能得到商賈已經得到了的權利。政府招待商賈并聽從商賈了。貴族說：「我們呢？請聽聽我們的話罷，我們總算是尊貴的，我們是有特權的，聽從商人，而不聽從我們。這是好現象嗎？」在九十年代貴族沒有得到多大的利益。

但是在相當的程度上，這個說明，好似『偶然的事』——然而這個事實，絕不是具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的。這個事實是世界的。我們黨第一次委員的宣言曾經重述恩格斯的話，資產階級越近東歐，則越發卑賤。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東歐的資產階級之越發卑賤，究竟是不是他的神秘，不可思議的本質呢？當然，不是的，——這個資產階級的卑賤，有其物質上的基礎。在大工業最發展的國家，即在實際上沒有大工業國家的競爭者的時候，那裡的工業資產階級，時常有更堅決的行動。英國完全不知道有拿破崙主義，——而法國的拿破崙主義則已經經過了兩個時期（「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拿破崙主義，即是工業資產階級服從軍事的專政。德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在梭林諾夫王朝半君主專制的統治之下經過了數十年之久，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所忍受的甚至還是純粹的羅曼諾夫王朝君主專制的統治，商業資本主

義的國家開始發展自己的大工業愈晚，則受着技術上更優越的和武裝更銳利的敵手的威嚇愈大。于是她的封建元首——或她的資產階級的迪克推多，拿破崙——便越發「保護」祖國工業，地方的工業資產階級則越發被人收買，因此，資產階級消滅封建統治的熱情也就越發減少。

第七章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二十世紀的開始，使得欣欣向榮的俄羅斯的工業資本走到他面前建立的重重障礙物的道路上。在一九〇五年大的革命爆發之前，是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在這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情況之下，終於爆發了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

但什麼條件決定了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爆發呢？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爆發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必然要暴發的革命前提。

首先看俄國二十世紀開始時的經濟情況，這個時候經濟方面，呈現着停滯與危機的狀況。當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工業飛快的向前發展，在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間，俄國消費棉花

的數量增加百分之二百。鋼鐵生產品增高到百分之三百。但在二十世紀的開始，不僅不能向前的飛跑，而且不能再向前開步走，至一九〇二年就遇着了工業上所發生的恐慌。自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之整個十年中工業生產都未能走到興旺的地步，經常是在不進步中。一九〇五年前工業固然在困難中，一九〇五年以後一樣的不能與十九世紀末葉相比。如紡織工業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較前十年（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增長的速度低落了七倍，棉花的消費量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鋼鐵工業不但一點也沒有增加，並且相當的向下低落了。

俄國工業爲什麼會走到停頓狀態中，爲什麼十九世紀末葉那樣的發展，二十世紀竟會如此的低落。根本的原因，乃是封建勢力的束縛，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無情的剝奪，造成了農村經濟一般的貧困，因爲工業的發展，與農村經濟有密切的關係，農村經濟得不着暢快自由的發展，工業也難有其發展的前途。例如發展了製造機器的製造廠，必得要製造生產品的其他工廠之需要，如紡織工廠等。但紡織工廠大部分的生產品是爲農民用的。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農民業已達到極其貧困的地步，那裡會有力購置工業生產品，工業必然的要遇到他

不能向前發展的危機。這種經濟的危機，是造成俄國第一次革命之主要原因之一。

造成一九〇五年革命之第二個原因，則是一切反動政治所釀成。

在沙皇專制的淫威之下，對於任何之羣衆行動或要求，是要予以干涉與鎮壓，不容許有謀反叛逆的行爲如罷工等之經濟的政治的威脅，以保持封建政治之專制威權。然而壓力愈大，其反抗力愈強，歷史進程中之一切矛盾至於爆發的時期，絕不因壓力之大，而不爆發，相反的，因爲壓力之大，其爆發愈爲猛烈，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就是因爲「沙」的反動政治所促成。

二十世紀開始年代，俄國的工人羣衆爲了反抗經濟與政治的壓迫，工人運動中最普通的形式是政治的示威。在許多大的工業中心，工人階級出來作羣衆示威運動的時候，受社會民主黨的影響提出顯明的政治要求。成千成萬的工人，拿着紅色的旗子，唱着革命歌；喊着革命的口號，屢次與警察軍隊相衝突。關於這一方面特別明顯表現出來的，是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的罷工。一九〇二年罷工運動的中心是勞斯托夫。沙皇政府設立許多警察憲兵，禁止一切集會結社的自由，但是在他所統治下的俄國，居然有幾千工人在勞斯托夫城郊外聚

集，舉行警察與哥薩克（馬兵）蒞場的廣大的露天大會，而且在會場上竟有許多講演的人作反對專制政府的號召，其中還有頗何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代表。在這裡自然免不了同軍隊發生衝突，沙皇自然要竭力壓迫羣衆的反叛行動。一九〇三年發生南俄總罷工，開始因經濟的原因而發動於巴庫之煤油開採企業中，但很快的便染上了政治的色彩，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傳播到基佛立斯，巴都母等地，而將南俄的全部都捲進去了，運動中發生了許多示威行動及與壓迫工人的軍隊警察衝突。

當這種羣衆革命運動繼續高漲的情形之下，沙皇專制政府亦企圖把持工人運動，建立警衛局，而有所謂『柔巴托夫政策』來制止工人的革命行動。革命把警衛局束縛於工人運動上的鎖鍊打斷了，革命推倒了工人運動前面所樹立的障礙物——警衛局，而沙皇政府的壓迫遂至更爲加緊，柔巴托夫的自身也因為高命的高漲遭到了不幸。

同樣的，在一切客觀條件與工人革命運動的繼續不斷，驚醒了農民的衝動，一九〇二年波耳他夫，哈里可夫等省，都發生了許多農民的暴動，表現出了農民所儲藏着許多導火線的材料，表現出了他是傾向於反對地主，並且在這些運動中他是可以造成強有力的反對地主階

級及反對政府的革命運動。然而畢竟都遭到沙皇政府的殘暴鎮壓。

歷次工農羣衆革命運動之被鎮壓與殘酷的制止，終於防範不了一九〇五年大革命之爆發，只是更促成其早日爆發與爆發得格外猛烈。

一九〇五年俄國爆發革命的第三個原因，直接引起他爆發的近因，便是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的失敗。日俄戰爭的動機，原來是沙皇政府爲了執行商業資產階級的任務，爲商業資本主義找出路，目的是在取得滿州朝鮮爲其獨佔的殖民地，甚至還要吞併日本在自己的支配之下。結果是戰爭失敗了，不得不放棄在滿州的既得權利而與日本締結和約。這一戰爭的失敗，使得俄國政治經濟方面更形混亂，一般人對當時政治愈爲不滿，而沙皇的政權與威信，遂因走入一種動搖狀態中。革命遂在此時爆發了。

歷史上一切大的事變之到來，無疑問的是有他政治經濟的背景，尤以經濟上的矛盾爲主要動因。俄國一九〇五年第一次的大革命之爆發，就是因爲經濟政治上所引起的，另外加上一個日俄戰爭的失敗。

革命的經過：一九〇五年剛開始，形勢便是非常的緊張，革命的爆發由一月至十二月是

逐日的深入與擴大，至十二月則竟武裝暴動了。

一月的罷工是這樣開始的。當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中間，聖彼得堡普濟老夫製造廠中四個有經驗的工人，毫無理由的被開除了，他們是加朋聯合會的會員。所謂加朋聯合會，不是工人自己的組織，是沙皇警衛局在聖彼得堡的走狗神父加朋把持工人運動的組織。加朋聯合會派代表見製造廠的總經理，要求恢復被開除的工人，這要求沒有得着圓滿的結果。加朋聯合會幾次派了代表見製造廠的總經理及聖彼得堡的將軍，但是聯合會的請求到處都被拒絕了。加朋組織中所團結的工人羣衆要用罷工來回答這種開除。一月一號聯合會決定宣佈普濟老夫製造廠的罷工，二號通過決議，三號普濟老夫廠的工人完全停工。由加朋組織的聯合會與普濟老夫廠工人的廠主提出下列的要求：（一）實行八小時的工作制，（二）每月三班輪流工作，（三）男子加工資六成六，女子加工資一倍，（四）改良廠中的衛生條件等。罷工不僅限於普濟老夫製造廠。一月四號普濟老夫製造廠的工人求助於法俄製造廠，該廠工人也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後幾天罷工傳播到五金製造廠及色麥黑可夫，奧布荷夫，亞歷山得洛夫等大工廠。到一月八號幾乎所有聖彼得的工人都罷工了。人數不下十五萬。

工人革命運動正在繼續的向前發展，加朋不得不企圖集中自己的指導作用，以盡其走狗的職任。當時社會民主黨還沒有強有力的組織，爲工人中唯一的羣衆組織，祇有加朋工人聯合會，加朋以去沙皇那裏請願的論調，哄動了當時的工人羣衆。

一日九日成千成萬的工人由各個區域向皇宮附近的大場那裡走動。羣衆拿着宗教的旗幟，神像，沙皇的照片，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誦着祈禱文，各方面由加朋領導向皇宮那裏移動。羣衆的游行，完全帶着宗教巡行的性質，沒有什麼紅色的旗幟，也沒有什麼革命的口號，這些波浪樣的隊伍，與路上駐紮的軍隊漸漸接近時，大家都相信軍隊是不會屠殺的。當時有個極守舊的保皇黨加其可夫醫生會說：『我是相信正教的，服從專制國家，愛惜祖宗歷史，服從長期統治人民的沙皇，我以爲當時的情形，決不致於開槍，而且軍隊也不敢開槍的。』但是軍隊居然開槍了。

加朋領導的羣衆，離納耳夫斯加門還有三百步就被軍隊截止了。馬隊飛一般的衝入羣衆中間，拿手中的刀向羣衆身上亂砍。馬隊退去之後，步隊即向羣衆放排槍。步兵之後，又是騎兵向着逃竄受傷的羣衆追擊。加朋在人羣中逃走了。這種對徒手人民的慘殺，繼續了好久。

在一個大路上放槍的時候，這些工人都挺着胸喊着：『我們死罷。同志們！不要向後退一步
嘯！』

在特羅斯基橋那裏的屠殺更爲殘酷。那裏的軍官當着羣衆離橋還有兩三百步的時候，便下令開槍。當着滿地都倒斃着工人，婦女，小孩，老頭兒的時候，騎兵又衝上來了。有的工人是表示了反抗的。工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之下，搗毀了賣軍械的商店，用電線桿，街上的小涼亭，木板等做成障礙物，用槍，石，木棍等來打騎兵。但結果終於是秩序戰勝了。軍隊自下午一點半鐘起直射到四點鐘止，犧牲的數目是很難算清的。傷者約有一千人，死者約二百人，一月九號在聖彼得堡的經過就是如此。

所有全俄國的無產階級都用罷工來抗議一月九號在聖彼得堡所經過的事變。據官廳的統計（他們是時常故意縮小數目的），莫斯科在一月九號以後的十日罷工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參加。罷工的範圍幾乎包括了所有俄國的大工業中心。很多的地方，都發生了工人同警察及軍隊的衝突。一月九號就是這樣變成了俄國無產階級羣衆革命運動的推動力。

一月九號的意義，盧森堡說得好，在這次示威運動的幡旗與聖像之上，有『馬克斯的精

資產階級奮鬥，以要求改良自己的地位；提高工資，改良爲自己生存的物質條件，以及取消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野蠻條件。因爲無論那一個國的資產階級都沒有像俄國資產階級那樣殘酷的赤裸裸的剝削無產階級的，除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落後的國家。

在當時所有工人提出來的要求與口號中，最主要的是有兩個：一個是在同資產階級鬥爭路線上的要求八小時的工作制，另一個是在同專制鬥爭的路線上的要求立憲會議。

在許多區域中，特別波蘭及波羅的海一帶，工人運動已經走到了與沙皇政府武裝鬥爭的路上。當然，當時專制政府還是有力量，足以暫時戰勝工人的。但是工人雖然是失敗了，而在某一種意義上還可以說是勝利的，如勃浮師涅山斯基地方的夏季大罷工，最是明顯的表示出這一點。這次罷工參加了五萬以上的工人，延長到六十幾天，工人在鬥爭開始的時候提出了經濟性質的要求，以後在鬥爭過程中又逼着工人加上政治的口號。因爲工人的堅持，使警察與軍隊不能不採用武力來干涉他們。當工人在城市中被禁止而不能開會的時候，他們就聚集到城外開會。好幾萬羣衆在那裏聚集着，聽他們的政治指導者社會民主黨人的演講。運動走到了一個非常緊張的地步。資產階級稍稍的讓步了一點，但不能滿足工人的基本要求。最

後警察與軍隊用起武力了，他們不惜將槍砲向徒手的工人大會射擊。這些窮苦而家庭人口又多的工人，沒有方法可生存下去。一部份被壓迫而跑到鄉村去，另一部份不得不屈服。但經過長期罷工之後去上工的工人，對資本家宣佈道：『我們現在雖是屈服了，但我們並不以為我們是永遠被你們征服了的。』

工人在城市中繼續不斷的發展革命鬥爭，農民革命運動亦繼續着而起。農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在一月間已經開始，但到了二三月間，他因為一方面受了沙皇政府軍事失敗的影響，另一方面受了工人革命運動的影響，他才帶有了羣衆的農村運動的性質。農村革命運動的範圍，包括中部俄國，波蘭西部邊境，沿波羅的海及高加索等地。並且在波蘭波羅的海及一部份的西部邊境一帶的農村運動，不僅有農民參加，而且也捲入許多農村的工人。因此，在這些區域也發生了許多罷工運動。中部俄國一帶的農民運動，都帶着自然爆發的性質。在開始的幾個月中：不斷燒毀地主的居屋，踏害地主田地的禾苗，砍伐地主的森林等。一九〇五年春夏之季，農民運動在俄國內部蔓延了六十二縣，佔全俄所有縣數百分之十四。

所有的農民（連富農也在內）幾乎都參加了這次的運動。在每個月中都有新的農民加入農

村革命運動中去。而且要求組織的企圖也表現出來了。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這些散漫的分離的農民，已經有了一些運動的組織的中心。七月三十一號在莫斯科舉行了秘密的全俄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而且這協會在全俄區域都已有了許多分部。這一次會議的中心問題，自然就是關於土地問題，關於分配地主土地的問題。在大會所提出來要求之中，內中也有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大會上有四五十個代表是農民。自然當時還說不上農民協會是一個廣大的農民羣衆的組織。其中還不過只是些農民的政治代表，農民中最覺悟的上層份子。可是就是這些上層份子的組織，也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但是若以爲當時的農民運動帶有明顯的政治意義，那又不是正確的。我們可以說，政治的口號在工人運動中已有了確定的意義，工人羣衆是一天一天的走近了政治口號的中心。工人階級將這些口號看成了第一步任務，但是對於農民却不能這樣說。農民運動還是帶有經濟的性質，還在自然爆發的狀態中，他們還沒有覺悟的政治見解。

但是在軍隊中之有組織的一部份農民，他們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上是比較有覺悟的，例如由日俄戰爭的障綫上戰敗而回到鄉村的兵士，海軍中尤爲顯明。一九〇五年的夏季，黑海

艦隊發生了暴動。六月十四號塔甫立切斯基軍艦上的海軍，曾因細小的經濟原因（伙食不好）發生暴動。海員很無疑義的在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之下，拘捕了軍艦上的軍官，提出他們的政治要求，並向禍鐵史城市中的罷工工人表示聯合。以後海軍將軍艦開到海口，全體革命的海員都上了岸，在岸上廣大的羣衆中間去埋葬一個被軍官打死的海員。六月十七號軍艦又開到海中的時候，便遇着一個艦隊奉命來討伐他的暴動。這些暴動的海軍，便直接的公開的與艦隊作戰，並號召其他軍艦上的海軍來響應他們。有一個戰鬥力很強的軍艦炮別多老氏便與他聯合了。但是這個聯合並沒有經過長的時間。在砲別多老氏艦上並沒有堅固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此，他便很快的離開了暴動。塔甫立切斯基軍艦成了一個孤立的形勢。過了幾天之後，在暴動者中間的組織也漸漸鬆懈了。六月二十三號塔甫立切斯基艦逃到羅馬尼亞的海口昆斯坦茲。在那裏海軍將軍艦交給了羅馬尼亞的政府。海員們爲避去反革命的專制政府的壓迫起見，各自分散，但有許多海員仍是由羅馬利亞政府引渡給了沙皇政府。

因此，第一次的海軍暴動終於失敗了。但是他有偉大的政治意義，這種失敗，就是勝利的準備。塔甫立切斯基的暴動，搖動了對專制政府之威力的信仰，在軍隊中造成了革命傳統的

的思想，並開闢了羣衆武裝暴動的通路。因此列寧曾著了許多文章號召所有覺悟的人都應該注意這一次的海軍暴動。給着社會階級的觀點上說，這一次運動的特點是穿着海軍衣服最有紀律，最有組織的農民，居然開始了革命的偉業，很自然的走到了同工人階級作革命聯合的道路上。

一九〇五年一月至十月間革命運動是如此，至十月的革命則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形勢更爲緊張，而舉行了全俄總同盟的政治罷工，武裝暴動的準備與預演，時刻表現於各大城市的中心區域。

莫斯科的無產階級，開始了十月罷工的先聲。在以前莫斯科工人受聖彼得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是很薄弱的。但是九月末莫斯科爆發了印刷工人的羣衆大罷工。九月二十五號，莫斯科罷工的印刷局有五十個，工人幾乎有六千。印刷工人在罷工中提出的一些經濟性質的要求，事實上已經轉變成了反對專制政府的政治活動。同時城市中其他工人及辦事人中間的運動已漸漸發展了。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麪包工人的罷工運動，於九月二十五號開始的，在誹尼婆夫麪包廠中

的罷工，竟達到了武裝衝突的地步。罷工的麪包工人，被警察及軍隊鎮鍊一般的圍着，他們遂聚衆於屋頂上很勇敢的集成小團體，由那裏對軍對放槍。

到九月末，罷工運動便傳播到所有大工廠製造廠中心。就是布列斯特鐵路上之鐵路製造廠的工人也參加了。十月三號列寧格勒的印刷工人來向莫斯科的同業工人宣佈了同情的罷工。最後參加罷工的有國家紙張製造局的工人，涅夫斯基造船廠的工人，以及聖彼得堡其他工廠的工人。這一次首都罷工的運動，得着了附近工業中心之很多的響應。但是全國統一的組織中心，共同的口號還是沒有的。一直到全國鐵路總罷工開始，這一次革命運動才找到組織的中心。

九月二十號全國鐵路工人的代表大會，於聖彼得堡開會。開會的目的本來只是個很不重要的「審查養老儲金部的章程的會議」。但是當時的環境既然在那樣的革命緊張中，遂使這個特別的代表大會，不得不漸漸的將一般嚴重的政治任務擺到自己面前，議事日程也漸漸的擴大，要討論當時之急待解決的問題。從局部的問題起，到一般的政治問題止，

這個審查養老儲金部章程的會議，在這個革命環境中過了幾天之後，便自己宣佈為「全

國鐵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政府看見鐵路工人正式開始了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便開始了極大的恐慌。工人羣衆中則完全相反，他個對於大會表示堅固的同情，無限制的希望，不少的要求，特別的注意。所以當十月六號拘捕了。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上的代表的謠言傳出之後，在鐵路工人中間，便引起了巨大的騷動，實是不足爲奇的事。十月七號加讓斯卡鐵路因工人罷工而停車。再過幾天便所有在莫斯科中心的鐵路都停止了工作。電報工人同郵局工人的罷工，更使着這種運動走到特別嚴重的地位。這種罷工很無疑義的自然傳播到聖彼得堡及其他鐵路中心去。因此鐵路罷工到十月中便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有熱烈的羣衆，有示威運動，有同警察與軍隊的武裝衝突，成了全國政治總罷工的動力。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代表七十五萬鐵路上的工人及職員。鐵路在全國的經濟，軍事及政治生活上都有很大的作用。停止鐵路上的運輸，就是擾亂了商品的流通，停止了工業經常的發展，並且使政府束手無策的不能運兵到革命的中心去。在另一方面，他更加鞏固了革命的地位，因爲他爲了革命利益的需要，還是可以繼續行動的。假使沒有鐵路罷工，則十月總同盟罷工便無論如何沒有那樣的廣大。當着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時候，鐵路職員用盡方法阻礙無產

階級革命的勝利，但當着一九〇五年工人階級還沒有直接擺出社會主義任務而只是與專制政府奮鬥到底的時候，鐵路上的職員是曾經同着鐵路上的無產階級共同幫助過工業無產階級的。鐵路總罷工之後，全俄革命無產階級開始了最有名的進攻。沒有一個工業中心，沒有一個大企業，沒有一個大工廠，沒有參加這一次的十月全國政治總同盟罷工的。電報停止不動了，報館沒有報了，電燈不明了，每日都沒有新生產的貨物拿到市場上消售了。國家及私人機關的日常工作都沒有，而在街市上所表現的又是十分動人的，十分響亮的革命的政治罷工。一切在罷工前有很大威力的高等教育機關，現在都充滿了戰鬥的革命羣衆。在廣場上，時常看見軍隊與警察被羣衆大會所趕走。數千人示威運動，變成家常便飯了。這真是所謂全民的革命。部份的經濟要求都置之腦後了。罷工的主要口號是八小時工作制，公民自由與立憲會議。許多羣衆大會及示威運動的結果，都是與軍隊及警察的武裝衝突。街上時常佈滿着障礙物。

十月十號在哈耳可夫，十六號在俄得斯，都曾發生過巷戰。罷工的人不僅只是工人，學生，各機關辦事人，廣大的智識份子，並且也包含了一些自由資產階級，及一部份裝帶着口

由派色彩的地主，商人，資產階級的教授，甚至於官僚。但是參加這些運動的羣衆雖是五花八門，而無產階級都很無疑義的是革命中的領導者，他變成了運動中組織的中心。

十月十三日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聖彼得堡開會了。在他們第三天的會議中已經參加了由一百個企業中所派來的二十六個代表。這個工人代表蘇維埃在當時的一個短時期內，不僅在聖彼得堡，而且在全俄的革命運動中都掌了指導的作用。以後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中都有同樣的組織。

十月十七號，運動已經到了最緊張的地步。就在這一天專制政府決定了讓步。沙皇頒布了十月十七號的宣言。宣言上允許一切主要的政治自由，並允許了召集國民立法代表會議——國會。反革命戰線的破裂，在人民羣衆中間引起了很大的狂熱。但是革命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却是很明瞭，假使革命的勢力不繼續的進攻，不在以後的革命運動中奪取比較更大的勝利，則這種開始所得的勝利，仍然是不會鞏固的。政府頒布了宣言之後，罷工仍然沒有停止。

可是羣衆的十月進攻，使罷工的工人感覺到了疲勞。武裝暴動是需要相當準備的。只有

在許多預備工作完成之後，才能保證新的進攻之得以勝利。因此武裝暴動應當選擇另一種順利的時期。聖彼得堡蘇維埃於十月二十號決議停止罷工。議案通過後，五天之內便所有的罷工都停止了。

這一次的事變——十月總同盟政治罷工，是一月九號以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第二個大階段。

十月政治罷工，是革命運動中一個明顯的界嶺。他所包括的社會成份是非常的廣大。在罷工口號之下所聯合起來的，不僅是無產階級，不僅勞働羣衆，並且也有不堅決而表示同情的自由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得到了十月十七號沙皇政府的宣言之後，他們便退出了革命的戰線，將革命的話頭取消了。

自由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線而向左邊走，在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則又有了他逐漸堅決，逐漸明瞭的同盟者——農民。一月二月無產階級的運動，促進了一九〇五年春季農民運動的發展。同樣十月政治罷工，在農村中也找到了響應。自一九〇五年秋季十月半起，農民運動已帶着了羣衆運動的性質。秋季內農民運動所包含的區域，要比春季內大三倍，它搖動了所有

中俄沿波羅的海，高加索及波蘭的鄉村。地主的財產被搗毀了。地主都感着留在家中的危險，狠狠的離開了鄉村，貴族也捨棄了舊有的家庭。據當時不正確的統計，在這時期被搗毀了的地主的住宅有兩千所。在運動特別緊張的十省內，地主的損失約值三萬萬盧布。高加索的農民運動則帶着很明顯的政治性質，完全在社會民主黨的形響之下。在沿波羅的海及波蘭一帶，農村無產階級在農村革命運動中有非常偉大的作用，農民與城市的工人中心發生有極密切的關係，農民運動已有了相當的組織形式了。十月十七號，全俄農民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了。在這一次大會上所提出的經濟問題，比較第一次大會更爲革命些。政治要求也同樣比較更激烈更堅決些。

在這種條件之下，當然在軍隊中也不免要發生革命的潮流。十一月中間，聖彼得堡發生了許多軍隊中的騷動，特別在軍事工程隊中間。一九〇六年一月中間之黑海艦隊的事變，又在革命運動史上算是新的光榮的一頁。

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五號黑海艦隊中發生了革命的騷動。開始於斯米德所領導的俄加可夫軍艦上。暴動海員扯出了紅色的旗幟。繼續俄加可夫而暴動的還有另一個軍艦。斯米德爲

這一次運動的領袖，他巡視整個艦隊，這次運動遠比夏天的更為嚴重了。就在暴動的這一天，斯米德給沙皇拍了一個電報，要求召集立憲會議。上半天就在極緊張的時期過去了。但這種情緒是很容易變動的，在下半天就有未被拘捕的軍官集合所有的力量，來鎮壓暴動。俄加可夫軍艦首先便受了槍炮的攻擊。他也用槍炮來還射，後來暴動軍艦上遭了火，其他船上的海軍都紊亂了。這一次的運動到晚上就完全被壓迫下去了。其他在基也夫，哈耳可夫，沙馬耳等城市軍隊中，都發生了或大或小的騷動。

由此看來，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農民，在鄉村中搗毀了地主的財產，在城市中穿着海軍或陸軍的服裝，宣佈不服從政府，破壞沙皇的軍紀，表明他已經到了革命的路上。但是只就這些個別的事實上，還是說不上農民已經走到了羣衆的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的路上。農民僅只是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僅只開始了有組織的企圖，僅只真在革命路上的開始的一步。

但無產階級運動的特點，不獨是新的口號增加，政治覺悟的程度提高，並且組織上也有成績，在十月中間，許多城市都組成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十一月二十二號在莫斯科第一次工

人代表蘇維埃的會上，出席了八萬工人的代表一百八十人。伊凡諾夫，基野夫，禍鐵史，及其他幾十個城市，在十一月中間都有了同樣的組織。這許多工人蘇維埃中間要以聖彼得堡蘇維埃的政治作用為最大。因為他自己有很豐富的革命經驗，在全俄已有了大家公認的威信。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工人運動的先鋒，全俄工人都是緊隨着首都所發生的事變。聖彼得堡在革命運動中如像音樂指揮者一樣，雖然這個音樂指揮者並不能時常能使一切音樂家都彼此服從他的指示。自革命發生以至一九〇六年一月，革命鬥爭的重要責任，都是聖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担負。在其他城市中，無產階級像聖彼得堡的活動，我們還沒有看到。

事實上蘇維埃已經成了一切鬥爭的指導機關。聖彼得堡的蘇維埃指導工人工作每日只作八小時的工作鬥爭，不斷的與資產階級及專制政府鬥爭。另外一次大活動便是聖彼得堡蘇維埃所指導的第二次政治總罷工。這次罷工開始於十一月一號，而結束於十一月七號。罷工的宣佈因為有兩個政治原因：一方面在克羅斯泰地方軍隊中發生了暴動之後，這個運動的指揮者以及幾百萬海員與兵士都被交到了軍事法庭上。另一方面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在波蘭

宣佈戒嚴。這兩件事的回答，便發生了第二次的政治罷工。這次罷工在十一月七號最後的一天，還包括了十萬工人。其他十一月十五號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又指揮了郵政工人的總罷工，又是非常有組織而廣大的罷工。

蘇維埃的權威一天一天地擴大，專制政府乃不得不予以嚴厲的打擊，他開始解散會議，拘捕革命的指導者及加緊一切警察的壓迫。最後的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終要到來。十一月二十七號工人代表蘇維埃通過了準備武裝暴動的議案，十二月三號政府下令拘捕所有到會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委員。莫斯科於十二月七日開始罷工，聖彼得堡於十二月八日開始罷工，這次政治總罷工中，聖彼得堡的工人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勇敢與堅決，因為這個先鋒戰隊在這時候已經精疲力竭了。但在莫斯科却又異常的熱烈，十二月七號開始總罷工的人數達十五萬，總同盟的政治罷工開始以後，一直到八號九號，幾乎全俄城市的勞働羣衆都參加了！

十二月八號的晚上鎮壓革命的屠殺，開始了莫斯科的武裝暴動。羣衆是第一次參加武裝暴動，鬥爭的方法是非常原始的，經驗是沒有的，軍械又很少，事實上有戰鬥力的僅只有幾百糾察隊。這幾百人的槍是非常雜色的，連獵槍也包括在內。但是許多人民來建築成了遮蔽

街道的障礙物。廣大的勞働羣衆，是完全同情於革命的糾察隊的。武裝糾察隊雖然很少，但是直接間接參加暴動以擾亂軍隊與警察的組織而鞏固糾察的地位的勞働羣衆，却是非常之多。在這幾天中間，莫斯科街道上發生了許多激動的戰爭。時而退守，時而進攻，時而因軍隊勢力壓迫，拋棄了已經破壞的障礙物，時而又在新的地方，飛快的建設新的障礙物。參加暴動的人對於來壓迫暴動的兵士做了許多革命宣傳。有些地方這些革命宣傳得着了成績，革命的將軍也不能十分相信他們自己的軍隊。列寧當着做莫斯科武裝暴動的結論而研究他的經驗的時候，曾經特別指出兵士羣衆中革命覺悟的增高，他說：『莫斯科無產階級在十二月暴動中給了我們對軍隊中做宣傳工作的一個偉大的教訓，例如十二月八號在斯特大場中，許多羣衆圍着哥薩克向他們周旋，使他們不得不後退。又十二月十號在普涅斯尼的時候，兩個女工拿着紅旗在萬餘羣衆的前邊走，他們遇着了哥薩克便喊着：『殺我們吧！我們活着是不肯丟棄這旗的。』羣衆又高喊着：『哥薩克萬歲！哥薩克被這種喊叫激動之後，自己退走了。這是在無產階級腦筋中所應當永遠記着的現象。』

暴動決不限於莫斯科，其他如若斯托夫，紹夫莫夫，哈耳莫夫，同樣的舉行過武裝暴

動，都是以很少的武裝和廣大的羣衆對統治階級作戰。

十二月暴動是革命最緊張的時期。暴動的失敗，便是無產階級退守的開始。但是這些廣大的工人羣衆及工人的同情者參加武裝暴動的事實，專制政府在這個時期，戰慄恐怖的事實，軍隊向革命方面動搖的表現，廣大的勞働羣衆都認爲武裝暴動是與專制政府鬥爭的方|法。所有這些，都是在人民的腦筋中劃下一個深刻的痕跡，在俄國歷史的發展上留了一個深刻的界碑。

這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過，每一事變的過程與其發展，都值得予以深刻的注意。

革命中的各階級：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然而革命的指導者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最有利於肅清農奴制度，最有利於澈底推翻封建制度而到達取得民權主義的勝利。但資產階級既不能如此的去幹，完成他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當然無產階級只得英勇的走上革命的領袖地位，而且必然的要走到革命的領袖地位以取得革命的領導權。因爲無產階

級有預備與組織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應當起來推動歷史的車輪前進，使着社會關係漸漸接近於社會主義的革命。

俄國第一次的革命，工人羣衆在布爾塞維克指導之下，出現於廣大的政治鬥爭的舞台，他們所表現的並不是一個狹義的行會的無產階級，而是反對沙皇政府鬥爭中的發起者與指導者。每次的偉大鬥爭，都能激起廣泛的革命高潮，直接壓迫沙皇政府使之不得不讓步。這一讓步的表現，常視工人鬥爭的高漲爲轉移。一月的事變，十月的總罷工，十二月的暴動，沙皇政府則立即有二月十八號招集詔議會的宣言，十月十七號發表允許自由以及立法的國會的宣言，十二月十一號又頒布了國會的律法，擴大了城市人民選舉的權利，工人也相當的得着了選舉權。雖然此時還說不上已經接近於民權主義的條件，因爲地主的權利，還是大於資產階級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三倍，大於農民十五倍，大於工人四十五倍。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工人革命鬥爭迫得沙皇政府的讓步。

十二月暴動失敗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開始衰落，而專制政府也就開始進攻，限制國會及選舉人權利的法律相繼頒佈。足徵無產階級是革命中的生力軍，無產階級的運動是鞏固一

切在革命時期中由專制政府處所奪來的勝利的保證，

罷工運動的經驗，特別是十月總罷工的經驗，教訓了社會民主黨只有總政治罷工是革命鬥爭的重要工具，而總政治罷工又為轉入武裝暴動之必需經過的途徑。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中，當然還說不上所謂純粹的政治罷工。每次大的政治罷工中能夠同時引起許多經濟罷工，政治罷工高潮過去之後，接着就有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經濟罷工，因為俄國的無產階級，不僅在沙皇的專制政府壓迫之下，而也一樣的是在資產階級野蠻剝奪之下，並且資產階級時常勾結沙皇的軍警用其他的政治壓迫工人。因此，俄國工人罷工運動，一方面是反對沙皇的專制政治，一方面是反對國內的資產階級。但因革命的發展，政治罷工遂成了羣衆鬥爭的重要武器，一直轉到武裝暴動。

羣衆的政治罷工與武裝暴動，固然是以搖動沙皇的專制制度，可是還未能消滅沙皇的專制制度，還沒有力量破壞國家的一切壓迫工具專制政府之軍事警察的力量。因為他們還沒有堅強適當的有力組織，即就當時無產階級的政治黨，不是整個的，而有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分，都有其在工人羣衆的影響，時常要作不斷的鬥爭，布爾塞維克時常要肅清孟塞維克

在工人羣衆中所散佈之不革命的影響。就是職工會，雖然在革命中蓬勃的發展，却未能在政治上與組織上予以充分的注意，只是蘇維埃有了政權萌芽的形式。

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俄國之第一次革命中盡了他偉大的任務。

農奴制度的專制政府的破壞，是最有利於資本主義之向前發展的。但是因爲下列原因資產階級乃不惜拋却革命，離開革命戰線。

第一，資產階級總是還不覺得肅清農奴制度之絕對必要。雖然專制政府並不願犧牲地主的利益而取消對農民之農奴式的剝奪，但專制政府不但允許資本主義之發展，并且還極力幫助他。

第二，專制政府漸漸允許了資產階級參加政權。

第三，大部分有勢力的資產階級，都是恐怕農村革命的。因爲農村革命不但對於地主，并且對於資產階級都是有損失的。事實上很多地主的土地都與質於資產階級銀行中。因此資產階級的本身，也是地主之土地所有權的參與者。

第四，資產階級看着工人革命運動的前途是非常驚駭的。

以上便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原因，至多他只能利用革命力量以滿足本階級之小的利益，至於左派資產階級則企圖在羣衆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可以得着專制政府的政治讓步，而不分政權。但是當着他得到這些讓步之後，看着工人表現出要拿着武器繼續奮鬥的企圖，看見工人階級的活動產生了蘇維埃的組織，於是這個從前本來不是革命的資產階級，現在連革命的話也不說了。所有他們在國會中作政治活動的時候，他們從沒有一次說到要與專制政府作革命鬥爭的話。批評專制政府的時候，他們認爲只需要用請求的方法，要求政府的讓步就夠了。他們認爲一切可以做可以實行的事，僅只是專制政府所同意而允許的事。

資產階級與反動勢力妥協走開了革命的戰線，無產階級在另一方面却找到了農民做他有力的同盟者。農民階級的成分雖然複雜，然而在反對地主的戰線上則是一致，並且革命到了深入與擴大時，農村無產階級的作用愈爲顯現，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也在所不免。農村無產階級運動最重要的地方沿波羅的海一帶，與城市無產階級是一樣，罷工運動也轉而爲武裝暴動，也組織蘇維埃爲革命的專政的萌芽。不過此時最主要的仍然是在推倒地主階級，肅清封建勢力。此時所有農民運動的方向幾乎全爲反對地主，做地主敵人的常是全體農民。

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曾作過極廣泛的鬥爭。時常是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愈高漲，農民的革命鬥爭亦隨之而急劇。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驚醒了農村中廣大農民的甯夢。農民雖然有時不堅決陷於妥協性，但城市工人的革命運動以及布爾塞維克正確的指導。教育了，訓練了，和培養了農民革命的傾向。每次農民革命運動都得着無產階級的密切領導。第一，幾乎在所有農民運動表現得有力的地方，那裏的指導者與發起人，或者由城市到鄉村中去的工人，或者在城市中領過工資生活的農民，或者是到過城市而在工人區域受過政治訓練的兵士。第二種表現，則是農民運動的發展，是在工人革命的推動影響之下，這在運動的各時代的變化上反映出來的。第一次農民革命的潮流，發生於一二月無產階級的革命潮流之後。從春季開始一直到夏季。革命運動的範圍，佔歐俄各省中之六十二縣，當所有縣數百分之四。第二次的農民革命，是在十月總罷工之後，歐俄四百六十三縣中有一百六十一縣發生了農民革命，佔所有縣數的百分之三十七。十二月暴動後又激起了一九〇六年春夏兩季之農村騷動。工人革命潮流低落後，農民運動的百分比亦隨之而低落。由此足徵廣大農民是無產階級強有力的同盟軍，此強有力的革命同盟軍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鬥爭。不過步調

還不一致，還未能有適當的配合。

顯然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各階級，資產階級是不革命而且是怕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擔負起革命的重担子，並且領導廣大的農民實行革命的任務。

革命中的社會民主黨：

這個時候在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已經不是一個整個統一的社會民主黨，顯然的有了三派：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與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洛斯基主義者雖然沒有大的影響，就是所代表的數量在人數是不多的。但他有特別的固定的政治思想的路線，因此我們必須予以注意。

當一九〇五年之俄國第一次革命，首先在社會民主黨中爭論問題就是革命性質問題。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都承認歷史環境所決定的當時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廢除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餘與破壞地主一切經濟政治的特權，是應當肅清封建勢力，保證資本主義關係之加快的發展，這種發展，便預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兩方面的估計，僅止至於此，其餘則是背道而馳。

孟塞維克不承認俄國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在新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產生出來，已然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不一樣。在這個革命中，有特別作用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農民，指導革命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無產階級，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成了不革命的腐朽階級而非法國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孟塞維克不明瞭這一點，不能在新的環境中找出新的方向，因之他只是應用呆板機械的見解來理解俄國的革命。

托洛斯基派，他對於革命性質的瞭解，是由於曲解了馬克斯的革命理論，曲解了所謂『不斷的革命論』。他以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因為階級衝突的激烈，即在當時俄國的環境中其革命是不可免的要帶社會主義的性質。托洛斯基沒有估計到決定革命性質的俄國農民，忽視了農民革命的經濟基礎。

布爾塞維克則不然。他估計歷史的時期，能特別研究在這個時期的特點與這個時期和別個時期的區別，他知道今天的條件會與過去及將來完全不同，他理解在今天的活動方法若是根據於過去及將來的條件，則他在今天便不能勝利。因此布爾塞維克能在一種新的條件之下，適當的應用一種新的口號與新的策略。

第二是關於革命動力的估計。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對於這個問題的估計，已在一九〇四年『鄉紳會議』運動的時候，已有不同的意見，孟塞維克已經說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就是一切發展着的社會運動的領袖與指導者。他們以為資產階級的革命，只有資產階級足以做革命的領袖與指導者，無產階級是不能而且沒有這個資格居於領袖與指導者的地位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只應當催促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革命化，但不要恐嚇他；只要推動他，使他行動更徹底，更堅決。強迫他，但是不要叫他分離了。至於農民，他們以為僅是一個自由資產階級運動的附屬品，他們根本沒有估計到農民在資產階級的農民革命中之偉大的歷史作用。

這種謬誤的理論，根本是由於未能明瞭俄國社會之特殊的階級關係而發生的。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不是勇敢的革命階級，而是懦弱的不革命階級，他只是傾向於請求憲法，請求沙皇政府對於他們的讓步，並且他們懼怕革命。事實上當時俄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性，不是決定於資產階級而是廣大的農民，農民是這個階段革命中的主要動力之一。因為俄國社會的私有財產份子中間，佔全國人民最大多數的，不是大資本家而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所有俄國的環境，經濟的與政治的條件，都是推着他們走向反對地主國家的革命鬥爭的道路上去的。

但農民是分離的，散漫的，無組織的，他沒有能力在革命中發生獨立的自動的指導作用，做革命的指導者，為資產階級的農民革命中的指導者，只有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正自做着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兼而反對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妥協性。孟塞維克反以為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真是瞎了眼。

托洛斯基在『鄉紳會議』運動時，是與孟塞維克合作的。一九〇五年他才與孟塞維克分裂。他能指出資產階級之不革命的性質，但他仍未能瞭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托洛斯基提出了革命中必不可免的社會主義性質，他同時斷定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在革命過程中終不免要出來反對無產階級。他訕笑布爾塞維克以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保證』是在與小資產階級的農民聯合。因此托洛斯基完全不把農民看成一種革命的力量。不能明瞭革命的性質，當然也不能明瞭革命中的動力。

第三是俄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相互關係的問題。顯然的俄國一九〇五年之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時期，在西歐，資產階級的革命已成過去，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已經成熟，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這一階段的俄國革命對世界革命有什麼關係，孟塞維克的回答是

俄國革命對世界革命沒有影響，不能影響於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他只承認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對俄國革命是有影響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極力注重與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聯合及使俄國革命促進國際革命的爆發的必要。但他們不明瞭，這種促進的作用，只有到革命範圍最為擴大的時候，才能達到目的，怎樣能使革命範圍擴大，僅只有無產階級政黨能明瞭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的農民革命的時候，因為聯合世界革命與促進世界革命，這只是一句空話，只有無產階級在革命環境中找出實際的路線，使無產階級有依靠於廣大民衆的可能，使無產階級能站在統治的地位以指揮革命運動以至於勝利祇有依靠這樣的力量才能說自動的促進國際無產階級的活動。布爾塞維克則完全與他們相反，因為他能適當的估計革命的性質與革命的動力，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了布爾塞維克認識之正確。

第四個問題是革命鬥爭方法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布爾塞維克主張以『平民』的手段推倒沙皇專制政府，號召民衆積極的預備武裝暴動用總同盟政治罷工轉變為武裝暴動。暴動以後，立刻組織工農革命專政的政權，這一政權的組成，就是蘇維埃。孟塞維克雖然也承認總政治罷工的偉大意義，但他們否認武裝暴動，只承認武裝暴動可以宣傳而不能實行，甚至

沙皇用流血摧殘革命的民衆，孟塞維克的理論家普列哈諾夫還高喊着說：「原來用不着動武呵！」他們只承認蘇維埃如罷工委員會一樣，極力反對蘇維埃轉變爲武裝暴動的機關，尤其否認蘇維埃是政權的萌芽。托洛斯基對蘇維埃的問題比較孟塞維克離布爾塞維克的主張近些，但他仍未能明瞭蘇維埃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政權機關。他不明瞭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的條件中，蘇維埃正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權專政的胚胎。托洛斯基自己所提出來的口號，打倒沙皇，政府歸工人，仍是表現着他對於革命性質與動力，不能有正確的估計。

孟塞維克在革命中向右走了，托洛斯基派向左去了，因此他們都不能正確的估計革命，而只是會引導革命誤入迷途以致取消革命。只有布爾塞維克能正確的估計革命性與動力，能適當的應用革命的鬥爭方法。雖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失敗了，然而一九〇五年之失敗正是教訓了布爾塞維克走到勝利之途。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意義：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雖然因爲客觀反動勢力之大與主觀上若干缺點而遭遇了他的失敗，但這一次革命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這次革命的意義列寧在他左派幼稚病上說得非常的詳

盡，他竟這樣的說：

『一切階級都明顯的出場了。一切綱領的與策略的見解，都爲羣衆行動所校正。罷工鬥爭之擴大與激烈，爲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一轉而爲政治罷工，政治罷工再轉而爲暴動。領導的無產階級與遊移不定被領導的農民中間之關係，得到實際上之校正。在鬥爭底散漫的發展中，產生了蘇維埃的這種組織形式。那時關於蘇維埃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二〇年間未來的偉大鬥爭。議會形式鬥爭與非議會形式鬥爭，抵制議會策略與參加議會策略，鬥爭之公開形式與非公開形式及其相互關係與聯絡等等之轉變，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若就羣衆與領袖，階級與政黨對於政治科學原理的學習而言，則這一時期底每一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中之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勝利，將成爲不可能。』

這就是列寧對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所肯定的意義。

第八章 俄國沙皇的改良政策

工人羣衆運動的失敗，促成了工業資本自由主義反抗態度之潰渙。這一點在資產階級看來，是不可解決的矛盾。在我們看來，却是辯證法。羣衆運動失敗的結果武裝暴動的失利，工業資本應當投降商業資本。何以故呢？我們必須完全公開的承認，其所以然者，是由于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比較十分覺悟，由于我們已經有了工人階級政黨的端倪。

這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不使無產階級的羣衆，不使被吸入革命運動中去的羣衆，成爲資產階級中的武器。同時無疑的，她又破壞了分裂了資產階級的反抗運動（即工業資本及其有關係的份子的運動）。故有人們仇視布爾什維克，說布爾什維克分裂了這個革命的力量。

量。在上述這個事實的意義上說來，他們有幾分對的。不錯，實際上布爾塞維克是分裂了資產階級所領導的羣衆，組成了工人階級的政黨，具有一定的革命方針。布爾塞維克反抗資產階級的方向和反抗君主專制的方向，是雙管齊下的。資產階級既以羣衆運動爲兒戲，我們當然要破壞資產階級那種把戲。一九〇五年因布爾塞維克能運用無產階級獨立領導的政策。故資產階級未能博得勝利。實際上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並沒有達到他們所要求的目的，沒有達到普魯士式或奧大利式「相當的」資產階級的君主專制。所以然者，是由于既有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有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分子，不許工人階級變爲資產階級的武器。

現在問一問：我們的革命是否像我所說的由于純粹的工業資本失利諸條件而終結了呢？立憲民主黨人由窺竅政權一變爲反對派以後，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中改變了歷史的真面目，許多人受了他們的傳染，也隨聲附和，不明真象。此時立憲民主黨的報紙時常咒罵得勝的商業資本，所謂商業資本便是以史托里平及十月黨人爲代表的。不僅在俄國境內的報紙中是如此，即在國外的報紙中也竭力鼓吹着，俄國施行虛偽立憲主義，俄國所有的設施是欺騙的，史托里平是立心不良的草莽奸雄，他徒就依靠武力和偵探以支持其地位，所有他的憲法的退

議，無非是個誘惑，借以欺騙國外資產階級，以便向他們借外債而已。立憲民主黨的報紙，描寫第一次革命總結的大意，約略是如此。我們也重複了他的話，因為我們的五官並沒有感覺到任何的憲法。

自第一次國會解散以後，尤其是自第二次國會解散以後，布爾塞維克黨處于秘密環境之中。入黨的人，政府償以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是放逐和褫奪一切公權。若努力參加黨的作者，則處以苦役。在這幾年中，工人的政黨沒有絲毫的自由。工人的印刷，只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才能公開，才算合法。因為當時工人的運動重新活動起來勢力浩大，政府莫可如何。因此才允許「真理報」「星光報」等等在國內出版。雖然每天沒收這些報紙，大約每月要封閉一次，然而此時工人們總算是利用了公開的印刷了。但是這是稍晚一點的事實。而在一九〇九年此等的公開印刷還是沒有的。甚至職工會還處于半公開的環境。時常解散職工會，職工會每次引導罷工勝利以後，職工會的指導者即被放逐。換言之，甚至最平常的保護工人經濟的利益的職工會，都被認為不法的行動，同樣的處在秘密情況中。然而這個秘密的環境對於革命情緒的高漲，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思想的進步却有莫大的影響。一九〇五年

以後，在俄國工人羣衆中所有的經濟主義，自沙皇政府對於職工會實行了史托里平的政策以後，已經完全燻消雲散了。那時工人們看清楚了許多擺在自己面前的顯明的例子。工人羣衆都深信要得到一些經濟的利益及保持這些利益，若不先行推倒沙皇，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無不趨于革命之途，結果就有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可是對於我們還是沒有甚麼憲法可言，這是神聖的真理。甚至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可憐孟什維克居然夢想，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存在條件，要和德國俾斯麥時代所頒佈的社會主義法律一樣。孟什維克那種夢想，終竟成了黃金時代的幻想。因為我們的法律絕不能與俾斯麥時代的法律相比。俾斯麥的法律，只不過由漢堡放逐到阿爾敦，或則由阿爾敦放逐到漢堡，我們的法律則不然。誰要是加入了社會民主黨，誰就要被放逐到西比利。如果多少積極的做了一些煽動工作，那麼就要處以苦役。對於工人政黨的關係，對於工人運動的關係，俄國不但沒有任何的虛偽的立憲主義，即一般的立憲主義，也是沒有的，俄國簡直沒有任何的保障。我們說，俄國有虛偽的立憲主義，史托里平迷惑民衆，等等。我們這種說話，的確是撫拾了立憲民主黨人的牙慧。

然而立憲民主黨人，却曾經好好的利用過這些「虛偽的立憲主義」，故在代表工業資本

主義的政黨，立憲民主黨人看來，憲法當然已經實現了。第一他們的政黨底本身，雖然沒有得着史托里平法律上的承認，立憲民主黨人曾經幾次要求法律承認。但未能達到目的，——可是這個政黨在實際上是已經被承認了。立憲民主黨的委員會，完全公開的存在。當時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人還要處以放逐之刑。加入立憲民主黨的，只審判過一次，這次的審判，完全無關痛癢的，結果只處以罰金，並沒有監禁。立憲民主黨的印刷物，比之俾斯麥時代之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還要自由。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立憲民主黨的言論機關這樣的責備政府，責備史托里平及其關員，無論任何普魯士的機關報，恐怕也沒有這樣大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普魯士的出版物的聲調，比之俄國資產階級出版物底聲調，隨時隨地都要自重些。這樣一來，立憲民主黨人所需要的，無一不備了。立憲民主黨人和政府已經暗中結成良緣了。立憲民主黨人關於革命運動史的書籍，可以自由出版，他們的書籍，根據沙皇的刑律的眼光看來，甚至是有害的，也可以自由出版。布爾什維克的書籍則不然，布爾什維克的書籍比之立憲民主黨的書籍，在表面上的聲調，雖然寫得更為慎重，然而也還是要被禁止。一九〇六年史托里平爲着第一次國會的事情，稍爲抑制了他們一下，因此彼此便發生

了一些誤會。自此以後，立憲民主黨人便完全生存于自由之鄉，并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了。故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們，毫無疑義的是實現了憲法。第一次革命的結果并不是完全的失敗，第一次革命的結果是雙方妥協。在主觀的民權方面，得有相當的成效，即立憲民主黨在憲法方面得了一些保障。

倘若稍為深刻詳細的去分析史托里平的政策，不只顧其外表，不限于他對工業資產階級和她立憲民主黨所實施的純粹的憲法上的讓步，而仔細的看史托里平的社會政策，那末我們便可看到更大的讓步。史托里平的政策，在經濟和社會的實質方面，實可說是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中間真正的調和，真正的妥協。這個調和與妥協，給與當時著名的一六十年代的大改革——先後輝映。六十年代的情況和力量的相互關係，儼然重現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這個時期的過程中。當此立憲民主黨的機關報，對史托里平的政策，時常是相當的造謠或說慌。我們對於史托里平的社會政策，不能忽略了他的最主要的土地法令。他的最重大的社會政策，即他在一九〇三年三月四號公佈關於改良土地的命令，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號公佈關於退出鄉村公社的命令，及一九一〇年六月十四號總結從前所公布的命令而頒行完全的法

律。現在應該直接的來說，這是六十年代以後，沙皇官吏的行動最莊嚴燦爛的時期。

史托里平的土地政策，絕不像立憲民主黨人所說的一樣，實質上這乃是一個可憐的欺羣惑衆的政策，是引誘富農到政府方面的可憐的欺羣惑衆的政策。他是十分中肯的政策，爲俄國工業資本主義打開了兩扇大門。此次行動明確堅決，爲沙皇政府自農民解放以後從來所未有。史托里平實行消滅鄉村公社。他的政策執行以後，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數目字。現在先把史托里平的立法內容，簡括的說一說。

一九〇六年三月四號所頒布的土地改良法（最先的，第一次國會以前所公布的），給了那不在鄉村公社內領有土地，而是個人的領有土地的農民以莫大的權利。在這個法令上，規定國家土地的出售，并予農民購買土地而成立農莊的優先權，此時農莊經濟已經產生了。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號的法令，又再進一步。這個法令允許任何鄉村公社農民的少數，有權破壞鄉村公社。倘若某公社有農家二百五十以上，若有五分之一的家長請求退出公社，即政府便准許他們退出。這種行爲由地方土地改良委員會辦理之，委員會中大多數是地主和官吏（農民佔少數，到一九一〇年這個農民的少數，或由政府委任，或由省農事會議上由地主選

舉，換言之，自一九一〇年以後，農民有一個代表參加邑區選舉）。這個土地改良委員會，應當根據這個五分之一的家長的請求，實行消滅公社的土地領有。在特別情形之下，倘若沒有障礙，即土地改良委員會可以允許不足五分之一的家長請求退出公社，且無論何時，得允許個別的農民有退出公社和要求分離他的分地而為獨立的農民之權利。這是對於我們鄉村公社真正的打擊，這是對工業資本真正的讓步，因為這個公社是農奴制度的餘孽，是羈絆農民在田間的主要工具，換句話說，這是保證商業資本自由剝削農民的主要工具。所有這個過程，商業資本是東縛農民和剝削農民，公社是商業資本主要的目的物，商業資本主要的利益。現在情形可就不同了。

情形的改變，在革命以前已經開始了。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已經廢除了株連法，即廢除了公社統治主要的中心。此後的行動，實際上不外是一九〇三年所廢除的株連法之邏輯上的發展而已，但是我們十分明瞭的，在歷史上，邏輯還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工具。從一切的歷史事件中，或則完全不能得出邏輯的結論，或則閱時甚久才能得出邏輯的結論。資產階級的憲法，是從六十年代資產階級改革以後所得出來的邏輯的結論，可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前，門

羅諾夫並沒有得出這個結論。即在一九〇五年時也只得出了一些十分不明確的結論。反之，由廢除株連法所得出來的邏輯的結論，却是非常之快非常明確。

農民的羣衆運動，也是這樣。這農民的羣衆運動，初時弄得地主們狼狽不堪，于是乃提出一個草案，擬將地主一半的土地送給農民。這是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間，正君主專制驚得魂飛魄散之時，故維德所提出的草案頗博得尼古拉的惠顧。但在一九〇六年初，狼狽的時間一過以後，尼古拉對於維德及其內閣枯特爾所擬定的土地改革的草案，便十分冷淡了。故羣衆運動對於史托里平的立法有莫大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不過羣衆運動沒有勝利，只有工業資本的勝利罷了。工業資本客觀上究竟需要甚麼呢？當然需要憲法。憲法是賞心悅目的東西。對於剝削者好像錦上添花一樣，委實生色不少。但是剝削者對於人民的自由——尤其是對於真正的人民的自由，又怎樣呢？假使這個自由有如英德兩國一樣，那末工業界的企業家當然也是需要的，但在企業家的內臟和軀體內却沒有自由的要求。企業家只要法律上的自由，換句話說，是要工人和無產者從土地中和生產器具中解放出來，這是企業家第一個需要。工業的企業家第二個需要，便是國內的市場。倘若他不能得到國外市場的時候，

那末他就要國內的市場了。日俄戰爭已經表示出，找尋國外市場暫時已經毫無希望，我們的企業家徒然依靠其手裡擁有的鬥爭工具，已經不能取得國外市場了。因此必須擴充國內市場。上述兩件東西，就是我們的工業資本家真正所需要的，這不是憲法的虛文，而是資本家的經濟命脈之一方面——是無產者，另一方面，——是國內市場，要有無產者，便必須要有更多的破產農民，要有國內市場，便必須要有殷富的農民。他們有較好的飲食，較好的衣服，一般的生活更近人類，更享幸福，更為妥當。只有如此，他們才能多多的消費工業底生產品。史托里平的土地政策，恰恰是走着這兩條路線的。他的政策在保證我們的工業資本，第一，有「自由」的和便宜的工人，第二，有國內市場。

現在先要說明的，就是這個改革有些什麼直接的結果。若認為百分之百的完成，才能算為勝利，那麼，史托里平的政策便沒有此種成績。但是他的政策，多少總有一些勝利。看看數目字。一九一五年以前請求退出公社的戶口，計有二、七五六、〇〇〇，即等于俄國公社的戶口全數百分之三十。他們中間，有二〇、〇〇八、〇〇〇、戶口，實際上是已經退出公社了，即等于全數百分之二十二。他們所得到的私有土地計一千四百萬俄畝，即等于全部公

社領有土地總數百分之十，但準備分給他們的土地又計一千八百萬俄畝。總共由公社分出的土地有三千二百萬俄畝，等于俄國公社土地全數百分之三十一——約為三分之一。這樣看來，若謂史托里平未能徹底的破壞公社，這是對的，但是他已經破壞了三分之一的公社，這是不可否認的。往後史托里平不能有特別偉大的成績了，從請求退出公社的戶口數目可以看出。此地有十分奇異的統計。

在一九〇七年那時還有革命的妄想，以為或者還有奪到地主土地的希望。故請求退出公社的，只有二一二、〇〇〇，一九〇八年則有八四〇、〇〇〇，一九〇九年有六四九、〇〇〇，一九一〇年有三四二、〇〇〇，一九一一年有二四二、〇〇〇，一九一二年有一五二、〇〇〇，等等，以後便一年一年的減少了。一九〇八年突然發生異變大有天翻地覆之概，請求退出公社的數目增加了四倍。用革命手段去改革土地的希望，已經完全消滅，大部份的農民羣衆都在史托里平的道路上磨肩接踵的想退出公社。

為估量這個過程的結果，還是用數目字來說明，較為好些，試作一比較，在史托里平政策以前有多少獨立的農戶，史托里平立法後又有多少。俄國自立的農戶總數，（西部和南部各

省較多)，共有二百八十萬。一九〇五年以後，經過史托里平的立法，又增加了農戶約為二百萬，——即是約增加一倍，總共已經有四百八十萬了。但是一看農戶分化的數目字，則有十分奇異的數目，這與上面所引證的關於農民退出公社的數目字恰恰相反。農民出賣分地，一九〇七年只為二六、〇〇〇俄畝，一九〇八年為一五七、〇〇〇俄畝，一九〇九年為三七三、〇〇〇俄畝，一九一〇年為五二四、〇〇〇俄畝，一九一一年為五三三、〇〇〇俄畝，一九一二年為六五〇、〇〇〇俄畝，等等。農民羣衆之失掉土地，彷彿是融雪一樣。一九一五年初，退出公社的農民有百分之三十已經出賣了他的分地，其所出賣的分地約有百分之二十，共有土地面積二百八十萬俄畝。

俄國的無產階級，因為史托里平的改革，增加了很多。十九世紀末葉，純粹的無產階級為五百萬（列寧算作一千萬，是聯半無產階級亦在內）那末現在又增加了約二百五十萬，即增加百分之五十了。這一點應當記著的，因為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何以當時穀物價格高漲，俄國的工業還能如春花怒發繁盛起來。自一九〇九年起，俄國的工業較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低廉的穀物價格為基礎的工業，要隆盛得多。所以然者，即因為經過史托里平的土地改

良，工人數量加多了。不然穀物價格高貴些，工資也要提高一些。但因當時有二百五十萬的新勞動力流入市場去，故其結果，企業家對於勞動力方面有莫大的競爭，工資便能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水平線。這個事實必須記着的。因此可以了解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工人運動何以開始激烈的原故。新興的無產階級，應當忍受這個殘酷的剝削，由鄉村出來的新勞動力，壓在舊無產階級的身上，這當然，要使工人羣衆的經濟地位大起劇變，使工人羣衆一天一天的走向採取積極的運動的形勢。

自史托里平的立法以後，俄國鄉村之普遍的無產階級化，究竟到了什麼程度，這一點有下列的家畜數目字可爲明證。一九〇五年每一百居民共有馬二十五頭，一九一三年——有馬二十三頭。大角的家畜，一九〇五年——三十九，一九一三年——三十五。山羊和綿羊，一九〇五年五十七，一九一三年——五十一。豬，一九〇五年——十一，一九一三年——十。這是史托里平立法所走過了一條路線，這是史托里平使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聯觀的路線。這是經過鄉村無產階級化的步驟，給俄國工業以便宜勞動力的路線。至於這個政策的另一條路線——擴大國內的市場。此地我們有許多非常明顯的數目字。

先舉每個人消費糖的數目字：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八、七磅（三、四啟克蘭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一四、七磅（五、九啟克蘭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一九磅七、七啟克蘭姆，即多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二倍之數。此等數目字，我故意引來形容鄉村的無產階級化。在這些數字裡面，也許要發生一種妄想，以為農民羣衆底物質條件有點改善。這絕對不是的。不過有人食糖比以前多二三倍，這是毫無疑義的。屋瓦鐵片的生產數目字，也是一樣：一九〇三年——一千四百五十萬普特（二二七、五〇〇噸），一九〇五年甚且減少了，只生產一千三百三十萬普特（二一九、五〇〇噸），一九〇八年——一千八百六十萬普特（三〇四、六〇〇噸），一九一一年——二千〇七十萬普特（三三九、〇〇〇噸）一九一二年——二千二百四十萬普特（三六六、九〇〇噸），一九一三年——二千五百三十萬普特（四一四、四〇〇噸）。瓦鐵的生產量一年一年的增加了。當然，不是破產的和出賣分地的農民能夠使用瓦鐵，（他們的屋頂也許破爛不堪了）而是富農們則一天一天的多用瓦鐵了。這種情形，還是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有了，普列哈諾夫在他的著作中早就描寫過某個富農的屋頂覆以鐵片，又堅固又漂亮的事實，隨後用鐵片的當然

是逐漸的增多。

最後，史托里平的第三條路線，便是儲金銀行。一八九九年在儲金銀行內農民的儲金共有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三年（穀物價格高漲的時期）農民的儲金已經有了二〇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等於當時全部儲金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一二年農民的儲金共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一九〇三年要多二倍以上，農民的儲金等於全部的儲金百分之三十點四。

這是史托里平擴大國內市場以上工業資本聯盟的另一條路線。現在不必再引數目字了。從新興的富農食糖及用瓦鐵的分量中，當然可以推測許多。富農購買棉紗比較要多些，購買皮鞋比較多些，其佔有農業機器（尤其是在南俄）也比較要多些。換言之，即富農曾竭盡自己的脂膏，去繁殖培養俄國的工業了。俄國的工業培養到什麼程度，俄國的工業興旺到什麼田地，——我在下面再來敘述。

有幾個十分有興趣的問題，我認爲必須要答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我們的工人階級是否爲單五個哥比（這是一字不漏的照抄出來的），抑或有什麼政治性

實在內呢？

我應該說：據我的統計表，一九〇五年有一半的工人是在純粹的經濟的口號之下罷工的。據普多羅夫的統計表，經濟罷工，只有三分之一。據此種事實而論，也完全不是說此等工人只為五個哥比而奮鬥。此地必須分別兩個原素：一方面，是革命運動的性質，另一方面是革命的覺悟。

我已經指出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俄國工人階級革命的覺悟，的確還是落後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革命的覺悟，工人階級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的覺悟，這事毫無疑義的事實。然而這不是說的落後的羣衆，沒有革命的情緒，不過這個情緒，還沒有達到明確的思想的形式罷了。工人階級革命思想的進步，始於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當工人們深信他們從前所做的鬥爭形式、純經濟運動而無政治運動的形式，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時候，那麼，他們便覺悟到政治運動。但是這不是說，工人們最初沒有革命的情緒。我舉一個例子，一九一八年我們的工人曾經要求平均分配教授的褲子，這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情緒呢？當時我應當出席莫斯科蘇維埃區的會議對工人們解釋，平均分配教授的褲子，是社會主義最惡劣的形

式，他們便質問我道：倘若一位教授居住五間房子並沒有五條褲子，我們則穿着襤褸不堪的褲子，并且五人共住一間地下的房子，那末，這是怎樣的社會主義呢？當然，這不是社會主義，他們完全是對的。他們具有社會主義的天性，同時對於社會主義沒有覺悟的態度。不知道不應當分配教授的褲子而是在另一方面更急進的和更有系統去幹。

所以從來我沒有斷定過，一九〇五年的工人只爲五個哥比而奮鬥的；但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把自己的革命看做與廠主的鬥爭無異，在這個關係上說，他們是與農民相差不遠，因爲農民看作自己的革命是與地主鬥爭無異，——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我們決不能把這個運動看做是「五個哥比」的運動，否則，我們便不能了解一九〇五年俄國工人運動和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〇年英國的工人運動二者間的差別了。英國的工人運動，實際上是爲五個哥比而奮鬥的，因爲自覺的避免革命運動，在整個的工會主義時期的過程中，即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這四十年的過程中，英國的工人並不是革命者。他們自覺的放棄了革命鬥爭的形式。這確實是爲五個哥比而奮鬥的，而俄國的工人沒有避免革命鬥爭的形式。按其天性，按其情緒，俄國工人已經是革命者了，不過還沒有認識其革命的

終局，并幻想着這個運動是以戰勝廠主爲限罷了。那時怎樣再進一步去打倒沙皇，這是他們還沒有認識的。

這樣就可以了解我所說過的一九〇五年工人運動中的經濟主義了。

現在答覆與此有關係的另一個問題：如何去了解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這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也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呢？我認爲這是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之一種玄學的解释，這種玄學的解释，考茨基還是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便已經把他打破了。

一九〇五年普列哈諾夫質問考茨基道：按革命的性質來看，俄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呢，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呢？考茨基答道，這是舊的腔調，而不是馬克斯主義的說法。列寧又註疏考茨基的話：「俄國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爲資產階級，不屬於現在俄國革命的動力。而俄國的革命，亦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爲這個革命絕不能實行無產階級單獨的統治或專政」。此地還要補充一點，孟什維克所了解的資產階級革命，換言之，即工業資本的勝利，可以說，我們沒有充分的力量去完成這個革命的事業。

我已經說了，史托里平立法的政策是什麼東西，其意義何在。他的政策是破壞鄉村公社。倘若翻成法國革命的語言，那末，這便是——「取消特權」。障礙法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者，是特權，所以必須掃除這個障礙，同樣的，障礙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者，則為鄉村公社。誰來掃除俄國的鄉村公社呢？是反動的史托里平的政府——是沙皇的政府。

這樣一來，對於發展工業資本主義，我們就無須用強暴的爆裂了。雖然我不否認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羣衆運動，在相當的程度上曾經加速過這個發展的過程。一九〇三年廢除了株連法，一九〇六年事實上已經實行消滅鄉村公社了，沙皇政府既已動手消滅公社，那麼這便不需要革命，而只用改革就可完事了。在消滅公社的關係上說，一九〇五年的工農運動是有一「催促者」的作用，好像農民騷擾，是克留姆戰爭時期的「催促者」相差無幾，當然前者的行動是比較更為有力的。我們十分知道，十九世紀的君主專制，很能聽從工業資本主義的要求，況且，君主專制的本身，完全不是封建的白頭老翁的餘孽，而是商業資本主義底構造，換句話說，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的構造。

現在必須答覆再下一個問題了，——這是關於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問題。問題說道，

工業資本較之商業資本，既為更高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商業資本何以能戰勝工業資本呢？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個問題又是純粹的玄學。斷不能以為這樣：咚，咚，咚——商業資本來了，咚，咚，咚——工業資本來了，咚，咚，咚——社會主義來了。這樣的，像小孩子一樣的想法，是不行的。我說出「小孩子」這句話，實在對不起，但我不是說一般人，而是說那些有此想法的政論家。這樣的想法是不行的。人類歷史的過程是萬流的總匯。最終的結果，當然，是更高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取得勝利，這一點，在史托里平立法的例子中，剛剛看見了。形式上是商業資本勝利。工業資本欲從中取利的羣衆運動，已完全被壓制下去了，然而革命終竟有利於誰呢？革命有利於工業資本，萬流匯合的結果，工業資本佔了優勝的地位。這是經過了十分複雜的迂迴曲折的道路，一般的歷史的過程就是如此。倘若歷史沒有這樣的迂迴曲折，那末，完全沒有研究歷史的價值了，看看社會學就夠了。我們何必要研究歷史呢？我們研究歷史因為實際上所有的原因是複雜的，是錯綜雜合的，有的向前奔馳，有的向後退却。因為我們在生活中，在實用的策略中必須實事求是，我們應當在歷史的例子中去研究，使自己能夠適應這個複雜的變幻無方的和迂迴曲折的歷史過程。我們應當準備，我們所

走的道路，完全不是直接了當，而是萬分曲折，忽而凹地，忽而溝壑等等。我們若不注視自己足跡所歷之地，換句話說，若不研究人生歷史的實際，那末，我們只有在溝壑中失足和顛墜，焦頭爛額，粉身碎骨罷了。

現在答覆最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立憲民主黨究竟是什麼？此地有從警察局文件保管處得來的極奇特的文件，當我們公佈這些文件的時候，立憲民主黨人便非常憤怒的說道：看看啊，布爾什維克又和那些播弄是非的人們完全同流合污了。立憲民主黨雖是合法的政黨，然而警察局却還是注視她的。警察收集了關於立憲民主黨人的文件，這些文件是十分奇特的，這就是論及立憲民主黨的金錢問題。例如在莫斯科，金錢上幫助立憲民主黨者，主要的是商業專門學校的創辦人維百涅可夫，莫斯科的大豪富臘布盛史基等。臘布盛史基是最慷慨疏財的幫助立憲民主黨人，所以在第四屆國會改選時，立憲民主黨人選臘氏為國會的候補議員。惟其臘氏是更慷慨疏財的人，此外他又有自己的報紙。臘氏有這兩種資格，對於立憲民主黨人自然是特別重要的人物。在此事之前，我還知道，在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立憲民主黨的『新報』，曾經得過猶太的大資產階級的新迪嘉之資助。這個猶太的資產階級，第一是

懸念民族的利益，嗣後他看了「新報」對於擁護猶太人的利益不甚出力，則求之于我們布爾什維克的政論家現在已經逝世的龍茨，并請龍茨為該報的編輯。當時龍茨非常氣憤的說，豈有此理，你們的報紙，是立憲民主黨的，我呢，——是布爾什維克。猶太的資產階級說：這沒有什麼關係。且我們認為，你們對於民族問題的關係更為明確。這樣看來，立憲民主黨的報紙，實際上是得了猶太資產階級新迪嘉的薪俸。這個新迪嘉對於立憲民主黨的綱領却頗懷冷淡的態度。根據沙皇警察的文件，立憲民主黨人從芬蘭資產階級的政黨那裏得了許多的補助金，——得了三十萬芬蘭馬克，即等于三十萬佛郎，或十二萬金盧布。芬蘭資產階級的政黨要求立憲民主黨在俄國的言論機關和國會中，擁護芬蘭的利益，這又是一個例子。還有一個事實，即立憲民主黨的「聲報」，是由最大銀行之一最有權力之一伯克底資財所創辦的。另一個事實，便是警察局的探訪員呈報立憲民主黨曾受窩爾詩，卡姆斯基銀行和阿索夫，銀行財政上底幫助，我們如果將這些事實都湊合起來，那麼我們便可得到一幅十分完備和明確的畫圖。由此也可以明白大戰時立憲民主黨所持的態度。這一點在以後要講到的。

史托里平的政策，是與商業資本利益實行聯歡的政策，商業資本在這個時候仍居統治的

地位。因為穀物的價格繼續向上高漲之故。若以一八九九年的穀物價格為一〇〇，則一九〇一年為一〇三，一九一三年——一三〇。因為穀物價格高漲的關係，所以俄國穀物的出口，不特增加其分量，且增加其價值了。試舉俄國穀物之多寡與一九〇〇年作一比較，若以一九〇〇年穀物出口的普特量和盧布為一〇〇，則一九〇九年出口的普特量為一八二，而從這些普特所得的盧布量則為二四九。從此便可看出穀物價格之高漲。在一九一〇年的普特量則為一九六，而盧布量則為二四五，一九一一年的普特量亦為一九六，而盧布量則為二四一，因此俄國底貿易額便達到了最高限度的數目了。一九一〇年俄國的出超，換言之，即出口多於入口，共為五萬八千一百萬盧布。因此之故，商業資本便大占優勢，對於工業資本的關係，便只能談到讓步，只能談到調和了。

倘若史托里平的改革，是直接的和直覺的以讓步來滿足工業資本為目的，那末，在不直覺方面，結果史托里平的政策究竟對誰有利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很奇特統計。「強有力的」農民除用退出公社的方法來掠奪同鄉共井的人，和購買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底分地以外，還佔了地主許多的土地。這個佔領地主土地

的行動，非常積極。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這幾年中間，地主的土地出賣三一四、四〇〇、〇〇〇俄畝，即與農民退出公社時所得的土地相等。此等土地中，經過農民銀行的一卽落到農民手裏去的土地，有六、四〇〇、〇〇〇俄畝。貴族新出賣的土地，在窩羅尼斯省和坦波夫省有百分之三十，在新比爾省有百分之三十五，在生馬爾省有百分之三十，在沙拉多于省有百分之四十。換句話說，即地主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已經轉移到農民的手裏去了。

這是史托里平政策的第一結果，這個結果當然不在史托里平的意料之中，這個結果產生了甘其食，美其服。居高堂大廈的農民，富農收買了地主的土地，且十分努力收買地主的土地。農民土地面積的增大，即由于貴族領地的縮小。倘若我們舉出一九〇六年因購買私有土地而向農民銀行請求借貸的數目字來看，則全數的借貸中富農個人佔有百分之十八、七。合營公司佔有百分之六三、九，合營公司——這是富農的公司。此時富農還是異常薄弱不能用個人的力量去購買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們組合以後，就能佔有這些土地了。其餘百分之二十七、四的借貸是屬於鄉村公社，即企圖增加舊式農民的分地，舊式公社農民的分地。這是一

九〇六年的事實。倘若舉出一九一二年的借貸來看，那末個別的農家已經佔有百分之八一、五了。換言之，一九一二年地主土地五分之四已經賣與個別的農民了，合營公司的借貸只爲百分之一七、八，而鄉村公社的借貸——百分之、七。鄉村公社已經墮落不堪了。此時差不多沒有地主的土地了。富農的合營公司，差不多也用不着了，因爲此時富農已經強盛起來，能够使用個人的力量去購買地主的土地了。農民從地主手中買來的土地，有四分之三是歸個別的農民所領有。可知此時農民的土地領有，如何偉大的個人主義化了，在經濟意義上最進步的分子，其土地領有之擴張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了。

我在前幾章中屢次說過，富農——是鄉村中破天荒的自由主義者，且爲鄉村中民主革命的柱石。有人與我談話時，他斷定道，在這數年間鄉村革命的情緒，無疑義的是上昇起來了。這是他個人的見地。他的見地已被警察局探訪員的消息證實了。一九一一年探訪員說，在不久的將來革命是不可免了。同樣的，此時各個有名的社會運動家也這樣說過。

這是史托里平底政策始終沒有預料到的結果。鄉村中底個人主義化有莫大的發展，怒憤填胸的仇視地主的分子，亦有莫大的發展，同時這個分子日益強固日益擴充且用合法的手段

一天一天的吞併了地主的田地，然而我們可以推想，人們化費自己的蓄金去購買地主的土地，較之一錢不費的得到這些土地當然要滿意得多——這是自然而然的。

還有一個最後的客觀的結果，也值得我們的研究。此地我們又有頗奇特的統計表。倘若我們以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這五年間俄國耕地之面積爲一〇〇，那末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這四年間則爲一一〇。耕地的面積已經增加百分之十了。倘若我們以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收穫爲一〇〇，那末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收穫則爲一二三、六三。耕地的面積只增加百分之十，而收穫的數量，差不多已經增多了百分之二十三。

這樣一來，公社的破壞和富農分子的形成，這種客觀的經濟的結果，乃是進步的現象。收穫力和深耕法擴大起來了，由是農業機器的使用也就隨之而增加。

一九〇九年農業機器的入口，只值一七、一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在一九一三年已經有二三、七〇〇、〇〇〇盧布了。複雜的農業機器的入口，一九〇九年——一四、七〇〇、〇〇〇，而在一九一三年却只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此地我們須明白，複雜的農業機器即使用蒸汽的機器，大部份是用在大領地之上，而簡單的機器則多用于農民的田莊，從這

個主要的事實著眼，我們又可看到富農的發展了。富農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頗有根深蒂固的反動性，但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却曾經與鄉村中一切其餘的分子起而共同反抗地主。一九一七年十月還有最後一次的統一戰線的進攻。只自一九一八年夏天起，才開始反革命的富農運動。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列寧在全俄貧農委員會代表大會上說過：『自十月革命以後，我們革命發展的第一階段，第一個時代主要的，就是戰勝全體農民共同的敵人，即戰勝地主。在這個反抗地主的鬥爭中不能不激起所有的農民來參加，而且事實上也已經把所有的農民都激奮起來了。這個鬥爭聯合了不剝削他人勞動的貧農。這個鬥爭也聯合了較為安康的農民和一部份甚至最豪富的非有僱傭勞動不可的農民』。

第九章 世界大戰前的俄羅斯

在前一章中曾經說過，俄國第一次革命底結果，從狹義的政治立場上來說，乃是商業資本及商業資本所造成的專制政府之偉大的勝利，但在實際上却又見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底妥協。所謂妥協，便是從社會經濟立場說的。爲得到政治上底勝利，商業資本委實耗費不少的代價，他失去了舊的工業資本前的強有力的剝削工具——農村公社。農村公社沒有被史托里平的法律所破壞，這是史托里平失敗之處。簡單說來，就是因爲他的時間太少，因爲無論如何，這個過程不能在短短的幾年中就迅速的完成的。但是就在這短短的幾年中，已經做了很多的有利益于工業資本的舉動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之初所遇見的，把階級爭鬥移轉到鄉村

去之一點，確是表現於反動政權的力量已經轉移到鄉村中去了。這反動的政權是擊敗革命黨人的政權。這是矛盾——不，我們不稱之為矛盾，而稱之為歷史過程的辯證法。在這階級爭鬥注入鄉村之後，其結果一方面則有鄉村人民之急劇的迅速地無產階級化，給工業資本以廉價的勞動，在另一方面則造成了富裕豐肥的鄉村資產階級，替工業資本造成了國內的市場。

現在我們只要把這個過程下個總結，并以極少的數目字去分析這個結果。

自然，首先使應該看工業原料之發展，次之，則工業生產品之發展。工業原料之發展，可於下列數目字中見之。在一九〇八年煤之採掘為十六萬蒲特（二千六百萬噸），而經過五年之後，在一九一三年則近于二十二萬萬五千蒲特（三千六百八十萬噸）。這是產煤業之發展，即俄國工廠中底汽爐所消費的燃料之增長。當然，工廠的生產亦與此同樣的增加了。如以練鐵為例，則有如下之數目字：在一九〇〇年為一萬七千七百五十萬蒲特（二百八十九萬噸），在一九〇三年（恐慌最激烈的時候）一萬五千〇二十萬蒲特（二百四十萬噸），一九〇八年一萬七千〇十萬蒲特（二百七十萬噸）。在這裏的數目字與二十世紀初不相上下。在一九〇九年的下半年市場行銷大為變動；有許多的表現，其中之一是我個人在自己的生活

中所感覺到的。正在一九〇九年時我移住巴黎，而我所得的文稿的酬金，亦匯到巴黎去了。我計算了我應該從銀行中得到多少錢，但是他多給我了。要銀行中多給錢給別人，這是決不會有的事情，我想大概是我算差了，重算一次，結果還是不差。到底爲什麼呢？銀行決不會津貼我的。原來是俄國盧布匯價高漲——在國際交易所中他超過了本價。盧布原價爲二百六十六先令，當時則漲至二百六十八——二百六十九先令。這是俄國貨幣史上盧布在交易所中超過本價之空前的一次，普通匯價總是低於原價的。這段逸話顯然表示一九〇九年下半年市場行情的變動，從這年起鐵之生產開始增加了。一九一〇年產鐵一萬八千六百五十萬蒲特（三百零五萬四千噸），一九一一年二萬一千九百四十萬蒲特（三百五十八萬噸）。一九一二年二萬五千六百三十萬蒲特（四百十九萬噸）。一九一三年二萬八千二百四十萬蒲特（四百六十一萬噸）。這是大戰前的最後一年，以後鐵產更爲增加，這就是因爲要製造戰爭所需要的兵器和大砲等等的原故。俄國當時表面上雖有鐵的飢荒，由外國運入生鐵，但是戰前鐵產之增加，那是毫無疑義的表示着我們工業基礎已有極大發展，因爲五金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之基礎。這個生產的基礎異常迅速的發展，市場上的消費品自然亦隨之而發展。試以一九

〇〇年之數目爲例，則棉花之消費爲一千八百萬普特，一九〇八年一千九百八十萬普特等。這次可算開了俄國棉花消費史上底新紀元，俄國工廠建立以來，從來未消費過這樣大量的棉花，這是百年史上最新穎的一頁。

因此我們便可武斷的說：一九〇九年以後諸年，是俄國工業有力的高漲的時期，是俄國工業發達繁茂的時期，這種繁茂是在第一次革命史托里平政策底矛盾的（或辯證法的）結果底基礎上所產生的。當然，我說史托里平政策，並不是想歸之史托里平個人，只不過是爲簡略而已，實際上這是商業資本迎合工業資本底要求的政策。這是繁盛的基礎。現在我且把商業資本爲什麼能夠這樣揮霍，這樣寬宏大量的施恩于幼弟的原因講一講，至于這個現象的其他方面我暫且按下不提。

前面我說到階級爭鬥移到鄉村中，在那裡造成了富農——國內市場；及貧農——爲工場所需要的無產階級，商業資本就必然的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因爲革命的力量發展了。更確切的說，造成了兩種革命力量：一方面產生了德謨克拉西的（非社會主義）富農，富農是鄉村中的第一等的自由主義者。在另一方面則造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這

裏商業資本對於幼弟之一切施捨，都是捨施於忘恩負義之徒了。下面的數目字，表示這個忘恩負義之徒的狀況。十九世紀末俄國工業之發展主要的是依靠外資輸入，在維德時代投入工業資本中的資本，大部份是在俄稅協定後從外國輸來的十六萬萬盧布。所謂俄稅協定，粗略的說來，就是把俄國的稅務交給法國，把俄國之租稅在巴黎的市場上賣給法國，因此得到了十五萬萬以上的盧布，這些資本則完全投入于工業之中。在這種條件之下，俄國的資產階級就要依賴這個直接供給他們以資本的國庫了。因為每個落在俄國資產階級手中的盧布，必先經過國庫。這個中間的連環（國庫），于是就成爲限制俄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障礙。這雖不是主要的，然亦是使得九十年代俄國資產階級效忠於沙皇及祖國的要點之一。資產階級必須經過國庫或由國庫的幫助，才能得到生產上所必需的東西。這一點，是有極大的作用的。

但如以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時期，即一九〇九年以後工業高漲的時期的數目字來看，則情況迥然不同。試以那些曾經立案的俄國股份公司和外國的股份公司相比。在一九〇九年，俄國股份公司計共一百零八個，其資本共一萬零三百四十萬盧布。外國公司共十二個，資本九

百萬盧布，在一九零九年俄國公司一百十六個，資本共九千五百萬。外國公司十五個新資本一千二百九十萬，一九一〇年，俄國公司一百八十一個，計資本一萬九千萬。外國公司十七個，計資本三千三百萬。一九一一年俄國公司二百二十一個，計資本二萬四千萬，外國公司四十個，計資本八千萬。一九一二年俄國公司三百二十二個，計資本三萬七千一百萬，外國公司二十個，計資本三千萬元。一九一三年俄國公司三百四十三個，計資本五萬零一百萬，外國公司二十九個，計資本四千四百萬。如以上面兩個數字相比較以下，則可見外資在俄國工業中底作用之逐漸減少，而本國資本之作用日增。全時，此種增長却並非由國庫所致，而是資本主義的自然積累。這種積累之過程，我們從其他的數目字中，從糧食出口的數目字中也可以看出。我們糧食出口之增長有如下之比例。如以一九〇〇年糧食出口普特之數目作為一百，則一九〇九年為一百八十二，一九一〇年為一百九十六，一九一一年全上。如以糧食出口之價格而論，一九〇〇年為一百，一九〇九年為二百四十九，一九一〇年為二百四十五，一九一一年為二百四十一。總之出口品的價格，要比其容量多一倍半左右。這就是昂貴的糧食價格所起的作用，這一點我以前曾經屢次說過。這種對外貿易底出超，亦即是充實俄國資本家錢

鏊之金河（出超在一九〇九年達到一個極大的空前的數目字，五萬八千一百萬金盧布），因之現在俄國資本之繁殖并不倚賴外資之輸入而在「本地」之積累。其結果則使俄國資本主義更勇敢更利害。在一九一二年，在俄國甚至組成了資產階級的反對黨，即所謂進步黨，其首領爲斯在盧威與加腦伐落夫。加腦伐落夫是一個大工業家，後爲臨時政府中底工商總長。這個黨在政綱上右于立憲民主黨，而在策略上則左于立憲民主黨，他對政府說話的音調比立憲民主黨更爲堅決。立憲民主黨是俄國資本主義的思想，但不是直接代表工業的，這點我上面已經說過了。我們的工業家至今還是直接地團結于十月黨之中，十月黨的首領爲顧起可夫。因之，在這十月黨內的左派（進步黨）；「進步黨人」較之立憲民主黨便要強硬得多，這一點是很可令人注意的。

當在鄉村中產生了仇視商業資本與專制政府的份子的時候，在城市中在大資產階級中也發展了反對政府的心理，與此相并而行。在當時有許多好的有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甚至還產生了一種這樣的妄想，以爲俄國走至了普魯士發展的道路。他們說資產階級的憲法，在俄國多少可以經常地發達起來，羣衆的工人運動自然是要發生的，但是沒有新的空慌，沒有

大的革命高漲。魯沙可夫就是在這種見解上脫離了布爾什維克。他說在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完結，而離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尚遠；因之現在，我們應該按照孟什維克的樣子改造本黨的組織。取消黨的秘密組織等等。

這就是我所說的史托里平的政策之政治的經濟的結果。國內似乎是很穩固的。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遠不如內政之順利，而在本期之末，在俄國經濟範疇中，正從外國方面逐漸堆滿了烏雲。

在史托里平的政策之影響之下，國內市場發展的速度還依然是不能滿足俄國工業資本主義底需要。當然，生產絲綢比較那些能購買及穿着這些絹綢的要容易的多，第二個過程顯然的落後于第一個過程。很可注意的，就是製造品的市場在這時期之末開始停滯了。一九一三年時許多專門工業的及其他的經濟的雜誌，開始預示這個停滯，這個停滯的結果，使俄國的工廠主不得不企圖海外的市場。企圖那一種海外市場呢？自然，他們決不會想把俄國的絹綢輸運到英德去。試以俄國內亞洲邊境方面所運出去的紡織品來看，則有以下的數字：在一九〇九年爲二千一百五十萬金盧布，經四年之後，在一九一三年爲四千零八十八萬金盧布，在四

年之中俄國由亞洲邊境輸運到波斯與土耳其兩國去的工業品增加了幾乎兩倍，這增加是非常之偉大的，特別是俄國的工廠幾乎佔領了波斯的市場。波斯的工業品的入口，俄國要佔第一位，超過英國，其他各國則更不容說了。甚至英國的紡織品在波斯的市場上還不及俄國的紡織品。因此，波斯的市場，便很堅固地被俄國的工業品所佔領了。但同時，因為俄國富農發展得不分快的緣故；俄國的工業品在波斯的市場上仍是銷售不完，故俄國的工廠家還應該把自己的眼光向西方注意，因此便開始把自己的工業品運輸到土耳其去。

這是俄國的工業資本主義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爪牙之一。在別一方面却更加嚴重。我曾經講過，俄國資本主義一般的積累是建築在糧食出口之上，並且曾以數目字來表明其日漸發展的情況，但是現在我應該加以修正。糧食出口之發展，只到一九一一年為止，自本年起，他便大為降低了。在一九一一年糧食出口的數目為七萬三千五百萬金盧布，在一九一二年則為五萬四千七百萬金盧布，數目已經降低了。而一九一三則比較多了一些，為五萬八千九百萬金盧布，但還是比較一九一一年數目低落了許多。很可注意。不但盧布的數目減少了（這是糧食價格低廉的原因，糧食價格在這時候已經逐漸低落了），連出口普特的數量亦減

少了。在一九一一年俄國輸出麥類共八萬二千一百萬蒲特，而一九一二年則爲五萬四千八百萬蒲特。這是爲什麼呢？俄國出口的降低，對於俄國對外貿易的平衡，頗有極大的影響，這種現象究竟是從那裡來的呢？在一九〇九年之出超爲五萬八千一百萬金盧布，一九一二年只有三萬九千一百萬金盧布，而在一九一三年僅僅只有二萬萬了——低落了兩倍有餘。這是一個異常緊要的預兆，流到俄國資本家錢囊中去的金河開始淤塞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在一九一一年九月間爲爭奪利蒲之故開始了意土之戰爭。爲使君士坦丁堡不致受意大利的襲擊起見，土耳其便把海峽封鎖。自土耳其封鎖了他大尼里海峽之後，俄國從黑海方面的出口便完全停頓了。其結果遂得了如上面所說的數目字。在意土戰爭之後，接着就有俄國所挑引起的巴爾幹戰爭。俄國並沒有估計到自己挑引的結果。海峽的封鎖，數年來遷延不決，使俄國的資本主義受了很大的打擊。其影響如何我們可從官場的文件中看到。俄國銀行在這些事變的影響之下，三四個月的短期期票，其利息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資本便陷于恐慌之中。因爲利息之增加，乃是恐慌底表誌。

在這幾年中，俄國底出超，及一切從國外得來的各種利益，其代價仍是昂貴的。自然，

俄國的工廠主認爲這種價格是永遠不會變動的。工廠主比任何人都少懂辯證法。不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變動的。實際上，歷史的過程永遠是辯證法的。這裏就有如下的情況：如以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的三年平均而計，則大麥之價格每蒲特爲一百十八哥比，而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的三年中的平均價格，則爲一百一十哥比。如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的三年中的燕麥的平均價格，每蒲特爲九十九哥比，則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三年中之平均價格，則僅爲八十五哥比。麥類的價格很明顯的降低了。如果俄國底工業品在東方的競爭者是英國，那麼俄國麥類的競爭者便是德國了。德國從十九世紀末俾斯麥時代起，也已開始採用了關稅保護政策，不過他們的保護政策對於工業品底保護，沒有對於農村經濟的保護那麼嚴厲罷了。德國麥類的進口稅，每噸在八十年代爲十馬克，一八八五年已爲三十馬克，一八八七年五十馬克。一九〇二年燕麥的進口稅爲五十馬克，大麥爲五十五馬克。在工業進口稅的保護之下，發展了俄國的工業。麥類進口稅的保護之下，發展了德國的農業。到一九一三年時，普魯士每俄畝底生產力平均竟達到二千七百啟羅格蘭姆（近于十二蒲特半），同年俄國每俄畝的生產力，則只有九百啟羅格蘭姆，即少兩倍多。德國的農業在此種偉大的生產力之下，他就能

很順利的與俄國競爭。俄國麥類之輸入德國逐漸減少，特別是燕麥。在一九〇〇及一九〇四年間，俄國燕麥每年輸入德國八十二萬八千噸。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間每年輸入只有五十五萬五千噸了，而在一九一二年輸入德國的麥類，只有二十六萬八千噸了，這就是說比二十世紀初減少了四倍。並且還有十一萬四千噸德國燕麥輸入俄國，這是空前未開的大衝突。在燕麥方面，德國的農業，已經在俄國的國內市場上與俄國競爭了。俄國消費的省份主要的是西北各省如不斯克夫省，新城市等等。運入廉價的德國燕麥，比較本國的燕麥要便宜得多。這是真正的衝突。這使得俄國在歐戰前數月，還決定要征收穀類的進口稅。這一點在我們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在某種一定的方向上加緊了當時所有的外交上的矛盾。我們可見，情況是異常複雜的。俄國的工業努力向東方波斯與土耳其去。波斯土耳其對於德國却有直接的利益關係。故在爭取東方市場的經濟爭鬥上，便形成了俄德的衝突。這便是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的經濟情況。

現在不再多用數目字了，讓我來說一說當時外交界之情況。

我現在來講那些直接引起一九一四年衝突的條件及俄國參加大戰的原因。這個戰爭，又

直接的引起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爆發，羅曼諾夫皇朝的崩潰，最後這至十月革命之完成。凡是稍爲明白事體而不十分愚蠢的人，便不會懷疑，俄國之所以參加一九一四年大戰的原因，主要的就是要根本解決海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俄國商業資本生死存亡底大問題。握取了博斯福與他大尼里之後，俄國的商業資本，才能成爲東歐糧食販賣中之專利者。因爲他大尼里成爲俄國的海關之後，則這方面唯一的競爭者，保加利亞羅馬利亞等國便要成爲俄國商業資本的附屬品。

在開始戰爭時，土耳其是中立的，俄國甚至還有拉攏土耳其爲俄國聯盟者之企圖。但是因爲有上述的事實之存在，故雖在事變之初，此中底蘊也是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但無論怎樣土耳其並未參加戰爭。然而對於每一個頭腦清晰的旁觀者，就十分明白的知道：俄國之所以要戰爭者，只是爲了海峽，大戰之末年（一九一七年），關於這點已經完全公開的說了。在這一方面米留可夫爲爭奪他大尼里海峽的事情因而特別聞名于世，在革命之後，我們也找得了許多文件證明在開始時就已經是這樣了。

我上面所指出之現象——在海峽封鎖之後，俄國麥類輸出之降低，俄國出超之低落，在

政府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試看尼古拉與英公使裴加安的談話便可知道。尼古拉說：海峽之封鎖，使俄國的商務陷于異常困苦的情況之中，假使和平方法無效之時，便以武力開峽亦所不惜。這是一九一四年春天所說的話。

因此，當時俄國所受的經濟困難與問題，及一九一四年大戰的關係便十分明顯的了。

日俄之戰，在外表上雖是俄國商業資本與沙皇政府殖民政策之嚴重的失敗，然在別方面亦有一個優良之結果。有時人們在吵打之後便變成了好友，『不打不成相好』，俄英在亞洲亦是一樣。在幾乎一世紀之中至少亦有七十五年中，英俄是不可調和的仇視者，是不可調和的敵手。英俄衝突充滿了整個十九世紀，直至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亦是英俄衝突之一部份，亦是英俄資本在中國之衝突。但日俄戰爭却終結了這個衝突。英國之所以惶惶不安者，就在俄國有極大之陸軍，而英國則沒有這樣偉大的陸軍用以保護殖民地。特別是印度。從此就產生了英國在亞洲對俄國之疑忌的態度，形成了許多的衝突，這種衝突，至今還很深刻的印在那些在紅軍中供職的舊沙俄軍官的記憶中。但是富于實際性的英國人，在一九〇五年之後，在這點上他却很安心了。因為他知道俄國就在陸路上其偉大亦不像從前所想像

的那樣可怕。日本的軍隊很容易的戰勝俄國了，而日本的軍隊，從一九〇二年起，從英日成立協定之日起，正是保護英國在亞洲的力量。在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協定的基礎上，日本軍隊在一切在亞洲的衝突中，應該幫助英國，日本可不必干涉歐洲之衝突。這就說明，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日本軍隊之沒有出現于歐洲舞台上的原因。但是英國之所以懼怕俄國正是爲着亞洲的事情。現在英國的印度既有日本的軍隊前來保護，那英國自然可以高枕無憂了。

因此，在一九〇五年前咬牙切齒仇視俄國的英國，在一九〇五年之後，這咬牙切齒就變爲和愛的微笑了。英國現在很善視俄國。在一九〇七年以後，英俄關於亞洲的問題還訂了許多的協定，在這協定之中，兩國就劃定了勢力範圍，而且這個協定對於俄國並不是毫無利益的。英國資產階級在這裏很聰明的了解，激動敵手是用不到了，應該以小小東西來賄賂他，這賄賂俄國的小小東西就是在波斯北部經濟勢力範圍之退讓。

因之，俄國得了一個發展與運輸貨物到波斯去的可能，這是英俄協定之直接的結果。英俄之衝突是消逝了。所以在遠東的一切事件都停頓了。遠東問題已經放在次要的地位了。在一九〇七年之末，英國公使已與當時俄國的外交總長（後爲駐法國公使）與世界大戰的罪人

之一依茲伏而斯基有了一次談判。若以個人而論，則世界大戰的罪犯；在法國則爲撲蔭開雷，在英國則爲愛德瓦特，辯利亞，在俄國則爲依茲伏而斯基。在依茲伏而斯基還沒有爲駐法大使之前，還在俄國外交總長任上的時候，在一九〇七年之末，已與英國駐俄國公使有一度之談判。英公使在這次談話中，曾暗示他說，如果現在俄國佔領近東時，在英國方面決沒有甚麼反抗之行動。

英國這種態度，應稍加解釋，英國對於近東事件是非常之注意的。因爲從英國到印度去的最短的捷徑，要經過近東一帶，經過近地中海底東部。因此，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英國已完全購買了蘇彝士運河的股票。所以在資產階級的法律關係上就成爲世界脈絡的主人翁。雖然這運河在資產階級的法學觀點上看來似乎是中立的，但是因爲股票全在英國人的口袋裏，實際上牠當然是屬於英國的了。故英國用盡了一切的方法來保護這個捷徑，不使被人侵害。因此，在英俄衝突的時期內，英國對俄國侵占海口之企圖是非常注意的，因爲這個佔是非常接近這條捷徑。假如俄國在他大尼里海峽有了海軍之後，他便可隨時出來打斷這條航路，使英國感到極大的困難。但在對馬島之役以後，俄國之海軍可說沒有了，從英國看

來，黑海中底偉大勢力，實際上是非常渺小的。英國的艦隊決不會懼怕那巡遊于西伐斯多泊爾奧地斯與新俄羅斯間的五六個陳舊不堪的鐵甲艦，在這方面對於英國可以說毫無危險。

全時，在十九世紀末，對於英國發生了別個極有力的競爭者，德國帝國主義之出現于世界舞台。在一八九八年，德皇威廉極奢華的巡行，到耶魯薩冷，沿路各城（君士旦丁，大馬斯克）到處駐蹕，並發表政治的演講。這些演講把他的政治伎倆，完全暴露出來。一言以蔽之，引起極大的紛擾，明白的證明德國準備侵略此地。特別明顯地就是威廉在大馬克斯的演說，他說及對回教之敬愛。他說：回教的人民，沒有比德國更好的朋友。從前英國人總自稱是回教的好朋友，這已經是英國人的特權。英國之所以要盡力的影響回教人，即因為回教是英國在印度之唯一柱石。現在德皇威廉居然說：德國比英國是回教人更好的朋友，這自然要引起莫大的喧擾。

從這個時候起，一八九九年德國在土耳其得到建築鐵路（從康斯坦丁堡到巴加達及波斯灣）的租借權。在一九〇二年，便有人開始寫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東西。羅爾勃出了一本小冊子，上面很詳細說明某國利用巴加達路來佔領蘇彝士運河及埃及。我不知道，這種東西，怎

樣會在出版界中出現。全世界任何一個批評家都會對著說，對不住，你如果要自思自想那麼天高地遠的事，無所不可，但是請你不要寫出來吧。你看，英國人立即就會讀到了。但羅爾勃大胆的寫了，德國人大膽地印了，正與威廉在大馬斯克及其他各處的演說一樣的大胆。

英國人當然大為震恐。英國人不準任何列強侵略蘇彝士運河及紅海兩岸的演說，亦散滿英國國會中了。英國很直接公開的說：這是迫得英國脫離愛和平的態度之惟一原因。而當時外交總長，蓋斯頓公爵，對於德國在波斯灣出現的問題，第一個聲稱以大砲為最後的手段，英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實在被這些計劃草案打擊了不少。

當時是在對馬島之役以後，一方面是連一個軍艦都沒有的俄國，而另一方面則有佔有巴加達路及用此路而進行侵略蘇彝士，埃及，及斷絕英印交通的軍事計劃之德國。因此，對於英國是非常顯明的了。無論俄國是怎樣的不好，但現在他已經是無利無害的東西，故讓俄國到海峽邊去，還不十分要緊。否則爪牙銳利的德國，若一侵入海峽中去，那就利害多了，這是絕對不容許的事情。因此很明顯的一九〇七年，英國駐俄公使給了依滋伏而斯基一個暗示說：你們如有意于海峽，那就請吧！我們並無絲毫抵抗。

一九〇八年二月，在彼得堡召集了一個會議，以史托里平爲主席，討論的問題正是與土耳其實行新戰爭的計劃。主戰者一方面是依茲伏而斯基，別方面則爲俄國總參謀部。俄國總參謀部以爲戰爭總是不可免的，土耳其聚集了無限的力量明天就會來進攻我們，因此我們應得先加防備。實際上，軍人之意見亦不一致，當總參謀長巴利村說到上面所述及的那段話的時候，陸軍次長普列王諾夫說：用什麼東西來戰爭呢？沒有機關槍，沒有子彈，沒有軍裝，沒有軍鞋等等。這是在革命之後的一九〇八年，在軍人中竟有這樣的分裂。史托里平在這裏頗有極大的作用，他是維德之後的專制政府中最聰明的人。史托里平極憤怒的在這個會議上說，目下一切關於戰爭的思想，是不健全的政府的病狂，直接的說，依茲伏而斯基與其同伴們，簡直是發病。他說：俄國剛從革命浪潮中振拔出來，養精蓄銳還需要很多的歲月，你們現在又想把他捲新的戰爭之中，我在一日決不能允許有這種狂暴的行動（史托里平常然沒有這樣說過，但他演說的意思是這樣）。當時史托里平是一個極有勢力之人，只要讀一讀尼古拉給他的信就夠了。這些信中尼古拉對史托里平的諂媚，令人驚心動目：『最敬愛的彼得，阿爾加得亦維哥，明天任何時間內是否可以來一次，若于你不方便時，那我可另定一個時間』

等，沙皇寫信給自己的總長這樣的謙遜。

上層勢力的相互關係既是如此，史托里平既已拍案宣稱：決不允許戰爭，說戰爭是不健全的政府的病狂，那當然就會明白當時戰爭所以沒有發生的原故。我在一篇記文中說過，史托里平之死，也許與他在近幾年中嚴禁戰爭的主張多少有點關係。但無論如何，在一九〇八年在政府中無疑的發生了一次大的變動，因為依滋伏而斯基由外交總長調為駐法公使，而史托里平之婿做了外交總長。在史托里平看來這乃是一個充分的保證，不至有任何愚蠢的計畫提出了。

因此在一九〇八年俄國帝國主義之根本問題，近東問題就已經放在當前了。

在史托里平死了不久之後，對土耳其新戰爭之準備又積極的進行了，計劃是這樣，引起巴爾幹之衝突，利用巴爾幹諸國錯雜的衝突，陷土耳其于極困難的境域之中（在武力上土耳其是當時極有力的強國），而以保護『同血同教的兄弟』的口實來干涉他，因為這才最容易適合俄國羣衆之社會心理。

這個問題比我所說的更要複雜的多。保加利亞仇視希臘人比土耳其人更甚，塞爾維亞仇

視保加利亞到此種程度，凡在皮爾克拉答所通過的提案，在沙菲一定加以否認。巴爾幹的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我們要使他脫離異教徒，并把他們在一個任務上聯合起來，是很不容易的事。這裏我們有很奇怪的關係，所有的談判不是由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政府直接談判的，而是在俄國駐塞公使尼克路獨夫及駐保公使加爾達維克間進行的。他們雖同是俄國外交部的俄國官僚，然而他們的關係常是很緊張的（純粹是爲了客觀的原因）。只因爲一個是在皮爾克拉答，一個駐在沙菲的原因，而且有一次幾乎使他們去決鬥，其至于這些緩衝國亦被『斯拉夫兄弟』間底衝突所薰染。但俄國總參謀部有一位大佐在這一點上確是一個很有天才的人物，他劃定了保塞兩國的疆界，使雙方在幾次爭論之後大爲滿意。俄總參謀部底大佐解決了這個保全和平的任務。這個分界是按照土耳其的領土而實行的。

在這時候大家都說：俄國時時關心保持歐洲底和平。我們當然會估計到這種情況。完全的和平，誰都不願戰爭。而同時俄國總參謀部底大佐坐在沙菲，面前放着一張土耳其的地圖，他在這圖上分割疆界。這歸塞爾維克，這歸保加利亞，不破壞和平怎樣做呢？這一點，大佐是不管的，因爲他的作用純粹是技術上底作用。從來定立了保塞協定。

以後，俄國總參謀部大佐分割土耳其的計劃，是很明白的了。當彭恩開爾看見了這條約驚呼道：『這是戰爭的武器』！這保塞『和平』條約（當然對於土耳其疆域是絲毫沒有提到的，因為這是條約秘密之部），是新戰爭底準備，這戰爭在一九一二年秋天就真的開始了。

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羣眾所歸的土耳其，總以為他的武力一定能夠很利害的擊敗敵人，不料土耳其在戰爭開始時就被人擊得粉碎，軍不成軍。君士坦丁堡亦為保加利亞所佔領。君士坦丁堡是應該屬於俄國的，不是保加利亞的，亦不是塞爾維亞的。全時保皇菲遮南已經定製了希臘式的皇服，以便進駐君士坦丁堡之用。這裏就發生了空前的混亂。保加利亞是俄國要救護的國家之一，現在則無須援救了。

其結果則必須持取非常手段。羅馬尼亞被人暗示起來反對保加利亞，因之保加利亞很快的平靜了。其他的舉措也不能再事進行。因為棋局已經全盤的混亂了。

這樣一來，在東方引起獨立的戰爭的企圖，於是便沒有成功，但是這種思想還依然存在，俄國總想利用一切的口實藉以激起東方的問題。如于一九一三年末在重新恢復的土耳其

軍中發現了以德人利門風為顧問時，居然在聖彼得堡召集了多次的會議，在這會議上總想利用這一點來恢復俄土底衝突。討伐君士坦丁堡這問題，在當時已經是很實際的了，并已確實的決定那師軍隊應派出去，在什麼地方上船，多少時間等等。除了這個提案之外，還有一個補充提案，這補充提案是當時我們海軍官佐所做的，其目的是在戰爭宣佈之前，毀滅土耳其一切的軍隊。土耳其是有遠見的人民，他亦準備了而且得到了兩隻大的鐵甲艦。當時俄國在黑海中還沒有一隻鐵甲艦。俄國永遠是遲緩的，對馬烏之役遲了，這裏又遲了。俄國的鐵甲艦，正在製造之中，而土耳其却已經有兩隻了。俄國乃開始的積極起來購買外國造船廠中所造好了的鐵甲艦。買到四隻，但是怎樣運到黑海去呢？按一八四一年底和約，海峽不準軍艦通行，所以這鐵甲艦是走不進黑海的。他們應該集中在地中海以便搗亂土耳其之後方。但是他不能直接幫助黑海艦隊。假如要他能夠幫助黑海艦隊，則必須佔領海峽，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後英法在一九一五年的經驗，就證明了這點。這裏在俄國海軍人員腦袋中，就產生了一個大計劃。利用最新的技術，在西代斯得堡建設一個俄國水上飛機場，同時俄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海軍偵探應該小心的注意土耳其兩個軍艦的行動。因之，整個的馬拉馬爾海及海峽

便會分成許多的方塊（大約有一百方塊），每塊有一號碼，而俄國君士坦丁堡公使館在不克地爾的無線電站應該不斷的把土耳其鐵甲艦所在地的號數報告於西伐斯得堡，譬如五號，土耳其軍隊就在五號一方塊內，十七號則在十七號內，二十三號則在二十三號等等。

同時在這外交斷絕之時，不克地爾的無線電站，就可以無線電通知西伐斯脫堡飛出去，投擲在這兩個軍艦上。戰爭還沒有開始，土耳其還不能有什麼準備，因此鐵甲艦便可以炸燬了。這個計劃以後並不會實現，在俄國這樣技術落後的狀況之下，這個計劃是否能順利執行，當然是很大的問題。大概飛艦所飛去的地方不是他所應去的，炸彈則擲到不是他所應擲的地方去。除了羞恥之外，什麼都沒有。然而這計劃的本身從外交的觀點上看去却是很有趣的。試看俄國以前怎樣的怒罵日本人之無恥，日本人之進攻旅順海口，陰狠的進攻等等，後來俄國自己亦學會了。俄國並不是鐵子，完全依照日本人進攻旅順口底方法，甚至還更利害的方法，去消滅土耳其的軍艦。這個計劃底特點，即在他表示出了俄皇政府爲了海峽的問題，籌謀得何等深遠周到。實際上，俄國後來並沒有舉行單獨的東方戰爭，因爲他全時的陷入了世界大戰底漩渦之中。

英國在一九〇八年雖曾派遣自己的公使，暗示俄皇侵略海峽，英國決不干涉。然英國政府對於俄國奪取君士坦丁堡底苦心，曾經好好的利用了。

英國政策底變更，其主要的我們已經看到了。我還要再詳細的說明爲什麼英國這樣善意許俄國去佔海峽。在由他大尼里到地中海去的口子上，有四個小島，替納多斯，依伯羅斯，立姆拿斯，與薩膜弗拉克斯。這些島在英國人手裏。在舊的砲術之下，這些島是在他大尼里海峽中十五俄里以外，他們是毫無危險的。因爲舊的大砲至遠只能射四俄里，但自射十五俄里以上的新大砲出現以後，情勢就完全不同了。這些島上英國的砲台很容易封鎖韃靼海峽之出路。俄國在黑海之外又得了幾道溝渠，但是他在這些溝渠中航行是可以的，然而沒有英國人之允準，他就不能出這溝渠一步。因此英國深謀遠慮的佔了這些島嶼，因爲從戰略上觀察，則問題不在他大尼里海峽而在這些島嶼上，因爲如果誰佔了這些島嶼，誰有現代的技術，誰有大砲，那他大尼里海峽便在他的手中了。因之英國能夠這樣靜靜的對俄國說：博斯福爾，他大尼里海峽都給你吧！但是那些島嶼則又當作別論。

英國對於俄國侵略海峽的軍事行動，似乎是很安靜的，全時他又想使俄國加入他的聯

盟，使他也能出力去包圍德國。德國是英國自在十九世紀末起，所日夜懸念不安的。

無論如何在這個環境之下，英俄同盟在俄國方面是逐漸成爲不可避免的。一九一四年五月已經在進行英俄海軍協約的談判，而俄國則分外的積極，熱心，急急地想參加這個海軍同盟。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俄國海軍總長已提出集中英國商船於波羅的海以便轉運俄軍到保米郎尼亞去的問題。保米郎尼亞是普魯士之一省，在柏林之北，沿波羅的海岸。俄國的公使皮金杜路夫，的確曾經勸告他們不要說保米郎尼亞，因爲英國人是頑強的民族不受急驟的。俄國的海軍人員，亦不會多說關於在保米郎尼亞上岸的事。但是非常有趣的，在一九一四年五月，誰都料想不到德國會進攻俄國的時候，俄政府却預計到怎樣取得輪船來抵抗德人。同年法國駐俄大使報告自己的政府，他與一個俄國內閣要人談話，所談的却正是瓜分奧國。在這次談話中，那位內閣要人，所表現的希望，就是將來的奧國怎樣處置的問題。我們知道每個皇帝都是要死的，皇帝死了，皇儲可以斷位，奧皇亦有皇儲，那有什麼問題呢？爲什麼內閣中的要人對於奧國將來的問題這樣的苦心焦慮呢？那是很自然的，奧皇死了之後，奧國的一部份（卽加利村及巴加文兩處）就應該歸屬俄國了。這個內閣要人舉了許多的理由，歷史

的。經濟的甚至宗教的理由；那裏是正教派，俄國亦是正教派；他們所通行的語言是俄國所禁止的烏克蘭語，這些理由，無非是想把這兩省歸併於俄國，這亦是在一九一四年五月。愛和平的話，在當時說得非常漂亮。當時德國駐英公使利哈諾夫斯基稍有所聞，便質問當時英國的外交總長克利約道：你們與俄國關於海峽的問題訂了些什麼條約，他便瞪着眼兒很真摯的說：任何關於海峽的條約，自拿破崙戰爭之後，幾乎完全不曾有過。真的，談判並不是關於海峽，而是關於波羅的海與西米耶尼亞的問題。同時則致電彼得堡：「這顯然是尊處空談過甚之故」。自塞爾維亞底審判底黑幕揭破以後，暗殺菲遮南事件的曲折于是更加複雜。菲遮南是法郎士越南底皇子，菲遮南被刺後，因此奧大利于是有充分的理由給塞爾維亞一個最後的通牒，塞爾維亞回答道：願意聽從，但不能如奧大利亞所要求的一樣，戰爭于是便從此開始了。

佛郎士·菲遮南底死，在好戰者看來是一個非常之機會，因此在那些『宗教傳說』的人看來（他們以為戰爭是由德奧互相約定而開始的），這個問題却是很難解決的了。他們只得說威廉為要作戰起見，特別殺了自己底好友，這是極少真確性的。不久之前，當時塞爾維亞

的偵探長對於這件事情的解釋，確是放了一線光明。在一九一四年五月，這月比一九一四年七月（即宣戰之日）更要多事，在皮而加達得到由俄總參謀部送到塞爾維亞總參謀部的一個秘密電報，說威廉與菲遮南在加拿樹得會面之後，決定在最近時間內進攻塞爾維亞。提議者為菲遮南，他之到巴斯比亞，表面上雖為閱兵，實際上則是進攻塞爾維亞。閱兵本身即是集中軍隊于塞爾維亞邊境之掩飾。得到此項消息之後，塞爾維亞總參謀部慌急起來了，怎麼辦呢？因之就產生了暗殺佛郎士·菲遮南的計劃。用以破壞他的攻擊，以便取得一些時間求援於俄國。在塞爾維亞熱烈的青年民族主義者之中，自然不難找得一個人。派至沙辣浦去刺殺菲遮南，以後的事變就走入正軌了。菲遮南與威廉是否準備進攻塞爾維亞呢？這是不很明瞭的。但無論如何俄國總參謀部手中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挑起戰爭的事實。如塞爾維亞人在奧大利境內殺死奧大利皇子這類的打擊，奧大利是不會承受，而且在全世界任何強國亦決不能忍受的。當然，奧大利要給塞爾維亞以哀的美教書了。

暗殺菲遮南，是俄總參謀部所教唆的。這是很顯明的，因此對於誰先開戰的問題的答覆也是很簡單的了。很明顯的，在奧大利最後通牒之前兩天，法國駐俄公使巴立阿樂與喋山國

的公主們，已經有一次很有趣味的談話，這公主之一就是後來俄國總司令『大』尼古拉之妻，這時法國大總統彭思閣雷剛到彼得格勒，這許多『黑山婦』說：『你們知道麼？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的神聖的時代呢，明天在檢閱時所奏的只有法國的行軍曲，洛倫行軍曲與復仇行軍曲（即與德國爭愛爾薩斯，洛倫），我今天得到父親的密電，他告訴我到月底要有戰爭了』。

這在奧大利最後通牒之前兩日。誰都還不知道，奧大利通牒之內容是什麼。而著名的嘿山國的侯爵尼古拉，已經知道了月底將有戰爭。

請讓我以這小小的逸話，來結束這個引起戰爭的外交衝突。『我們知道，假如要找戰爭的直接罪人，可以不用在柏林甚至在倫敦找，應該在彼得格勒找。尼古拉第二便是斷送千百萬人命于世界大戰中的首魁』。

或許有人要問：這僅是政治方面，狹義的政治方面罷了。這些政策有沒有『經濟的基礎』呢？俄國爲什麼要參加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這是很明白的。俄國爲什麼，不站在德國方面，而要站在德國的敵人英法方面呢？這是否僅僅只是英法外交手腕所造成的呢？抑或是另有什麼其他的客觀條件推動他到那方面去的呢？

首先要注意：俄國帝國主義，這句話用之一九〇五年以前是不正確的，不對的，而在一九〇七與一九一四年間已經是真實的東西了。無論如何，是可以說的了。俄國的銀行資本之偉大的發展，及銀行資本對俄國工業的統治，這便是帝國主義的表顯。在一九〇九年正月一日銀行所有的基金共二萬二千二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一四年正月一日則為八萬三千六百萬盧布，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六。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二年間俄國銀行之基金，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德國則僅二百六十，俄國銀行資本之發展速于德國。同時在銀行手裏集中了百分之八十六的鐵工業，百分之七十七的煤礦工業，百分之八十六的煤油工業。

銀行管理俄國資本——以存款的形式而來的，在銀行中集中了一切由俄國麥類交換得來之大批金錢。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四年，存款從九萬七千六百萬增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但是銀行本身却不在俄國人手中，大部份底股票（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在外國人手裏，使外國銀行成爲俄國銀行底指揮者，而俄國之工業亦在其指揮之下。我們應該知道，在每企業的股東大會上，股東決不會全體到會的。普通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有時還要少些，因此只要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就可以指揮該企業了。俄國的

銀行正是傀儡一塊，在柏林與巴黎抽線的時候，他便舞蹈起來。俄國的銀行一擺動，俄國的工業也跟着他舞蹈起來了。『紅色文庫』有一件準備發表的文件證明在一九一四年前頓河流域的煤礦被法國所管理。路寧說：

『俄國在戰前共有四十六家獨立的商業銀行，兩個大的財團，總的管理在外國財政資本手裏。其他一切『小的』銀行的比重是很少的，除了莫斯科幾個及彼得格勒一個銀行之外，這些銀行可說等於零。』

再補充一點，這外國財政資本是從兩方來的：俄國銀行的一派接近巴黎，別一派則接近柏林，兩派不斷的為勢力而爭鬥。而在這個爭鬥中顯然是法國得了勝利，且數量很少的英國資本，現在亦與法國聯合起來了。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中俄國新銀行的股票，百分之八十一又五，銷售于德國，法國只有百分之十八又五，英國的財政資本在這幾年中完全沒有。而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間，則俄國新銀行股票在德國銷售的止有百分之三十八又八，而法國則有百分之五十六又八，英國共百分之四又四。這是英國財政資本在俄國的第一次。在戰前倫敦巴黎已經把柏林從俄國財政資本的範圍中趕了出去，故束縛俄國的外資正是協約國

的資本，這種束縛到一九一七年克倫斯基時代爲甚。這還是在五年前已經表顯出來了，外國資本在少數股票的助力之下，完全統治了俄國的市場，而且能夠迫着自己的『奴隸』去做一切。資本主義的俄國，要從戰爭中挽救出來早已不可能了。只有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俄國才從戰爭中逃將出來。

第十章 帝國主義戰爭與俄國經濟

我對於立憲民主黨曾加以分析，說他是俄國資產階級的極左派。這個極左派本身大多數是由著名的知識份子，大學教授、名醫，技師等等組織而成。他是與俄國當時大的（銀行的）資本有密切的關連。至於右於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的政黨，第一便是那莫斯科絲織工廠主的進步黨，次之則為十月黨，該黨一方面代表高利貸資本，另一方面則代表重工業。至更右的政黨，那無容去說他了。

很明顯，戰爭牽動着俄國資本主義整個的（工業與商業的）切身利益，那麼各黨派對戰爭應該有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成為俄國資產階級的社會輿論。只有立憲民主黨動搖了一

分鐘，這也許他們想到以前曾希望左派幫助的原因。這真正只有一分鐘，當右派攻擊立憲民主黨及恐嚇他要封閉『言論』報的機關時候，立憲民主黨亦同音合拍地奏唱起來了。一切資產階級的出版物都是同調的，友善的同一方向的工作着。我永遠不能忘掉我流亡於巴黎時，俄國寄來的報紙所給我的感想。在我一生中其厭惡無甚於此者。這種感覺是一種天天加甚的道德上的厭惡的感覺。而在我的國際主義之下，有時我甚至希望德國趕快打勝，讓他來清除俄國資產階級報紙上的一切醜態。這是真正的卑鄙齷齪，因為這裏我們後來曾發現有與巴黎警察廳有關係的份子參加在內。著名的皮洛夫是『俄羅斯輿論』的通訊員，是報紙上愛國主義的主要者傳播之一。我們在巴黎警察局找得了皮洛夫給巴黎警察廳的一封信，要求爲巴黎警察廳效勞。這請求沒有接受，巴黎警察廳決定不收買皮洛夫，大約因爲他不怎樣努力。這人出賣未成，這就是掌握當時俄國社會輿論的人物。這裏自然形式上亦有廉直的人如米留可夫，但是他在政治上則不甚正直。他們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與他人同意合唱。他們也許少好一些，但亦叫着『萬歲』，唱着『天佑沙皇』。他們欺瞞廣大的讀資產階級報紙的羣衆，而他們憑信着資產階級報紙上說的是真話。這樣的人，至今還是很多，很多人還想資產階級的

報紙能够說真話，後來在戰時，我在比較俄國報紙還要好一點的外國報紙上，我得許多荒誕無稽的統計（如德軍之人數等等），簡直就是信口造謠。我在自己文章多次曾指出英法報紙這類謠言。而可憐的俄國資產階級，可憐的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竟會完全信任這報紙上所寫的東西。

試看俄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在此種社會輿論的影響之下，究竟幹了些什麼樣的把戲，我要讀一段很長的摘錄是很有興味的，這是從當時俄國報紙上摘來的：『莫斯科十月九日（一九一四年）上午十二時，在莫斯科大學新校舍內，于加勃魯可夫講授講演之後，曾有學生露天大會通過學生對於號召學生從軍命令必要表示態度底決議。兩時左右，在莫斯科大學新校舍一號教室，大學教授在自己的演講中，說明他對歐洲與俄國目前所發生的事變的觀點，同時并談到國務院號召學生從軍的命令。當時有一學生某不知道爲什麼資產階級報紙把眞姓名隱藏了），站了起來并且演說道，學生們都是很狂熱的歡迎號召他們保護祖國的命令，學生們將勇敢赴敵，到會學生遵照演講者的提議高唱『永久不忘』之歌。全體上操場排隊出發，口唱『天佑沙皇』與『上帝救世』歌。學生手中高舉着沙皇與皇后的像片，口唱國歌，在熱

開的街市中遊行之後到市政府去。莫斯科市長阿得利亞諾夫將軍站在露台之上，當國歌完了之後，一個學生向市長致詞說：『市長大人，讀了政府號召高等學校學生從軍的命令之後，各大學學生謹一致愛國之熱忱請大人將我輩效忠祖國及準標從軍之誠心，轉告於吾主萬歲之前。學生們願與我軍同時長驅擊破強敵；並望我們與德人作戰時，不在沙爾附近，而在柏林城下』。莫斯科市長阿得利亞諾夫將軍回答道：『我今日即以爾等效忠祖國之誠心及希望入軍之熱忱轉達皇上，我們共同的希望着，我軍及爾等均為佔領柏林之英雄』。阿得利亞諾夫之演說為狂熱的呼聲所掩：『萬歲！萬歲，到柏林去！上柏林去！』

這次示威遊行不是唯一的一次。莫斯科大學學生示威之後，有交通專門學校學生之示威，以後則有商業專門學校之示威，最奇特的便是學生羣衆在紅場（就是現在我們開慶祝大會的地方）歡迎塞爾維亞貴族米哈依爾的時候，『學生在貴族米哈依爾的前面，祝頌英雄的塞爾維亞、貴族米哈依爾感謝學生之注意與厚愛』。當時報紙上雖沒有這樣寫着，但他們彼此祝福，那確實是有的。這樣一來莫斯科便充滿了令人憎惡的青年的示威運動，這許多青年并且還真實的以為他們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因為他們受了當時資產階級報紙上謠言的迷惑，當

時一份工人報紙也沒有。

非常顯明的，一般資產階級的老輩在起初時，較之那些青年人，那些讀報讀到俄軍前進，俄砲術遠勝於德國等等消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要穩重得多。小資產階級羣衆永遠要比那些老成持重的人來得狂暴。當時那些老成慎重的人，其穩健的程度，竟被人罵爲賣國賊，如廠主顧順便是一個好例。顧順是一個雙料的愛國主義者，他是俄國的工廠主，又是法國人，而俄法當時在戰爭中都是站在一方面的。大資產階級在初期還要穩健得多，大學教授雖然亦贈效忠祖國的禮品給尼古拉，但是這已經是戰爭開始後第二年的事了。這就是說：比青年要落後一點。應該補充一句，就是剛復不馴的人，在學生中也有沙若夫大學及少數莫斯科大學學生，曾經反對過這種示威。有封很好的抗議書，甚至在『俄羅斯指南』上登載過。我之所以提及這點，就是不要以爲在當時整個的學生羣衆中連一個明白的人都沒有。重複一句，這許多讀報的青年，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其愛國心之表露，較之大資產階級要早得多。大資產階級後走上愛國主義的道路，只有當他們明白瞭解戰爭對於工廠的利益之後，在他們明瞭戰爭本身大市場的時候，才會走上愛國主義的道路。戰爭是一個極大的市場。戰爭

的時期雖短，但這短期中的利益有等於數年之所獲。

試看開戰後第一年各工廠的利潤罷。土耳其工廠戰前每年平均利潤為一百八十六萬盧布，在開戰之第一年則為八百三十九萬盧布。加爾鐵廠戰前利潤為二百十七萬盧布，開戰後第一年則為四百七十二萬盧布。沙爾莫夫廠戰前利潤亦為二百十七萬盧布，在開戰後之第一年則為三百七十九萬盧布；在加皮爾廠戰前為一百四十萬，開戰後第一年為三百三十四萬。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新的工廠，新興的股份公司，將如雨後春筍之怒發，在一九一五年中，共創設了一百三十六個股份公司，計資本一萬八千九百萬盧布。在一九一六年至十月一日止，共創了一百五十九個公司，計資本二萬一千萬。這些資本究竟怎樣分配的呢？下面有一個關於一九一六年所設立的股份公司的表。在這表上，有新創立的公司，亦有資本增加的舊公司。例如以紡織工業為例，則新公司僅三個，增加資本的舊公司只有十二個，資本的比例如下：新公司的資本為二百六十萬，舊公司所增加的資本為三千一百萬。試以五金工業為例，則新工廠為十七，增加資本的舊工廠則為廿一，新工廠的資本為二千五百五十萬，舊工廠所增加的資本為三千八百五十萬，較之紡織工業多得多了。其次則為與五金工業有連

關之鑛業，新的工廠二十個資本增加的舊工廠二十三個，新工廠的資本四千五百萬，舊工廠所增加的資本為六千三百萬。最後為準備一切爆發物之化學工業，新的七個，增加資本者十個，新工廠的資本一千四百四十萬，舊工廠增加資本六百萬，你們看，廣大羣衆所需要的消費品，在戰爭中得到最少，但他亦獲利的，因為兵士不但需要槍械，砲彈……等等，而且也需要穿衣服。監督處預備了大批的棉織品，至一九一八年春，莫斯科蘇維埃慎重地討論了是否要把這些紡織品推行到民間去的問題，因為當時工業品恐慌，人民多半赤身露體無衣可穿，而莫斯科的監督處堆棧中却還存有一千萬俄尺棉織品——一個極大的數量。以後這些棉織品都供給了革命後的紅軍，且用了很久。紡織工業在戰爭的影響之下發展較小，五金，礦業，化學工業則大盛。俄國工業的一般地生產力增加了。試以一九一三年為標準，一九一三年生產品的總值為五十六萬二千萬盧布，二年之後，在一九一五年已為六十二萬五千萬，而一九一六年則為六十八萬三千一百萬了。

俄國資產階級所得的利益，不僅是從戰爭本身得來的，並且還從俄軍失敗得來的。這一點，對於估計一切愛國情緒，是很有興趣的，在戰爭的政治史上，也很值得加以指明。這是

極有趣的一點，我們五金工業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月不但不發展而且停滯了，這亦可拿彼得堡工人數量來證明。在一九一四年彼得堡的工人總計二十萬八千人，而一九一四年九月則僅有十九萬七千三百人，工人都應募從軍去了，而對於工廠都沒有多大妨害。因為工作很平靜的。我們的定務局確信我們對戰爭的準備是很充分的，而「聰明」人都是以爲戰爭的時間是極短的，在兩三個月之內，我們一定可以把德國人打得粉碎。縱使打不碎的話，那到一九一五年正月一日時德國人就要餓死了，因為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把最後的一塊麪包都吃完了。因之砲務局準備了比日俄戰爭多三倍以上之的砲彈，總以爲對戰爭之需要完全充足的了。所以當時有些最蠢的私人製造所向陸軍部包辦子彈，而以大貴族西爾蓋，爲首領的砲務局則回答道：「還沒感覺得砲彈之缺少」。當槍砲開始射擊之後，才知道我們的防務局的估計是太樂觀了。在八月之末，我們大砲中所放射的砲彈，已經是第三次的儲藏品了，在當時總參謀部長耶奴書開維奇給陸軍總長沙火米利諾夫的信件中，便已有砲彈不足之虞。我們的大砲不夠，只有少開火，然而這對於軍隊却有莫大的影響，我們於此就可知當時缺乏子彈的悲聲是與日俱增的。因此便迫得沙火米利諾夫走出了他的溫暖的辦公室，奔波于各工

廠主之前，請求他們製造子彈。

俄國軍隊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冬起所受子彈及火藥的恐慌，是一九一五年夏俄國潰敗的主要原因。因為在德國三千發射擊時，我們只能回以數百發。此種情形，不但繁盛了我們的工業經濟，而且還增加了他們在政治上底比重。砲務局把砲彈不足這點秘密隱藏了很久。米留可夫說：他似乎在一九一五年正月才第一次聽到這個砲彈是恐慌，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我上面已經說過，耶奴書開維奇與沙火米利諾夫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末已經在書翰中寫到了這點。無論如何，巴黎至遲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時，也已經知道了，同時，我們在巴黎的僑民亦知道了。因為那時正俄國的軍事代表帶了俄軍在戰場上狼狽不堪的消息到巴黎去的日。從法國派了專門技師到俄國來指導俄國的兵工廠，發達俄國的化學工業到必要的程度等等，我們關於這一點在十一月間也知道了。當一九一五年五月麥更靜開始進攻時，當麥更靜以其著名的三千尊大砲的聯隊向前進攻時，這裡已無從掩飾，只有在全世界前面承認，俄國祇以一百尊大砲去抵抗德國三千尊大砲。在這種條件之下，非但不能進攻，而且不能堅守。俄軍開始從蓋利村後退了，被虜了百萬俘虜，失了濠溝等等，俄軍完全潰敗了。若以日俄戰

爭中的奉天之役來與一九一五年戰線上的潰敗相比，奉天之役只能算是一場小戰。這是不能掩飾的。一九一五年夏在彼得堡舉行了國防會議，有廠主工業家及國會議員等等之參加，當然這裏也有政府指派的官僚，然而大多數則為專門家，博學之徒。自一九一五年中起，俄國工業資產階級，自一九〇七年羣衆運動失敗後，被打擊了的工業資產階級又捲土重來了。他實際上是當時底主人，後方之主人，軍隊供養之主人，而我們可知道，這時軍隊的供養是一切的基礎。

路得像哥在其回憶錄中說：在特別會議舉行後不久，前線上已經充滿了子彈，同時工人親手在子彈上刻着『請勿顧惜子彈的字樣』。這一點是否真確，現在無從知悉。這裏曾經向外國去定貨，由外國運到大量的子彈。在外國及俄國之間會有一定的分工，要用大量的子彈作進攻時，由外國工廠供給。日常的需要，自利加至巴古的戰線上的防禦品，則由俄國工廠供給。俄國工廠怎樣的供給，數目字我上面已經說過。這樣一來，一九一五年夏，資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是軍事經濟的主人翁與領導的力量了。這就是一九一五年夏天末的事實。從政治觀點看來，所以沒有多大的意義的緣故，因為尼古拉第二解除了尼古拉維奇的總司令之

職，因他是戰敗之罪魁（老實說，他並不會比其他大公族的罪來得大）。此時俄國在實際上于是便成了拉斯普丁底專制，因為尼古拉是他妻子手中底玩物，而她呢，則直接的說，她為拉斯普丁所指揮，她解釋這一點當然是很神秘的。事實是這樣的，拉斯普丁指揮她，而她則指揮尼古拉。話雖如此，實際上戰爭的經濟命脈，却握在資產階級的手中，所以她才與拉斯普丁的統治周旋了許久。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資產階級想依賴羣衆。很可注意的，這種聯盟在一九一五年又重複了一下。資產階級又想依賴羣衆了，因此我們必須要費幾分鐘來說一說大戰前數年羣衆運動的狀況。

我不是要詳細說明這時代的工人運動，我在這裡只是要說工人運動自一九一一年，特別從一九一二年四月已有偉大的發展了。一九一〇年共罷工二百二十二次，罷工人數四萬六千人。一九一一年罷工四百二十二次，罷工人數二十五萬六千人。一九一二年罷工二千一百三十二次，罷工人數七十五萬人。一九一三年罷工二千一百四十二次，罷工人數，八十六萬一千人。四年中罷工人數增加了二十倍。我們看，工人運動是這樣地發展！至一九一四年夏天工

人運動又達到了高點，一九一四年五一罷工者在百萬人以上。這是一九〇五年以來未有的現象。當讀到資產階級報紙關於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各處事件底輕描淡寫的電報時，就不禁使我們（海外僑民）回憶到一九〇五年。特別是彼得堡，一九一四年夏，簡直完全回復到一九〇五年的形式。在熱度上在形式上等等都感覺到真正革命的爆發。一九一四年時，即我們中最悲觀的人，亦感覺得二次革命不遠了；他已不像我們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所猜度的那樣遙遠。

這一點，不僅我們知道，而敵人方面也看到了。這就是俄國資產階級之所以在握取戰時經濟之後，日夜懸心于吸引工人羣衆到自己方面去的緣故。資產階級所發起的軍事工業委員會是要叫工人代表參加的，而布爾什維克黨當時却曾堅決地反對工人代表參加此委員會，我們指明，參加帝國主義的戰事，對無產階級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事。這一部份工作，只在最先進的無產階級中，聖彼得堡的無產階級中，做得有點成效，然也不是盡善盡美，在聖彼得堡很早很早就進行了反戰爭的煽動。而在維波爾格區則在戰爭剛宣布之後，尚在國會召集之前就已經發表了反戰爭的宣言。隨後布爾什維克黨彼得堡委員會也跟着發了宣言。在彼得堡雖

有此種煽動，然而，也只能以比較的多數（九十一反對八十）通過拒絕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決議，莫斯科的無產階級並沒有鼓動起來，因之他們便參加了軍事工業委員會。資產階級不願工黨的意志如何，居然把他在一九〇五所玄想的那種聯盟實現出來了（這種聯盟也可以說經過工黨的屍體而實現的，因工黨在國會中底黨團已經被捕，并須準備就刑。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後，對專制政府及工人階級的關係彷彿是得了復仇的勝利，可是這復仇的時期是如何的短促。

就在這裏資產階級也失於算計了。爲要瞭解爲什麼會產生這類的事變，那我們就必須從另一方面來觀察戰爭時期的經濟。我們剛才已經看到戰爭是給俄國工業一種豐肥的食料。但是這正是和一切的刺激物一樣。他能夠暫時的興奮人的機體，但同時却又破壞了，損害了這個機體的基礎。我們現在就應該轉過來觀察這一方面。第一點就是戰爭的組織者（英國人除外）是極少遠見的人——沒有預先看到戰爭時運輸的影響。這點我應加以極大的注意，因爲他是一切東西的基礎，特別是在俄國。俄國幅員廣大，鐵道稀少，運輸實有極大的作用。因幅員廣大，鐵路稀少之故，運輸的忙碌，實較他處爲嚴重。

如果我們從這方面來觀察戰爭的影響與戰時的經濟，則情況如下：戰爭使得運輸工作增加到極大的範圍，因為大的軍事動作必然地要調移軍隊。實際上，這時候的戰爭不僅在戰國的戰線上，就在任何戰線都是一樣，是一種鐵道的遊戲，而德國之用鐵道正是無上好手。因為德國的鐵道比俄國發達得多，故在緊急之時，軍旅之增加正要使敵人覺得草木皆兵之慨。在兩三天之內，就可以把九百里內的軍隊完全調動就緒了，鐵道是現代戰術必要之一部份，但是這需要極大的運輸工具及燃料等等的支出。這就是說鐵路要比平時多做無限的工作。若以火車所走的道路來計，則一九一三年為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鐵道里，而一九一四年，開戰後第一年，同時不是全年而僅半年已為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鐵道里，至一九一五年則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九一六年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因此，這裡便增加了一倍半以上。這就是戰爭對運輸的第一個影響。運輸不得已只有加緊工作。當然，車箱之裝載量，亦必隨之而增加。在一九一三年每天的貨車為五萬八千輛，一九一四年為四萬三千五百輛，一九一五年為七萬一千輛，一九一六年為九萬一千輛。當然，車廂每日夜所走的亦照此比例而增加。在一九一三年平均每日夜走的路為三六八、〇

〇〇鐵道里，一九一四年則為四一二、〇〇〇，在一九一五年為六三〇、〇〇〇，在一九一六年至八〇〇、〇〇〇鐵道里。這樣一來，交通的工作就緊張了。很自然的，在這種狀況之下，供給運輸的工業亦應發達至同樣的程度，但是在這裡情況則完全不同。無論如何，在戰爭中最重要的是砲彈。故以前那些供給交通用的機器製造廠，現在都去準備砲彈去了。結果是這樣：沙爾莫夫廠底機關車的製造，一九一三年為一百七十，一九一四年為一百〇七，一九一五年為一百一十，稍為多了一點，一九一六年只有六十四了，一九一七年却只有五十五了。並且在一九一三年，壞機關車之比例不到百分之九，而在一九一六年則為百分之十三，一九一七年則達到百分之二十三、四。

供給運輸的工業，修理車廂，製造及修理機關車等等完全縮減少了，同時運輸的工作，却大為增加，此外，機器製造業并且還要把價值三萬萬元的器具，交給軍事當局——定大批的機器，以前大部份是供運輸工業之用，現在則去準備大炮與砲彈去了，這當然要使鐵道的運動感受極大的困難。

如以一九一三年每月所運貨物之平均數為一〇〇，則一九一四年七月所運之糧食僅等一

九一三年之九二，八月爲三五，九月爲四七，十月爲五八，十一月爲五九，在鐵道上關於糧食之運輸，永遠沒有達到和平時期的水平線，永遠在百分之六十以下，這就是運輸破壞對於人民直接供給底影響。其結果則生活品價格必然要增加，而且出人意外地迅速的增加了。試以莫斯科市場上牛肉之價格而言。若以一九一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之價格爲一〇〇，那二月三日則爲一一九，二月五日則爲一四四，不到一月，價格漲了一倍半。這就是戰爭時市品價格底影響。蛋的價格從一九一四年四月至一九一五年四月增加百分之六十一、五，糖的價格在一九一四年九月每普特五盧布五哥比，十月便爲五盧布四十哥比，一九一五年五月爲六盧布四十哥比，糖的價格每月增漲。我所用的是批發價格。零售的價格，其增加更大。零售商人也是一樣想儘量的抬高價格，因爲他賣了這批貨物之後，買進了第二批貨物時，價格已經漲了許多了。最主要的麪食食物的價格如下：一九一四年七月麪粉的價格爲一盧布十五哥比，八月——一盧布二十二哥比，九月——一盧布十八哥比，十一月——一盧布十五哥比（這是受新收的影響）。一九一五年七月一盧布四十三哥比，八月一盧布四十八哥比，九月一盧布六十個哥比。在一九一五年則甚至連新收對價格亦無影響了，九月中價格還是繼續增長。運

輸的混亂，糧食裝載之縮減，其影響於城市供給，一至於此。

因此首先使減少了城市中的麵粉的供給，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聖彼得堡麵粉之供給只有常時百分之九十一，而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在一九一七年正月用了種種的方法才達到百分之五十七。現在且舉一個拉斯普丁的聰明與熟練的例子來說，拉斯普丁確實預見了這一點，并想設法防止他。在尼古拉的妻子給尼古拉的信上說：拉斯普丁怎樣的終夜皇皇，口中不絕的嚙語，車站，火車，罷工，而其結果則有所謂『糧食週』的命令，就是說在一星期之中某幾條路上專運糧食，這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在一九一五年時，拉斯普丁便已經見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滑倒羅曼諾夫朝的西瓜皮了。自然，這許多事情，必然要影響到工人羣衆之心理。假使在戰爭開始第一年的夏天，學生對市長利亞諾夫談話的口吻，是以前那樣。在一年之後，甚至還不到一年，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工人便對副市長說：『在彼列烏勃來盛斯基市場上，爲了物價高貴的緣故，集了一大羣婦女，當馬得爾先生嚴厲的對她們說話時，高漲的情緒立刻就遷到警察身上去了。一個女子以石擊之，她並被羣衆由汽車拉出來，擁向河邊。同時馬得爾先生還不斷的要求：『姊妹們！請赦宥我對你們的行動……等等。』爲了

這件事情轟動了一些軍隊來。但是婦女們很大胆走到兵士面前高叫道：「難道你們沒有妻子麼？她們的生活同我們一樣難堪呵！槍殺我們，就是槍殺你們的妻子」。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不列斯，格魯精各地，那裡有一個舖子賣了牛乳給此人，而不賣給別人，結果把他家的玻璃都打碎了。」

在一九一五年春工人羣衆的心理，在戰時經濟的反面的影響之下頗爲憤激。因爲這些羣衆雖在當時極端秘密的情況之下，已爲布爾塞維克所組織起來了，所以常表現着有組織的行動，這是一種對政府非常危險的形式。當時的秘密到這樣程度，我可用一個事實來說明，即聖彼得堡委員會常在小池中開會。在彼得附近有很多的小池，這是唯一毫無危險的地方。在一九一五年末，我們已經直接在戰線得到大的進步了。這就是鐵甲艦上著名的歷史，那裏準備海軍暴動被政府發覺了。兩個海員被槍斃，其他之人移交法庭，以後並牽涉到革命的組織。他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被捕的，到一九一六年秋才開審。很可注意的，這時候羣衆是情緒高漲到這種程度，政府簡直不敢槍斃一個人，雖然在軍艦上準備暴動，從軍法觀點上看來，本是極重大之罪犯，應該立刻處以死刑的，但是沒有槍斃一個。就是對海軍一度之審判，便引起

了聖彼得堡十三萬人的罷工的緣故。如果再槍殺他們，那麼像莫斯科十月罷工時那種情景，便一定要爆發了。因此政府是退讓了。在資產階級報紙上預先宣傳不會槍殺之消息。保護海軍的律師沙可洛夫說道：照法律一〇一與一〇二兩條他們本是槍決的，但是所以讓步則正是因羣衆革命情緒高漲之故。故在一九一五年時在工人羣衆中確已發現了一定的革命的情緒。有組織的表現就是海軍暴動，無組織的表現，便是我上面所說過的許多紛擾。

這戰時經濟的反面，自然要防碍資產階級政策的進行。資產階級採用了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政策，起初彷彿似有些成效，但現在却完全坍塌了。至一九一六年秋，緊張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連社會民主黨內的保護祖國派底報紙也開始說，要設法停止戰爭，須預先消滅專制政府。一九一七年正月，社會民主黨所散發之傳單已號召人民自己起來停止戰爭，因為沙皇專制政府是不能停止戰爭的。這種情緒連保護祖國派也是一樣，這是我們必須指明出來的。因為他們不敢堅決地暴動起來反對戰爭，所以他們便走上了保護祖國的軌道上去了。

自一九一六年秋天起軍事工業委員會內的工人團的記事錄上，關於工人情緒的消息，很值得我們注意。從十月初起，在聖彼得堡盛傳着在莫斯科，哈爾可夫及其他各省城的非常事

變的謠言，從幾個城中來的私人信件中常問：『彼得格勒產生了些什麼事變？』實際彼得格勒什麼都沒有產生。在彼得格勒工人羣衆中討論着極重要的問題：『關於莫斯科有什麼消息？』在彼得格勒各區的工人間，盛傳着『莫斯科事變』的謠言，屢次迫得工人團去詢問莫斯科的同志，而每次這些傳聞都是無稽之談……有許多工廠常報工人團說工人憤激的情緒異常高漲，照工人團的通信員的報告看來。工人的情緒高漲到這種程度，甚至連小小的吵鬧，一小塊的鐵片下落，便可使工人立刻關車，擁向門外去。同時在城市中散布着奇怪之謠言。情勢是十分嚴重的了。當時革命的情緒與一九〇五年及法蘭西大革命之前夜的情緒，完全一樣。法蘭西大革命前法國全國佈滿了大盜將至的謠言，即所謂『大恐怖』，人民驚慌萬分。但在實際上却一點事實也沒有，純粹是無稽的謠言。重要的就是這種情緒，不僅在工人之中而且還波及到軍隊中去了。『一九一六年秋，彼得格勒李西尼午工廠罷工時，工人阻攔別廠工人之上工，警察來驅散他們。在新李西尼午廠之左右，集聚了特別多的工人，廠旁爲一百八十一後備步兵團的營房，工人與兵士的關係是非常友善的。工人羣衆中且有兵士在內。據說是克羅衣辯夫的騎兵團的傷兵，當警察開始橫暴起來以鞭棒打擊羣衆之時，在隔離旁觀的

兵士忍不住了，衝籬而出與工人一起驅逐了警察。當局調了哥薩克騎兵來逮捕兵士與工人，但是哥薩克兵沒有行動，他們便退走了。兵士之擾亂，使得軍事當局驚惶起來了。各級長官都到營房中去，一八一團中的「鬧事人」，只在深夜點名歸隊之後才把他們逮捕，捕了一百三十人并交法庭懲辦恐嚇之。

現在我要再說一說，這種革命情緒之物質基礎，并將這幾月來聖彼得堡工人階級的客觀狀況加以簡單的分析。當我引用洛夫的圖表的時候，我曾說過工人羣衆之最革命的份子，一方面是五金工人，另一方面則爲大工廠中的工人。因此，首先要注意於聖彼得堡工人之一般的增加。一九一四年九月爲一九七、〇〇〇人，一九一五年九月爲三〇五、〇〇〇人，至一九一七年正月到四〇〇、〇〇〇人，即比一九一四年九月增加了兩倍多。這些工人怎樣分配的呢？自然，大多數都是五金工人，這是不難明白的，因爲彼得堡是五金工業的主要中心。五金工人的百分數是很大的，五金工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七十。工廠的比例是在一千以上的大工廠內的工人，佔百分之七十六又七，在一萬人以上的最大工廠中的工人佔百分之二十二又八。因此集中在彼得堡的工人羣衆其絕大多數都是在最革命的隊伍之中——他

們是五金工人與大企業中的工人。這是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六年秋天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但同時，因為無產階級的羣衆運動，無論如何不能不影響到非無產階級的羣衆，特別是那些易受感動的小資產階級，故很快的便把那些青年學生拉到自己方面來了。一九一七年正月十二日，莫斯科的學生照常地慶祝了大學節，但他們在慶祝會上所唱的盡是革命的歌曲。副市長親身來了，並懇請他們只唱一次『天佑沙皇』之歌，但是終于未允！

第十一章 宮庭政變與二月革命

在一九一七年春，一切革命的成份都已經具備了。因交通的破壞而引起的全國經濟大破壞，產生了大的工人的聚合，而且是最革命的工人——五金工人，大工廠中的工人。總之，自一九〇七年以後革命運動所不會有的條件，現在都已經具備了。但是缺少極有作用的一點，就是缺少在一九〇七年以前出現于政治舞台上的那個政黨，就是缺少那領導第一次革命的政黨。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他能夠領導第二次的革命。開始時因為這個政黨不會出現于舞台之上，那就使得舊制度多受八個月垂死的苦悶。這種苦悶對於國家的犧牲是很大的，特別在加深經濟破壞的意義上，并因此而要進行第二次的開割，而這種開割當然亦可以省掉的。

其所以如此者，當然不是上帝的意志。一部分是因為那俄國的執政者之自覺的支配，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之間凶殘的剝殺布爾什維克，不僅把布爾什維克黨人禁錮于獄中，充軍于西伯利亞，流逐于海外，而且消滅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沒有一種出版物，曾像布爾什維克的出版品一樣受到那樣嚴厲的搜查。我們在巴黎警察廳的文書庫裏面，找到了一個很奇妙的文件，該文件是一個偵探，也許是領巴黎警察廳的俸金的文人所做的。該文件敘述布爾什維克的出版品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是如何的偉大。那裏關於布爾什維克當時所出版的那些公開的和秘密的書籍，還有一個很詳盡的目錄，并附帶地指出其害處。由此可知，羅曼諾夫朝直至最後一分鐘，也還在進行着自覺的爭鬥，來防止以列寧為首領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境內之出現。在我們研究第一次革命時所分析過的那種力量，我現在又要談到了。當時我們曾經講到這個反動的力量，并欲說明他的本身究竟是什麼東西。

俄國統治階級內部因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間的利益對抗所造成的裂痕，促進了一九〇五年的爆發，但是這種仇恨是不深厚的，因為資本家很好地感覺到由羣衆方面來的危險，因此，他們便沒有分裂到底而給于合作了。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冬間的情形，其特點就在俄國

的統治力量，可簡稱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論地主與廠主，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在他們目光的，這個羣衆運動爆發的危險，已經完全沒有了。以爲在史托里平的流血時期之後，再不會有大的羣衆運動了。我不知道，看到過一九一四年夏天彼得堡工人運動的人爲什麼會有這類的夢想，但是這種夢想實際上是有的。米留可夫對伯烈烏魯而且曾經公開的承認過這一點，米留可夫的話，確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米留可夫說：『這點我們完全沒有預料』，而一切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行動，也都證明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工人羣衆之進攻。這是我們以後要再加分析的。我們還沒有把這革命的詳情細目都弄得清清楚楚，我們未能澈底明瞭，到底爲什麼資產階級會有以爲羣衆運動的爆發是不可能的奇怪觀點。但是事實是有的，這事實且爲米留可夫所承認，即當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政策也完全是如此。因爲羣衆運動之故，所以在一九〇五年沒有敢于分裂到底，但是現在這種勇敢心是有的了。二月革命，雖不是當時上層分子中的鬥爭所引起的結果，而這鬥爭却使她容易了許多。這些上層分子已經完全忘記了世界上還有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存在，忘記了這個無產階級能在一個很好的機會中握住爭鬥者雙方的衣襟，把他們驅逐到他們所不願去的地方去。

普通都把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冬間所發生的事情寫成純粹的宮庭之爭，但是當時直接觀察者拍烈烏魯，已經很清楚的看到爭論的根源還更深遠得多。這爭論除了宮庭之外，還為幾種社會的力量關係，若以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分析的時候，很容易發現根本的矛盾在什麼地方。在表面上，好似進步派與專制派之爭，以個人論則為米留可夫，顧起可夫與拉斯普丁間之爭。進步聯盟派是在一九一五年實際上已經掌握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資產階級用「特別會議」的方法來把戰時經濟握在手中，在國會中則他們組成了一個特別聯盟，極左從立憲民主黨起，極右至民族派止，就叫做進步聯盟。表面上，似乎是進步派與專制派（以拉斯普丁為代表）間的決鬥的樣子。這僅是外表上的觀察，實際上矛盾要深遠得多。一九一七年冬間的爭鬥，便是那一對敵手之最後的決鬥。這對敵手的爭鬥，成為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俄國歷史底基礎。這兩種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俄國的領地上是永遠不能調和的。在戰爭之始，商業資本是欣悅的，奪取海峽的任務是商業資本主義的任務，這是俄國爭奪商業通路之時期。同時工業資本起初對於戰爭是異常之冷淡的。後來因為戰爭成為俄國工業的大市場，可得更高的利潤，工業資本於是便慢慢的興奮起來。而在另一方面，則俄國一切的

出口都停止了，商業資本對戰爭的恩情于是也就漸漸的消滅。三四個月便能以光榮的勝利來結束這次的戰爭，這種商業資產階級的希望完全沒有實現。一九一四年之收穫損失了，一九一五年的收穫也損失了，一九一六年的收穫又沒有運輸到國外去。因此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主義間的利益便互相倒置起來。戰爭愈久，工業資本則愈有興趣，商業資本則愈感覺困難與痛苦。這一點，在代表工業資本的進步聯盟，與代表商業資本的宮庭貴族彼此間的相互關係中，表現得清清楚楚（因地主是商業資本的代理人，故貴庭貴族能代表商業資本）。

停止戰爭好使俄國糧食運輸到國外去的思想，一天一天的有力起來了。當然，有兩件事實可以使得商業資本變得和軟一點，第一就是收穫之減少，一九一七年的收穫降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大麥小麥各不同），而其次則為軍事供給的貧乏，也使得地主更軟和。無論如何，出超之停止，出超變為入超，這一點不僅使商業資本異常不安，而且還使俄國資本主義之一般的積累都恐慌起來了。工業資本對於這一點要鬆懈些，因為他有大批進款到自己的袋子裏來。但若以整個的俄國資本主義來看，那就要成問題了。故從整個的看來，那就應該給那種和平的傾向找一條出路，這種傾向維德在戰爭開始時就已經見到了，可是他一點回響也沒

有得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之大戰，與一切大的戰爭一樣，一方面作公開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則進行秘密的外交手腕，這是現在誰都不會懷疑的了。在克萊姆之戰時，在拿破崙之戰時，都是一樣。和平問題幾乎在宣戰後一天已經提出來了。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初，我們已看到德國政府請求美總統威爾遜為調人，來與英法俄協約國作和議之談判。對於這點，不待多說。非常有名的，便是尼古拉第二，與喬治第五是消滅這第一次和平企圖的人物。這和平的企圖，發生于在開戰後一月半以後。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之十二月與正月間（英法及俄國對於海峽的協定，這是在一九一五年三月訂定的，英國真是咬牙切齒的簽了這協定，這從英國的通譯可以聽到），在一九一五年秋及一九一六年夏（德國企圖以日本為調人來進行談判），都曾經使用種種的方法來恢復和平的企圖。總之，這種企圖充滿了整個的戰爭時期。這連協約國亦不否認，因為這是由德國方面發端的，德國是永遠注意着的，他常與某個國家談判和平問題。當然，對俄國亦曾做過這類的談判。在一九一五年春，尼古拉之妻已經有信給尼古拉說，他得他哥哥愛而寧的信說：他已經派了親信人到斯多各爾去了，最

好尼古拉亦派自己的親信人到這個人那裏去。信到尼古拉的妻子處。已經遲了一點，因之她很嚴重問尼古拉道：『怎樣辦呢？這個親信人已經在斯多各爾了，而你都不在。你在前方，我很怕因此發生誤會，愛而寧將非常苦悶。事情當然不是在愛爾寧之苦悶，而在委任愛而寧進行談判之破壞。這封信尼古拉在佔領彼利美書約之次日才接得，這次的佔領是戰爭中，俄國唯一的大勝，而尼古拉當時之情緒是非常好戰的。很明顯的，他拒絕了這意見，甚至還勸告她說：『夫人，關於這一點，請你在下次不要再寫吧！』至少，在以後的通信中，我們便沒有看到，菲獨洛夫娜讀到她和她哥哥通信的事。但她與她哥哥的書翰往來那是無容置疑的。這也許而且一定是——就是尼古拉在夏宮被捕後所燒掉的那封信。這在尼古拉的日記中可見到。日記中有兩行說：『撕殺紙片……撕燒紙片』。克倫斯基對尼古拉個人的文件，不但沒有把他包封起來轉交臨時政府，并且還『不小心』的自由處置。現在被他收拾清楚了。因之尼古拉在戰時的『秘密外交』文件，就沒有遺留下來。文件雖然沒有，但在許多事變之間，却不能沒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譬如一個大貴族之妻伐西爾起可瓦之刺彼得堡，這人對宮庭方面是很親近的，而我們則知道她是帶了德奧外交界方面一定的使命而來的。伐西爾起可瓦住

在夏宮，離皇宮不遠。她很小心地注意拉斯普丁的動作，使菲獨洛夫娜非常憤恨，總想設法驅去之。把伐西爾起可瓦從彼得格勒騙走的真正原因，正如菲獨洛夫娜所說的一樣，伐西爾起可瓦坐在亞歷山大的宮中，像貓兒一般的觀察我們所做的事情。無論如何，其來之特別，是很明顯的。更明顯的，就是激路托撲撲夫（他後來被亞歷山大菲獨洛夫娜及辣斯普金推薦為內務總長及候補內閣總理）在斯多克各爾訪問德使館的顧問瓦而蒲而的事情，這件事稍一不慎，未能嚴守秘密，各報館便一概登載出來了。偶然的事情是不會有的，很明白的，不僅德國在主觀上想進行和平的談判，而且在客觀上他也已經找到了與他談判和平條件的人。

但是其詳細情狀，我們還不會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夠在德國的文書中找出一些材料來。德意志共和國所宣佈的那些文件，只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這是很奇怪的。而在一九一四年之後的事，我們就不知道了。我止能舉出事實：無論如何，談判是有過的。在俄國方面主和者的大人物（這是從文件中知道的），就是實際上自一九一五年秋天起的專制皇帝——拉斯普丁。我雖怕被人譏笑和誤解我是站在「老翁」派底觀點上的人，但我還是要承認，在政府之中，在商業資本這一派人中，就是在專制派中，拉斯普丁是最聰明的

人。不要笑他是一個文學不大通順的農民。他不是一個平凡的農民，他的不平凡處就在他最初就反對戰爭。戰爭之始，他住在西伯利亞醫治他被顧雪瓦所刺傷的傷痕。他從那裏打了一電報給尼古拉，在電報中雖然沒有抗議反對的話，但是他仍以戰爭為不幸。他很深刻的諷刺說，他是知道主戰派及俄國總參謀部底挑釁政策的，他很憂慮的向自己及其屬下說，那些引起戰爭的人，對我們有沒有幫助呢、後來看到他們是不會有幫助的。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當俄國軍隊已經潰敗了。拉斯普丁決然的說，戰爭是毫無益處的，塞爾維亞之不值得幫助，正與保加利亞一樣等等。這從菲獨洛夫娜給尼古拉的信中便可知。因此柏烈烏魯所暗示的德國金錢，實已毫無需要。雖然拉斯普丁並不要錢，因為他手下的人是世界最富的人，雖然沒有德國的金錢，也能使拉斯普丁成為俄國方面底和平政策底中心。這和平政策底基礎，很清楚的就是那引起戰爭的商業資本主義之客觀的利益。沒有出口，沒有對外貿易，住在一個四通不通風的匣子裏，商業資本是承受不住的。在十九世紀中葉克萊姆戰爭時，他已不能忍受，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冬，他也是不能忍受的，但是他不能放棄戰爭的捕獲品，即不能放棄海峽。故與德國一切談判之所以決裂的原因，也就是為着這個問題上：『海峽問題如何解

決」？土耳其是德國底聯盟者，德國當不願出賣土耳其。

戰爭愈久，德國的情況則愈困難。我們知道至一九一七年時同盟國（德，奧，保加利亞，土耳其）的情況，已經是困難不堪了。土耳其的情況愈壞，則他對這方面也漸願讓步。在一九一六年和，在彼得格勒流行着一種謠言說，和約在日內就可簽定了，俄國在某種條件之下（何種條件不知道）得到海峽，并以此退出大戰與德國單獨媾和。德國的領導者亦希望如此。關於這點在二月革命時代，我們復得到了一點多少可靠的消息。二月革命對於德國的資本界，特別是銀行界發生了一個沉痛的感想。德國的一個銀行家，對俄國底通信員說：「我們希望在不久之內，可以締結和平條約，但現在這種希望又落空了。」至于在實際上快要締結和約這一點，却沒有為銀行家所瞭解。羅曼諾夫與德國的和約，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訂立的，關於這一點，實不值加以推斷。我的推想是如此：這和約是根據俄德在一九一三年秋天關於海峽的談判而訂立的，但是這點可不必注意。不過當時報上發生一種謠言就是威廉第二向尼古拉提議把海峽作為中立區，而由俄國來保護這中立區，這就是俄艦成為海峽的主人翁。

只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就是沙皇政府的上層份子已經走上了和平的道路。並且他在這條路上必然要與當時的好戰者發生衝突，這一點也是很顯明的。

商業資本又要如一九〇五年一樣重新與工業資本衝突起來。當時他們沒有分裂到底，就因為顧慮羣衆運動。現在他們偶然把羣衆運動忘記了，而決定分裂到底。尼古拉底計劃在苦爾樂夫的雜記中寫得很清楚，其計劃就在解散國會，發表給農民以補充田地的宣言，同時并宣佈全俄民族一律平等，好使猶太人滿意。因猶太人在沙皇政府看來，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故對猶太人的平等待遇和給農民以補充的土地，由尼古拉與其親近看來，定能得到羣衆對專制政府的同情了。在這個基礎上便可解散國會與訂立和約。這就是說有了和平，土地與民族平等了。這個計劃是在三月間擬定的。無論敵方是否知道這個計劃，但是他已經決定用反攻的手段來抵禦這種攻擊，反攻是應該採用非常堅決的行動。當然，喜戰者不僅是工業資本，而且那些親身作戰的高級軍官也是非常之好戰的。因之以進步聯盟爲代表的工業資本便很容易的在軍官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有力者，甚至于如總參謀部部長亞歷西亦夫將軍，亦參加于謀叛之中。這些軍官是此次謀叛的助手，他們都組織在進步聯盟的周圍，而以立憲民主黨爲

其領袖機關。這個謀叛有許多人知道。斯略濟尼可夫在他的書上很清楚的說來：

「有幾個進步聯盟中人知道謀叛這件事，他們指這件事的中心人物爲苦腦凡樂夫，顧起可夫與貴族開里爾。而在軍官中，則仿佛是克留姆夫。參加這事件的有齊海日及克倫斯基等人。他們不僅知道這件事，而且與其他人一樣，希望挽救這個宮庭的政變。前任勞働總長格若日結告訴我，在軍事工業委員會及齊海日派之間，爲了國會宣言開幕的問題，發生了決裂。許多人不僅不滿意宣言底內容與戰爭問題，而且還不滿意于這些問題的發生。國會中的孟什維克懼怕民衆運動損害宮庭政變的計劃。這種關係，證明了孟什維克是非常的混亂。我記得我每次碰到齊海日的時候，他總混混沌沌的，他在這『混糊』中自有他自己的邏輯，自己的路線。在戰爭時，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底黨團完全脫離了羣衆，完全落于資產階級反對派的營壘中去了。」

因此，可見在進步聯盟內還有立憲民主黨的更左派，以及工商業委員會內底保護祖國的孟什維克派都參加在內，這一點很值得指明出來，因爲敵方從這裏曾下了第一次的打擊。

這個政策的計劃，却是很簡單的。他是這樣的，克留姆夫將軍應率領其軍官隊去進攻沙

皇到前線去的專車，捉住尼古拉迫其簽字讓位，不然，則如但尼金在回憶錄中所說一樣，『將他殺死』。殺死之後則立小『亞歷山大』為沙皇，而以亞歷山大維奇（他是尼古拉之弟）為攝政王，他以後自稱為共和派，為當時大貴族中最自由主義的人，他應該在實際上成為沙皇，而名義上則以多病的幼孩充之，當然這小孩不會管理國家大事的。以後則應任命國會派的內閣，即進步派聯盟的內閣。俄國在不久的時期內應實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

這就是謀叛的計劃，敵方沒有知道這些詳情細目，正與進步聯盟之不知道沙皇政綱的詳情是一樣。但敵方總是揣度着，那裏在準備什麼，因此採取了許多方法，來制止敵人。第一步，就是逮捕已經任命為內務總長而且實際上是當時的內閣總理，澆魯多巴泊夫，及逮捕工商委員會底工人團。工人團是進步聯盟與羣衆間的聯絡者，因此最初就要破壞這個聯系。更進一步就應該解散國會。但是這步後來才實行，在革命的高潮中才實行，因此便沒有意義。至于那關於猶大人平等及土地的宣言，則沒有頒布，因為聖彼得堡的工人不會給他們時間。政府上層份子底決裂，對二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專制政府這樣快的崩潰了？為什麼不像一九〇五年一樣的長期的抵抗呢？這就是因為在這個時候，執政者內部

都在那裏準備官庭政變之故。當時彼得格勒的守衛軍是第二隊的新兵，是沙皇軍隊中最革命的一部份。在聖彼得堡只有後備軍，其中大多數是新兵，在聖彼得堡及其四週，人數達十七萬以上。據各處來的消息看來，就可知道這是將來準備官庭政變之用的軍隊。至于這十七萬人以後落到工人手中去，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因為對於工人誰都沒有計算到，誰都沒有以為他會有進攻的行動。但是，這新的政權究竟將要依持誰呢，當然要依持現社會中那班青年，這班青年的緒情僅是非常之仇恨專制政府的。學生在那大學節所唱的還只是革命的歌。新的革命的政權應該建築在這部份羣衆之上，故後來當米留可夫看見這部份軍隊的槍尖倒轉來反對進步聯盟的時候，便可想見米留可夫是何等的酸鼻痛心。雙方都聚精會神的進備好了，一方面要解散國會，另一方面要逮捕尼古拉。事變已經在工作日程中準備好了。他們的工作日程，就是要在三月中迫尼古拉讓位。而正在這時候就產生了聖彼得堡之革命的爆發，這個爆發完全出乎雙方意料之外。謀叛只做了一半，只做到殺死拉斯普丁，拉斯普丁之被殺無疑義的是謀叛中的一部份。但是這樣一來就引起了對方的注意，以至毫無勝利可言。因為拉斯普丁只是實際上的沙皇，在法律上他并不是全國的元首。故拉斯普丁之被殺對於強迫尼古拉讓位

及他們以後的計劃之進行，當然要便利得多。但是他們終于沒有做到。這就是因為二月革命已經爆發起來了。

這就是彼得堡暴動能够這樣迅速勝利的條件。最堪注意的，就是：這時布爾扎維克還站在武裝暴動的千里之外，史略潑尼可夫在其回憶錄中說，他甚至還阻止工人武裝隊之組織及工人武裝。

（註）史略潑尼可夫，在本書第一版後，他告訴我說，他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要執行當時布爾塞維克中央的命令。我認為必須把史略潑尼可夫底聲明附載于此，但我並沒有見到中央的這個命令。其真確的內容我也不知道。

這是千真萬確的。他曾勸告工人去宣傳兵士，宣傳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宣傳兵士與工人自己底武裝是兩件並行不悖互相輔助的事情。無疑地，假使二月底沒有工人在聖彼得堡街赤手空拳之進攻，則決不能吸引兵士羣衆到這個運動中來。兵士以後被吸收到工人羣衆中去了。自然，兵士羣衆變成爲當時情況中底主人，他使得爭鬥的雙方在革命之後一日即陷于極大的恐惶之中。

我很怕我這章之上半節所說的詳情細目，會對於根本問題的瞭解發生模糊。情況是這樣的，工業資本希望繼續戰爭并藉此推翻尼古拉，別一方面則為希望和平的商業資本，其代表人為大貴族，宮庭貴族及尼古拉自己，其實際上的首領則為拉斯普丁，因為戰爭把商業資本幽閉在密不通風的匣子裏，毫無生存之望。沒有麥類之出口，商業資本已經不能成為商業資本。正在這兩種資本的爭鬥中，露出了無產階級有力的鐵腕，把他們都驅逐到很不舒服很不安逸的地方去了。最初這些帝國主義的上層份子的代表底狀況都是絕望的。這種絕望充滿了米留可夫與拍烈烏爾的談話之中，這段話我在這裏不再引用了。一切彷彿都已經完了！所餘者，只有自為慰藉，自己慰藉了無數次，還要欺騙外國。他們并企圖和外國人這樣的說：進步聯盟雖沒有把這次叛變徹底做成功，然革命却正是進步聯盟底勝利，革命是反對勾結德國底賣國賊彼獨洛夫娜，及主張和平的尼古拉之愛國的爆發。一團一團的兵士陸續的到國會中去在賴特靜哥及國會委員會之前表示其敬意，并願以愛國的熱忱繼續戰爭，一直至勝利為止。

為消滅這些毫無根據底謠言起見，最好讀一讀路特靜哥自己在將死之前在一九二一年所

寫的回憶錄。賴特靜哥這樣寫道：『二月二十七日，即革命之第一日，不知在誰的命令之下，聖彼得堡之守衛軍兵士開始捕人……（不是那個政府機關捕人，而是彼得堡的守衛軍兵士捕人！）……第一個被捕的大官僚，就是國務院院長悽特洛維托夫。大羣的兵士（如沒有記錯的時候，那便是普列奧布拉克基團的兵士）把他押到我這裡來。我當時爲此類行動所驚愕，因我并未發此類的命令，我便請悽特洛維托夫到我的辦公室去。但是這些兵士頑梗不放，說他們要把他帶到克倫斯基或工人代表蘇維埃去。當時我便試用我的威權，要兵士們立即服從我的指揮，那兵士們便圍繞着這個縛虜，用最狂暴的態度把自己的槍械對指着我。以後我便不知道把悽特洛維托夫解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件事就成爲我與工人代表蘇維埃第一次衝突底原因，以後也就和緩了，因爲他把悽特洛維托夫放了，即簡單的交給羣衆自己去審判。因之就把他臨時的押在國會的內閣議員室內，而後來則由臨時政府的命令禁止于彼得羅堡伏而監獄。

『三月二日斯米爾諾夫（然官長極少）到國會來見議長。當我致歡迎辭之後，彼等便大聲鼓掌，在我的辦公室內高呼『萬歲』。當時在我的辦公室內，國會臨時委員

會正在開會』。

我演講之後，國會議員起里依齊便立刻出來說話，極力的鼓吹要求議長的演說，并叫斯米諾夫國人要求我，真確的說明我對於在俄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及解決土地問題的意見。當我重入大廳時，斯米諾夫團兵士之情緒已與先隨時完全不同了，且有非常進攻的心理。但當時被議員起里依齊的演說所激動起來的兵士，却又被解決此項問題之權不在議長亦不在臨時政府，而以立憲會議等等話頭所平靜下去了。

『三月三日第二艦隊的海軍士卒，亦整隊示威于國會之前，他們的情緒更加激昂。而且是少年軍官，剛補海軍少尉的青年們所領導。在這演講廳中，舉行了極熱烈的演講，有一演講者當我不在場時，毫不容情的說，我亦是值得槍斃的『有產者』，海軍兵士們也彷彿是不反對執行這一點。』

這是我們在革命後四年，在法國報上所讀到的賴特靜哥的回憶錄，這頗值得我們對賴特靜哥鼓掌，須知這種鼓掌有非常的特點。很明顯的，這時候政權是在羣衆手中，而真正的主人就是羣衆的組織者工人代表蘇維埃。我在自己的論文中曾舉過一個例子，我更可舉一個別

的例子，書爾金及賴起可夫曾向尼古拉取退位書。起初這個大典——即將古拉尼的退位書取至聖彼得堡來，賴特靜哥，很想自己去做，因此他使用國會議長的權力，要求專車。沒有給他專車，他就派了自己的副官到工人代表蘇維埃去要車，車沒有給他，因之賴特靜哥沒有走成功。而且書爾金與賴起可夫亦只是因為怠工的原因，才能走掉。他們到了車站，一個工程師以私人的關係，給了他們一輛火車，偷偷的跑出了聖彼得堡，絕不像正式政府的代表堂堂皇皇的走的。

因此，工人代表蘇維埃便成了聖彼得堡的主人。對於在當時彼得堡是否能組織工人政府的問題，我們可以堅決地回答說：假如那時候列寧在聖彼得堡。假如那時候有布爾扎維克的領導機關在聖彼得堡，假如布爾扎維克能夠參加這次革命，那當然可使俄國人民不經過第二次的革命（十月革命），不再犧牲許多無產階級的鮮血，便可立刻創設那一九一七年十月後所創設的制度了。其所以不成功的緣故，就是那些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內偶然居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大部份都去極力的幫助他人實現宮庭政變的計劃去了。照史略潑尼可夫的話看來，甚至于彼得堡的布爾扎維克黨人，也主張建立布爾扎維克，孟扎維克，及社會革命的聯合政府。

換言之，即主張組織那非但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貧農利益的政府。因為社會革命黨，誰都知道他是富農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聖彼得堡的布爾扎維克黨人，竟居然以為聯合形式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在此須明白當時聖彼得堡的布爾扎維克，正是這些知識份子的極左派。他們所企望的聯合政府。還不能算做革命的政府，那麼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政府，當然更沒有什麼希望。他們簡直直接地說：假如不讓立憲民主黨參加這聯合政府，這一切的事情都完結了。沙哈諾夫這樣的寫：『只有資產階級的政府，才能够代替沙皇政權，應該以國會的『進步聯盟』的政權來代替拉斯普丁，必須照這個方向去進行，否則政權便不能成功，革命就要失敗。』

沙哈諾夫這幾句話及他筆記中其他的話，列寧在臨死前一篇論文中曾加極嚴格之批評。我并不要對沙哈諾夫個人說什麼壞話，我只將他的論文略引幾段出來描寫當時那些領導工人運動的上層知識份子的意見。沙哈諾夫的筆記中說：他們在皇宮內轉輾徬徨，不知所從，最後決定與他的兄弟們一全到路利克那裏去，尊敬他說：『請你來統治，我們吧！』米留可夫當然很歡欣的接受了！後來這不但是應該的，而且是必要的了。而米留可夫，願起可夫等

等的「革命家」，就很高興起來引導俄國的革命，他們領導這革命是為達到當時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目的，無論如何要繼續戰爭一直到「戰勝敵人」為止。拉斯普丁的和平主義并不是受了德國金錢底引誘，第一個革命政府為什麼會堅決的站在帝國主義戰爭繼續到底的觀點之上，也并不是協約國的金錢所能解釋的。這是必然如此的。拍烈烏魯說：他最初時就注意到了克倫斯基是協約國用以組織政府的最合式的一個人。因為他一方面有羣衆之信仰，而另一方面則照着帝國主義的道路，是協約國忠實的同盟者。所以他繼續戰爭一直至勝利為止。因此，實可說臨時政府是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忠實的遵守者，同樣十分明顯的，聖彼得堡的革命首先便是反戰爭的革命，這點連沙哈諾夫亦見到了。他決然地說，在二月聖彼得堡的露天大會所叫的喊聲都是：「反對戰爭」。這就是因為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受了「青墨瓦爾的訓練」的緣故。但在實際上其原因當然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比俄國資產階級要更能代表整個俄國國民經濟底利益之故。他不能不清楚的瞭解到：戰爭會使整個的國民經濟陷于滅亡，陷于破產。俄國的無產階級的論調快要滅亡的經濟底呼聲。俄國最覺悟的勞働者，比任何人都清楚的知道不能再戰。因為繼續戰爭，就是完全破產。至於後來戰爭又繼續了八個月，這就使

得經濟恐慌越發加深。如果戰爭在二月間停止了，那破壞一定可以小得多，應該起來挽救俄國的國民經濟，俄國的無產階級就負了這個責任。用舊式的說法講呢，這就是他在俄國革命中之偉大的歷史的使命。他的確把俄國的經濟挽救出來了。這一點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把他實現。

因此聖彼得堡無產階級羣衆對戰爭的態度是非常之堅決的。止有一部落後的羣衆中，止有在軍隊中還有一些幻想存在着。歐洲協約國的新聞記者在說明俄國革命的意義的時候，他們把所謂聖彼得堡守衛軍之愛國示威這點放在第一個位置上。但是要從我所讀的賴特靜哥的那段摘錄中，就可知道這示威的意義何在。

戰線上情緒如何呢？在五月四日（革命後兩個月）在彼得堡所開的軍官會議會把他下了一個總結。這還在布爾什維克的廣大的宣傳煽動以前。布爾什維克宣傳的勝利是在五月三十日的第一次的工廠委員會代表大會上。這是在俄國非黨大會上以絕對的大多數通過列寧，季諾維也夫的布爾什維克的決議的第一次。而在五月四日（即在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勝利前三星期）各軍軍官會議上已經把二月間在線戰所發生的情景下了一個總結。所以我們如從這次的

軍官會議上的情形去描述俄國軍隊中之情緒，可以完全不注意布爾扎維克之煽動。煽動還不會有，還不會廣大的發展起來，他還沒有完全奪取彼得堡的無產階級，而全時西北戰線總指揮不魯西洛夫將軍關於自己的部隊的情緒曾經這樣說過：『有一團兵士說，他們不但不願進攻，而且願望退出戰線，解甲歸田』。委員會起來反對這種傾向，但兵士們要驅除他，我勸導了他們很久很久，然而再問他們是否同意于我呢，他們要求讓他們以書面答覆。經過幾分鐘之後在我面前豎起了一面大旗：『無論如何要和平，反對戰爭。』

在以後談話中，一個兵士告訴我說：『大家都說不要割地，那我們要這座山幹什麼呢？』我回答他們說：『這山對我亦沒有用，但是我們要攻打佔據山上的敵人。』

『結果，他們願意停住不動，而拒絕進攻。理因如此：『我們的敵人很好，而且告訴我們說：如我們不進攻他們，他們決不向我們進攻。我們重要的，是回家鄉去，得到土地與自由，戰爭幹什麼呢？』

這是簡單的農民的口吻，但是這證明戰線上的兵士亦不願戰爭，這是關於某國兵士的話。不魯西洛夫在後面則說到一師了：『在駐紮于防守方面的一師，當要調動他們到進攻方

面去的時候，他們不願移動，希望留守原防，同時并通電各處。」

以後就是別一個司令特辣洛米洛夫將軍發言：「軍隊中底情緒都希望和平。凡是宣傳不要割地并給人民以自決權的人，極容易在軍隊中得人信仰。對於『不割地』的口號，有種特別的瞭解，愚笨的羣衆不懂各民族情況之不同，常常問道：『爲什麼協約國的民主派不同意我們的宣言呢？對於和平的企望非常懇切，甚至於有時不肯拿武器，『要我們幹嗎！我們不願戰爭。』工作停頓，必須設法使得營壘中軍裝完善，并須修築道路。」

以後就是詩爾拔却夫將軍演說：「我就任不久，但已將部下軍隊檢閱一周。對於軍隊之思想狀況與戰鬥力的感想，適與以前各位所詳細說明的相同，其主要的原由，則在羣衆之缺少知識。」

我所引用的這些將軍們的解釋，都是很可注意的。對於下層羣衆的希望，是要加以解釋了。如爲什麼西歐的民主派不宣言說不要賠款不要割地呢，這是很有道理的問題。但將軍各米洛夫却以愚蠢來解釋，而詩爾拔却夫將軍則以羣衆沒有受教育來解釋。「他們沒有受到教育，當然他們的罪惡，這是舊政府整個的破產。內務部睜着眼睛看着國民教育的問題，但是

不懂得嚴重情形下的羣衆不正確地解釋善良的思想。我不必多舉例子，我只指出俄軍之最後的一師（當然是十六師），在過去戰爭中所等稱鐵軍的那一師。把這師調往前綫進攻，他們不願進攻，不願作準備進攻的工作，在其附近的射擊師裏面亦發生同樣的情形』等等。不再摘引別的摘錄了。但有一個總指揮會講到：『在斯文斯基之前，德國兵士開始和俄軍親陸起來了。有一個軍官想阻止并破壞這種親睦，被兵士把他驅走了。而他的兵士整夜追索他，想殺戮他』。這點特別可注意，因為他發生在革命後的第一星期內，布爾什維克的煽動，才着手進行反戰爭情緒，就在戰線上發展起來了。

更有甚者，就是在尼古拉的日記中，亦有證據證明這點。尼古拉敘述他爲什麼簽名讓位的理由說：『在使兵士們能在前綫上安心作戰！』很明顯的在尼古拉讓位之前，從戰線歸去的企圖早就已經有了。而在沙皇四周的軍官也對沙皇說：陛下，因爲你同德國人眉目傳情，所以前綫的兵士不願戰爭了。必須要有一個強固民族的政府，不然前綫將要潰散了。無論如何，在尼古拉讓位之前，下列的事實是有的，軍隊不願戰爭，軍隊希望和平，前綫開始潰散。就是一九一七年夏天的事。臨時政府的政策是一種偉大的暫時成功的用電氣蘇醒戰爭的

屍體的政策。米留可夫及利伏夫在這方面的才能要小心些，因為大家都很知道他們是他大尼里海峽派之同情者。在這個同情他大尼里海峽之基礎上，他們在四五月間被逐了。他們是與顧起可夫等同時被逐的。因之拍烈烏魯所指出的一點不是徒勞的。造以成『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爲首的『社會主義』政府亦不是徒勞的。這政府以繼續戰爭爲自己第一個任務，這政府是爲了繼續戰爭而組織的。他開始逐漸地準備六月的進攻，這六月進攻是七月事變的推動者。繼續戰爭是克倫斯基混合政府的第一個任務，這政府的組織是要把俄軍從那種混亂的狀況中挽救出來。克倫斯基在進攻失敗之後，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在給路易喬治的信上這樣寫道：『從共同事務（克倫斯基與路易喬治底共同事務！）的觀點上看來，俄國的情況是十分艱難的。但我們認爲現在比去春却已經好得多了（就是革命後慢慢的好了）那時在我們的前線上，實際上已成爲體戰的狀況——這是『兄弟』口號的宣傳及軍事紀律喪失的結果。德人與他們都認爲必須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并希望抽調一部份軍隊起來反對同盟者的同盟者。這種情形愈形使人不安。臨時政府看清了這種危險，決定無論如何要消滅這種現象。我們的進攻，雖然先勝後敗，但是其主要的目的——停止休戰的現象與繼續戰爭，應該是列強最可寶貴

的」。克倫斯基聯合政府的意義，就在恢復戰爭，消滅兵士不願鬥爭的現象。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在其旗幟上高寫着：「首先和平」的口號的緣故。更確切的說，便是要把各民族間的戰爭變為階級間的戰爭，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樣一來于是便使布爾什維克成爲當時一般人物所恐怖嫌惡的對象，使他們不能不採用各種非常的手段來阻止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參謀部之回俄。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說過列寧山德回俄底意義，即在衝破這反布爾什維克的障礙。不準布爾什維克黨人回俄這點，我有極充分的證據。我當時在巴黎之國民圖書館做事。在那裏我得到了第一個關於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後，有一天在我看書的時候，來了一個在圖書館中認識我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是布爾什維克）極著名的協約國派新聞記者，潑士業兒我與他常談文學而避開政治問題的。他問我誰是阿歷新斯基，我很奇怪他不知道阿歷新斯基，我對這個人下了一個分析，潑士業兒就安靜下來了而告訴我說：「那很好，但是有人說他是布爾什維克呢」。『那麼爲什麼有人向你說他是布爾什維克呢？』潑士業兒停了一下說：『有人叫我調查，那些要求回俄的俄僑底政治面目，別人我多少知道一點，而阿歷新斯基我却不知

大明白，好像他最近是讀成戰爭的了，但是別一方面說他是布爾什維克」。實際上這人也知道「不準布爾克回俄」的口號，而當列寧回俄之後，情況就大變了，立即請我們到公使館去說：有車可回去等等，同時在四月中允許了我們，到八月才準我上車，就是說儘量的怠工，不但阿歷新斯基，就是更左的人亦不要詢問，異常的和愛，這正是列寧經過德國回去的時候，他們知道不能不放布爾什維克回去了。因此立刻就改變了政策，布爾什維克到了俄國。

當時在布爾什維克黨人面前客觀地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列寧的頭腦中從外國帶回來的。相反的，我們有文件可以證明當列寧在瑞士還沒有得到聖彼得堡及俄國狀況的真實的消息時，當地被報章上的謠傳所隔絕的時候，他並沒有走出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之外，這是在臨行前數日寫給瑞士工人的書，他直接說俄國是歐洲最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他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直接的舞台，但是他希望俄國的民主革命給歐洲的社會革命一種推動。這是馬克思昂格思普列漢諾夫及盧森堡等人的普通說法，當他到了斯在克郭電姆見了俄國革命的參加者，聽到了俄國的實況之後，才草就那載有社會主義革命的著名的大綱。什麼社會主義革命呢？實際上這就是把生產轉移工人手中。我已說過俄國革命整個的意

義就在無產階級起來保護為戰爭所破壞的俄國經濟。事實比我的說話更具體得多。這是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開的第一次工廠委員會大會代表的演說辭，工人伏龍可夫說：『二三月間工人停了工作，走到街道上去，消滅沙皇政權。工廠製造所都停止了工作。數星期後工人又回到廠中去了，在此地亦見到許多廠主都爲了自己的命運，而自由脫離了工廠。』

『這些工廠都沒有辦公處，那怎麼辦呢？在工廠中立刻就選了工廠委員會。在工廠委員會的力量之下，恢復了工廠與製造所之經常的生活。』

『以後，革命便走上了軌道，走得更平靜了，逃亡人開始回到工廠裏來了。一部份極反動的份子，工人就沒有放他回去。其他部份則放他回去了。同時亦派了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去監督他，因之工人實際上就成了工廠一切的監督者了。』

生產轉受工人羣衆的監督。起初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的，因爲工廠停工了，而工人則不願他停工。工廠主看到了戰爭的結局，戰爭自然地停止了，而戰爭在過去却是一個極大的市場，因之他企圖縮小生產，而保持工廠，等待時機，以便全體開工。就是等待秩序之恢復，革命的消滅。這方面最顯著的事實則爲以斯米諾夫爲主席的莫斯科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歷史，他有

系統的隱藏自己的原料，造假報告等等。總之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止，他們專門對於自己的生產怠工，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生產對他們已經無利可圖了。而他們的生產的目的都是爲了利潤。資產階級之進行生產不是在什麼清正的思想上產生的而是爲了利潤，所以在工廠無利可圖的時候，廠主當然想保全自己的資本，停止生產，他在每次恐慌發生的時候都是這樣幹的。在著名的大恐慌（俄國革命時）中也是如此的。爲了要繼續生產，爲了要防止工廠主的停止生產，工人們便不得不起來干涉。

因此，二月革命不僅按其消滅沙皇政府及實際上握住政權的羣衆社會成份看來，是工人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必然地在客觀上完全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重說一句，列寧頭腦中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從外國帶回來的，而列寧偉大的頭腦只是比別人更好更快的觀察了情況，瞭解了在那種條件之下，除了把整個的經濟過程轉移到工人手中（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別無其他方法。因爲當時的條件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爲進行這革命起見，列寧便不能不與那些反革命勢力，爭鬥與那些起而讓權于米留可夫的智識份子實行爭鬥。這些智識份子在米留可夫推助之後，他們便徘徊不進，自己既不敢奪取政權，又不準別

人奪取政權。最可注目之事實，就是孟什維克在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到了大多數，但是政府却沒有拿到，而組織了以克倫斯基爲首領的政府。

俄國革命全史

日本石川一郎著

下篇

第十二章 二月至十月

二月革命發生於統治階級內部之嚴重恐慌時期，這種表現，就是工業資本階級準備推倒沙皇，沙皇也準備以軍事的力量推倒國會及軍事工業委員會。

在前線上有軍事的失敗，在國內——尤其是聖彼得堡，發生麪包的恐慌，那時的人民很堅決的向政府要麪包，需要麪包是擺在廣大羣衆面前的迫切問題。情形是這個樣子，譬如當時的一個麪包商店，每天在沒有開門以前，就有許多許多提着籃子的婦女在很早很早的時

候，羅列幾里長，等候在商店門口甚至站一整天，還得不着一塊麪包。麪包的缺乏和人民的需要，我們就此即可證明。警察和購買麪包的婦女發生衝突的事實，一日數次。

三月八日聖彼得堡的婦女，從工廠的出來舉行國際婦女紀念節的遊行示威。和軍警發生了直接的衝突。軍警向婦女羣衆開鎗，結果打死了許多婦女。第二天聖彼得堡實現了總同盟罷工，罷工的範圍擴大至整個的聖彼得堡。羣衆情緒非常高漲，罷工之第四日就有聖彼得堡之軍隊，表同情于工人。並且舉行了工人和軍士的暴動，二月革命——即從此先成。所以二月革命只有幾天的期間，沒有發生大的嚴重的流血。

二月革命推倒了沙皇的政權，建立了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事實上是蘇維埃繼承了沙皇的政權。因為新政府還未成立，兵士工人都聽命于蘇維埃。當時蘇維埃是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掌握之中，他們——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是不願意無產階級專政的。他們說：現在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所以應當組織資產階級的政權。他們就在這種理論上的了解之下，請資產階級組織政府。于是就由社會革命黨邀請國會議員及民主立憲黨組織臨時政府。故臨時政府之政權，是由蘇維埃交給他的送給他的。

在這時候，布爾塞維克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布爾什維克之重要領袖——如列寧，季維也夫等等——都僑居于國外。因為在國內受政治上組織上的嚴重壓迫，很難有存在的餘地。故二月革命不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但同時也不能說是孟塞維克領導的。乃是羣衆自發的鬥爭。布爾什維克的影響是十分微小的。

在世界大戰發生之時，布爾什維克曾堅決的反對戰爭，並號召羣衆反對戰爭，提出變帝國主義的戰爭而爲國內的階級戰爭的口號。故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戰爭中，沙皇對布爾什維克施以很大的打擊。黨的組織完全破壞了。在另一方面，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順利的公開的條件之下，進行他們的工作。他們主張戰爭，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幟，欺騙廣大的羣衆。他們有他們的報紙，他們有他們的活動，沙皇是不壓迫他們的。

布爾什維克雖然受了很大的壓迫，在工人羣衆中的組織影響微弱，但是羣衆所走的道路，却是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二月革命的本身，即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之具體的表現。但在組織上，布爾什維克完全是微小的，並且有時發生羣衆蔑視布爾什維克的現象。譬如開羣衆大會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向羣衆演講，羣衆時常發出嗤嗤的聲音。故二月革命時，

布爾什維克在組織上是不能領導的，即在布爾什維克黨本身，亦還沒有統一正確的政治路線。

譬如臨時政府組織成立了，布爾什維克對這種事件，應當取甚麼態度呢？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是沒有中央的。聖彼得堡的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便成了中央，代理了中央的職權。聖彼得堡的執行委員會是採取這樣的策略。就是說：臨時政府是不能反對的，因為臨時政府是蘇維埃幫助的，而蘇維埃又是工人羣衆的組織。但是又不能幫助臨時政府，因為牠現在又是帝國主義的行動，牠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他們——聖彼得堡執行委員會，決定是這個樣子，強迫臨時政府執行蘇維埃政策，就是說蘇維埃的政策要透過臨時政府而實現。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這是如何可能的呢？這種策略顯然是十分的錯誤，是十分的不正確。

直到四月，列寧自瑞士歸國，布爾什維克才能在列寧指導之下有了統一正確的路線。列寧當二月革命發生時，還僑寓于瑞士。他得了這個消息，就寫了一篇文章，名叫「第一個革命第一階級」。列寧在這篇文章說：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是資本主義大破壞的時期，所

以就應當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因此俄國所發生的革命，只是第一個革命，一定還有其他各國——如英法美；是——發生全樣的革命。這只能叫做第一個革命。甚麼叫做第一個階段呢？就是說：二月革命決不能因此就暫告停滯，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還要繼續發展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所以二月革命是第一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他一定還要繼續發展到第二個階段。就是這個名詞，已經將列寧的政治路線和對於此次革命的認識，表示盡淨了。並且還指出世界革命之必然發展的前途。

列寧在二月革命之後，就設法歸國。在歸國以後，才能完全的知道國內詳悉的情形。在這個時候臨時政府已經組成了，蘇維埃幫助臨時政府，建設資產階級的政權。蘇維埃之領袖——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是幫助臨時政府，贊助臨時政府之一切政策。臨時政府是不停止戰爭，繼續着革命前的政策，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

列寧走到聖彼得堡之第二天，就出席一個羣衆的代表大會。然在這次會議中，列寧就提出著名的四月大綱。四月大綱就是二月到十月的根本路線。這個大綱有十個要點：

1 關於帝國主義戰爭的。列寧說，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性質，是侵略別國和壓

迫別國的性質。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說：現在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爲甚麼呢？就是因爲俄國革命，已經得到勝利，已經將反動的沙皇推倒了。假如不繼續戰爭，德國若戰勝和佔據了俄國，則俄國已經得着的勝利，將會遭慘酷的失敗與犧牲。他們這種觀點，當然是十分錯誤的，這完全是他們的欺騙。列寧說：革命戰爭是只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假如無產階級沒有取得政權，那還不能算是革命戰爭。

因此列寧提出堅決反對戰爭，反對孟什維克派及社會革命黨以革命兩字掩飾戰爭之帝國主義性。

2 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及農民奪取政權，不能使資產階級組織臨時政府。現在就是從資產階級的政權過渡到工農政權，要使工農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回政權。

3 不幫助和信任臨時政府。

4 主張以蘇維埃爲政權機關。雖說大多數蘇維埃領袖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但是蘇維埃是羣衆選舉出來的。假如蘇維埃掌握政權，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願取得政權時，那羣衆就會看見孟什維克之假面具而不信任他們了。假如他們掌握政

權，我們得着了羣衆擁護和信仰，那就可以用選舉的方法，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驅逐出蘇維埃。因此蘇維埃雖然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導的組織，但是我們還是要提出蘇維埃掌握政權的口號。

5 提出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國會制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是主張國會制度，列寧主張用蘇維埃制度代替國會制度。蘇維埃有一切司法行政立法的權利，不需要國會。國會是虛偽的官僚機關，蘇維埃應當自下到上的建立全國的工農兵士的羣衆代表會，使生產者能以管理政權。

6 土地問題，應當提出沒收一切地主教堂及貴族的土地，並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由蘇維埃分配給農民耕種。

7 沒收全國銀行，建設全國統一的銀行，直接歸政府管理。

8 一切重要產業都歸工人監督生產，監督分配。

9 改變黨的名稱，列寧說：我們現在不能叫社會民主黨了，因為孟什維克派將這個名詞侮辱了，我們應當用馬克思在發表共產主義宣言時候所用的名稱。馬克思在發表共

產主義宣言的時候，爲什麼不叫社會主義宣言。而叫共產主義宣言呢？爲的是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接用『社會主義』的名稱，欺騙了廣大的羣衆。當國際社會民主黨叛變以後廣大的羣衆也就感覺着現在社會民主黨的名義表決了革命的意義。所以說社會民主黨的名稱被孟什維克出賣了。我們現在應該不叫社會民主黨而叫共產黨。列寧並提議於最短期間召集布爾塞維克全國代表大會，重新審查黨綱。

10 重新發起無產階級的國際，應該叫做第二共產國際。因爲帝國主義的戰爭，把第二國際的革命性消滅了。

這是列寧所提出之四月大綱。這個大綱提出以後，不僅使布爾什維克黨員受了很大的刺激，並且使布爾什維克的一切敵人都受了很大的恐慌。在大綱發表以後，所有孟什維克及資產階級都散發傳單，說這個大綱是非常危險的。布爾什維克是破壞革命的，列寧是革命的破壞者等等。布列哈諾夫說：列寧是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的冒險者。就是布爾什維克內部，也是不十分了解這個大綱。列寧的四月大綱發表之第二日，就有加米列夫首先提出這樣意見表示反對。他說：這路線是錯誤的，這是列寧的私人意見，布爾什維克的意見不是這樣。

他說列寧根本路線之錯誤，是他的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路線，而俄國現在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所以他是錯誤。

加米列夫的意見發表之後，接着就是開布爾什維克的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在這個會議上，就發生列寧和加米列夫之嚴重的爭論。在爭論中主要的就是他們兩人表示出兩個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爭論問題的中心點：現在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是否完結了？現在的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是否已經實現？現在是否應該做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作，這是根本的理論問題。加米列夫的理论是這樣，我們老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就是要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這個任務到現在還未完成土地問題亦還未解決。我們現在的任務，還是要領導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過渡到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因此現在還談不上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因為他們自稱是一九〇五年的老策略，所以他們就稱為「老布爾什維克」。

列寧當時的意見說：工農專政在俄國已經實現了，並不是沒有實現。這個實現是甚麼？就是現在的蘇維埃，蘇維埃的領袖因為快愾的原故，不能完成這一任務，但在他的階級關係上所代表的却是工農專政。目前我們已經看到臨時政府，這是資產階級得着政權的表現。在

這一點意義上說，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完結了。至于土地問題，則他在現在已經是不能解決的了。他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才能得着徹底的解決。列寧當時很注意到俄國革命後之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兩個政權的實現。二月革命以後，成立了兩個政府，一個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一個是蘇維埃的工農專政。所以說資產階級革命意義完結了。但是他的革命任務，還有許多是沒有解決，也就不能解決了。因為當時階級鬥爭的尖銳，使這些任務，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全部底于完成。

加米列夫又提出另外一個意見。他說：很簡單的例子，現在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我們是需要廣大農民羣衆的合作。假如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那不只有無產階級單獨去幹麼？現在還不是無產階級單獨去幹的時候，我們現在還不能單獨的去幹，還是要聯合農民，因此證明現在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列寧說：這種意見是完全錯誤的。現在我們因為資產階級現在沒有能力解決土地問題，資產階級不能領導農民以解決土地問題。能以滿足農民之需要而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因此，農民可以服從無產階級的領導。現在的形勢，是一定要等到資產階級

的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土地問題才能得着澈底的真正的勝利。因為這種客觀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必然要和一部份農民合作的。

列寧說：布爾什維克黨與國際機會主義者的區別，就在機會主義者將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絕然的分開，中間好像隔着一座萬里長城。布爾什維克否認這種理論的。布爾什維克承認資產階級革命的澈底勝利，就必然要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確是由資產階級革命之澈底勝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只有機會主義者，才說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必先要建立資產階級政權，必要經過資本主義經濟和平的發展，才能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就不是這樣。當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趨于勝利，無產階級就可以起來領導革命，以走到革命的澈底勝利。既然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佔據了廣大勞苦羣衆中之最高的領導地位，則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便必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和平的發展。

在這個爭論中，就表示着非常嚴重的意義。贊成加米列夫意見的人就另外形成組織，名之曰老布爾什維克。因為他們是繼承一九〇五年的「老」政治路線，說列寧現在是改變了，

不像一九〇五年的列寧了。一九〇五年的列寧是主張工農專政，現在要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和他們的主張現在完全是不相同了。所以他們自己要叫「老布爾什維克」。

列寧說：我們在原則上並不是和一九〇五年不同，只是因為一九一七年的客觀條件與那時不同了。因為客觀情形的轉變，才使我們改變我們舊的主張——工農專政，而為新的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形勢，無論在國際上說及國內階級關係上說，都與一九〇五年不同。假使不認識客觀環境的轉變，只知道死守一九〇五年的條文，這種布爾什維克，只好放在古物陳列所了。這是當時對加米列夫的批評。

在四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爭論的結果，大多數通過了列寧的意見。從此以後，布爾什維克才有統一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故四月大綱在俄國歷史上，在整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發展的歷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大綱，很明顯的表示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總的政治路線。

那個時候，布列哈諾夫對於列寧也有他的批評。他的理由是說列寧的主張是代表民粹派思想之復活。我們知道布列哈諾夫在過去馬克斯主義反對民粹派的鬥爭中，曾經努力駁斥當

時民粹派之農民社會主義的理論。對於列寧現在之主張，布列哈諾夫批評爲以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就是民粹派思想之復活。自然這是十分錯誤的。列寧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自然，他的主要力量仍是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只是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之一種策略，絕不是依靠農民來做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十分顯然的。

此後布爾什維克的整個路線，集中於一切政權歸于蘇維埃的口號。號召廣大羣衆，于「和平」「麪包」口號之下來鬥爭。要和平，就要停止帝國主義戰爭，要麪包，就要解決土地問題，同時要工人羣衆堅決要求八小時工作制。

在五月初，協約國——即英法等，給了俄國臨時政府一封通牒，詢問對於戰爭的態度。俄國外交總長米留可夫，也就給了一封回覆。主要的就是臨時政府繼續沙皇的政策。對於沙皇和各國過去所訂之條件，認爲完全有效。並繼續沙皇而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

通牒在五月三日發表了，引起廣大羣衆之反感。布爾維什克在這個時候，號召廣大羣衆反對戰爭。告訴羣衆說臨時政府是繼續帝國主義之政策。結果就組織五月五日之廣大示威運動。

五月五日示威的影響很大，主要的反帝國主義戰爭。臨時政府不得不重新改組，示威運動驅逐了外交總長米留可夫。資產階級于是就改變政策。拉攏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黨員組織聯合政府。克爾斯基是社會革命黨黨員，同時又是聯合政府中組成者之一，聯合政府便是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者』的聯合政府。資產階級想以此欺騙羣衆和無產階級，但是以後的作用很小。布爾什維克不斷地揭破了他們對於羣衆之欺騙。尤其在以下的幾個問題上，聯合政府是不能够——也就不願——堅決執行的。

第一，如八小時工作制。布爾什維克主張立時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但是臨時政府是沒有這個決心的。他向工人宣佈，現在是戰事緊張的時候，不能實現，八小時工作制，等到戰事結束後，才能做到。布爾什維克號召工人，只做八小時工作。號召工人做了八小時之後，就離開工廠回到家去。就在這個堅決的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中，布爾什維克領導了許多廣大羣衆反對臨時政府的運動。

第二，關於土地問題。俄國地主擁有廣大的土地，農民要求平分土地。臨時政府說：農民分地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能。因為現在要是分地，則前線戰事，就要瓦解，士兵就要回

到家裏去分地。所以要等到戰爭勝利以後，才能分地。布爾什維克當時就號召農民，立刻自動的瓜分土地。因此在克倫斯基政府組成之後，就由社會革命黨領袖統率士兵到鄉村去壓迫農民的暴動，廣大農民羣衆於是都認識了臨時政府之假面具。

第三，關於招集國會問題。俄國羣衆爲國會奮鬥，歷數十年之久。現在廣大羣衆普遍的有立時召集國會之要求。臨時政府一樣是說，必要等到戰爭後，才能召集，因爲這樣才免得影響戰爭。

布爾什維克的政綱，本來是主張自上至下都全用蘇維埃的組織，不需要官僚主義的國會制度。但是羣衆到了自動的要求起來召集的時候，臨時政府又盡量不願意召集的時候，布爾什維克也就號召羣衆選舉代表組織國會。

以上的種種問題，臨時政府均無法解決。國會呢！等到戰後再說。土地呢？等到戰後再說。八小時工作制呢？也等到戰後再說。——一切都要等到戰後。羣衆對於臨時政府的不滿，於是一天一天的劇烈了。而在布爾什維克在羣衆的影響也一天一天的增加擴大。布爾什維克就在領導羣衆，反對戰爭，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實現平分土地及自動的招集國會的鬥爭

中，奪取了廣大的城市鄉村及兵營中的羣衆。布爾什維克影響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

所謂七月事變，就是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的大示威運動，武裝巷戰。這一暴動是當着克倫斯基政府宣佈新的進攻，新的動員令，繼續着和德帝國主義劇烈戰爭的時候。羣衆們起來堅決的反對戰爭，又加以布爾什維克之鼓勵。羣衆的情形，是非常高漲。布爾什維克在這時之主要口號，是號召羣衆，主張一切政權歸于蘇維埃，打倒資本家政府，等等。

七月事變，已經看見聖彼得堡的羣衆是到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有幾十萬羣衆，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要求一切政權歸于蘇維埃。這個示威的結果，就引起武裝衝突，引起暴動引起政府與蘇維埃對羣衆之大的屠殺。這個屠殺，就使羣衆認識了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之真正面孔。

七月事變以前，列寧曾說由現在的蘇維埃是可以和平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甚麼是和平轉變呢？在開始說過。怎樣能由蘇維埃的工農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呢？假如，蘇維埃能握着了政權，布爾什維克可以用選舉方法，佔據蘇維埃的大多數，逐漸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這不是和平轉變麼？這就是由蘇維埃的工農專政和平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七月事

變以後，這種和平轉變是沒有可能了，是不能做到的了。只有武裝暴動，才能將政權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所以說七月事變是和平轉變的最後企圖。

七月事變後，就到了一個極反動的時期。七月事變以後，羣衆和布爾什維克慘遭了嚴重的失敗。布爾什維克的報紙被封閉了。在這時臨時政府下了一個命令，通緝列寧及季維諾夫和一切布爾什維克的重要領袖。臨時政府說：列寧及其黨徒，都是威廉第二的偵探。德俄是交戰的國家，德國怎樣能取得勝利呢？所以德國就取買偵探，宣傳反對戰爭，進行國內戰爭以推倒本國政府。列寧能在一九一七年俄德戰爭方酣時，由瑞士轉德國回到聖彼得堡，顯然是得了德國的允許與收買。當時法庭並偽造了列寧和威廉第二的通信，並說列寧受了德皇許多萬馬克的賄。於是就以偵探罪名，大批拘捕布爾什維克。布哈林托洛斯基就在此時被捕下獄，列寧和季維諾夫都穩藏起來。那時就只有斯他林指導布爾什維克工作。在這八月就舉行了布爾什維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列寧因為政府通緝，不能參加，國民與革命一書，就是列寧於此時寫成的。此次大會決定，奪取政權；由資產階級的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及武裝暴動之計。

跟隨着八月大會以後，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的影響，一天一天的更擴大了。結果就有反動軍隊準備努力進攻聖彼得堡。當時有反動將軍考爾季諾夫他是最反動不過的軍隊——他打的旗幟，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保皇黨的。——由前線開回聖彼得堡，目的是在鎮壓聖彼得堡的革命運動；解散一切在布爾什維克掌握之中的蘇維埃，同時壓迫布爾什維克的組織。

考爾季諾夫由前線回到聖彼得堡，這一段歷史詳細說來，非常有趣。由這就可以證明布爾什維克在士兵和農民中間工作方法之巧妙。考爾季諾夫的軍隊，非常反動，任誰也料不到這些軍隊會有布爾什維克化。考爾季諾夫由前線開回聖彼得堡的時候，因沿途交通之破壞，沿途多停頓。每到一站，布爾什維克便號召廣大的羣衆，包圍士兵。羣衆向他們演講，宣傳。主要口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鼓勵士兵回家奪取土地，同時告訴他們，不要壓迫革命運動。要和工人連合起來，共同革命。反革命的考爾季諾夫的軍隊，沿途都受着廣大農民熱烈的宣傳。結果使他們掉過槍頭來贊助革命。在未到達聖彼得堡的時候，就把反動軍事首領考爾季諾夫捕捉起來，這是誰也不及料的。這件事情，對於革命的廣大的羣衆，有很大影響。

在考爾季諾夫軍隊向聖彼得堡進行時，聖彼得堡當然料不到有這樣大的成績，故積極進

備自己的武裝。把聖彼得堡的工人，統統武裝起來，同時改選下級蘇維埃。結果，大多數的蘇維埃，都被布爾什維克佔據了。除了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兩個大城市外，到處都有農民暴動。革命的高潮，一天一天的發展了。而臨時政府就非常薄弱，無力壓迫革命。這時臨時政府就決定這種策略，甚麼策略呢？是將自己沒有能力壓迫革命的軍隊調離前線，讓敵人的德國佔領聖彼得堡。以德國戰勝之威和新式的技術，來壓迫俄國的工農革命運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經常所喊出「民族利益」和「保護祖國」的欺騙口號，是甚麼作用。在「民族利益」「保護祖國」的口號之下，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益的時候，他就盡量用他以欺騙工農，使工農為他的利益而犧牲了。等到工農運動的發展，震憾了資產階級基礎，他就不怕出賣民族的利益而和敵國妥協。藉以壓迫本國工農運動。巴黎公社之失敗也就充分證明這一點。就是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假如面前擺着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工農運動的暴興，有奪取統治階級的可能，一是敵國大兵的壓境。在這兩條路只能選擇一條的時候，資產階級肯敵國的軍隊佔領自己的境地，而不願工農運動之勝利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那時法國工農佔據法國首都巴黎。法國的統治階級，當前線和德國大戰方殷的時候，調

開自己的軍隊，反而勾結德國的軍隊，以進攻革命的巴黎。法國巴黎公社就因此失敗了。

在這時候，列寧看到時機危迫。從他隱藏地方寫了幾封催促暴動的信件，交給布爾塞維克中央。說：要很快的組織暴動，假如不乘這時候舉行暴動，以後就難有機會了。這種提議，經過了很多時間和多次的爭論，但是有許多人還是非常懷疑暴動。如季諾維也夫加米列夫就是反對暴動之最為堅決者。列寧很詳細的指出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有充分暴動的條件。假如一再遲疑，俄國革命一定要受很大的影響。列寧又指出，兩個首都（聖彼得堡及莫斯科）的羣衆都爲布爾塞維克所指導，工農運動都有很大的發展，並已很親密的聯合起來，城市的工人和鄉村中的農民現在都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而能積極的活動了，這都是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之很順利的條件。季諾維也夫及加米列夫覺得還有許多和平的幻想。他們只想以和平選舉的方法，擴大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及其在羣衆的政治影響。在他們覺得，組織暴動的前途是非常危險的。暴動完全是冒險主義者。甚至季諾維也夫及加米列夫以退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反抗這個提議。但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會依然通過了列寧堅決的提議，準備了在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時候組織暴動。結果，暴動開始了。聖彼得堡的暴動經過是非常簡單的。只一夜工夫，就

將聖彼得堡佔領了。聖彼得堡的士兵及海軍都在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之下，那時只有少數女衛隊是擔任聖彼得堡的警備。反抗革命運動。所以在很短的時間，能把聖彼得堡佔領。第二天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蘇維埃政府之成立。組織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當時舉出蘇維埃政府第一屆人民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主席就是列寧。人民委員會向大會提議三個議案，這三個議案，就是：一，前線立刻停止戰爭。二，地主教堂土地一概沒收，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工人以監督生產和分配。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在整個十月革命過程中，尤其在說到由二月至十月之革命轉變的理論問題中，有一個問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這就是托洛斯基在整個十月革命中過程中的作用。十月革命之唯一的領袖，自然是列寧，因為在整個十月革命的過程中，完全是執行列寧的路線。托洛斯基是參加了十月革命的，並且是十月暴動之一個有力的組織者，這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托洛斯基對於列寧的政治路線，完全在另外一種理論系統的了解之下。因此，關於托洛斯基對於十月革命的認識，我們還有比較詳細說明的必要。

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以反世界大戰中，他整個表現，可以說是和孟塞維克的左派相同。

在他的一切根本理論上，統統是孟塞維克的觀點，但是對於世界大戰的態度，却和其他孟塞維克不同。大多數的孟塞維克是和資產階級的口號一樣，是「保護祖國」的，所以稱為護國派。而托洛斯基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所以就稱為國際派。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托洛斯基主張國際工人不應當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入伍，不作戰。這種消極的不革命的觀點，在國際革命運動的發展中，他也漸漸改變了。二月革命以後，俄國羣衆的革命情緒是高漲的，因之，托洛斯基的態度一天一天的比較「左」，漸漸就和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接近了。

列寧在發表四月大政綱以後，托洛斯基曾經表示過他要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本來很早就提出來了，但經過長期的談判，未能成爲事實。因爲在他那時加入布爾塞維克的條件他是要保留自己的小組織，自成一派。他要永許他以整個組織加入布爾維克。他還要永遠保持着他的小團體。他加入的時候，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列寧非常陰險的，我們要保持着我們的組織，才能存在，然後才能得着地位。」當然，在這種原則上，列寧是不曾允許的。經過很多談判以後，他才取消他的意見，否認了以前的原則。才以托洛斯基個人的資格，加入布

爾什維克黨。

托洛斯基究竟爲甚麼加入布爾什維克？理由在那裏？理論的認識又在那裏呢？在以後他在論到十月革命的著作上，說到了一九〇五年的經驗，他發表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意見。他說：我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提出了俄國革命是「不斷革命論」。爲甚麼是不斷革命？就是說：俄國革命不勝利則已，倘若勝利了在推翻沙皇之後，便急轉直下無間斷的直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是不需要農德莫克拉西專政，俄國是不會有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的，經過十月革命之事變，完全證明了「不斷革命論」之正確。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之路線，就是和我托洛斯基所說的不斷革命論是一樣。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已經在理論上重新武裝了。改造了舊的理論系統。只有加米列夫是「老」的布爾什維克策略。列寧是已經不用「老」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了，所以列寧批評老布爾什維克是不對的。這就是一九〇五年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記，在一九一七年完全實現了。這個理論是在一九二四年托洛斯基自己所寫的。在他所著「十月革命之教訓」一篇論文中，有系統的發表出來。托洛斯基發表這個理論的時候，那時十月革命已經過去得很久了。列寧已死去了。這個問題顯然只是理論的，但仍是非

當嚴重的問題。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究竟是列寧主義的勝利，還是托洛斯基主義的勝利？

在俄國共產黨中，經過了極長的極熱烈的討論，在所有支部中都引起了激烈的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都認為十月革命證明了托洛斯基不斷革命的理論系統是不正確的。二月到十月，革命的革命策略與革命性質是列寧主義的根本問題。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是整個革命轉變的過程。這革命轉變的策略，托洛斯基認為是與一九〇五年的布爾什維克根本不同。托洛斯基謂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在策略上是一『重新武裝』了。什麼是重新武裝呢，便是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反學習了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不斷革命論。照托洛斯基這樣說來，簡直是列寧變了托洛斯基主義者，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策略是不正確的。自然，在當時列寧主義者看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的。當一九〇五時，那時在革命羣衆面前主要的任務，是推倒沙皇，肅清封建勢力，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二月革命以後，已經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政權，並且實現了工農的德莫克拉西專政。在國內以及國際上的形勢，都不與一九〇五年相同，已經到了無產階級直接暴動的時期。三月革命以後，已竟轉變到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布爾什

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策略是對的，在一九一七年的策略也是對的。一九一七年的策略與一九〇五年在原則上並沒有絲毫的差異，只是在新的歷史環境中，所以就有新的策略。

一九〇五年列寧只提出澈底實現資產階級的民權，需要工農的德莫克拉西專政。主要的還沒有革命的轉變的任務，革命的轉變還不在議事日程中。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就不限于資產階級德莫克拉西的任務，他有了新的任務，就是使資產階級德莫克拉西的革命繼續發展而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武裝暴動。所以列寧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〇五年的原則上並沒有絲毫的不同，只是在歷史上的兩個環境不同，所以方法也就不同了。

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絕對不與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相同。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成功，而革命將要發動的時候提出來了。十月革命却是二月革命之後，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經完成之後，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而成功的。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是超過了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而直接做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是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澈底完成之後，轉變下一個階級。十月革命經過了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才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十月革命並不如托洛斯基的理論。

還有一點，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是不需要農民的，是「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權」。而十月革命是工人領導廣大農民成功的，十月革命的革命動力，不僅僅是無產階級，並且還有廣大的農民羣衆參加。就是參加十月暴動的，除布爾什維克外，還有代表農民的左派社會革命黨。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建築在工農發生衝突，工農絕對不能聯合建立政權的。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所實現的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在農民幫助之下，才使革命得着偉大的勝利。這一點也是與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相反的。

由這幾個要點，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但不能證明托洛斯基之不斷革命論的正確，而相反的，他是實現了由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完全證明列寧主義的成功。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他想以十月革命的事實來裝飾他的不斷革命論，這完全是修改抹殺歷史的罪人，同時修改了列寧主義。托洛斯基相以不斷革命論的理論系統，來推翻列寧主義，而代以托洛斯基主義。這一企圖在俄國受了非常嚴重的打擊，鬥爭的羅輯，一直將他驅於國外。十月革命的性質，自然都十分的認識牠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但是因爲十月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而轉變過來的，所以在

十月革命中間，同時還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澈底的勝利。十月革命完成了這一工作，如十月革命解決了土地問題及民族問題是、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也是在估計十月革命性質上要顧及到的。由這個革命性質上之估計，就可以明白布爾什維克關於兩個革命轉變的策略。列寧認為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裏面，就包含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成份，革命愈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的成份就愈多愈以加強。資產階級的革命，走上澈底的勝利，則社會主義革命的成份便愈加愈多。由數量的轉變可以到質量的轉變，無產階級革命成份的加多，則革命性質也就要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中，仍包含有不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成份。並且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時，然後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才能有最後的鞏固。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由這一個革命轉變到那一個革命的理論。

第十三章 波勒斯特和約與軍事共產主義

當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這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和平問題。前線的戰爭是非常緊急的，德國軍隊節節進攻。在革命前，俄國軍隊迭次失敗。蘇維埃政權在當時自然沒有可能去進行戰爭，也就沒有軍隊可以戰爭。舊的軍隊——即沙皇的軍隊——大都瓦解，此時士兵都回家分土地去了。新的軍隊——紅軍——還未組織起來。很少數的由糾察隊初改編的紅軍，在這時有很重大的其他的責任。因此，當前的問題便是對德和約問題。

關於和約問題，當時分作三種意見。第一，是列甯主張馬上和德國訂立和約。第二，是布哈林，反對列甯的意見，說現在的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不應同對強盜的帝國主義妥協

讓步。並是現在是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無產革命的怒潮，一天一天的高漲了。俄國工人正應當進行革命的戰爭，向帝國主義繼續宣戰。所以不應當和德國提出構和條約。第三，托洛斯基主張，不戰爭也不和平。即是不準備戰爭，也不交涉談判。開始這三派的意見，開始贊成布哈林主張的，要佔大多數。一九一八年一月廿一日在聖彼得堡召集一個積極份子會議，解決這個問題。這會議裏面，到的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及聖彼得堡高級負責人員，共六十五人。其中贊成托洛斯基的主張有十六人，贊成列甯主張的有十五人，其餘的三十四人都是贊成布哈林主張的。證明布哈林派佔會議席中的半數以上，到一月廿二日，復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將各方面的意見都顧及到了。結果，通過了不戰爭也不派代表進行和議的決議，這是托洛斯基的路線。但是雖然通過了這一決議，但這種決議自然表示中央的路線是非常動搖的。這時候，下層羣衆的爭論，就非常劇烈。在布哈林領導的莫斯科區執行委員會——布哈林的書記——是贊成布哈林的意見，因此在許多地方許多問題都表示非常分崩離折的意見，中央的路線，也只是白字上的黑字，沒有方法去遵照施行。

到了二月間，德國的軍隊繼續進攻了，得着了很多的勝利，佔領了許多土地。中央以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有社會革命黨參加）又復決定，改變原先的路線，派遣代表要和德國談判了，代表團的首領，就是托洛斯基。談判結果，德國要割讓很多的土地，以及許多有利于德國的條件，自然使俄國代表團難以允許。代表團的領袖托洛斯基，也就不敢簽字，于是就將這個問題提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列寧提出的承認這些條件而簽字，但僅僅只博得少數委員的贊成，不能通過。和平決裂了，德國很猛勇的繼續向蘇聯進攻。列寧看到形勢危急，又跑到中央執行委員會，要中央勿論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應當承認德國的構和條約。結果中央通過了他的提議，乃致電住德的代表團，催促其迅速簽字。可是德國到了這時，他却變更了以前的條件，又提出新的更不利于俄國的條件，又要更大的土地，更多的賠款。這個條件，使俄國代表團又難以簽字，又將這個問題提到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對於這難以容認的條約，在開始的時候又不能通過，同時更惹起廣大羣衆的注意。列寧在這個時候，依然堅持他的可以承認的主張很努力的把他的主張，向一般黨員解說。當時許多人向列寧說，以前你主張簽字是對的，可是現在就不够了。因為這個條約使

我們吃的虧太大了，勢將與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以很大的影響。——列寧說：以前我主張簽字是對的，現在我主張簽字，依然是對的。我們經過了很多時期的戰爭，內外的搔擾，已經到了精疲力竭的時候。我們要留一點休息的時間，使我們得以「鞏固政權」，「建立紅軍」。否則我們所說「進攻，進攻」，完全是癡人說夢。所以我們要暫時的犧牲讓步。那時布哈林所領導的左派，叫「左派共產黨」，大罵列寧是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的政策是和帝國主義妥協的，不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利益之上去解決一切問題——兩派經過很長時間的爭論，終于沒有得着解決。列寧最後提出，他的意見若不能通過，則他必要退出中央和政府。用這來促起中央委員會的注意。自然，列寧是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中最有威望，最有能力的領袖，他這樣堅決的主張，自然有很大的影響。于是中央就在這樣情形之下通過了列寧的意見。但是布哈林所領導的左派共產黨員，在中央通過這個決議之後，仍然宣佈不服從中央。莫斯科執行委員會也通過了不信任中央的決議。那時不僅僅莫斯科，還有其他好多的省執行委員會，脫離中央而獨立。中央在這種嚴重狀況之下，無產階級的政權開始組織，還沒有達到鞏固的時期。德國的進逼，前防戰事非常危急。國內反動勢力的到處蠢動，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恐慌。在這時

候，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分裂，成了非常嚴重的問題。反對中央的布哈林派，開始的時候要佔全黨百分之四十以上。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肆意造謠。大罵列寧及布爾什維克。資產階級的報紙說：『我們在列寧回國的時候，就已經指出列寧是德國的偵探。他爲買好子德國起見，提出變國外爲國內戰爭的口號。現在列寧又主張割地賠款給德國，這完全證明列寧和其黨徒是祖國的叛徒』。這些自然是瞎話，但資產階級的報紙卻言之成理，打擊列寧。當時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員，也是贊成布哈林意見的。他們在那時候曾和布哈林商量，組織暴動，推翻人民執行委員會，打倒列寧，等等。布哈林只覺得這樣做去是要不得的，但並未將這個消息報告給中央委員會。這證明這個問題是到了這種嚴重狀況之下了。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得着最後的解決。全黨的大多數，通過了列寧的意見。

在這時候，大多數的黨員羣衆，是在列寧領導之下和左派共產黨作激烈的鬥爭。不僅在和約問題上，同時還有其他許多問題。在無產階級剛剛奪取政權之後，馬上發現資產階級的怠工。不僅僅資產階級怠工，並且還發現了智識份子以及工程師的怠工。怠工的結果，是工程師不做工，工廠不能開工，醫生不看病，政府的職員如書記等等將文卷拿跑了。這時

候，甚麼事也不能做了。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也就是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當時，列寧就主張對於工程師及智識份子，要用收買的辦法，就是多給以物質上的報酬以及工作時間之減少等。比方工人只分得一斤麪包，他們就可以得兩斤麪包，工人得的是黑麪包，並他們得的是些白麪包，再這有工人每天作工八小時——甚或至八小時以上，工程師一天只做一二點鐘工等等。這種辦法，自然是種妥協的辦法。列寧提出來以後，左派共產黨員特別反對，說中央委員會又走到機會主義的路上去了。這種宣傳在工人羣衆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本來在工人們覺得，現在既是我們的政權了，但是我們享的利益爲什麼趕不上工程師呢？我們每天做長時期的工作，只能得着這一點點麪包，工程師只做一點鐘的工，得了那樣白那樣多的麪包！所以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不僅遭了敵人的造謠攻擊同時還受了黨內全志以及一部分工人的謾罵詆毀。

諸如是類的問題，在列寧當初提出意見的時候，可以說只是列寧一個人了解，大多數人是非常懷疑，甚至於還要激烈的反對。情形是漸漸轉變了。事實的變幻，漸漸證明列寧路線的正確。于是由少數人之了解進而至於大多數了解之後，再進而至於通過整個會議，以及全

國的羣衆。在列寧的正確路線指導之下澈底鬥爭。

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的提議。但是左派共產黨依然表示不服從中，同時還有小組織的存在。直到一九一九——二十年，德國革命發生了。德國革命的結果，推翻了反動的威廉第二，蘇聯舍垢忍辱所締結之布勒斯特和約，於是告終。同時，蘇聯並利用其強大的紅軍向德國進攻，奪回了布列斯特和約所損失之土地。僅僅到了這個時候，左派共產黨才承認他以前反對和約觀點之錯誤。布哈林自己也公開承認列寧的路線是正確的，布爾塞維克於是終是統一了。

關於反對左派共產黨的鬥爭，列寧自己對於這一問題，看得非常重要。在列寧主義的發展上也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列寧在他所著「左派幼稚病」一書中說：無產階級的政黨，不僅是要學習于進攻敵人，並且還要懂得怎樣正確地退却的科學，以作進攻科學之補充。列寧又說：會打戰的軍隊，不僅會打勝仗，並且會打敗仗。就是說：當打敗了仗的時候，能夠很有計劃的很能正確的退出敵人的戰線，以便疲困的恢復其實力，補充其損失。假如只知道進攻，只知道打勝仗，在打敗仗的時候，不知道正確的退却，則這種軍隊，就會一蹶不振，沒

有甚麼用處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反動沙皇嚴重的壓迫，逼得布爾什維克不能不採取退守的策略。退守以保持無產階級的組織，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和羣衆的聯繫。在被打敗的革命黨中，以布爾什維克最退得旗幟不紊，頹喪最輕，恢復工作之能力最大。一九一八年德軍進攻蘇聯，形勢非常危急的時候，而自身又無戰爭能力，這時就是需要退守的策略，退守決不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列寧又引一實際的例子，以爲以上所說退守策略之正確。列寧說：比如你乘着汽車出去被強盜攔住了。你必要交出了你底錢，手鎗，汽車，你因此才能幸免強盜的屠殺，向你要求這樣的妥協（我給「你以金錢，武器，汽車，「使你給」我以完全無恙地逃脫虎口的可能），此時如何呢？很難找到一個並不瘋癲的人說，這種妥協是根本不容許的。或者說：這個執行妥協之人，是想同強盜打夥的，（雖然強盜得了汽車武器以後，可用以打劫別人）。列寧認布爾什維克和德帝國主義妥協，正和這樣的妥協類似。

有各種不同的妥協，人們要懂得怎樣分析每個妥協與變相妥協底具體情形和條件。人們應該學習，必要將這兩種人分別開來：一種以金錢兵器交給強盜，藉以減少強盜的兇惡行

爲，以便後來拘捕或槍斃這個強盜——這自然不是機會主義者。他一種如社會民主黨之流，把金錢兵器奉獻強盜，希圖夥串分贓。還有一種是把金錢武器交給強盜，而自己逃過消極不管了。

布勒斯特和約，便是我們和強盜妥協，以便團結力量組織紅軍準備新的進攻，這是正確的策略。

自然在布哈林的意見，就是我們不顧一切去和德國一拼，即或失敗，也不失爲一個英雄好漢，但是這也僅僅是個英雄好漢而已，對於無產階級又有甚麼利益呢？

對於工程師問題，列寧是這樣的解釋。列寧說：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絕對不是和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一樣，就是只顧到目前的利益。無產階級不僅只是顧及到個人目前的利益，同時也要顧及到整個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收買工程師，並不是如資本家之優待工程師而壓迫無產階級一樣，資本家是優待工程師而剝削工人。現在是無產階級政權來收買工程師，這是爲着無產階級政權之鞏固，和經濟之發展。不如此，不能衝破經濟之難關，以和敵人作艱苦的奮鬥。所以收買工程師乃是個正確的策略並不是機會主義，是無產階級保持政權鞏固政

權的方法。

最後，列寧說：左派共產黨表示雖然非常「左」，實際上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冒險主義。不能經常的運用正確的策略，取得最後的勝利。

當布勒斯特和約解決時後，正是當着國內經濟建設非常困難非常複雜的時候。德軍的進攻，同時又勾結保皇黨佔據烏克蘭。隨着還有其他的反動勢力也佔據了很多的地盤。尤其是帝國主義者的武裝進攻蘇俄，表現非常努力。在當初是德國，和德國同時積極向蘇俄進攻的，還有法國。因為法國帝國主義從前與沙皇是結了很深的不解之緣的。沙皇曾向法國借了很大的外債。法國在俄國市場上之投資，也到了一個驚人的數目。法國在沙皇時代，却實也算俄國第一債權國。沙皇推倒，蘇俄成立，首先否認一切的外債。法國這種巨大的損失，當然使他不能忍受。德英都借給了俄國很多的國債，不過沒有法國那樣多，這在以前都已經講過。他們首先向俄國進攻，這當然也是一個原因之一。當然不能只算是個原因之一，其實他們進攻蘇俄的基礎，自然因為他們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所以在這開始的時期，武裝進攻蘇

俄的，以法國最爲急進，最爲激烈。法國會運用了許多陰謀詭計，收買反動將軍，組織軍隊，向蘇俄圍攻。尤其是捷克斯拉夫人，在法國指揮扶助之下，佔據南俄很多地盤，甚至有時還逼到莫斯科的附近。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是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如英德法義美波蘭，及東方的日本都瘋狂似的參加了武裝進攻蘇俄。蘇維埃在國內戰爭激烈，帝國主義圍進狀況之下，各方面感覺了很大的困難。

在經濟上，主要的生產不能進行。如產煤區域東巴斯，時常被反動軍隊隔斷。即有出產但亦不能運至聖彼得堡及其他工業區域。麵包產地如西比利亞及烏克蘭，也是時常被敵人佔領。反革命的將軍，又在兩個重要區域建立反革命政府，哥恰克在西比利亞建立北俄政府，尼台金在南俄建立南俄政府。在最危險時期，僅僅只有聖彼得堡及莫斯科附近地域及北俄一帶，是在蘇維埃指揮之下，其餘的地方都被敵人佔領。這個時期，是怎樣的嚴重呢？

在軍事上應付廣大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是非常困難的事。各帝國主義乘戰勝之威嚴，復以新式的科學的武裝向蘇俄進攻。而蘇俄農民拿著很舊式的，很落後的武裝，甚至還有以

農村生產工具作武裝，以和敵人對抗的。紅軍才開始組織，還是工人糾察隊的形式。戰爭技術，更是談不上的。再還有紅軍沒有紅色軍官，僅僅只能利用少數白黨軍官。軍事上種種的弱點，使國內戰爭，走上非常嚴重的地步。嚴重的具體表現，就是蘇俄軍隊的屢次失敗。政治上經濟上之弱點整個暴露，到處發生絕大的恐慌。政治上弱點之發展是隨着經濟上弱點之發展而發展的。那時蘇俄沒有任何經濟之建設，甚至供給在前防作戰的紅軍需要就沒有。全國生產，都完全停頓了，工產品無從生產，工業生產品既然沒有，當然不能使產生麵包的農民拿出麵包來。要使農民拿出麪包來，只有拿農民所需要的工業品和他交換。但在現在的蘇俄，是沒有這種力量的，是沒有任何城市工業品可以向農民交換的。在這種不能以工業品滿足農民需要狀況之下，自然不能希望農民自動將麵包拿出來以供給紅軍，沒有辦法，結果，只有實行軍事徵收政策，這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

不解決麵包問題，則不能使紅軍在前方作戰。槍炮之不犀利，以及軍事技術之落後，都還有紅軍勇敢犧牲來補救。假如麵包不夠吃了，則一切都是要失敗。以前蘇俄軍事上之失敗，大半都是由此。至于城市工業品之生產，也是非常渺小。尤其是重要工業，發生嚴重的

困難。有些工廠，被國家沒收了，沒有能力去開門。有些是原料的缺乏，不能開門。就或少數生產品，也不能讓各工廠自由的買賣分配，必定要將所產生的物品先行交給國家，由國家分配給紅軍。在這種狀況之下，為應付國內戰爭擴大之需要起見，於是軍事共產主義就適應這種環境而產生了。在蘇維埃政權開始組織的時候，並沒預定走向軍事共產主義。列寧在當時曾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無產階級開始的經濟政策，大部分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列寧提出許多經濟建設的計畫，終于因為以上所說種種原因，未能照着實行。結果實行了當初所決不意料的軍事共產主義。軍事共產主義是什麼呢？可以分幾方面來說：

自無產階級建立政權以來，首先就沒收一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地主的貴族的以及教堂的土地都完全沒收了。土地沒收之後，農民統統是在國內階級戰爭狀況之下。每個鄉村的農民在分配土地的時候，都為土地革命作激烈的鬥爭。在這種環境中，固然有一部分農民自動的將麵包拿出來供給紅軍，但是就整個農民情形說來，這種現象，是十分渺小的。若就農民所自動拿出來的麵包，則絕不能供給廣大軍事上的需要。本來農民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拿出他們的麵包，供給了紅軍的需要，使紅軍能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之下得着了勝利，他們奪取

的土地，才有充分的保障。但是他們總不相信紅軍有完全勝利的前途。他們以為將麪包拿出以後，他們奪取之土地，未必就有很大的把握。所以許多農民始終是動搖的，始終動搖在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勝利的中間。

在農村中，只有富農和中農是貯藏有大量的麪包，富農很早就反革命了。中農是農民中間特別動搖的，尤其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戰爭以及政權尙未鞏固的時候，他們的動搖特別利害。所以有麪包的農民羣衆，很難得自動的交出麪包，使蘇維埃政府不得不用紅軍到農村中去徵收。開始的時候，發佈了許多佈告，勸農民自己將麪包拿出，以後漸漸的派軍士到農村強制徵收。許多農民却將麪包藏在非常秘密的地方，所以因徵收麪包而引起許多混亂，這也是事實上不可否認的。

有時白軍打來了，蘇維埃政權推翻了，農民所奪取的土地又被地主佔去。等到紅軍打來了，土地又歸了農民，但是紅軍來了，是需要徵取農民麪包了。所以農民時常是徘徊在「要麪包呢」「要土地呢」的歧途中，自然，廣大農民是需要土地的，而白軍于奪取土地之外，還同時也需要農民麪包。當時農民權衡輕重，當然對於紅軍，還是抱着偉大的希望。

總計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在農村中的政策，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武力徵收麪包，有計劃的分配給紅軍。

第二，組織貧農委員會。在那時候，有許多農村蘇維埃完全在富農和中農領導之下。若希望以他們的力量去徵取麪包，自然是難以做到。所以在農村中就只有依靠貧農，貧農知道誰家有麪包，誰家有好些麪包，甚至藏在甚麼地方，這是他十分清楚，而且又非常願意說出來的。貧農在軍事共產主義實行徵收麪包的時期中，盡了偉大的力量。

第三，擴大農村無產階級的組織，蘇俄農村之工業品的程度還非常弱小，所以無產階級的力量異常薄弱，這種組織，因此也並不十分發達。

第四，建立農村協作社與組織蘇維埃農場，不過同樣是實現得很少，僅僅有這種提議而已。

所以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所謂「共產」之最主要的表現，不過是「共」農民的麪包而已。只有這樣，才能應付戰線上紅軍的需要。

對於這個問題，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當時蘇維埃政府能徵收很多麪包，有計劃的供給

紅軍，確實與軍事上以很大的功效。自軍事共產政策實行以後，歷年徵取農民之麪包，其數量如下。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開始的一年）徵收了一百零八個百萬普特，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徵取了二百十二個百萬普特，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最後的一年）徵取了三百六十七個百萬普特。這個數目字，是非常之大的。當沙皇時代，自農民徵取的麪包（代替國家租稅）最多每年也只能徵取到四百萬普特。和軍事共產時期最後一年相比，相差竟至九十倍之巨。爲什麼在軍事共產時期，農民能付擔這樣大量的麪包呢？固然，資產階級的報紙說布爾什維克會「搶」布爾什維克自然不絕對否認，但是沙皇又何嘗不是「搶」呢？實際上這種「搶」的作用所收之效果是十分微小的。「搶」絕不是唯一的根本辦法，軍事共產政策效用之偉大，絕不是「搶」所能做到的。

這個就談到建設革命政權的根本問題——經濟問題了。這個就有非常大的意義了，這個就關係到革命政權在敵人的封鎖壓迫搗亂的狀況之下的生死存亡問題。假如能衝破這個經濟的難關，革命政權就會走上平坦的康衢大道，否則就會在敵人的鐵腕之下夭折了。

沙皇也曾以軍兵向農民強制征收麪包，但是牠所能獲得之效果，却遠不及蘇維埃，這完

全是前者和後者政權的迥不相同，而後者是澈底的實行了土地革命，沒收一切土地，減輕了農民負擔。使農民雖然交出大量麪包，但仍較沙皇壓迫之下要輕得多。

在一九一八年共計沒收地主土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教堂土地三、五〇〇、〇〇〇俄畝，及貴族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俄畝，總共每年解放農民三百——四百五十個百萬盧布租金這就是蘇維埃政權與沙皇大不相同的地方。這就是農民固然供給了政府大量的麪包，同時却豁免了地主教堂貴族的租金。

譬如在革命以前，農民對政府的稅收，只能負擔全部生產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但是要交給地主的，却有百分之五十，交給教堂及豪紳所謂地方稅收的，則有百分之十或二十，農民在國家稅收的付担，表面上是非常之輕的。

在革命政權建立以後，為解決目前困難經濟問題，向農民征收大量麪包——即國家稅派——佔農民全部生產百分之廿，乃至三十。但是他免除了地主教堂及地方稅收，澈底沒收了他們的土地，消滅了一切特權，所以即使農民對國家增加十倍的稅收，但農民仍然有負擔的可能，並且還樂為負擔。

所以要解決革命政權建立以後的經濟問題，只有依靠廣大的農民羣衆，切實推倒剝削農民之地主階級，掃除一切農民的剝削。只有這樣，在農民剝削掃除之後，才能徹底解決革命政權的經濟問題。

在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政權開始組織，必不可免的要遇到嚴重的經濟恐慌。這個挽救的辦法，是要看革命政府有無堅決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假如沒有堅決的政策，不能將地主教堂貴族的土地馬上沒收，那麼，蘇維埃便沒有辦法向農民徵收麪包，沒有辦法解決經濟的困難問題。所以土地革命不僅是革命任務上要解決土地問題，並且在鞏固革命政權的任務上也同樣必要解決土地問題，否則政權就不成立和鞏固。

再講到工業方面，當蘇維埃政權開始組成以後，列寧提出在原則上是要沒收工業和一切產業，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策略上不要特別鄭重。列寧指出，假使無條件將大的小的工廠一律沒收，則馬上就會使全國經濟整個紊亂。所以在這個時候，不是將全國工業完全沒收，只是將幾個大的重要的工業沒收，但蘇維埃政權執行的結果，不僅將大的產業沒收了，並且逐漸的將小的產業也沒收了。這是因是以後階級鬥爭的尖銳，小資本家也同樣勾結

反動勢力，希圖推翻革命政權，所以工廠的沒收，以後就越過越多，一直到一九二〇年據最高經濟委員會的命令，僱傭五人以上之工業，都在沒收之列。因為以後軍事上的需要，所有的生產品都必要交給國家分配給紅軍，禁止買賣，停止商業關係。假如不禁止商業關係，則一切對麪包及工業品的軍事徵收，都要遭受破壞。那時一切生產品，都在最高經濟委員會統一集中管理之下，貨幣制度也廢除了。

當時既然禁止了商業關係，廢除貨幣。所以在工廠裏在機關裏都廢除了工資薪金制度。每一個人做一天工就得一張紙條，他可以拿這一張紙條，到分配地方去領取他所需要的東西，如麪包番薯及糖之類。開始的時候，每個人所領取的東西是非常之小的，可以說僅僅夠他個人之最低最低限度的生活，可是有時候連這種程度就不能達到。由下面兩段事實中就可以表現當時的生活。

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他準備出外工作。他費了很長的時間，領了三天的麪包，準備歸家收拾行李，以便起程。一面走着，一面吃着，打算着他的事情。可是等他到了他的家中，他所領的三天的麪包，統統吃完了。這種麵包是非常粗糙惡劣的，但在他們看到，都成

了山珍海味而不可多得的东西。這位準備外出旅行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以後在這三天中間就只能吃很苦的番薯以維持他三天的艱辛生活。

在烏克蘭有個農民領袖，是非常崇拜列寧的。有一次他從遙遠的地方要去會列寧。他準備送一點特別的禮物給列寧。這禮物就是一大包番薯。因為在那時候，一大包番薯，就表示唯一無上的敬禮了。

我們由這兩件事情證明，當時一般人民生活，是怎樣的困難。尤其是在一九一九年中，「不蒙天父上帝的保佑」，發生大的天災。自然帝國主義戰爭，及革命暴動對於農村經濟的破壞，土質的不良，以及慨灌肥料的缺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農村經濟的危機。許多農民都飢餓而死了，使全國經濟生活更加紊亂。

在一九一九年蘇俄天旱的時候，美國義賑會大發其「慈悲」的心腸，拿着「人道主義」的旗幟，運了好多麵包到俄國去賑災。他們到了西比利亞以後，召集飢餓的農民去接受他們的恩惠。他們在農民集合之後，將他們帶來的麵包，向地下一倒，許多農民爭先恐後的奪取麵包。他們乘着這個時候，就開動活動機，製成電影。他們又將許多破壞狀況的照片都製

成電影。向新大陸以及西歐大肆宣傳，在西歐工人前面開映，說：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成績，這就是蘇俄實行社會主義的成績。這也就是美國義賑會掌住人道主義旗幟的收獲。

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及全國經濟這樣紊亂狀況之下，共產黨員的工作，特別辛苦勤勞，他成爲一般工人工作的領導者。在一般人的工作，是每天規定只有八小時，但是共產黨員就不同了。他在規定工作之外，還要做許多額外的的工作。就是他每天的工作，是不只八小時而在八小時以上的。同時還鼓勵許多工人，參加額外工作，希圖戰勝經濟上和政治上之困難。于是有所謂『共產主義禮拜日』及『共產主義禮拜六』之組織。本來禮拜日和禮拜六的下午，是不做工作的。但是就有許多共產黨員領導工人羣衆在這假期中間，依然繼續着去工作。所以就成爲共產主義禮拜日及禮拜六了。

在蘇俄當時是有許多工必需品立刻要做的，所以在假期中間，許多人——尤其是共產黨員——是不能空閒着。譬如當時煤炭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必須要到鄉村的去砍柴。還有如鐵路破壞了，馬上要人去修理。像這一類的工作，需要人去特別担負，並需要極敏捷的去做，

這種事情，都是由共產黨員以及所號召的工人。組織『共產主義禮拜六』及『共產主義禮拜日』去工作，這是工作以外的義務勞働。這種工作，却是做得不少，對於當時經濟上的幫助，亦却是有偉大的效果。

再說到紅色恐怖了。在國內戰爭的時候，反革命力量時常實行暗殺的工作。這種暗殺的組織不僅時常在前線上發現。就是在革命戰線的後方，也時常佈滿。他們時常準備着刺殺布爾什維克的領袖。結果，他們的計劃實現了。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有個社會革命黨的女子，行刺列寧。列寧有一次出席工人會議，會議結束了，列寧走出會場，準備上他的汽車，還有許多工人圍着他說話。猛然從人叢中出來一個女子，向列寧放了兩鎗，兩鎗都中了。列寧的一個膀臂受了很重的傷痕。這個女子雖然被捕，但是列寧也有很長的時間，不能參加指導工作。因此也就影響到他一九二四年的病疾！假如沒有這次的狙擊，或許一九二四年是不會病死的。

自從列寧被刺以後，發現了反動派的偉大陰謀，蘇維埃政府於是就實行嚴厲的紅色恐怖。這次紅色恐怖，就捕捉了許多保皇黨憲兵及白黨軍官反革命牧師，比較少的是資本家，

也還殺了一些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被殺得最多的要算保皇黨了。爲實行這種紅色恐怖計，就組織健全的有實力的國家政治管理局，所謂『格迫烏』。

關於紅色恐怖的策略，全黨黨員都是一致熱烈贊成和擁護的。只有資產階級及國內孟塞維克是說布爾什維克想用『鎗』殺出社會主義。我們可以堅決的斷定布爾什維克在當時對付一切反革命派若不堅決的採取紅色恐怖的策略，則蘇維埃的政權是不會鞏固的。

國內戰爭到一九二〇年漸漸的結束了，蘇俄的軍隊得了偉大的勝利。蘇俄的軍隊以落後的舊式的武器，和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的聯合作戰，而能得着偉大的勝利。這確實有他很重要的幾種原因：

第一，是蘇俄動員了廣大的範圍的工農羣衆，積極參加反帝國主義及反對白黨的戰爭。是什麼力量戰勝了帝國主義而鞏固了蘇俄呢？絕不僅僅是這些武裝惡劣供給缺乏的紅軍，——自然他們也盡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出了最大力量的還是蘇俄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羣衆。雖然農民在革命過程中，有時是非常動搖的但在反帝國主義及擁護奪來土地的鬥爭中，却是廣大羣衆動員了。反革命的軍隊，也曾經佔領了許多重要城市，就是莫斯科也曾有幾次岌岌

可危。但在反革命軍隊，距離莫斯科很近的時候，但他們的背後便馬上發生了農民暴動，擾亂了他的後方。在幅員廣大的俄國中，反革命的軍隊是沒有方法將所有的農民暴動鎮壓下去的。如當時日本也曾佔領了西比利亞，但遭受農民的襲擊以後，使他不得不將他所久思覬覦的企圖放棄了。所以廣大羣衆的動員是蘇俄軍事勝利的根本的原因。

第二，西歐無產階級的幫助。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在其本身來說，雖然是失敗了，但是對於蘇俄革命的幫助，却實收了偉大的功效。如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勃興，撕碎了蘇俄所忍垢含辱的布勒斯特和約，奪回了烏克蘭的割地，鼓勵全俄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法國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震撼了帝國主義本國的基礎。帝國主義不得不將進攻蘇俄之武裝撤回，以壓迫本國的革命運動。因此減少了對於蘇俄革命進攻的力量。這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於蘇俄革命的幫助，否則蘇俄革命將受更大的犧牲和長期的圍困。

第三，布爾什維克黨在各種主要問題上，運用了正確的策略，當時正確策略的領導，決實決定了俄國革命的命運。譬如農民問題。關於澈底完成土地革命，組織貧農委員會，都與革命勝利以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適當的時期，戰勝中農的動搖，使他在無產階級領導之

下，一致反對富農。在一九一九年對於中農的政策，是使中農中立，後來環境改變了，馬上能在適當的時間，改變了對於中農的態度。決定聯合中農，加強無產階級革命在農村中的基礎。農民問題，是決定國內戰爭的主要問題。

城市工業問題，也有適當的策略上的轉變，在蘇維埃開始組織，是對於沒收工廠問題，主張鄧重實行。後來看見資本家時常憑借他的生產工具以為反革命的需要，於是馬上改變策略，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厲行沒收一切工廠作坊，集中一切生產于蘇維埃管理指揮之下。這對於蘇俄革命的勝利也有莫大之影響。

組織紅軍問題，也是很堅決執行的。在紅軍開始組織的時候，很難得將紅軍組織擴大。尤其是感覺紅色軍官之缺乏。那時布爾什維克對於紅軍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具體的策略。首先是擴大工農武裝，消滅一切非工農的武裝。就是將一切武裝，都集中于工農羣衆的手裏。軍官方面，則利用舊俄的白色軍官，施行黨代表的制度。黨代表的職權在軍隊中，要比軍官大得多。一切問題，都只有黨代表簽字後，方能發生效力。軍官的職務，僅僅給軍士以技術的訓練，和戰爭時指揮作戰。茲實了廣大羣衆以參加紅軍，在紅軍中非常着重政治教育。這樣

才能很快的建立廣大的紅軍，應付了國內外激烈的戰爭。這也是決定了國內戰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此外還有許多問題，如政治上之堅決，及紅色恐怖的實施，對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都表現了執行了很堅決的策略。這都是勝利的主要條件。

一九二〇年國內戰爭結束了，軍事共產主義的階段也就從此宣告他的責任完畢。軍事共產主義實行到了一九二〇年，客觀的環境，使他非結束不可。同時便需要新的以及適應工農需要的政策，來承繼着他的使命。

一九二〇年末廣大的農民，對軍士的徵取麪包已經深刻的表示不滿。他們積極或消極的反抗這種軍士徵取麪包政策，他們的不滿在許多地方就表示出來，其尤其是在經濟上的怠工表現得更為充分。當時的農民，只耕種僅敷他個人需要的那些土地，多一點田地他就不肯耕種。因為他感覺生產剩餘的物品，還是沒代價的交給蘇維埃，所以他就沒興趣的多餘從事生產。生產的農業品很銳利的減少了。到軍事共產主義的末期，耕地的面積減少，廣大的土地荒蕪，全國經濟的紊亂，已經達於極點。

同時也還有積極的反抗蘇維埃的。一九二〇年反革命的運動力量，在戰線上是失敗了，但是他們還是潛滋暗藏，到處鼓動農民。希圖利用農民的暴動，以推翻當時的革命統治。尤其是以沙皇時代的軍官，進行這種工作，最為努力。甚至當時的農民喊出這樣的口號：「布爾什維克萬歲，反抗共產黨」，「蘇維埃萬歲，反抗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是領導農民，奪取土地的，所以還能博得當時農民之擁護。但是共產黨呢？「共產黨」是一九一八年更改的名稱，自從更改了這個名稱以後，就實行了軍事「共產」主義以徵取農民的麪包。所以當時實行征收麪包損失了他們利益的責任，就應該歸共產黨負擔。農民就在這種口號之下，實行了許多暴動。

農村經濟的破壞，城市工業的衰微，尤其是當着軍事期間，國內戰爭繼續的延長，生產物品僅僅作了軍事的需要。當時交通的破壞，工廠的停閉，工業品的生產，就日趨愈下。我們試舉兩種主要的工業來說，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情形了。

現在就以煤和鐵為例吧。假如以一九一三年的生產為百分之百，那一九一八年煤的生產為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一九年為百分之廿九，一九二〇年是百分之廿七。一九一八年鐵的生

產是百分之十二小數三，一九一九年是百分之二小數七，一九二〇年是百分之二小數四。尤其是以鐵的生產破壞最爲利害。

若連輕工業共同的計算，可得以下之比例。將一九一三年的生產外爲百分之百，一九一七年就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一八年就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一九年降低百分之廿六，一九二〇年爲百分之十八。

全國經濟破壞的浩大，是任何一國所沒有之現象。在歐西各國工業最大之破壞，也只到戰前百分之五十或六十。其中以德國破壞最巨，但也只達到戰前百分之五十。

當然蘇俄經濟巨大的破壞，不是沒有他重大的原因，他遭受了各國所沒遭受的命運：帝國主義長期的戰爭，革命的戰爭，國內的戰爭，帝國主義的進攻圍困，這些都是破壞蘇俄經濟的偉大動力。

在城市經濟鄉村經濟都發了劇烈恐慌之時，就充分的表現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經濟政策。經濟政策是怎樣改變呢？首先就是對農民的讓步，不繼續以前征取農民的麪包，而以農民需要物物品作交換麪包的代價。農民才肯耕種更多的土地，以交換他所需要的物品——如糖是

肥料及布疋等。農村經濟只有在農民很有興趣很有希望的情緒之下，才能發展。但是怎樣能有代價的交換農民的麩包，這就在于城市工業的發展，所以也就改變了以前對於工業的政策，允許商業關係在某種條件之下存在。經濟根本路線改變了，這便是繼着軍事共產主義而實現的新經濟政策。

第十四章 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在一九二一年開始實行了，新經濟的內容是甚麼呢？大概包括以下幾點：

1. 停止軍士征收農民麩包，代以農民依照法律完納單一的糧食稅。
2. 允許商業關係，同時恢復鞏固穩定貨幣制度。
3. 重要工業——如鐵路銀行等等——收歸國家管理，允許私人自由貿易。
4. 設立並發展農村協作社，使小農經濟組織起來。
5. 對外貿易，歸國家壟斷。
6. 允許外人在蘇維埃政權規定的條件之下投資。

由新經濟政策具體實施的方法，可以看出新經濟政策的精神，牠的精神是在允許農民可以有獨立的自己的經濟。使農民于完納糧食稅以外，剩下的農業生產品，有自由處分之權。因此商業關係也就恢復起來了。就是說，農民在有了剩餘的農產品，可以搬到城市，去交換工業品。所以城市工業也就可以漸漸的發展。

在另一方面，並不是使小農經濟無限制的發展，而是牠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組織協作社，使許多小農經濟組織起來，使他們成爲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經濟。

農村的小農經濟使他能變成共產主義者，必需要施以長期的共產主義的教育並且還要多方面的教育。不僅要在文化上宣傳上去教育他，而是要在實際經濟生活上去教育他。這就協作社的作用。

國家用各種方法幫助協作社之建立和發展。如蘇維埃在農村中建設蘇維埃農場，蘇維埃農場是大規模的農村生產，應用新式科學的方法，機械，肥料，因此蘇維埃農場的生產品比小農生產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要好。而運用的勞力比較少。這樣所以鼓勵農民照樣組織，使農民走向集體的生產。

同時國家在經濟方面，也與協作社以許多幫助。農民組織好了之後，若需要農村機器者，可以到國家工廠去買，價值可以特別便宜，並可以分期付款，當然一架農耕機器，絕不是一人或一家所能購買的也不是一人或一家的土地所能應用的。譬如一架電犁，必須要耕種幾千畝土地。因此需要農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才能享受國家的特權。

不僅在機器方面。就是在別的種種方面，只要大家聯合起來，組織起來，都可以得着許多便宜。譬如協合社的農產品，須要向別方運輸。交通機關——即鐵道輪船——的取價也較私人經營要便宜些。再還有協作社的農產品到市場上去販賣，到國家經營的商店中，價值也要比私人經營者要好。其他如銀行放給協作社的債務，利息也是非常輕微的。這些都是國家對於協作社的幫助與獎掖，私人則不能享受這些特權。於是這樣可以逼着農民，使他組織起來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逐漸在經濟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集體生產。

用這樣實際的例子，經濟的利益，教育着農民，促使着農民漸漸擴大其組織，變成集體的生產者。這是對於農村合作社的政策，這種政策使農村生產很迅速的工業化，集體化，以至消滅農村的小農經濟。

所以新經濟政策，一方面是使小農經濟在某種條件之下允許他可以存在，另一方面是鼓勵農民的情緒，擴大農村集體經濟之組織，使農村經濟很快的走上社會主義的生產。

在城市方面，因為使農民生產能自由買賣，同時還要使農民能取得他所需要的工業品，所以就必需恢復商業關係和鞏固的金融制度——即貨幣制度。但是在這種商業關係金融制度恢復以後，很容易促進私人資本之發展，怎樣能防止私人資本之發展呢？這種方法就是將一切主要的生產工具都集中於無產階級的國家掌握之中，並且使中小生產者沒有經濟能力以和國家作有力之競爭。在市場上競爭上，誰人能夠勝利呢？不用說只有大生產能夠得勝利了，大的生產工具經濟命脈最高經濟的統治，都在無產階級國家的手中，所以就不怕和私人資本競爭而且充分有勝利之把握。尤其是政權在無產階級的掌握之中，在任何時，只要無產階級認為必要，認為有防礙國家經濟建設之可能，都可以給與私人資本以種種之限制，使他僅僅能在幫助國家經濟建設而不含有危險成分的狀況之下，可以存在。否則儘可以盡量的加重賦稅，不賣給他原料和運輸等。凡此一切，只要無產階級認為必要，都可以有力量有計劃的去打倒私人資本。

在軍事共產主義剛結束之後，無產階級經濟上之困難，並不是私有資本之發展，而是整個生產品——尤其是工業生產品——之缺乏。同時又沒有力量使用所有的國家產業都活動起來，因此不得利用私人資本，以使全國經濟很迅速的恢復起來。在主要工業經濟命脈和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中的時候，私人資本是不會有超過無產階級國家經濟的力量。

同時蘇聯也顧及到了他和帝國主義之關係，蘇聯在新經濟政策中有兩種是關於帝國主義的。

首先是對外貿易問題。在廿世紀的時代，任何國家也不能離開世界而自己建立一個經濟上完全與外國隔絕的國家。蘇俄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他以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怎樣和帝國主義發生關係而保證蘇聯不變成帝國的殖民地呢？主要的便是關稅必須由蘇聯有絕對自主的權利，並且對外貿易，完全歸國家壟斷。現在任何資本家不能在國內收買原料和自由賣給國外。在國外生產品，是經蘇維埃政府認為必要時，才能輸入蘇聯。並且要交到國家，由國家商店經營買賣，私人是不能將國外商品運到市場買賣的。出口貨物主要如麵包，也不是由農民和商人直接與外國發生商業關係，同樣是由政府有計畫的有規律的收買麵包，運到國

外。政府計畫要收買好多麪包向外國運輸，結果只有那些麪包出口，政府準備着好多錢購買國外機器，結果也只有那多價值的機器進口。所以對外貿易，是完全掌握在國家手中，使帝國主義的經濟不能支配操縱蘇俄的經濟。在對外貿易上只能幫助，蘇俄經濟的發展，絕不能使蘇聯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蘇聯不僅經過商業必要利用帝國主義的經濟以促進本國經濟之發展。並且在投資上也同樣企圖利用外國資本的力量，以開發蘇聯的富源。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可以允許列強向蘇聯投資，但是必需遵守蘇聯政府的條件。譬如一個很大的鑛山，蘇聯現在是沒力量可以開採的，他就允許外人投資，與外人訂立條件。條件規定効力幾年，在這幾年中，每年最高生產額和最低生產額是多少，生產品價格及市場的規定，工人數目，工人工資及工人待遇——等等，都明白的載出。過了規定年限之後，所有工廠機器統統交給蘇聯，歸蘇聯政府無代價的收回。在這種條件之下，帝國主義還是可以取得利潤的，以取得利潤為最高原則的帝國主義，自然還是可以願意向蘇聯投資的。不過帝國主義也只能得着利潤，絲毫不能建立資本主義之基礎，破壞社會主義之經濟建設。相反的，是幫助了蘇聯經濟的建設。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就是這樣。

當一九二〇年列寧提出這樣的計畫以後，許多人都是懷疑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黨員，勿論國內國外的，都感覺新經濟政策是含大量的危險性的。都說，爲甚麼不從軍事共產主義上想個辦法，漸漸的走向共產主義呢？爲甚麼轉變到這樣含有危險的經濟政策使社會主義走上危險的道路呢？這樣的懷疑，經過了很長時期，同時也有長時期和激烈的爭論。

列寧當時的回答是：我們不要將軍事共產主義看作一個經濟建設的政策，或者是走上社會主義必要的經濟階段。我們只能認爲軍事共產主義是適應當時軍事環境的臨時政策。軍事結束了，他的任務也就完畢。新經濟政策就不同了。新經濟政策是產業落後的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之必要的階段。新經濟政策不是現在提出來的，而是在蘇維埃開始組織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能在資本發展不集中尤其是小農經濟佔大多數的國家，馬上建立共產主義，所以新經濟政策必需的。

軍事共產主義只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在經濟生活上的軍事同盟，所以軍事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經濟政策和經濟建設的政策。就在說他是當着全國在軍事期間，無產階級爲保持鞏固自

已政權的臨時政策。只有新經濟政策是經濟建設時期的經濟政策，一方面補救落後的經濟，同時使廣大的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經濟的隊伍，

列寧的這個回答，同時也回答了資產階級的造謠。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和書籍說：俄國共產主義失敗了，俄國由軍事共產主義轉變到新經濟政策，便是證明共產主義的道路走不通，以為俄國是倒轉頭來實行資本主義。這當然是不通之論。

實際上說：新經濟政策却是產業落後的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捷徑。我們只由實行成績上說：已經看出俄國在經濟方面已經收到很大的效果，顯然的證明了新經濟政策已竟得着很大的勝利。這就表示無產階級不僅在軍事上鞏固了自己政權，並且在經濟上更加鞏固了政權的基礎。

許多人說新經濟政策，仍然是一種資本主義的，這當然是十分錯誤的。新經濟政策和資本主義有兩個根本點不同：

第一，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經濟政策，而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

第二，新經濟政策下面之一切重要產業，都是國家的企業，其中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劃分。也沒有資本主義的剝削。所以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另外有人說：新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這也是不對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德國帝國主義企圖經濟運用之靈活，故將所有的公私企業工廠，統統組織起來。使全國經濟在國家的統一計畫監督之下，從事生產，生產數量，方法，價格，市場，都經過國家在嚴格的支配，但利潤及所有權，仍屬於資本家的。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俄國所實現的新經濟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顯然不同。這裏首先就是政權上的區別，蘇俄政權是無產階級的，資本家是沒有選舉權的，關於政治組織以後還講到的。政權既然在無產階級的手裏，這便是蘇俄和各資本主義大不相同的地方。蘇俄政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主要產業中是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劃分，這是與國家資本主義不同的。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蘇俄的經濟究竟是什麼性質呢？列寧的回答說：蘇俄的經濟有五種不同的性質。

第一，原始的民族社會的經濟，這是在蘇俄一部分落後是民族中，那裏依然生活于漁獵

遊牧的生產狀態，他們可以說是原始的氏族社會的經濟。第二，是小商品經濟，主要的表現於全國小生產的農業中。第三，私人資本主義。這是在小工廠中看見的，因為在那裏還有資本家剝削工人的事實。第四，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將企業租給私人，或是國家和私人共同經營，或是租給外國資本家。這種經濟，不完全是國家的，但是國家有指揮支配監督之最高權力。同時在這裏却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劃分。無產階級在這種經濟形式中，是要受資產階級的剝削，不過這不簡單的是私人力量，同時也有國家的力量。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還有最後第五種，這便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大多數的主要的企業，歸國家管理，應當屬於這一種。這種企業在經濟中佔着統治的地位，這種企業中是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劃分，這完全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這完全是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之主要的經濟基礎。

新經濟政策本身的表現，只是一種經濟政策，而不是一種固定的生產關係。所以在這種政策之下，目前還包含着五種不同的經濟形式。在經濟發展的前途上，無產階級的政策是要漸漸發展壯大社會主義經濟的成份，使整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甚麼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呢？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加電氣化」。新經濟政策的道路，就是向着這

一前途。

★ ★ ★

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時候，也還是曾經經過了許多的爭論，主要的因為蘇俄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遇着很多的困難問題。列寧所提出的經濟建設計劃，大部分都是很順利的執行了。但是在執行期間，遇着了許多非常嚴重之困難的。

在新經濟政策開始以後，馬上國內就有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之發展。在蘇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也隨着國家經濟而發展了。這種發展雖然與國家經濟發展前途並沒有嚴重的危機，但是因此曾引起了許多爭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帝國主義的包圍進攻中，又加以蘇聯經濟之落後，缺乏經濟建設的經驗，在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之生產關係之下，來進行經濟建設，這自然是一個非常困難與複雜的任務。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新經濟政策開始的兩年，成績是很少的。

一九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那時主要的表現，就是所謂「剪刀」問題。城市工業品因為生產不易擴大求過於供，價格日益提高。而農村生產品價格日益低落。農民拿着很

多的麵包，不能換得等量的他所需要的工業品。一方面是工業品價格向上增高，一方面農產品向下低落，形成「剪刀」形式。以致影響到全國整個的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以很嚴重的危機。自然這是沒有很長期間的，到一九二五年，便被經濟發展工業建設所克復了。

總的說來，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建設，到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便已竟恢復到了戰前的經濟水平線。

在這個過程中，列寧及黨的全志提出了很多關於經濟建設的問題，並著作許多書籍，闡明新經濟政策的理論策略。如經濟所著關於改徵糧食稅的「論糧食稅」，以及「合作社計劃」；等等。

這時候經濟建設的中心問題，表現得最為嚴重的，就是怎樣發展國家經濟限制私人經濟，因為私人經濟和國家經濟一同發展了。當新經濟政策提出來的時候，就有許多人非常懷疑，說實行新經濟政策，豈不是又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麼？列寧的答覆是：新經濟政策之下，當然是有私人資本之發展，但是怕私人資本之發展，而不實行新經濟政策，那就根本難以建立國家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說：新經濟政策是要實行的，只是用甚麼

方法，擴大國家經濟的統治領導，而限制阻止私人資本之發展。

所以那時列寧提出「學習做生意」的口號。爲甚麼布爾什維克要學習做生意呢？這就充分表示國家經濟和私人資本在市場之競爭，不曾做生意，是不能希望在市場競爭上有戰勝私人資本之可能。在這樣情形之下，列寧經常提出限制私人資本之方法，譬如加重私人資本的賦稅，和重要原料不賣給私人資本，以及盡量減低國家經營生產品之價格等等。同時還向工廠的，政府的，黨的等處宣傳，使大多數羣衆都到國家商店去購買貨物。當然，只要稍爲有點常識以及認識自己責任的人，都是會到國家商店去的。並且國家商店貨物品質好些，價格又便宜得多，所以私人資本是不能與國家經濟相競爭的。

但是私人資本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怎樣會得着些須進步呢？這就是因爲國家經濟的力量，還不充分，還沒有能力去消滅私人資本。譬如說：國家經營商店，時常發生貨物不夠人民需要的恐慌，自然他的貨物是價廉物美比較容易消售。但工業品之生產還是不十分擴大，他的價格，是有規定的，絕不因貨物的容易消售或來源稀少而抬高，所以國家商店的貨物，很容易銷售干淨的。私人資本就在國家企業不能滿足需要的條件之下而乘機發展的。所以私

人資本之發展，以及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由於國家產業還不十分發展的緣故。

就在一九二五年時候，有些工業部門，已竟趕到戰前水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整個工業是趕到戰前水平了。所以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是蘇聯經濟恢復的時期。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的經濟年度。有些是趕上了一個一三三年的生產數量，有些是超過了一個一三三年的生產數量，大體上說來：是恢復到了一個一三三年的生產狀態了。

這也只是說現在的生產數量恢復到以前的狀態，並不是現在蘇聯經濟的性質和以前俄國經濟性質是相同的。舊時俄國是資本主義的，是有地主的，是有資本家的。現在的蘇聯就不是這樣了，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在組織上在生產關係，都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所謂現在的恢復。只是恢復了以前的生產數量。

我們要是拿蘇聯與其他帝國主義比較蘇聯經濟的發展，是要超過其他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假如我們就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來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受了很大的影響與破壞，到了一九二七年，世界整個經濟是恢復到了戰前水平。自然，這種恢復是不平衡的，有些是超過了的——如美國，有些是不及的——如英國。但在世界經濟整個恢復到戰

前，狀態期間，蘇聯也恢復到了戰前經濟的水平，我們不能不承認蘇聯經濟之發展是非常之快的。

蘇聯不僅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偉大破壞，同時還經過革命，暴動，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經濟封鎖及長時戰爭。再還有英法美是戰勝利的國家，而舊俄是戰敗的國家，這也是很影響于經濟恢復的。但是蘇聯竟能在經濟混亂嚴重破壞狀況之下，利用新的生產組織，建設新的經濟基礎，竟能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同時趕上戰前水平線，這就是新經濟政策表現的成績。

到了一九二六年以後，就是在經濟恢復以後，蘇聯經濟就發生另外一個問題，即是所謂經濟建設問題。在經濟恢復時間——一九二六年以前，是說怎樣將以前的工廠開工。現在呢？就要說，要怎樣建設新的工廠。

在這時候，關於經濟建設問題，就發生新的激烈的爭論。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和托洛斯基的爭論。爭論的中心點，是一個國家能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這些爭論，都有他的歷史的理論的根據的。在這裏，或是能建設社會主義，或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自然是一個根本問題，

必須決定了這一點以後，才可以決定怎樣去建設經濟。以後具體的經濟政策，都是安由此理論爲出發的根據。

在托洛斯基的意見，說一個國家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他的理由，在表面上是根據于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問答上的理論，說社會主義不能在某一國家得着勝利的，只有在全世界同時得着勝利。恩格斯在起草共產主義宣言的時候，曾說，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得着勝利，一定要在所有的國家中同時得着勝利，這才是社會主義的勝利。

托洛斯基根據這個理論，那麼就做出托洛斯基的結論。托洛斯基理論主要的觀點，就是對於農民問題。說無產階級不能和農民合作，農民是小資產階級的，是私有制度的擁護者。社會主義是消滅有制度的。因此農民不能和無產階級合作，更不能共同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

托洛斯基曾說俄國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一定馬上要同和他共同奪取政權的農民發生破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破裂與矛盾。只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能得着解決。因此，托洛斯基反對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但是聯共中央的意見，關於這個問題之分析，是完全不同的。恩格斯當時的分析，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現在的世界是和恩格斯那個時期有許多地方是不相同了。現在是帝國主義時代了，帝國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依照不平衡的規律而向前發展的。這個不平衡的規律，對於整個帝國主義制度，是有嚴重意義的。在帝國主義的發展中，可以看出許多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的事實。譬如英國是帝國主義之最先發展者，接着德帝國主義就很快的發展而且和先進的英國作最有力的競爭，以致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雙方——英和德——都精疲力竭，讓新興美國的勃起，執着世界經濟的牛耳。由這看到，資本主義是不平和的不等量的，以不等速度向前發展着。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在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狀態中，他勝利成熟的條件也是不一致的。

蘇聯經濟的建設，是在帝國主義包圍中。但是在帝國主義還沒有武裝干涉，還沒有武裝打到國內，在帝國主義還未有防礙蘇聯的建設，而蘇聯還有能力建設的時候，蘇聯依然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現在不能說西歐無產階級的革命——在甚麼時候成功，但是蘇聯的經濟建設，是可以促進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成功，這是事實上所不能否認的。

在蘇聯國內正確的聯合了農民、正確的與農民聯合起來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是過去已經得着了偉大的功效的事實。固然農民是小有產者，富于私有制度的意識，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無產階級的力量却是可以教育農民，使農民逐漸走上集體生產的道路，使他的舊有的意識，慢慢的無產階級化。雖說需要很長時期的鍛鍊，但這是可能做到的，並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他的任務一定要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問題的爭論，結果擴大了爭論的範圍，牽涉許許多多的問題。結果，托洛斯基否認蘇聯國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以為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同時還否認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蘇聯的政權不是無產階級的，以至否認到蘇聯無產階級可以和農民合作。托洛斯基顯然是違反列寧的，因為列寧在沒死的時候，還提出了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他並且說：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加電氣化」。這顯然是說蘇俄有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

聯共中央指出托洛斯基之傾向，是社會民主黨之傾向，因為托洛斯基否認農工合作否認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之經濟，否認俄國的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是

社會主義的。這和社會民主黨是差不多的。

這個爭論，在蘇聯政治上經濟都有很重大的意義。聯共中央認為幫助世界革命與蘇聯經濟建設是全時進行的，幫助了世界革命即是鞏固蘇聯的經濟建設，建設了蘇聯的經濟，即所以幫助了世界革命。照托洛斯基的意見，是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還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在這時候，唯一的責任，就是幫助世界革命，托洛斯基將蘇聯經濟建設和世界革命對立起來。

聯共中央認為這種意見，是非常不正確的，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鞏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鞏固了社會主義的基礎，只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才能夠鼓動全世界無產階級也來照蘇俄這樣來做無產階級的革命。

在戰勝了托洛斯基以後聯共中央就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問題。經過很長時期的討論，結果，通過了所謂偉大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這五年經濟計劃，是由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的經濟年度，到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的五年經濟計劃。這個計劃，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之偉大的計劃。

這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大的區別，資本主義的經濟是無政府主義的，而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生產的。資本主義是隨着市場而變動的。市場上需要甚麼，就生產甚麼，甚麼東西賺錢，就生產什麼，所以是無政府的狀態，社會主義是隨着人民的需要而變動的，——就是說人民需要甚麼，就生產甚麼，他的經濟發展，也是相當的有具體的計劃。

第十五章 五年經濟計劃

五年經濟計劃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一) 牠是一個使國家工業化最大的速率向前進展的計劃，是蘇聯由農業國轉變到工業國的具體計劃。這從五年計劃中的總投資額及投資的分配上都可以看出。這一次五年間比前五年間的總投資額要差不多大兩倍半（一九二三——二四年到一九二七——二八年五年間的總投資額為二六、五〇〇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到一九三二——三三年五年間的總投資額為六四、四〇〇百萬盧布）。

在工業上的總投資額要大四倍（前四五年四、四〇〇百萬盧布，近五年一六、〇〇〇百

萬盧布，在農業上的總投資額提高百分之六十五。前五年一五、〇〇〇百萬盧布，近五年二三、二〇〇百萬盧布。用之于運輸的大約要增四倍（二、七〇〇比一〇、〇〇〇百萬盧布。）用之于電氣化要增加三倍半（九〇〇比三、一〇〇百萬盧布）。

（二）這一個是蘇聯維基本財產總量一般迅速增長的計劃，特別是工業財產量迅速增加的計劃。基本財產總量，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值七〇、〇〇〇百萬盧布，到一九三二——三三年便值二一八、〇〇〇百萬盧布。一切工業財產的基本財產，從九、二〇百萬盧布增長到二三、〇〇〇百萬盧布，鐵道運輸上是從一〇、〇〇〇百萬盧布，增長到一七、〇〇〇百萬盧布，農業是從二八、七〇〇百萬盧布，增加到三八、九〇〇百萬盧布。

（三）這是一個使工業農業出產額很快增加的計劃，特別是工業出產額加速增長的計劃，工業出產額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為一八、三〇〇百萬盧布，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則為四三、二〇〇百萬盧布，這比戰前的出產額增加三倍多。農業出產額則由一六、〇〇〇百萬盧布，增到二五、八〇〇百萬盧布，這比戰前出產額增加到一倍有餘。

（四）這是一個使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特別發展的計劃，特別使全國電氣化

和冶金術，產煤額及機器工業發展的計劃。總投資額中的百分之七十是投在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的。因此，根據五年經濟計劃，全部工業的生產可以增加到現有產額的百分之二百八十。而生產「生產工具」的這一部門的工業產額，則可以增加到現有產額的百分之三百三十。電氣化的事業上，是預備在五年之內建設四十二個新的長距離的中心，結果把電力增加到現有電力的四倍半（把電力產額每小時五、〇〇〇百萬敗羅瓦特增加到每小時二二、〇〇〇百萬敗羅瓦特），冶金術一般的進步，使生產額的每年產額大大增加，硬煤工業也有極大的發展，新機器工業有三倍半于現在產額的可能。

（五）這是一個是農業經濟能伴同工業向前發展的計劃，特別使中農貧農經濟戰勝富農經濟的計劃尤其是使小農經濟走向大規模共同經濟的計劃。農業用的機器，照五年計劃的規定，可有四倍于現在的產額。電動機現在只有九千架，將增加三二、〇〇〇架（據新的規定要增加到一二〇、〇〇〇架），化學肥料在一九三二——三三年的產額增長到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產額為一七五、〇〇〇噸）。一架機器犁可以耕種四〇〇個俄畝；貧農中農組織的經濟合作社，以便于共同耕作，農業經濟急劇的變革，是有利的中

農和貧農而不利於富農的。

(六) 這是一個使蘇聯經濟以最大速率向前發展的計劃，特別使蘇聯經濟追上先進資本國家經濟水平的計劃，尤其是蘇聯在國家經濟分量上佔着更重要地位的計劃，資本主義國家在生產最順利的年頭，其生產速率也不過是百分之七至八，而五年經濟計劃使蘇聯生產速率達到百分之二七。

(七) 這是一個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比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特別加大的計劃。同時，就是把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大加削弱的計劃。

(甲) 根據五年計劃，蘇聯的財產構造，將有如下的變更：

屬於社會主義成份的：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國家的 百分之五一· 百分之六三·三

合作社的 百分之一·七 百分之五·三

屬於私有成份的 百分之四七·三 百分之三一·

(乙) 因此，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生產量，對總生產的比例，就有如下的增加，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工業 百分之八二 百分之九二

農業 百分之二 百分之六

零售商 百分之七五 百分之九一

因為在農業中屬於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國有和集體農莊）之進展，農業生產上就有個大的變化，五年之後，屬於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耕地，將由一九二七——二八年二三百萬俄畝增至一八九百萬俄畝，佔全體農業總的耕地將由百分之二進至百分之一〇、三，屬於社會主義生產的，將由一九二七——二八年一三、七八百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二——三三年的八三、六百萬盧布穀物供給市場，佔農產市場的百分數，是由百分之七、五增至百分之四二、六。

(八) 這是一個使蘇聯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更加強大的計劃，同時，也是附帶的解決失業問題的計劃，蘇聯現在的工業上工人總數約為一一、三五〇、〇〇〇人，到一九三三年便增加到了二五、九二七、〇〇〇人，即增加百分之三七，蘇聯現在失業工人，約

百餘萬人，但在實現新計畫的五年當中，工業上需要四百多萬新工人。如果每年增加七十萬新工人，則五年當有三百五十萬工人，合併現在的一百萬失業工人，恰恰四百五十萬新工人，工業上將需要四百五十萬新工人。五年之後，全部失業工人都可以找到職業。

其他如這個計畫能使整個國民收入猛進增加的，能使蘇聯文化程度提高的特別是養成社會主義建設專門人材的以及使貨物貯蓄和金融貯蓄都得一突飛猛進的，在蘇聯經濟上政治上都有很大的作用。

這個數目字提出以後，使許多資產階級的學者及經濟學家，都說蘇聯是空想是誇大。不但資產階級的學者是這樣的嘲笑蘇聯，就是在蘇聯很有地位很負盛名的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如布哈林等，都說這個計畫太大了，是空想。但是事實上看到，第一年實行的結果，不僅是實現了預定的計畫，而且有許多部門超過了原來的計畫。

我們可以看出以下的這樣的數目字：

一九二八年主要工業的投資有十六萬萬盧布，其中有十三萬萬是投在重工業上。一九二九年主要工業的投資有三十四萬萬之多，其中有二十五萬萬之多是投在重工業上。——再進

一步，一九二八年大工業生產總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僅只重工業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九二九年生產總量據估計增加百分之三十二，重工業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場下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四十二萬五千五百公頃（每公頃約合中國十六畝有餘），糧食生產總額計六萬萬米突磅（即十進位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三十九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約計三萬五千萬米突磅。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八萬萬米突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共計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糧食生產總額約計十三萬萬米突磅。一九三〇年，據估計蘇維埃農場的耕地面積將達三百二十八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十八萬萬米突磅，而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將達一千五百萬公頃，糧食生產總額計四十九萬萬米突磅。換句話說，就是一九三〇年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生產的商品糧食合計總額佔全國所有農業生產總額的一半還多。

照這些數目字看來，這一五年經濟計劃，已經不是空的，不只是文字上的了。事實已經在表示着實地的發展。並且照這第一年發展的速度，各種部門都要超過五年計劃中的預算。在礦工業上，五年計劃預算要比戰前增加三倍半，經過第一年證明之後，現在預算可以增加

四倍半。原來五年計劃中預定第一年的蘇維埃農場的土地面積是由一百四十萬增加至一百六十萬公頃。結果已增至一百八十餘萬公頃。至一九三〇年本預定增至二百三十萬公頃，但現在又可預定必增至三百二十萬公頃。這些都證明五年計劃不但可以達到，並且必然要超過。

五年經濟計畫的意義，不僅在蘇聯經濟發展上可以看到他的偉大，倘若我們拿五年經濟計畫以及第一年實行超過預定之成功，和帝國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對比，社會主義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怎樣大的不同呀，

現在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不發生經濟危機的——尤其是到了戰後經濟發展到了一九三〇年，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加嚴重了。這種危機就表現于生產增加，而市場不足以及發生市場上的恐慌，這種市場的恐慌，就引起加緊市場的競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

帝國主義因為市場競爭的尖銳，就盡量的減低自己商品生產的價值，只有價值減低之後才可以有價廉物美的榮譽，可以在市場上競爭得着充分勝利之把握。

怎樣能將生產品價格減低呢？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就發生了減少工人，延長工作時間，加重工作強度，減少工資等等，所謂生產合理化的方法。資本主義在市場競爭所受的損失，

完全由工人負擔起來。

因為加重工作強度，改良生產組織，所以就裁減工人，造成大批的失業。在資本主義發展首屈一指的美國，失業的工人羣衆，竟達七百萬人以上，德國有三百五十萬，英國二百萬，其餘各國都有。在資本主義發展趨于嚴重危機的時候，但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確實得了不可否認的勝利。

蘇聯不但沒有商品過剩，市場的恐慌。而且在蘇聯全國農工生活程度提高，購買力擴大狀況之下，全國生產雖然有高度發展，但是還不能供給廣大羣衆的需要。生產過剩的現象，更是不會出現于蘇聯市場之上。因為全國人民需要的增加，使蘇聯更加努力的去發展工業。

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過剩，並不是商品沒有人用，乃是因為勞苦羣衆生活減低，壓迫增加，以及失業的衆多，購買能力的減低。這是人民沒有能力去購買，而不是一般人感覺生活的充分。實際上，資本家的貨物堆棧裡堆滿了許多貨物，而一般人還在飢寒交迫着。

蘇聯的生產發展，而仍感覺供給的缺乏。並不是爲勞働生活程度減低而不是生活程度之提高，蘇聯經濟的發展，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

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一天一天的走向危機，一天一天走向不能解決他的矛盾問題的道路上。譬如就解決失業工人來說，現在的資本主義是沒有辦法的。爲是要加緊市場的競爭，擴大市場的競爭，從敵人的手中奪回市場，不得不加緊的剝削工人，開除工人，以實行生產合理化。譬如有所謂連環袋子，使機器連轉加速，以前每個工人管三部機器的，現在要管五部機器了。以前需要成年工人的，現在要代替以工資微小反抗能力薄弱之幼年女子了。這樣才能減少成本。只有成本減少了，才能得着勝利。所以資本家的競爭愈大，工人受的剝削愈烈。失業工人愈加多。經濟上之危險，更無法能解決了。各國改良主義者，如英國工黨政府，他也有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綱，但是結果怎樣呢？失業問題不但不能解決，在工黨上台以後，失業只是有增無減。我們並不是說工黨政府不努力於解決失業問題，他却實是很努力的。自然他的解決失業問題，只是想減少資本主義經濟之危機，減少工人革命運動之發展。但是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是沒有方法能以解決的，美國總統胡佛上台以後，也曾經做了許多解決失業問題的宣言，也曾規訂了失業問題的計劃。結果依然是沒有絲毫效力。

在資本主義統治下所不能解決的失業問題，到了蘇聯就是怎樣呢？到了蘇聯就有辦法

了。蘇聯首先就實行七小時工作制，七小時制實行的結果，使全國工人階級人數增加。最近在一九三〇年四月起，實行所謂連續五日制。連續五日制，就是四天做工，第五日休息。合計起來，每五天只做工作二十八小時，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減少了，但是工廠機器依然不停的運轉着。因此，在同一的工廠，需要吸收大批的工人，於是失業工人就在連續五日制實現以後，大批找着工做。並且每年還有新的工廠增加。現在蘇聯全國失業工人共計一百二十萬人，這種失業工人並不是從工廠裏跑出來的，而是從鄉村跑出來的農民。他們是羨慕城市生活的不熟練工人。在連續五日制實現以及農村蘇維埃農場發展之後，大部分都可以找到了工做。因為若依照五年新經濟政策的計劃，五年之內，新舊工廠，共計增加工人四百六十萬人這樣一看，蘇聯的失業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由這個中間，不僅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生活是怎樣的惡劣。蘇聯的工人生活是怎樣的改善了。不僅在生活條件方面，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是有大的區別，並且可以看到世界經濟的危機，用甚麼方法可以得着最後的解決。我們只要看實際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資本主義對於失業問題，是怎樣的努力但是終于沒有辦法的。蘇聯對於失業問

題他是有辦法的。他是已經得着相當成績了。

自然，關於這樣偉大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在聯邦共產黨內部是發生了許多鬥爭的。托洛斯基們當然是反對的，因為他們根本不承認在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不但如何，布哈林也是反對的。布哈林認為五年經濟計劃太快了，以為這計劃是事實上行不通的。關於這自然已經被第一年的事實證明了。不過此外布哈林等還是有他自己的意見。布哈林在經濟建設計劃上，主要是偏重于輕工業之發展，理由是輕工業容易建設，建設之後，很快可以得着大量的生產品，很快的可以改良農工的生活，降落生產品之價格。這是馬上可以收着實際成效的。建設重工業就不同了。重工業費的資本很多，時間很長，立刻還不能收到實際的效果。生產的生產品之價值，還要比向外國購買的要昂貴得多。所以布哈林素主張着重建設輕工業。

聯共中央委員會是不同意於布哈林意見的。中央的意見是說，蘇聯不僅僅是要發展輕工業，同時並且要特別注意于重工業。只有在蘇聯重工業發展之後，才能脫離帝國主義之統治。假若只注意于輕工業之發展，將來還只是等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所以要鞏固蘇聯經濟

之基礎，鞏固工業之命脈。只有在重工業發展之後，社會主義才能得着安全的保障。得着經濟之真正的獨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富農的策略問題。蘇聯現在還有富農的。不過富農之所以爲富農，並不是他擁有廣大的土地。而是因爲他比較是有多的資本，肥料與農具。蘇聯土地是國家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家的所有物。農民之取得土地，是依照他的耕種能力而分配以相當的土地，蘇聯土地的質量非常惡劣，必需要比較多的生產工具才能生產。譬如俄國耕種一畝土地的，必須要馬一匹，並且還要比較複雜的機械和肥料，否則他的生產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所以許多富農，利用他擁有的生產工具，向農民剝削。他在耕種忙碌期間，將馬匹租給農民，每天每匹馬可以得七八盧布之收入，富農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却實有了相當的發展，因此就發生對富農態度的問題。

在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的時候，因爲希望整個經濟之發展，所以對於富農還沒有發生嚴重的問題。到了新經濟政策已經得到相當的成績，富農在經濟上已經得着發展，于是就感覺新經濟政策妨碍他的發展，對於新經濟政策，開始起反抗作用。聯邦共產黨在以前限制富農

之發展，到現在就要消滅這個階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反富農的鬥爭，便成了嚴重的問題在聯共中央也曾通過了許多消滅富農的實際路線。

這個路線，右派的布哈林是不同意的。在他覺得還有允許富農發展之可能，他以為打擊了富農經濟，便是打擊了蘇聯整個的經濟。打擊了富農，便使整個的農村經濟受着很大的影響。這觀點，在聯共中央的路線看來是非常錯誤的。經過了很長期的爭論，中央委員會的意見終於戰勝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布哈林給中央委員會一個聲明，承認他的觀點是錯誤了。

五年經濟計劃是非常大的一個計劃，因為在第一年既已經得了很偉大的成績，所以他們的勇氣也就愈提愈高。現在便已經又看見了新的口號，這就是『五年計劃，四年成功』。爲這發了一次特別的工業債券，舉行了全國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競賽』的運動。這確是現在唯一的國家，因為全世界上都普遍的發生着經濟，只有這裏正在大規模的向前發展。

第十六章 現在蘇聯的政治組織

現在必須說到蘇聯目前的政治組織。

我們普通說『蘇俄』，這是不正確的，應該要說『蘇聯』。因為現在的蘇維埃政權，是包括着六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俄羅斯只是其中的一個。這六個國家除俄羅斯外，還有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烏志別克斯坦，共同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所以正確的說，應該簡稱爲蘇聯。普通說『蘇俄』，只是習慣用舊字的說法。

在這六個共和國之中，各國都建立自己的中央與地方的蘇維埃政權。最高的中央機關爲各共和國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在人民委員會之下，又設

立各種專門委員會。

蘇聯是沒有國會的。由人民選出代表之後，便開全國的蘇維埃大會。由蘇維埃大會所選舉出來的政權機關，他掌有立法，司法，行政及一切權利，是採取一切權力集中蘇維埃的制度。並沒有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列寧稱這樣的制度是蘇維埃共和國，他說國會是官僚制度。在國會制度之下，只有一部份專門做官的官僚，才能掌握政權，但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則一切代表由工廠農村及兵營中選舉出來，他們不僅可當選為代表，並且可當選為蘇維埃委員與官吏。

因此，革命後的俄國，與沙皇時代的俄國比較起來，自然完全是兩個樣子。蘇維埃政權不是一個人（如沙皇）或幾個人的政權。而是全體工人農民，紅軍士兵集合起來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是一個由選舉產生出來的政權。但是，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選舉法如蘇聯一樣。資本主義如英美德法各國，也是用一種選舉的制度，可是，在那些國家中，選舉權尤其是被選舉權，都有很高的財產限制。因此，政權只在富人，資本家和地主們的手裏。因此事實上只有有錢的人有權選舉，工人和農民等於沒有選舉權。尤其是，即是當選了國會的代

表，但他既不能佔多數，又沒有行政的權力，所以政權終是資產階級的官僚手中。

在蘇聯的憲法內，對於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資格。有如下的規定：

有選舉權的是：(一)滿了十八歲的公民，做有利於國家的及生產的工作，自己賺錢過活的人，就是工人農民和職員（除了私商人）。(二)做家庭工作的人；這種人使上項所指的人，能夠安心去工作，如工人和職員的妻子。(三)紅軍的海陸軍的兵士和官長。(四)上列(一)，(二)，(三)項的人，但失掉了工作能力的。

在蘇聯內，一切有雇傭勞動的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一)凡資本家，債主，房主等不是靠勞動的收入而過活的人；(二)做買賣的人，如私人商鋪的掌櫃；(三)牧師和一切以宗教為職業的人；(四)沙皇時代的警察，憲兵，偵探等人。

除此以外，還有害神經病的人，如瘋子；及那些被法庭判為貪賊有害工農國家的人，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在蘇聯之內，資本家房主債主，私有商及其子弟，不但沒有選舉權，還不能夠當紅軍。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一切軍官和將軍都是資產階級的人。蘇聯的自稱是工農的政府，他的紅

軍也只有工農可以充當，一切軍官和將軍都是勞働份子。

因此，紅軍也參加蘇維埃的選舉。這一點也和別個國家不同的。在蘇聯內，紅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與其他的工人農民一樣，他有參加國家事情的權。

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機關，在鄉村中是村蘇維埃，在城市中是城市蘇維埃。

村蘇維埃的選舉，在全村的農民大會上舉行；城市蘇維埃的選舉，在工廠，作坊或機關的工人和職員的全體大會上舉行。

在村蘇維埃裏，每一百個人選舉一個代表。假使某一個村裏，有一千個有選舉權的人，就可以選舉十個代表。村蘇維埃裏去。但是，在三百人以下的村裏，也應當選舉三個代表，如在五千人以上，只能選舉五十個代表。

在城市蘇維埃裏，每一千個人選舉一個代表。但是，蘇維埃代表的人數，不能少過五十人，可是也不能多過一千人。

在村蘇維埃裏，由村蘇維埃的代表選舉一個主席。村蘇維埃服從上級的鎮執行委員會。什麼叫做鎮執行委員會？各村的蘇維埃代表，集合起來開鎮蘇維埃大會；在這大會上，就選

出鎮執行委員會。這個鎮執行委員會，從大會閉會後到下次大會開會為止，在這時期內，他就管理當地的一切問題。在鎮執行委員之下，設有民警（米里茨）局和刑事審判處。

鎮蘇維埃大會及鎮執行委員會組織的目的：（一）實現勞動人民的政權和保護他們的利益，（二）根據工農聯合的原則，保護他們的權利，（三）吸收廣大的人民，去管理地方和國家的事情。換句話說，鎮蘇維埃應當屬於勞動人民，第一就是工人和農民（除了富農）。這就是說，在鎮蘇維埃裏，不應有勞動人民的敵人；資本家和富農的坐位。在鎮執行委員會之上，有縣執行委員會。

由各鎮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城市蘇維埃代表選舉代表，組織縣蘇維埃代表大會。縣蘇維埃代表大會，為執行一縣的事情，選舉縣執行委員會。縣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已是很繁雜的事。因此，在縣執行委員會裏，又選出一個主席團；經常的在那裡管理一縣的事情。在縣執行委員之下，設有下列的各部：（一）行政處，（二）衛生處，（三）人民教育處，（四）縣的勞働監察處，（五）財政稅務處，（六）國家政治管理局（格白烏）辦事處，（七）地畝處，（八）軍事處，（九）縣市政處，（十）縣統計處，（十一）省法庭代辦處。在以前曾有過縣勞働保險處，

現在這部工作，已由縣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或互助會的縣農民委員會的主席團執行了。在縣執行委員會之上，有省執行委員會。

由各縣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代表組織省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省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選舉省執行委員會。省執行委員會管理全省的一切事情。省執行委員會的任務，執行中央政府的一切指令，保存革命的秩序，指導和連結一切地方機關的行動，并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發生密切連繫。

省執行委員會的人數，當然是比縣執行委員會多，所以常常的開會非常的不便利；因此，省執行委員會只是在某一定的過幾個月後開一次會。所以，省執行委員會又選出主席團，在由某一屆的省執行委員會，至下一屆的省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時期內，執行全省的事務。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人數：由三人到五人，最多不得過七人。省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就是實際上的政府機關，他領導全省日常的行政工作。

省執行委員之下，有以下的各部：（一）行政局，（二）衛生局，（三）人民教育局，（四）勞働局，（五）財政局，（六）國家政治管理局，（格別武）分局，（七）地畝管理局，

(八) 市政局，(九) 軍事局，(十) 人民經濟蘇維埃，(十一) 工農監察局，(十二) 省統計局，(十三) 國內商業局，(十四) 社會保險局。除此以外，在省執行委員會之下，還有省經濟會議。

在省執行委員會之上，爲這一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就是最高的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各省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城市蘇維埃代表大會選派的代表，組織成的某共和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某共和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爲某共和國的最高機關。在兩個大會之間，最高的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

蘇維埃代表會大，每年召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集一次。在上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下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之間，執行全國事務的，就是由中央執行委員中選出來的主席團。

現在總起來看一看，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像一架梯子似的，從村蘇維埃起，接着就是鎮和城市蘇維埃，再縣蘇維埃，省蘇維埃，一直到全共和國的和全聯邦的蘇維埃。

有幾個共和國，如俄羅斯，不僅有省，還有自治區，州區及邊疆，在自治區內，由村蘇

蘇維埃代表大會，而縣區及城市蘇維埃代表大會，最高則為省區及邊疆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州區內，由村蘇維埃代表大會，而鎮蘇維埃代表大會，縣蘇維埃代表大會，最高則為州區蘇維埃代表大會。

城市蘇維埃代表大會；派代表到縣，省，省區及邊疆蘇維埃代表大會，和自治共和國及自治區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工業大城市，省，省區和邊疆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及自治共和國和縣區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代表參加蘇聯內某共和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蘇維埃共和國內，最高的機關，就是共和國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某一屆代表大會，到下一屆的代表大會之間，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某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到下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間，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公佈一切的法律。

爲了執行上面所講的機關公佈的法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派十一個人民委員會。每一個委員會，有一個委員長。這十一個人民委員會，又連合起來，組織人民委員會蘇維埃。這樣，人民委員會，就是一個執行機關。人民委員會蘇維埃，服從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他的主

席團，和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除此以外，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有一國的最高的審判院和檢察院。在每個共和國內，有各國的人民委員會；如內務委員會，司法委員會，地畝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社會保險委員會；各國聯合的人民委員會，如最高經濟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勞動委員會及商業委員會（商業委員會的行動，在國內商業中，是一種聯合的；在國外商業中，是全蘇聯的）。除此以外，還有四個全蘇聯的人民委員會，如外交委員會，海陸軍委員會，交通委員會，郵電委員會及國家政治管理局（格別武）。

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民族問題也是非常之重要的。沙皇俄羅斯的下面，共有一百七十多種民族，都是受沙皇的壓迫。這些民族，因受壓迫，不能發展文化和經濟，逐漸衰滅下去。革命以後，蘇維埃政權第一步就宣佈了各民族的自決，便開始組織各民族共和國。再集合這些共和國組織成功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

俄國內戰終結以後，踏進到和平建設時期，擺在蘇維埃政權面前，很多的重要問題：如怎樣地改善民族問題，每個民族，都不受別個民族壓迫。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是組織一個各

蘇維埃共和國自由的大聯合——蘇聯。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十二月，便召集了一個大會，在這個大會上組織了現在的蘇聯。這個大聯合，開始只有以下四個共和國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經過了三年以後，又有兩個國家加入這個大聯合，一個是烏志別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另一個是土耳其敏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大聯合就是現在的蘇聯。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召集了全蘇聯的蘇維埃大會，在這個大會上，規定出了憲法，這個憲法共分兩部分：（一）第一部分為宣言，說明為什麼各國聯合在一塊兒，（二）這個大聯合的規約。

全蘇聯的最高政權，就是全蘇聯蘇維埃大會。他有權規定和變更憲法。在大會閉會時期內，全蘇聯的最高政權，就是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聯合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組成的。聯合蘇維埃，是由全蘇聯蘇維埃大會選舉出來的，并有各聯合共和國的代表在內。這些代表各民族代表的多寡，按各共和國的人民的數目而規定，總數共四

百一十五人，民族蘇維埃的組織，由每個聯合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選派代表五人，每個自治區各選派代表一人組成的。民族蘇維埃委員的名單，應經全蘇聯蘇維埃大會批准。這兩個蘇維埃：聯合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他們的權力完全平等，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提案，倘若不得到這兩個蘇維埃的同意，就不能發生效力。如在這兩個蘇維埃之間，對某個問題有不同意見時，便把這問題交協商會解決。假若在協商委員會上，不能得着解決，便交兩蘇維埃的聯席會議，假使在聯席會議上，還不能解決時，則交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解決之。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其主席團以及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的一切法令。訓令，命令，應用參加蘇聯的六大共和國的文字印刷，全蘇聯之內必須執行這些法令，訓令和命令。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的時期內，蘇聯的最高機關，就是他的主席團。主席團共有二十七個委員。這二十七人中，九個是由民族蘇維埃選出的，九個由聯合蘇維埃選出，九個是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選出來的。再在主席團內，選舉六個人為主席，每一個共和國一人。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機關，就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的組織如

下：主席一人，代理主席三人，和十個人民委員會會長。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的一切法令，指令，命令，在全蘇聯內的各地必須執行。

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就是全蘇聯的政府。他管理一切外交事件，締結債款，並有宣戰和訂立和約之權，批准蘇聯的預算，執行對外貿易，批准國民經濟計劃和管理全蘇聯的交通和郵電等，並解決蘇聯內一國和別一國間的爭議。

爲了執行以上這些任務，於整個蘇聯有共同利害的，組織了五個人民委員會，就是：海陸軍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會；國內外商業人民委員會；交通人民委員會，郵電人民委員會。這五個人民委員會，只在全蘇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才有。此外還有五個聯合的：財政人民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勞動人民委員會；工農監察院，中央統計局。不僅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的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內有這五個人民委員會，在各個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的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內也有這五個人民委員會。各共和國內的這五個人民委員會，對蘇聯的這五個人民委員會的關係，是接受蘇聯的這五個人民委員會的一般原則上的指導，再根據各共和國的特殊情形，使其適合於共和國的法律而執行之。

在蘇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的下面，還有以下的機關：勞動保衛蘇維埃。這個機關的職務，就是計劃全蘇維埃的經濟，和保障這些經濟。為恢復和發展全蘇聯的國民經濟，在勞動保衛蘇維埃之下，還有一個國家計劃局。

此外，在人民委員會蘇維埃之下，還有一個外國租讓委員會，經理一切外國租讓事件，還有一個國家政治管理局（格別武）。

在各個聯合共和國裏，有自己本國的人民委員會：內務，司法；國內商業，社會保險；教育；衛生；地畝。上列的這些人民委員會，只服從各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蘇維埃。除了這七個人民委員會之外，還有五個人民委員會，即是前面說過五個：財政，國民經濟，勞動，中央統計局，工農監察院，這五個人民委員會，除服從本國的人民委員會蘇維埃之外，還須服從全體蘇維埃的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的相當的人民委員會的指導。此外還有全蘇聯的人民委員會（外交，海陸軍，交通，郵電）代表處。

以上這是蘇聯的政治組織。總之蘇聯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國家，他的政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所以這一種政治組織的系統是非常奇特的。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蘇聯的一切政治生活都是與工農羣衆有密切聯繫的。尤其在下級地方蘇維埃中，許多工廠工人，農民都充當蘇維埃的委員與官吏，所以整個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民都是非常瞭解的。

全蘇聯政治問題，當然都在布爾什維克的聯邦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不過黨之領導作用，只是經過黨團作用的領導，並不是以黨的命令實現的。聯共對於蘇維埃，是沒有命令的，聯共只命令共產黨黨員及黨團。這些黨員在羣衆中間盡量宣傳黨的路線，使羣衆在蘇維埃中都擁護黨的意見，因此，共產黨在羣衆中是有很雄厚的基礎。在各級蘇維埃的代表大會中，產黨員並不佔大多數，但共產黨的政策，却爲大多數羣衆自動的擁護。

許多人以為在蘇聯內部是沒有自由的，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很明顯的在蘇聯任何工廠學校機關閱兵營農村每天都有不斷的集會，譬如一個工廠，除了黨的組織外，有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有職工會的組織及救濟國際革命救濟會之發展，航空化學會的組織，武裝的軍事組織，以及俱樂部之組織，在俱樂部及職工會之下，辦了許多關於文化遊戲藝術研究……的事業，因此又有許多組織。在一切的組織上，在任何機關中，都形成了鞏固的團結，生活

在蘇維埃社會的，現在已經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是以社會為單位了。各地都表現着有組織的生活，共產黨的領導，在羣衆中間，已經深入羣衆，變成大多數羣衆之領導者，因為這樣，所以聯邦共產黨雖然不能命令蘇維埃，但是蘇維埃以及蘇維埃所影響的羣衆，却都在聯共政治路線之下。

無論各帝國主義是怎樣侮辱蘇聯，無論資產階級的學者是怎樣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主義是做不通的道路，但是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蘇聯，經濟的建設，政權之鞏固，是我們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看不到的現象。除非他是個否認事實有意侮辱的造謠者。

因為是這樣，全世界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線，一天一天的顯明了。最近一切國際上的活動，如倫敦會議海牙會議日內瓦會議，他們一方面是想一致的團結，消弭自己內部的矛盾，同時也都負帶着加緊進攻蘇聯之偉大使命，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衝突，前途終恐不免于最終戰爭，

帝國主義已經準備了。從波羅的海到中歐，亞洲以及滿蒙海參威一帶，延長數千里的戰線，都是經過很多的努力。在帝國主義及蘇聯準備上却是已有相當之成功。但是在另一方

而，蘇聯的本國也是很顯然在準備着答覆了帝國主義對他之進攻。蘇聯政府現在也是同樣的公開的號召全國羣衆加緊武裝保護十月革命之勝利，武裝保護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

蘇聯在一般的武裝上，如海陸空軍都是一樣的逐漸的準備了。固然帝國主義對於海陸空軍計劃之擴大或者是要超過蘇聯，但是蘇聯還是一樣的最激烈的和帝國主義競爭着。並且蘇聯在國內，不僅有了相當的準備，在國外他也還有新的特殊的準備，這正是所有帝國主義所認為最危險最恐慌的，就是蘇聯的政治影響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革命之擴大。這就是蘇聯在全世界範圍內準備着用革命來回答戰爭。在蘇聯的國家，每年都有不斷的各國農人代表團到蘇聯參觀，他們實際的看到蘇聯經濟建設之偉大。尤其在西歐工人中，蘇聯已經樹立了絕對不可忽視的勢力。尤其當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期，只有蘇聯經濟以及工農生活得着適當的解決，這個事實更能非常鼓動全世界無產階級對蘇聯之同情。就是這一個原素，在將來世界大戰中將有偉大作用的。在新的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爆裂的時候，蘇聯不只是準備了紅軍及海軍空軍，並且準備了世界革命與殖民地革命，這些事實，雖然並不是蘇聯政府所能造成的，但是却是蘇聯的影響所幫助的。因此，現在全世界已經走到歷史之一

個劇大轉變的前夜，這個轉變就是新的戰爭。帝國主義必不可免的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之大戰的爆發，將要解決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

